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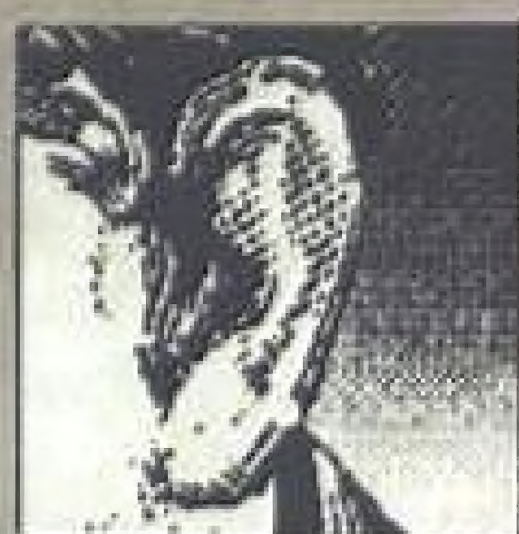
傳播館 36



Television, Audiences &  
Cultural Studies

David Morley 著  
馮建三 譯

# 電視，觀眾 與文化研究





Television, Audiences &  
Cultural Studies

David Morley 著  
馮建三 譯

---

電視，觀眾  
與文化研究

*Television, Audiences & Cultural Studies*

Copyright © 1992 by David Morley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Routledge Publishers in 1992.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utledge Publishers.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1995 by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G. 206

傳播學名著譯叢

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

---

原書名 / *Television, Audiences & Cultural Studies*

著者 / David Morley

譯者 / 馮建三

主編 / 陳世敏 · 潘家慶 · 鄭瑞城

責任編輯 / 趙曼如

---

發行人 / 王榮文

出版者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184 號 7 樓之 5

郵撥 / 0189456-1 電話 / (02) 365-3707

傳真號碼 / (02) 365-8989

發行代理 / 信報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 (02) 365-1212 傳真號碼 / (02) 365-7979

---

著作權顧問 / 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 / 王秀哲律師 · 董安丹律師

---

排版 / 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 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1995(民 84)年 6 月 1 日 初版一刷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45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2575-1 (原版 0-415-5445-1)

# 《傳播學名著譯叢》譯著前言

DA38/19

傳播學的發展，令人眼花撩亂？

這個學術領域，一度有人宣稱它逐漸消失了；有人說它走到十字路口，正待抉擇去路；有人說它潛沉蟄伏，蓄勢而發，就待春雷乍響。

這些片片馬賽克所拼湊的傳播學面目，像極了快速流洩而過的電腦動畫，令人無法預知下一秒鐘的圖像變化。新聞學延伸出來的媒介效果研究，歷經幾度枯榮，與社會科學結合，成為傳播學。還沒站穩腳跟，傳播學就迫不及待與其他學問進行分工與整合。現在的面目是：

第一、傳播學變成了其他學問的應用科學，產生了政治傳播、組織傳播、教育傳播、健康傳播、環境傳播、危機傳播等跨學科的新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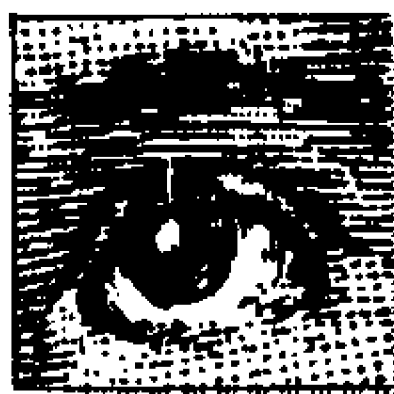
第二、傳播學向其他學問借光，逐漸自立門戶，形成傳播學的一部份枝幹，例如傳播社會學、傳播生態學、傳播政治經濟學、口語傳播學、大眾文化、傳播的文化研究、傳播的批判理論等領域，大大豐富了傳播學的內容。這方面，共同的源頭活水，是傳播革命。

短短五十年歷史，人類經歷了數次傳播革命，使傳播媒介深入社會，改造了當今人類社會的下層結構，也把傳播學術，一再推向另一個令人眼花撩亂的十字路口。

本譯叢目的，即在呈現傳播學繁複多變的面貌，選書時，不拘新舊、學派、取向、範疇，凡自成一家之言，或對傳播的學術和專業有




487386



487386

# 傳 播 館



 远流出版公司



# 目 錄

《傳播學名著譯叢》譯者前言	
譯序	
導論 .....	5
第一篇 理論架構	
第一章 批判電視觀眾研究史 .....	75
第二章 心理分析理論：文本、讀者與主體 .....	97
第二篇 階級、意識形態與詮釋	
第三章 詮釋電視：“全國觀眾”的閱聽人 .....	119
第四章 “全國觀眾”的觀眾：一個批判性的弁文 .....	185
第三篇 性別、家庭娛樂與收視行為	
第五章 研究發展：由「解碼」而至觀看脈絡 .....	207
第六章 家庭收視行為的性別架構 .....	215
第七章 起自“家庭電視”，走向媒介消費的社會學 .....	247
第四篇 方法學的議題	
第八章 力求以方誌學取向，研究電視觀眾 .....	265
第五篇 電視、科技與消費	
第九章 家庭內的傳播：科技與意義 .....	307
第十章 電視消費是一種商品關係 .....	329



第十一章 私人世界與性別化科技 .....	341
-----------------------	-----

**第六篇 公與私之間**

第十二章 建構日常生活：政治傳播與家庭媒介 .....	385
-----------------------------	-----

第十三章 全球共本土與客廳 .....	415
---------------------	-----

**參考書目**

**中英對照索引**

**英中對照索引**



## 譯 序

譯完一本書，似乎應該循例作點說明。

首先還是謝謝陳世敏老師，由於他靜默中透露的熱忱，交代我翻譯這本書，這才讓我的冥想進度能夠跟上腳步。四年多前還在英國讀書的時候，心想，每年翻譯一本，至少持續工作二十年，屆時就會有二十本可以一讀的書籍。目前的進度有點超前，來日尚未可知。

比起創作，翻譯比較容易掌握進度，若能適當加註及撰寫導讀，也比較能夠加快本地知識的創作。比起翻譯，創作比較能夠得到認同，也比較能夠符合學院升等規則的要求。對於個人心智的滿足及物質的報酬，社會科學的翻譯與創作，孰高孰低，比較不能輕易判定，或許應該說兩種工作所索求的勞動，具有不可共量比擬的屬性，是翻譯是創作，除了按照適合自己的方式分配勞動力以外，大概有些造化的成分。

這本譯書的譯註加得不夠多、不夠詳細，也沒有導讀，譯文也多有令人不滿之處，尚請讀者諒察，但希望無損於這本書在這個領域應有的學術地位。陳老師認為本書值得翻譯，應該多少是心中有望，期盼讀者閱讀這些論文以後，能夠減免重複閱讀相關類書的負擔，然後積累信心，進而動手開挖本地社會的素材，提煉「在台灣看電視」的知識才是。

能夠如此已經相當難得，但更大的挑戰並未就此結束。



一九九四年辭世的英國社會科學家密力班（Ralph Miliband）曾提醒我們，所謂「智識上的悲觀，意志上的樂觀」這句話，在政治上非常要不得，因為如果客觀的理智告訴我們前景不再可能轉好，則主觀意志的昂揚戰鬥，又有什麼意義？因此，在他看來，經常被誤為葛蘭西的話而引用，但其實典出浪漫文人羅曼羅蘭的這句話，雖然高貴，卻必須拋棄。與此相同，假使我們無意耽溺在文本的拆解及閱聽人的解讀，那麼，接下來的重要工作正是將這些研究成果，回饋並掛連於電視政策的分析、調整及制定，如果時間還願意等一等的話。

馮建三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於魚路古道



## 導 論

本書收錄的材料，目的在於透過一個特定的解讀方式，展示筆者的研究軌跡。這道軌跡的原點，起自於分析電視新聞時事節目的意識形態結構，穿過了內容較為廣泛的流行節目這個範疇，然後一路挺進，走向許許多多閱聽人日夜均涉及的消費與解碼之多面向過程。這部著作同時也代表了一種嘗試，想要重新架構意識形態的研究，將它置放在家庭內部這個較為廣泛的傳播脈絡當中，它包括了新傳播科技、廣電媒介及家庭權力動態進展的錯綜連結關係。最近幾年，筆者致力於發掘，就其所扮演的根本性角色而言，大眾媒介究竟如何構連接合了公共與私人領域，大眾媒介究竟如何將空間、時間，以及社羣納入特定的社會性組織？貫穿本書的論點是，唯有將當前關於媒介建構文化認同的種種論爭，放到這個脈絡中考察，我們才能得到最好的研究成果（參見 Morley and Robins, 1989, 1990 及 1992）。

專以後見之明論事，或是聲稱這部著作的軌跡圓融連貫，均是危險之舉，筆者對此頗有自知之明。究其實，本書只是往返於故園舊土的路途，一而再、再而三地針對先前已經存在的一些問題，再作探究；有些時候則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模鑄這些問題；另有些時候則轉換視角，扣門問津這些課題。

可以這麼說，本書各章的旨趣焦點，歷經了一系列的原則轉換，起始於關注意識形態的多種問題與多種電視訊息的分析，滑進階級結



構及解碼過程的成套問題，然後一路挺進，朝向家庭權力脈絡，強調性別等差所造成的收視情況之分歧。前進到了這個基點之後，本書又有兩次主要的轉折：其一，研究旨趣的焦點，原先是專研電視作為一種分神(decentring)的器物，現在則是走向包容更為廣泛的關懷，關注在家庭領域之內，多種資訊與傳播科技的多重使用狀況；其二，筆者擴大了研究脈絡，詢問在媒介的後現代地理空間內，以上提及的這些媒介，在建構民族國家與文化認同時，究竟有些什麼功能。因此，本書各章與各章之間，非但有若干重複之處，它們的論調亦略有不勻稱的地方，畢竟它們原先所設定的讀者羣，繁複不一。話雖如此，將各章的材料大底保持原貌，似乎仍然是最為適宜的。

這篇導論的目的，旨在向讀者表明，本書軌跡所行經的智識背景與脈絡（第二小節），回顧其它學者針對筆者之研究（尤其是《全國觀眾》*Nationwide*這個實徵的閱聽人研究）的評價（正面與負面均包括在反省之列）（第三小節），積極參與、介入當代的多種論爭，探討閱聽人研究在未來應該遵循的方向（第四小節）。不過，（至少對筆者而言）（譯按：在這些節次之前）就說是當作序言吧，似乎也應該就這部著作的書名，亦即使用這些術語的意義，提出說明。

### 一、一本書的名稱，隱藏著什麼玄機？

這本書取名為《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Television, Aud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顯然，筆者自有若干想法，因此有此書名；再究其實，就書名涉及的每一個術語（以及它們句法上的相互關聯性）來說，讀者會以為它們隱含著什麼玄機，又只能猜測由人，筆者是不能完全控制的。

筆者將逆轉順序，從最後一個術語「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開始說起。已有不少論者指出，原初發源於一九六〇與一九七〇年代，以英格蘭(England)作為背景脈絡的文化研究，如今已然日漸被納入學院的建制，並且內規隱然成形。非但如此，如此的一個特定正統觀與行事之排列，抑且跨洋飄海，由英國而向國際輸出，宛如彼時此地的英格蘭的文化研究成果，可以作為一個現成的樣版，供人取經。這些論者認為，凡此種種現象，實在危殆至極，而筆者深深以為他們所言甚是。

在另一篇論文，安與筆者(Ang and Morley, 1989)亦曾指出，想要將源自英國的文化研究橫向移植，十分危險，單只是透過出版品的出口業，就要將此領域，建構成為一個足以自由流通來往的跨國學術典範，實在不足取法。我們當時已經愷陳，文化研究並不是「固定的思想內涵，更不能任意由甲地移向乙地，它們在互異的民族國家或地域的脈絡，並不能說是帶有相似的運作方式」，而即便有人硬要這麼想，也實在裨益不大。反之，

伴隨脈絡的轉換，文化研究的位置與相關性也產生了變異，它們的位置與相關性若何，總是必須扣連於當地多種形式之政治與知識論述的特殊性格……文化研究也者，取決於脈絡的狀況，這正是我們必須謹記在心者；尤有進者，面對有人想要將文化研究定型化、正統化的發展趨向，面對有人想要從文化研究得到成套規範化語彙的誘惑，如果我們真想拒斥這些趨向與誘惑，更是必須將此謹記在心。(Ang and Morley, 1989: 135-6)

另外，滕納(G. Turner, 1990b)說得極是，他的論調與我們相近，



他指出了兩個頗堪扼腕的發展趨向。其一，事實上只是「英格蘭的」(English) 文化研究，卻被說成是英國的 (British) 的文化研究 (至少多年以來，相關的種族問題完全被排除而不問了：參考 Hall, 1988b；威爾斯、蘇格蘭與北愛爾蘭跑到哪去了?)；其次，尤有進者，英國的風格還竟然「自行僭越」，致使發生了多重不合理的情況，比如，「探討英國媒介的表意過程，隱然被當作是探討各地一般媒介的表意過程」——這彷彿是說，就某個意義而言，英國的事例本質上 (而不是歷經了帝國主義階段以後，特定的歷史狀況)，「已然成為標竿，而世界其它各國只是其變形」(ibid., 5)。順此傾向而下，就有論者會認為，「電視的多重文本與閱聽人，跨越了文化與政治疆界，已然日漸同質化」，而這是不妥當的一種趨勢；論者卻因此而忽略，這些議題理當放回它們各自的特定脈絡，才能妥當地分析 (Turner 1990b: 7)。滕納舉了例子說明，他指出，英國的文化研究出口至美國以後，由於「美國社會對於流行 (popular) 這個觀念的界定，在主流文化形構內，佔據了非常不同的位置」，因此也就造成了多樣後果，其中之一是，許多英國文化研究所抱持而奉若神明的文化樂觀之情，雖然引發了爭議，但在美國卻是更形強化(譯按：美國方面更是以樂觀之情審度文化現象了)。

筆鋒一轉，滕納再以澳洲為例，這個地方與英國截然相反，崇尚陽剛、反權威與民族國家價值觀的文化意義。澳洲人「看重體力的勞動，對於智識抱持懷疑……深深以身為勞工階級而自豪」(p.12)。誠如魏理士 (P. Willis, 1978) 所說，如果這等情況在英國文化，是一種低人一等的臣服的 (或甚至隱含著敵對的) 論述，那麼，放在澳洲這個後殖民文化的脈絡再作觀察，如果認為它的運作實況，一如它在英國那般，那可就大謬不然了；在澳洲，同樣的論述倒可能是主流民族國家神話

的一部分哩。事理至明，相同事物與現象，放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時代觀看之，其意義不會總是相等的，文化研究發展至今，如果有任何以不妥當的作法，意欲普同化其成果的傾向，那麼，這不啻是陷自身於危險之困境了。

尤其是在北美洲的學術圈，如今的情況似乎是，文化研究非但幾乎等同於某種後現代的理論建構，它事實上經常被當作是「理論」而已（就筆者個人經驗來作判斷，北美的研究部學生，尤其有此傾向）。將文化研究當作是抽象的理論概念，將它弄成超出人事之外的物神而敬而遠之地膜拜（fetishization），實在讓人覺得突兀，因為霍爾（Stuart Hall）不是說過，學術工作者在這領域的作品，按理會妥適地展示「必有的謙遜之情」嗎？敬若物神而膜拜的過程，事出有因而必須加以解釋，而這等情況也導致了多樣的後果。關於前者，歐卡納（A. O'Connor, 1989）提出的解釋是，第一，「美國人並不習慣文化研究從具體事例，推演而建構理論的風格，尤其是這些事例，大多特屬於英國社會，想要讓美國學生閱讀而後了解，真是談何容易？」誠如他的妙問：「又有多少美國學生……曾經看過“全國觀眾”（Nationwide）這個電視節目？」（p. 407）

（譯按：第二，）造成文化研究如此發展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出版業的經濟律則所致。這裏必須強調的要點，雖然相當平凡，但終極以觀卻十分重要，此即較高層次的抽象論述（「理論」），可以在更為廣大的（並且還不定然是特定國家的）市場，而這樣一來，出版商可以得到較高的利潤率，理論家也可以博得更多更廣的聲名。簡單地說，「理論」最禁得起長途跋涉。❶

❶譯註：本書作者曾經從事「另類」出版事業良久，因此對這個問題特別深有感觸，參見 Landry, C. and Morley, D. et. al., 1985, What A Way to Run A Railroad: an analysis



接著，我們必須轉而討論，文化研究這等被供作物神的過程，究竟產生了什麼後果，其意義又是什麼：誠如歐卡納所說，美國人進口英國的文化研究以後，極為重要的一個特徵是，英國將傳播過程根植於社會再生產與政治生態的意念，不復存在於美國（參見Byars, 1991，該書曾就文化研究在美國的發展狀況，提供了相當有用的說明）。他舉證說，美國人進用、流通霍爾的著作時，通常是將霍爾當作「是建構上層結構的理論家，並且這位理論家已經成功地將傳播孤立看待，使其不受物質與政治限制及壓力的影響」，美國人這種解讀的方式，甚至到了以下的地步，「在後現代的標籤下，……文化本是實踐、形式與制度的意義，完全消失了。」（O'Connor, 1989: 408）。誠如霍爾本人的分析，歷經這種大翻轉之後的解讀，非常危險，因為它不再能夠堅持文化研究之所以成為文化研究的立場——「理論建構與政治方案的多種問題，永遠無法解決，而兩者又處於恒久的緊張關係……（如此一來）……理論建構必然也就觸及政治方案，並使之困擾，反之亦然」（Hall, 1990: 17），這種關係的代價則是，理論建構一了百了的穩定性，邈不可期。（亦請參見 Hall 1986 的論文，內中提及美國人引用他的著作，並使之與後現代主義的多種爭論展開接觸。）<sup>②</sup>

筆者願意呼應梅鐸（G. Murdock）的看法，他說，如果意欲發展而精煉任何一種形式的文化研究，則目前我們面臨的課題是，「將各種傳播過程均涉及的兩個部分——具體的物質部分與曲折的符號論述部分、經濟的與文化的——打從構思階段，就要讓它們產生關聯，而不

---

of radical failure, London: Comedia

②譯註：中文方面，請參見陳光興，1992，〈在「後現代」與「文化研究」之間〉，《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十二期，頁85—115。

是一面倒向任何一個部分」(Murdock, 1989a: 436)。他又說，許許多多的文化研究之成果（尤其是近幾年來，而其中又以北美的變形文化研究更是明顯）所欠缺者，似乎正是這個，進行意義建構之論述過程分析的人，經常只就論述打轉，沒有能夠將這些論述與制度面、經濟面與物質面等等，合併觀察；梅鐸又說，反過來看，我們又常讀到一些著作，「單只是分析文化工業，但很少或是根本沒有觸及它們作為一種工業，其真正運作狀況，究竟是如何」，對於這些看法，筆者更是贊同（p. 436）。

眾多文化研究者的分析，為什麼沒有能夠整合政治經濟研究者的洞見？梅鐸在尋求答案時，提出了一個說明，雖然簡單，卻很富有啟發力。他說(ibid)，幾乎沒有例外，文化研究陣營的主要人物，其學術原初背景，都是文學批評與人文學科，因此，他們主要的關懷重點（以及他們的學養能力），是種類不一的文本；與此對照，整體來看，他們容或也經常提及馬克思主義，但卻對於經濟事務與社會學科，沒有對等的學養或興趣，其中，霍爾是一個重要的例外（參見 Hall, 1980, 該文述及早期的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irmingham〕與社會學的牽連）。而誠如梅鐸所說，這樣一個源自學科出身的限制，本來就已令人扼腕，但現在更是越來越嚴重了，因為新近建制化（譯按：於高等學府成立的）許多「文化研究科系」，主要的根基是人文藝術學門，它們與社會學科很少有制度上的聯繫。

筆者出身社會學界，而正也因為這個緣故，總是感覺自己是文化研究領域的邊緣分子；支配文化研究的主流典範，從文化主義者、結構主義者、心理分析者、後結構主義者或後現代主義者，接踵而至，但總讓我覺得無法進入其核心。因此，梅鐸的洞見更是能夠喚起筆者的認同。由於筆者的這層背景，站在文化研究領域內部而批評我的人，



主要是認為筆者的著作，流於一種本質論者或化約論者的分析。依筆者自己的觀點論事，這本書的主要目的，將正視文化及傳播的社會與物質情境，然後把文化與傳播的多種過程，放進其中，再作分析。筆者眼目所見，乃是文化研究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對於此種傾向，我心深以為憂，因為文本化的意思，經常也就是說文化現象在他們的分析之下，完全自由地流動，脫離了這些文本的重重社會與物質基礎。

再說精確一些，筆者專研各種媒介閱聽人的興趣，原始動力來自於早期的兩股社會學研究取向；而在我看來，文化研究的主流著作，從來沒有能夠恰當地整合這兩股取向的任何一股，筆者又認為，這層疏忽至今對於文化研究這個領域的發展，造成了削弱與頓挫的惡果。我所說的社會學取向，第一股指的是教育社會學及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它們關心的是語言及文化符碼(codes)及社會結構的關係，而這股取向的代表作主要包括了伯恩斯坦(B. Bernstein, 1971)、羅森(H. Rosen, 1972)、Labov(1970)、Keddie(1973)、寶笛(P. Bourdieu, 1972)、Giglioli(1973)、Pride and Holmes(1972)，以及辛士(D. Hymes, 1964)。第二股指的是階級、文化及意識之錯綜關係的研究成果，主要的代表人物及作品包括了帕金(F. Parkin)的早期著作(1971)(該書似乎是文化研究種種辯論所引用的唯一社會學著作，但引用時經常語帶不屑)，但也包括了帕金(1974, 1979)、曼(M. Mann, 1970, 1973)、Moorhouse and Chamberlain(1974)、Bulmer(1975)、Beynon(1973)、Nicholls and Armstrong(1976)、Beynon and Nicholls(1977)，以及《富裕的工人》(*The Affluent Worker*, Goldthorpe and Lockwood et al., 1968)這本雋永的書出版以後，圍繞該書的「資產階級化」(bourgeoisement)這個概念所引發的所有辯論

之作。

如是說來，這些書目只是起點而已，重新徵引這些著作，並不是說我們可以回返這筆早期的文獻而尋得當代問題的答案。不是這樣的，筆者的目的是：(1)表明我的研究成品，出身於社會學領域；(2)論稱這樣子的成品，其社會學式的關懷所必然提出的問題，迄今仍然具有時宜性，即便它提出的解答不一定相干，因為筆者向來主張文化研究必須具備社會學色彩，就筆者個人而言，至少，我期望他人知道我是從這個方向進行文化研究的。

在我看來，這些問題尤其具有現代的時宜性，因為，誠如霍爾最近所說，目前我們面臨了「深浚的危險局面」，其根源是文化研究，尤其是美國的文化研究，正以急遽的速度，趨向於專業化與制度化，它使用解構形式主義 (deconstructionist formalism) 的「理論流暢之論調」。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化研究的論述，徒然是以排山倒海之勢，將所有的東西文本化了……，它只是從語言這個角度，界定權力與政治的本質，再無其它觀點。」(Hall, 1990)

再一次，出版圖書本身的簡單經濟邏輯，接榫於學術生活的急迫需要，最能從物質立場，說明這個(理論上的)觀點。對於才開始萌芽、本來就是泛科際的領域，而且每一個學期都有新課程設立的情況下，學生(及出版商)對於教本的需求孔急，是可以理解的事，但這些教科書卻很快地取得了某種規範性的地位，限制住了、同時也界定了這個領域。例子之一是艾倫(R. Allen, 1987)的《電視與當代批評理論》

(*Channels of Discourse*) (本書中譯本於1993年由遠流出版公司出版)起：該書收輯了多篇介紹(主要是美國的)文化研究的論文，討論的媒體是電視，透過這個手法，毫無疑問地，對於許多學生來說，它具有相當實用的



的參考功能。筆者本人的興趣是，這本重要的論文選集所推廣的，到底是哪一種文化研究的版本？就此而言，筆者同意西伐史東(R. Silverstone, 1989)所說，他指出，儘管該書再三裝腔作勢，信誓旦旦地表明我們的需要，不止是寫出一本電視的符號學(semiology)，而是需要一本電視的社會學著作，儘管該書再三承認電視絕對不能化約成為文本的現象，這本論文集終歸完全是「以文本作為中心的」。誠如霍爾所說，以這方面的情況看，「文本的追求永遠不足以成事」，從事文化研究的人，必須從容生活於「緊張狀態之中，因為文化研究與機構制度、組織行號、代理機關、階級、學術、企業財團、各級團體、以意識形態取人的政黨與專業組織、國家民族、種族與性別等等的多種關係，必然發生聯屬……它所要研究的諸般問題，再憑怎麼具有批判力的文本分析或是其精鍊化，都沒有辦法完整涵蓋。」(Hall, 1990: 16—17)。

以下，筆者要重新提示兩點，作為本節的結論。第一，若說本書將自己定位在文化研究這個領域之內(或說橫跨文化研究?)，那麼，事理應該已經很清楚，筆者在這個領域的位置是相當特殊的(就某方面來說，或許還可以說是邊緣的)，這是因為一直到現在，凡是分析傳播與文化等等引發議論的問題時，我仍然執著於採取社會學式的切入點。

第二，同等重要的是，若說本書並不是一本真正關於「文化研究」的書，它也不能被歸類為傳統定義下的研究閱聽人之作——傳統上認為，這主要是大眾傳播研究那種(相當令人望而生厭的)經驗性的(或唯經驗論者的)範疇。反之，且讓筆者提前在此指出本書的論點，在於它提供了多種重新概念化媒介閱聽人的方法；在某種程度內，這些方法是向大眾傳播研究這個領域「挖角」而重作建構的(參考 de Certeau, 1984)，但另一方面，這些方法又是轉從以下多種學科轉借而來的

——最先筆者從社會語言學與教育社會學汲取養料，晚近則又加入了家庭研究、人類學與地理學。從我自己的經驗作個判斷，正是這些不同學科的交互作用，才最爲能夠恆久地得到最好的研究成果。

回到本書標題的最後一個詞：本書所說的電視，並非一體不變的本質式說法（比如，以下學者就是以本質式的說法，界定這個媒介的，McLuhan, 1964; Heath and Skirrow, 1977; Ellis, 1982）。反之，筆者感到興趣的是羅斯（Andrew Ross, 1988）的提法，他說，「電視隨著被使用的狀態而變」，這個說法相當管用；換言之，我關心的是，在不同時空下，身處不同脈絡的人，他們在收看不同種類的節目時，電視對於他們有什麼意義？筆者與西伐史東合著的論文（本書第九章），已經留意打破以電視作爲中心的媒介研究，我們重新將電視置放於較爲完整的範圍內，看它與其它資訊及傳播科技的關係，我們也將電視的觀看，置放於家庭內其它多種消費的面向中，合併考察。

言詞不盡意之處、今是而昨非之處、身不在其境而散失之處，在所難免。

## 二、起點

就英國的脈絡而言，一九七〇年代早期，媒介研究得以重新蓬勃發展的原因，如果是如霍爾（Hall, 1982）所說，起始於「意識形態的重新發現」，那麼，這樣的再發現又衍生了雙重結果，其一是導向（電視與報紙）新聞的意識形態之結構分析，其次是更爲一般性地，研究焦點移向了媒體的政治報導，尤其是媒體對於明顯引發爭議的論題，如勞資及種族關係的報導。這類型著作的一部分，主要的切入點是偏見

(bias)，只不過複雜程度有別而已（參見 Morley, 1976; Glasgow Media Group, 1976 及其後系列作品），另有一部分作品，其動用的概念，取自葛蘭西（A. Gramsci）與阿圖塞（L. Althusser）兩人的意識形態觀（其他著作之外，參見 Hall et al., 1981）。儘管這些著作在這方面產生了內部的分化，但它們大底仍然同意兩個前提：第一，如果是要研究意識形態的再生產（以及循此而來的社會秩序或霸權之維持），那麼，最能夠產生豐富成果的研究焦點，乃是明顯屬於政治傳播的這個領域；第二，（而這又與第一點賴以成立的意識形態之理論模式，有部分關聯，參見 Abercrombie and Turner 1978; Abercrombie et al., 1984）媒介的多種意識形態效果，事實上，可以經由分析媒介所散發的訊息之文本結構而得知。就此情形而言，媒介閱聽人大都不受這些分析手筆之青睞，而媒介掌控其消費者的力量，通常被視作理所當然。（參見 Connell, 1985）

以上這兩個前提，眾所周知，最近幾年已經被嚴厲地質疑。第一，人們的認知圖像已經擴大，意識到範疇更廣的許多文化產品，其實亦有其深刻的政治意義（人們得以有這樣的認知，部分原因是受惠於女性主義〔feminism〕者與反種族歧視〔antiracism〕者的眼界，是他們指出形象過程，實乃建構個人及文化認同的過程），有此認知以後，人們也就關注了娛樂媒介、通俗小說與音樂的意識形態結構；第二，自從霍爾（Hall, 1973a）發表了那篇雋永的論文之前後（該文談的是電視的製碼與解碼〔decoding〕），愈來愈有更多的人們體認到，媒介產品的文化消費過程，其本質是繁複而矛盾的——電視節目之消費如此（參見，比如，Morley, 1980），其它範圍更為寬廣的流行文化，也是如此（參見 Hebdige, 1979; 1988a）。以下，筆者將簡短地評估前述的兩個轉折，然後嘗試追述它們對於政治傳播這個領域的當代著作，有些什麼含意。



## 「流行」的意義

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以迄於今，出身媒介／文化研究等多種傳統的英國研究者，開始探索「新聞」這個類目以外，諸種媒介產品所形成之結構，具有何等政治與意識形態上的意義。這些林林種種的研究，包括了肥皂劇的性別(gender)認同之建構(參見Hobson, 1982; Ang, 1985)、戲劇與娛樂節目之種族刻板印像的呈現(參見Cohen and Gardner, 1984)、流行小說與戲劇所體現的政治與文化價值(參見McCabe, 1981; McArthur, 1981; Bennett and Woollacott, 1987)，以及猜謎遊戲對於知識本身的呈現(Mills and Rice, 1982)。以言英國的情況，空中大學(Open University)已經蒐集並出版這類作品的一大部分，也就是極具影響力的課程「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之教材。這些研究向世人展示，關心媒介如何建構政治文化的人，視野必須放得更寬，他或她也必須廣開定義之門，採納更多類型的媒介文本作為其研究素材。放在這樣的脈絡，新聞以及明顯是「政治」媒介產品的研究，也就只不過是整個領域的一小部分而已。除了這個轉折以外，伴隨著亦將虛構的戲劇節目納作研究素材的趨勢，另一個轉折是電視新聞與時事節目本身之研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媒介研究小組」在一九七五至七七年間，採取BBC早期的晚間雜誌性節目“全國觀眾”(繼承“今夜”(Tonight)，成為英國電視雜誌性節目的「旗鑑」)，作為其分析焦點。

“全國觀眾”值得研究的原因，部分是為了它在BBC整體節目編排的政策，位居樞紐——BBC明顯地是想要在華燈初上之時，透過流行性雜誌節目的形式(而這個形式既忽略了政治，也可以說是超越了政治)，吸引住大羣的閱聽人。在某個層次上，這個節目的企圖心可以說是相當

有限，它顯然無意於執守嚴肅的節目製作，原因是它認定這根本不是觀眾的需求。誠如該節目的一位編輯（Michael Bunce）所說：

你總得出點奇招，讓人難以猜測。你的觀眾既有郵局局長，但也有刺青的女士呀。大多數人辛勤工作了一天，坐下來以後，他們可不要每晚都來個「硬幫幫的」、需要全神貫注的節目。（刊登於《週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的訪問，1975年3月2日）

然而，雖說這個節目的優先順序，必然是企圖以其多種娛樂內涵，撩撥（及抓住）它的觀眾，但隨著「媒介分析小組」的進展，情況也愈趨明顯，亦即到了另外一個層次，該節目獨特地強調「日常生活」之稀奇古怪與變幻趣味以外，我們事實上已經可以看出，它所傳遞的成套政治價值觀是相當明確而濃厚的，而其手法正是透過「稀疏平常的」、毫不起眼的呈現風格。節目主持人那種虛張聲勢，以「街頭凡人」那種姿態，像是要均等地嘲諷天下政客與官僚，自認為代表了「街頭凡人」的觀點，那麼，其前提是說，所有的這些政治議題，到頭來都可以從常識的角度來談，而且這樣的角度最為有效，也最為能夠解決問題——這類節目最終都明顯地以常識作為圖騰，並且狀極尊崇。「媒介分析小組」（Brunsdon and Morley, 1978）主要的關懷點，在於展示這樣的一個節目，儘管把什麼都弄成是自然而然，把多種現象的關係也說得是自然而然，但它們其實（必然）是以某種特定的方式，界定了什麼才是常識，而它們又認為這樣的常識，想來無關乎政治，唯有透過這些無關乎政治的東西才能了解「政客與官僚」的古怪行徑。（狀似自然而然，但卻是人為建構的）常識觀，事後也就被舉作標竿，用以衡量評價所有的政治問題。這麼看來，常識的建構過程也就是最為重要的一個意識形

態(並且,當然,到頭來也是政治的)過程之一,觀眾收看類如“全國觀眾”等媒介節目的心情、狀態,亦為這個氣氛籠罩,因為這些節目總是將外在人們所不知的政治世界,轉換成日常言語(「稍等,請問財政大臣,這些措施對一般人民有些什麼意義?」),而這樣一來,這些節目等於替他們的觀眾建構了相當奇特的一個政治世界觀,也讓他們的觀眾與政治世界產生了關聯。簡短地說,這裏的論點是說(請見 Brunsdon and Morley, 1978, 第四章),明顯想要將自己說成是無關乎政治的媒介節目、訊息,其實並非如此,就此展開分析,對於任何想要解析政治文化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再說回來,筆者研究所涉及的要點,並不只是媒介節目、訊息之分析,同等重要的是,類型不同的閱聽人,他(她)們又是怎麼解讀這些節目與訊息的。同時,對於筆者所蒐集的閱聽人之反應類型,別人又是怎麼理解的?這也是一個問題。

### 三、回顧：再思考《全國觀眾》

一九八七年,羅薇(J. Radway, 1984b [1987]: 2)在《解讀愛情小說》(*Reading the Romance*)這本書的英國版,說得很好。她說,「無論她有些什麼意向,任何一位作家都沒有辦法預見或規約她的書,應該怎麼衍展,也沒有辦法要求她的書被怎麼閱讀。」羅薇寫這篇導論的用意,是要解釋她的著作究竟在什麼特殊的脈絡中發展,同時,她也企圖為該書的英國版,「取得一個特別的閱讀位置」(前引注, p. 1)。筆者認為,這篇導論具有範例的地位,原因是雙重的。第一,該文不僅只是清晰地陳述了(譯按:《解讀愛情小說》於一九八四年在美國出版以後)她所察覺到的多種限制;其次,該文也清晰而有力地重新複述羅薇原先提出而企



圖回答的多方問題，迄今仍然有其重要性。<sup>③</sup>

任何一位作者，事後想要就他人對於其先前作品的詮釋提出評論，顯然是要冒點風險的。他人可能會認為這位作者的回應，終會徒勞無功，或者會認為這位作者對於他人的批評，回應過度，或者，這兩種情形會同時出現。尤其是，如果這部作品的主要關注點，在於各方閱聽人詮釋媒介文本的多種方式，那麼，這裏所指出的弔詭之處，就又更加明顯了。筆者對於這些情形十分清楚，對於巴特（Roland Barthes, 1977）所提的作者論<sup>④</sup>亦相當明白，然而，尤其是針對《全國觀眾》（*The Nationwide*）這本研究閱聽人的書出版以後，各界所提出的詮釋（或說，多種「解碼」），筆者想要有所回應，提出一些評論。筆者這麼作的企圖，在於（重新）建構我所認為是解讀該書的比較妥當的一種方法（preferred reading）。筆者採取的這個寫作程序，容或需要一些說明，以下就是這麼做的簡短理由。

不消說，學術界人士在《全國觀眾》這本書出版以後（Morley, 1980）所給予的注意，是筆者衷心銘感的，而該書出版至今亦超出了十年，但仍然廣被引用，這也是筆者所深為感謝的；不過，該書為人引用的某些方式，倒還是令我覺得忐忑的。第一，該書已經絕版了一段時候，除了可以利用圖書館的若干人士以外，大多數當代的讀者，只能透過二手引用而知悉該書的內容，這些二手引用包括了專門用作學生教本的書所作的摘要與解說，比如費斯克（J. Fiske 1987a）或滕納（1990a）。基於這樣的事實與考量，筆者本書的第二章也就摘述了該書的要點與

③譯註：相關中文類書，請參見林芳玫，1994，《解讀瓊瑤愛情王國》，台北時報出版社。

④譯註：指作者對於已完成的文本，再無控制之可能，因為讀者可以自行決定如何解讀，這也就是「作者已死」之說。

內容，這麼作的好壞勿論，但至少這部前期的著作，能夠透過這樣的方式，以原本的面貌，供人討論。第二，這些二手詮釋的文字，不乏引用失實的事例。造成這種情形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談及該書的某些著作，其實只是轉述了他人對於該書的摘要而已。舉個例子，有人說（Frow, 1991:60註3），那本書犯下了一個「典型錯誤」，他們責怪筆者混淆了兩種情況：「問卷答案這種傳統形式的書寫文本，以及直接接觸節目的經驗」。問題是，筆者在執行《全國觀眾》這項研究的時候，從來就沒有使用問卷蒐集資料、取得觀眾的回答（該項研究的方法是「焦點訪談」[focused interview]，源自 Merton and Kendal 1955 的方法）。

類如前例那麼簡單，純屬於事實是否引用正確的問題，很顯然是可以相對輕易地釐清，但另有一些問題卻更為複雜，它們涉及了人們對於該書的詮釋及對於該書意義的評價。在本導論的第四節次，筆者將更為詳盡的說明，為什麼我內心深覺焦慮，原因出在《全國觀眾》出版以後，後來有人拿它的論證作為理論上的藉口，合理化了現狀，我們或許可以將這樣的詮釋，稱作為「別著急，快樂些」派，它主要是出自美國的文化研究（批評這派詮釋的人，亦曾將它取名為「解釋學派」或「新修正學派」）。但在這節骨眼，筆者只舉費斯克(1987a)與滕納(1990a)作為例子，因為他們的著作，對於《全國觀眾》這本書有所詮釋（與取用），並且廣為引作學生的教本。

回顧以觀，筆者尤其注意的是，《全國觀眾》這本書傳遞了什麼樣的行文而被定位為「打破了製碼／解碼的模式」(Turner, 1990a: 136)。費斯克是這麼聲稱的，他說，該書「顯示，莫里(D. Morley)本人發現，霍爾尾隨帕金(Parkin, 1971)，他們兩人都過度強調解讀形態的差異，起源於階級的不同，他們都低估了其他決定解讀過程的因素」(Fiske,

1987: 63)。滕納則這麼說，「莫里想要進一步推論霍爾的製碼／解碼模式，但到頭來卻歸結為，個人解讀電視的情況，還比霍爾的模式來得複雜許多」(Turner, 1990a: 111)。他又接著說：「莫里終究必須承認，社會位置與他所蒐集到的解讀類型，『毫不相關』」(前引書, p. 135)，並且，「莫里承認……企圖將不同的解讀方式，歸諸於整體的社會與階級決定因素（如觀眾的職業團體），注定是要失敗的」(前引書, p. 135)，或者，滕納也在其他地方如此寫道，「是要徒勞無功的」(p.32)，這整個研究計畫根本是「粗糙假設的犧牲者」(p. 136)。

這裏所牽涉的問題是多方面的。羅薇 (Radway, 1984a) 已經很正確地看出，筆者在該書出版以後（參見 Morley, 1981），亦曾察覺《全國觀眾》這個研究太過於專注在「階級這個單一變項，並且對於階級本身這個概念的建構，也流於簡陋」(Radway, 1984a: 9)。為了比對她自身的情況，羅薇又指出，回想起來，她的研究同樣有這個毛病，她「完全栽進了性別的陣地……援用了相當僵化的父權觀念」(前引書, p. 9)。筆者引用這段話的用意是，任何一個經驗性研究，總得在某個地方起個頭，而爲了要把相關的議題納入研究進程當中，有些時候，研究者確實會誇大己身的事例（而事過境遷以後，常有捫腕再三的時候）。《全國觀眾》這個研究，是應該接受合理批評的，筆者一丁點都沒有想要加以掩護，事實上我對該書的謬失，亦相當清楚。但再怎麼說，筆者對於其間涉及的知識史被人曲意陳述這件事，卻必須反身質疑，並且筆者也必須爲該書辯護，畢竟，「誤讀」與「多重解讀」是截然不能相提並論的 (Richards, 1960)。⑤

⑤就此而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雖說「解結構主義」的宏圖，急速被等同於對文本詮釋，採取了一種「什麼都成的」態度，但如此寬鬆空泛的作法，其實與曼 (de Man) 與德



找來原著，翻到所引用的段落，我們很快就會發現，若說有人以機械式的對應關係，解釋「多個意義體系」（帕金的用語）與階級位置的關聯（Parkin, 1971），那麼，這個人應該說是帕金，不是霍爾。同樣明顯的一件事實是，霍爾（1973a）本人那篇雋永的「製碼／解碼」論文，是努力想要避免重複帕金這方面的錯誤，但猶有不能，因為，霍爾畢竟是「擴充了」他的模式。如是說來，逕自賦予階級一個如此獨特的優先地位，使其超越其他社會類目的人，正是筆者早期的一些陳述文字，倒不是霍爾。但即便如此，整樁事情也並非這麼簡單。滕納引用「莫里終究必須承認，社會位置與他所蒐集到的解讀類型，『毫不相關』」（Turner, 1990a: 135）這段話時，事實上漏掉了原文一個關鍵性的字眼。完整的引文應該是：「毫無『直接』相關」（強調之處為筆者所加）。如果有人認為，諸如此類的文本之解釋，似乎無關宏旨，筆者也只能向讀者致歉，但在我看來，滕納省略的字眼，足以引發基本的歧見。無論是霍爾或我本人，如果真的曾經在我們的著作，企圖展現某種徹底形式而又機械式的社會決定論，如果我們曾經說人的諸種解碼僵僵硬硬地全由階級決定，那麼，只要找到證據，顯示其間欠缺這樣的對應關係，則我們的整個論述架構就要為此折損。可惜的很，這樣的立場既非霍爾所有，也不是筆者所說。不是的，我們想要提示的是，這

---

希達均相去甚遠。諾瑞思（Norris, 1991）就這點所引述的「解結構主義者」的說法，相當有趣。第一，曼說，「閱讀先是知識論上的現象，然後才是倫理或美學價值的事。這並不是說存在著一種真實的解讀，這只是說，若不就真與假的問題探究，閱讀之說，殆難以想像」（引自 Norris, 1991: 154）。第二，德希達曾與史樂（John Searle）發生尖銳的辯論，兩人針對奧斯汀（J. Austin）的演說哲學而辯論，其間，德希達的論點直接了當，他認為史樂「界定下的解結構主義根本是錯的（是的，錯而非真的）而且是脆弱的，這個定義對於許許多多的文本，均有差勁的（bad）（是的，差勁的，不好的）而脆弱的解讀，這些文本，第一，就是我的，因此這些解讀必須最後再作解解，或是再再解讀」（Derrida, 引自 Norris, 1991: 158）。

整個涉及的過程，相當繁複，其間，結構位置可能發揮作用，設定了框框架架，致使當事人攫取了不同的文化符碼，而有沒有這些符碼，也就定型化了解碼的過程。尤有進者，《全國觀眾》這個研究，固然顯示解碼的多種類型無法由階級這個單一因素決定，而實在是更為複雜的過程，但那些研究成果確實指出，解碼的定型化在相當重要的程度上，確實存在，而若要更為豐盛地詮釋這樣的結果，我們仍然需要一個社會決定論的模式，只要它能夠超出機械式理論的限制。至少在這個層次裏，筆者是要指稱費斯克與滕納，不但誤讀了筆者在《全國觀眾》所提供的證據，而更為根本的是，他們實在是錯誤地呈現了筆者提出的那些問題，畢竟，該書提出的證據，用意是要就這些問題，提出（部分的）解答。

另外，歐卡納（O'Connor, 1989）在比較概括的一個層次指出，葛羅斯堡（L. Grossberg, 1983）撰文向美國讀者介紹英國的文化研究時，認為英國的文化研究之研究成果（包括筆者及黑迪吉〔D. Hebdige, 1979〕的著作），徒然是一連串的失敗，說是我們的企圖落了空，沒有能夠將「文化」與「社會」作個妥善的聯結，說是我們的研究顯示回應的類型與社會團體之間，沒有清楚的關聯；葛羅斯堡以此解讀方式，進而合理化他的立場，說什麼放棄探索兩者的聯結，轉而擁抱浮動不一的後現代主義之論述立場，才是正道。但是啊，欠缺一個自動而清晰歷歷的對應關係，若說是一種反證，那也只是針對那種最為庸俗的階級理論、最為化約式的文化乃階級（或任何其它形式）之結構化的理論，才足以稱作是反證（參考 Bourdieu, 1984，該書展現的成果，可以作為一個事例，讓我們窺知什麼樣的理論，可以戴上不化約、不求簡、不機械式的桂冠）。

## 方法論的辯論

《全國觀眾》與《家庭電視》(*Family Television*)這兩本書所援用的研究方法，引起了相當多人以批判的態度，加以討論。筆者將在本書第八章，以更爲周延詳盡的文字，陳述我對於這些觀點的回應，因此，這裏僅就若干引發爭論的議題，作個初步說明。

筆者的著作，日後被舉做代表了以方誌學的取向 (ethnographic approach) 研究媒介閱聽人，部分原因是因爲我在那本書的若干地方，自行標舉了那個取向，另一個更爲晚近的原因則是，方誌學 (ethnography) 被放到了更大的一個脈絡，變成了 (過去?) 現代媒介研究者，唯一 (政治上正確的) 研究方法 (即便這種方法自有其危殆之處，亦然，參見 Clifford and Marcus, 1986; Marcus and Fischer, 1986)。尤其是在美國，那裏的文化研究幾乎是把傳播研究當中，具有進步傾向的一類，等同於質化的研究方法，而誠如羅耳 (J. Lull, 1988: 242) 所說，方誌學已經被物化了，變成了一種物神，成爲這個領域的一個「惱人的字眼」。

但究其實，雖然筆者援用的研究方法，原則是可歸類爲質化的，但就我自己的研究成果而言 (注意，《全國觀眾》與《家庭電視》這兩項研究，都包括了量化的元件)，筆者並沒有任何迷信，從未認爲方法論上唯一正確的作法，在於援用質化方法。在我看來，所有大大小小的方法論上的問題，最終一來都是實用與否的考量，決定採用什麼方法，必須多方考慮不同的因素，包括了可用資源有哪些、回答特殊問題所需要的特定類型之資料；此外，我還要更進一步指稱，所有方法學上的考量 (包括方誌學)，勢必付出經濟學家稱之爲「機會成本」的東西——換言之，採用「某一個」特定的方法，也就意味著其他可能亦值得引用的



方法，已被排除。所以說，對於梅鐸的評論，本人深表贊同。他說，就某些目的來說，妥當建構的社會調查仍然是最爲適宜的研究方法。誠如梅鐸所說：

具有批判性的研究成果，並不是以它所援用的技術作爲評斷標準，雖然不少學者立論的基礎，彷彿是說觀察、深度訪談與個人的證詞所提煉的「軟性」資料，是唯一可以認可的證據；雖然他們的言下之意，似乎是說所有「點數計子」的形式，由於與經驗主義妥協，因此必須捨棄，……（Murdock 1989b: 226）

反過來說，筆者倒也並不同意南丁格爾(V. Nightingale, 1986)所說。他認爲，由於方誌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執著於描述，因此多少在本質上，就不適合滿足文化研究的批判目的。筆者的方法論立場是，沒有任何一種單一方法能夠佔盡所有優點，而且，選定了方法以後，方法本身並不能保證一定有好的研究成果，但也不能就說其研究成果一定會乏善可陳。在我想來，讀一本好的調查報告，總要勝過讀一本壞的方誌學研究(反之亦然)。所以說，雖然他的品評，實際上是針對西伐史東對筆者所作的批評，他認爲我們就資訊與傳播科技所作的研究(參見本書第九章)，選用了不妥當的方法，但在原則上，筆者還是同意卡納(J. Corner, 1991: 25-26)的評論意見。他說，贊同方誌學取向的人，在對於「如此有限的『實驗』程序，卻取得了用來作爲激發討論的特定電視螢幕材料，深表不安」之餘，他們又經常地「誇大其詞，認爲收看電視的行爲，如果從一個自然而時斷時看的日常情境中抽離……將扭曲了觀眾看電視的反應狀況，使得研究成果難以讓人接受……這是因爲前已形成的個人認同，有其持續性……而且文本本身的表意過

程，亦有它的穩定性」。就此而言，對於滕納的說法，認為《全國觀眾》這個研究，由於要安排特定的影像內容作為討論之用，最後終要因為它所採用的「形式而刻意、人工的」方法，致而折損失色，筆者也是欠難苟同的（Turner, 1990a: 140）。誠如費斯克（Fiske, 1990: 89）所說，透過方誌學而取得的資料，其情境雖然大抵是由研究者建構並作控制的，並且這樣的程序也讓人在就研究所得而作推論時，保持注意與警覺，但這個方法，就其「本質」來說，並不致使得研究成果，黯然無效。終局以觀，這都取決於你所想到發現的東西，是些什麼。

滕納援引哈特利（J. Hartley, 1987）的論點。他說，閱聽人根本是「向壁虛構之物」，他們在經驗上根本不存在，因此，他的結論更過分，他認為《全國觀眾》這個研究本來就是刻意人工之作，因為它將一些人集合起來，作個訪談，但「這樣的一羣人，如果不是因為研究者的刻意加以集結，也就不會存在，也不會出現在同一個地方」（Turner, 1990a: 164）。這實在是毫不正確的指控。那些接受訪談的團體，原先已經存在，他們都是修習某些特定課程的學生，而我們對他們的訪談，也是在他們一向就很熟悉的教育環境中進行的。誠如筆者在其它地方所說（Morley, 1981），這個方法所涉及的程序，並非沒有它的成本與多種限制，但成本也好，限制也好，卻不是滕納這裏所推演得到的。筆者將在下文援用吉爾士（C. Geertz, 1988）的觀點，指出哈特利本人的立場，本來就誤解了「向壁虛構之物」（作出來的某種東西）（fiction）這個概念，哈特利弄不清楚什麼是「無中生有」（making things out），什麼又是「再作建構」（making things up）。

就我本人來說，滕納認為筆者所援用方誌學方法，在《全國觀眾》這本書裏，還沒有「發揮得淋漓盡致」（Turner, 1990a: 136），對於這個

說法，我完全接受；但再說回來，筆者既然在前面已經提出那些答辯，我也就不會認為，單是這樣的一個事實，對於該項研究的效度，會有些什麼特別的後果。只有認為單是透過方誌學，就足以回答所有方法論的問題，才有可能得出那種結論。同樣道理，羅薇（Radway, 1988）所言，認為媒介閱聽人的方誌學研究，問題出在它所涵蓋的背景過度狹隘，雖然讓筆者心有戚戚（關於這點，請參見 Evans, 1990, 該文論及傳統人類學方誌學的方法，以及媒介領域所習慣使用的方誌學，有其歧異），但我們卻也應該同時注意卡納的論點，他說，「理論層次不足，卻又想要不當地放大脈絡這個概念」，對照之下，將產生許多危險（Corner, 1991: 28）。卡納的評述應該足以讓我們駐足省思，我們或可因此而不再急躁論事，或許我們因此而知道，在某些情況下，就算是照顧到了「更多的脈絡」，也不必然保證這個作法已符合方法論的要求。

再跳到另一個議題，批評《全國觀眾》與《家庭電視》這兩個研究的人，一再指責這兩本書誇大了甲團體與乙團體之間的差異（一端是根據職業而產生的團體，再另一端則是根據性別而派生的團體）。對於這點批評，筆者倒是樂意坦承，因為這正是前舉兩項研究的目的，我當時正是想要（分別將）階級與性別的問題，引入媒介研究議程的核心，畢竟，唯有站在這個基點之上，往後過度簡化的其它研究論點，才能得所匡正。撫今追昔，或許讓人不勝驚嘆，現今我們習以為常、但卻已然經過轉化的議題，當年在筆者撰寫《全國觀眾》之時，（譯按：階級等等）議題大多無法在媒介消費的研究文獻中，找到任何蹤跡，雖然（稍前引述的）教育社會學的所有著作，已然清楚展示了階級用於解釋傳播過程，非常貼切。與此相近的是，筆者撰寫《家庭電視》這本書之時（Morley, 1985），雖然外界的心理分析之作，都已經對準了性別的問題，在電影

研究方面開疆拓土(儘管論述的文字相當抽象)，但是，除了少數一些人的研究成果以外 (Brunsdon, 1981; Hobson, 1982; Modleski, 1984; Radway, 1984; Ang, 1985)，性別因素在觀眾收看電視節目的影響，相對說來，是處於邊緣性的問題，當然，這是與性別因素在當今所受重視的程度，作了比較以後所得到的發現。

### 戰略性本質至上論與方法論個人主義

早期文化研究的傳統，適用在媒介議題時，主要的焦點是階級的相關問題，如果這樣的一個情形，在相對晚近的這段期間，已被崛起的女性主義及其專注於性別問題研究所取代，那麼，更為晚近一些，新近突竄的反種族歧視觀點，以及隨之而來的堅持，認為種族與氏族問題必須佔有一席之地，則又(部分地)更進一步，重新形塑及建構了關於性別議題的論述。在這方面，一篇重要(而廣為引用的)論文，出自玻玻 (J. Bobo, 1988) 之手，她分析了「黑人女性」作為影片(如“紫色姊妹花” [The Color Purple])，的「文化讀者」(black women as cultural readers)之身分。玻玻為自己所設定的研究目標，在於了解為什麼「黑人女性對該部影片的反應一面倒，都是正面的」(相對之下，許多基進的觀眾與評論家都以負面態度，評價該影片，兩種反應顯然矛盾)，「為什麼在人物時而陳腐的脈絡下，人們還是喜歡這部影片？……」而「這羣特定的閱聽人，又怎麼在如此主流的文本當中，創造其意義，並運用已然重作建構之意義，強化自身及其社會團體的力量」(Bobo, 1988: 92-93)。

如果有人要認為玻玻使用的類目「黑人女性」，隱含著本質至上的論調 (essentialism)，並以此指責她，那麼，這樣的批評與筆者等人所受的批評，其實是相同的，比如說，筆者《全國觀眾》這本書所受的



批評，主要集中於筆者不應該堅持階級（class）是最重要的解釋類目，而羅薇強調性別所作的分析（Radway, 1984b），同樣亦遭受了抨擊。（譯按：但堅持不同分析類目，各有其優先性，有什麼值得批評呢？這是因為）本質至上的論調，流於過度自動地從結構位置，汲取解碼策略（想想以下的情形，「來自於邊緣地位的團體〔有色人種、女性、窮人等等〕」，他們參與主流媒介之時，先已站在了一個對立的位置）。如同筆者前已指出的論點，我願意在此為玻玻的分析辯護，就這些理論上的根基而言，她完成了使命，將種族與氏族的問題，植立於媒介分析的根本架構之中，在這方面，筆者認為玻玻的成就，遠遠超出批評她的人所能理解的。明顯可知的是，其後的理論工作，有必要研擬一套不化約以求的分析架構，接合種族、氏族與性別之多種結構與文化的諸般結構（以英國的情境來說，《第三文本》〔*Third Text*〕這個期刊登載了 Mercer〔1990〕與 Gilroy〔1989〕的辯論文章，是個可供參考的例子），若能如此，必有極大貢獻。總的說來，不論在這方面有些什麼理論上的缺失，玻玻的研究，具有極大的長處，她的立論分析，清晰穩固，（至少提供了某些）黑人女性觀眾收看這類主流材料之時，有些什麼特定的反應。

誠如玻玻所說，重要之處在於：

歷經了看戲看電影的一連串經驗以後，身為黑人觀眾，我們已經知道，在某個時候，我們會看到一些陌生的原素。既然如此，我們有兩種選擇……第一個選擇是從此不再接觸媒介產品，在媒介飛奔四竄的年代，這是一個不可能的選擇。另一個選擇，則是針對種族歧視者提出的黑人定義，有所反應及抗辯，我們應該將媒介的負面意涵挑出，並另外發掘媒介中能夠讓我們產生積極意義

的元素。(Bobo, 1988: 101)

玻玻使用「我們」這樣的類目，或許是有些讓人滿心懷疑，但她的中心主旨與實質的論點，仍然合宜。她認為，造成黑人女性對於“紫色姊妹花”這部影片正面反應的原因，是因為她們眼見黑人女性有這麼樣的機會，以非邊緣的角色出現在銀幕上，她們得有這麼樣的機會，身心頓時感到十分舒緩；畢竟，誠如玻玻所說，在整個歷史情境中，「我們亦已了解，主流媒介從來沒有忠實地呈現我們這個族羣。多年以來，我們看電影、看電視節目、讀書報雜誌，從這些親身經驗，我們已有了十足的證據。對於這些花樣不一的主流文本，習慣上，我們已經學會怎麼蒐找出有利的部分，同時對於其它的部分，視若無睹 (Bobo, 1988: 96)。或者，就是這樣，「終於有人說到我們了」(ibid: 101)。

無論是種族或其它類目的本質至上論，明顯都涉及了方法論的問題。就方法論上的程序而言，團體「之間」與團體「之內」的差別（以及筆者看重前者甚於後者，尤其是在《全國觀眾》這個研究，更是如此），也被人批判（Lewis, 1983; Brunt and Jordin, 1986），這些不等的批評，對於筆者選擇團體訪談而不是個別訪談，都表達了懷疑的意見。為什麼作此選擇呢？筆者在下文第三章將會說明，但此處值得一說的是，當初的研究設計確實打算併用團體與個人訪談，後來只取團體訪談，原因是後續的研究經費之限制所致。與此對應的批評，來自於滕納，他說，由於《全國觀眾》欠缺團體之內的個別訪談，「我們對於那些受訪者的回答，也就應該表示懷疑」，因為「團體訪談本身，就已可能引發每個團體成員之意見，趨向一致的現象」，並且筆者的訪談實況，「可能也強化了這種趨向一致的傾向」(Turner, 1990a: 135)。藏匿背後支撐滕納之

批評的想法，似乎來自於方法論個人主義 (methodologically individualist) 對於文化的一些看法。滕納的想法看來是這樣的：使用團體訪談的方法，阻止了每個團體之內的個人，表達他們的個別反應及差異。

(譯按：真是這樣嗎?) 此處涉及的問題是，滕納沒有能夠體認涂爾幹 (E. Durkheim, 1938) 指出的一個根本論點：各種社會事實，自成一格，我們不能將它們化約成爲只是個別事實的「總合」。

若照滕納的立場論事，則有一個根本困難不能解決，波洛克 (F. Pollock, 1955) 在批評主流經驗性民意研究的論文裏，已曾論及這樣的立場，將有些什麼問題。誠如波洛克所說，「若認爲每一個人都有意見，未免讓人懷疑」，這麼說的原因，是因爲「時下流行的民意調查，乍看之下個人的意見似乎是基本的單位，但究其實這個意見卻是來自個人之外，是經過中介的東西」(Pollock, 1955: 228, 233)。波洛克這個核心論點，等於是替《全國觀眾》這個研究的研究方法，說出了最好的理由，筆者容許一個團體中最具有影響力的人，主控了討論的進行，並且扮演串連「團體共識」之梗要，不正是暗合這些人身處相同團體情境中，很有可能均有此例行反應 (譯按：指最有影響力的人，主控了全局) 的事實嗎？誠如波洛克所說，「時下的民意調查，將所有的個人一視同仁，加上一個個計數之餘，亦認爲每一個人 (譯按：實際上) 具有同等的權利，每個人變成都只是數據一點，品質高低相等，但這樣一來，時下這些民意研究，等於也是忽略了社會權力及社會能力欠缺之間，存在著實質的差異」(ibid: 231)，而這樣的等差對於團體中的每一個人，無論是在媒介節目方面，或是其它社會生活方面的集體消費與討論，都具有重大意義。誠如波洛克的警言所說，我們切莫認爲每一個人有若遊牧民族一般，他們的意見是在隔絕孤立的環境中結晶呈現，更不能以爲

這些意見是在社會真空狀態之下產生的（以致團體動力的過程也就不見了）。（譯按：我們應該採取的研究方法，與此靜態抽離的作法）剛好相反，「講求實際的……研究，在選取研究方法的時候……應該讓意見產生、持有與修改的真正過程，與研究時所能夠有的情境，貼得愈近愈好」（ibid: 230）——比如，在團體情境中進行訪談，而受訪者都是這個團體的成員。

#### 四、閱聽人研究，現在如何，以後又會怎麼樣？

當然，事情似乎是這樣的，過去幾年以來，媒介研究這個世界的景觀已經改變了。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往昔那種舊日的傲慢，總以為電視觀眾只是被動無依的消費者，而電視那般神奇的力量就這麼樣地影響了他們。根據這個說法，這些人（總是其他人！）如果不是給一頭釘在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架上，因此顯得可鄙可厭，就是滿腦子的消費至上的慾望。（譯按：到了現在）還好，這段電視觀眾史繼續數說著，說先前描述的圖像並不正確，因為事實上人們挺立在那裏，直挺挺在電視機座之前，使出渾身解數，積極活躍——主流的文化形式任由他們批判的／對抗的解讀；意識形態訊息全憑他們選擇性／顛覆性的看穿……等等。所以說，情況似乎變成了我們實在用不著庸人自擾——觀眾被動無依而只知消費的時代，早就過去啦。誠如伊凡士（W. Evans, 1990）所說，近來的媒介閱聽人（audience）之研究，大抵有兩個特徵：（1）閱聽人總是積極活躍的（並且不是瑣碎的）；（2）媒介內容總是「多義的」，或至少是開放閱聽人詮釋的。由此衍生的問題是，到底這些假設實際上的意義是些什麼？而這些假設又造成了哪些理論的與經驗上的



後果？

## 「新的閱聽人研究」

卡納寫了一篇論「新的閱聽人研究」(new audience research)之問題的文章，其中，對於當前學界就媒介閱聽人之「積極活躍」的辯論，他指認了一些重要的論題。他的主論點是，晚近一些年來，閱聽人研究這個從「需求面」探討媒介的趨勢，日漸升起，但它卻沒有能夠研究媒介的力量，事關政治勢力的運作。根據他的分析，這個新的研究幾乎等同於「一種社會學靠邊靜默不語的形式……此時，日漸受到強調的是收看電視的多種關係，亦即微觀的過程，取代了……從媒介與社會這個宏觀結構下手的論述」(Corner, 1991: 4)。

在筆者看來，雖然對於卡納的許多觀點，我有一些共鳴(參見下文)，但對於他建構這個問題的特定方式，我另有意見，主要是爲了他誤置了宏觀與微觀的關係，如此一來，他也就讓人認定，前者才是「真實的」。在眾多謬失之中，卡納的錯誤之一是，他的分析沒有能夠體認宏觀／微觀之分、真實／瑣碎之別、公／私之界線，以及陰與陽的等等差野，事實上並不是毫不相交，而是有其接合之處；而這些卡納批評的研究，有很多的一部分，卻是向來就以不等的方式，對此接合的可能，表達了關注之力。更爲重要的是，卡納引用的宏觀概念，似乎是把它當作是預先全然已經設定的結構，而不是一種(套用季定思的術語)

「結構化的過程」(structuration, Giddens, 1979)，卡納也沒有能夠弄清楚一件事：唯有透過微觀的過程，方始有可能複製、再生產宏觀的架構。「結構」這樣的詞彙，事實上只是一個用來分析的建構類目，它所探討的是無數微觀過程及事件的類型化(參見 Saussure 1974年關於langue

的地位之討論)。<sup>⑥</sup>除非我們將它作是一個已然物化的概念。正就是爲了這個原因，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媒介小組的研究重點，在其成形階段（參見 Hall et al., 1981），採取的也就自然是方誌學的切入點了：目的不在捨棄宏觀而就微觀（雖然許多方誌學研究者似乎是這麼認定的），並非如此，我們的用意是，透過微觀的分析，將其所得接合於宏觀的架構。

就微觀與宏觀的聯結而言，葛雷西 (C. Gledhill, 1988: 67) 提供了一個相當有用的論述方法，她說，我們應該特別看重「協商」(negotiation) 這個概念的角色，因爲它讓我們在分析不同意義的歸屬方向時，不致「認爲文化生產的過程，完全已經爲經濟……或心理分析所命定」。葛雷西的核心論點可以分別從兩個層次來說，就微觀層次而言，「協商」可以說是取代了「效果」(effects) 這樣的概念，而就宏觀層次以言，相對的則以「爭霸」(hegemony, 必然是不穩定且不完整的過程) 取代了「主控意識形態」的強制（既定而確保產生效果的狀態）<sup>⑦</sup>。這個論點正是說，一般層次的宏觀過程，只能經由無數的微觀權力之執行而見到其運作軌跡，而儘管諸種事件的一般衍展類型，受制於可能性的邏輯，但卻沒有任何一樁權力運作的結果，可以預先確保。誠如季定思所說 (Giddens, 1979)，結構並不是外在於行動之外的東西，而是說，結構乃是透過日常生活的各種具體活動，再生且複製的，我們如果想要分析結構，

<sup>⑥</sup>譯註：該書有中文譯本，1985年由台北弘文館出版，中譯書名《普通語言教學課程》。

<sup>⑦</sup>譯註：關於「爭霸」（另譯「霸權」）發生的場域，是在「國家機器」或是在「市民社會」，葛雷西似乎亦未交代得很清楚，但其中一個要點是不變的，此即參與 hegemony 建構的雙方，應該都有「積極而活躍的參與之後，始得共識」(active consent)。關於霸權的介紹，入門之作，請參見 Robert Boccock, 1986, *Hegemony*，已由田心喻中譯，《文化霸權》，1991，遠流公司出版。

則必須將它當作是歷史過程所形成的動態東西，是可以修正的——結構經由行動而建構，一如行動受制於結構。

就結構與行動的聯結來說，梅鐸很正確地指出，寶笛所說「習氣」(habitus)這個概念相當有用，可以幫助我們掌握行動與結構這兩個面向的聯結關係。習氣是多種性向與多種素養的結合體，足以催生樣式繁複的特定行事舉止，並為其背書，但又誠如梅鐸所說，「習氣並不是習慣。它們並不是固定的規則與慣例。究其實，它們提供的是基礎，使得結構之內，另有變化有致的空間，這就好像數個爵士樂手可以……繞著一個主題而演奏一樣」(Murdock, 1989b: 243)。與此同時，梅鐸儘管強調寶笛整體理論的正面部分，但他又很正確地批評了寶笛，說寶笛單只是強調早期的家庭社會化經驗，認為這是文化資本與素養的唯一來源，未免言過其實。梅鐸說得對，人們初期的社會化經驗，很是重要，它結構化了人們使用文化諸種符碼的可能性，因此我們必須正視，然而，若說這樣的過程無法逆轉，則又顯露了過度命定的看法：

在一個人的後期生活經驗裏……一個人在加入了狂熱的宗教團體，或是參加了政黨組織的強烈抗爭活動之後，他（她）論述事物的語彙很可能就會改變，動向也就不同。「語言設下的牢房」著實高而險阻，難以攀越，但脫逃的可能性總還是存在的。(Murdock, 1989 b: 245)

說來不幸，卡納的批評似乎混同了兩個不同的問題：一方面，他對於主控意識形態的看法，還是停留在它是一種既定的結構，而不是將它當作是一種霸權建構的過程（以及隨之而來，對於宏觀過程的微觀面向，保持興趣）；另一方面，媒介研究這個領域，在女性主義的理論與研究之

衝擊下，不再凡事以階級是問，而是轉向關注階級與性別的多重結構，如何產生接合的關係，尤其是關注媒介在公／私界面之間，扮演了什麼角色。這樣的一個研究議程，當然已經是以改頭換面的概念，看待媒介力量（比如說，這就與古典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極為不同），但這並不是說這個研究議程，已將權力的分析排除在外。誠如卡納所說，這仍然不失為一個具有見識的視野，它抱持著「向下修正的」媒介權力之概念，它所接受的是艾伯克倫必等人（Abercrombie et al., 1984）對於「主控意識形態綱領」（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的批判意見（亦請參見筆者對於這個立場的批評，詳見下文）。這樣的意見，既不接受派森思（T. Parsons）對於涂爾幹的解讀方式（認為社會穩定的所有原因，起自「集體良心」或社會的「價值體系」），也不接受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對於馬克思的解讀方式（套句馬克思的術語，它忽視了「索然無味的經濟壓力」[the dull compulsion of the economic]；它也忽視了分工複雜之社會，其經濟之相互依賴已經足以襄助社會的運作）。所以說，這裏所採取的論點，只是力求避免過度強調意識形態的角色，或說，套句康乃爾（I. Connell, 1985）更為平淡無奇的話，力求避免「一股腦推卸責任」（blaming the meeja for everything）而已。

說了這麼一些反責卡納的話，筆者還得另外說，他所引以為意的現象，我也有同感。他說，閱聽人研究領域的晚近著作，許多是有缺陷的，它們多是浮面地堅持媒介產品自有其多義性，此外，雖然未經列舉證實，它們也多假設閱聽人的詮釋抗拒之形式，遠比閱聽人臣服於或再生產主控意義的情況，來得普遍（參照 Condit, 1989，該文指出，媒介研究的文獻當中，「強調諸種文本之多義品質過了頭」，並說這是相當不幸的一個傾向）。萬一跟著這個思路前進，誠如卡納所說，必然會低估文本從媒



介產品建構意義的命定能力，並且，這不單會不妥當地將讀者的角色浪漫化了，而且是忽略了類如大眾媒介等等表意系統，實乃廣泛存在，並在某些意義層次上，散布著相對不曖昧的訊息。就像卡納所說的，跟隨這條歡愉（也許是後現代的）路途走去，只知強調各種媒介訊息的多義品質，等於是掉進了「心滿意足的相對主義」之陷阱，（譯按：有若井底之蛙）認為閱聽人的詮釋能耐，範圍如此寬廣而與深度如此入裏，而媒介之力量（media power）這個概念也就變得非常可笑了（Corner, 1991: 29）。

反過來說，類如卡納等人所提出的批評，認為霍爾（Hall, 1973a）原初提出的（譯按：主控、抗拒與）「優勢解讀」模式，有其內在的多種問題與限制，固然為筆者同意，但我還是認為，就許多方面而言，那個模式雖然需要再作修改與發展，但面對著所謂媒介文本同等「開放」而任人詮釋的說法（通常來自 Barthes 1972），它仍然提供了最好的一個另類概念架構。有人指出，霍爾的原始模式混淆了認出（recognition）、了解（comprehension）、詮釋（interpretation）與反應（response）等等概念，筆者同意這些概念最終必須拆開分析，但也有許多關於閱讀與文學社會學的著作（參見 Hoyles, 1977）會認為，既然讀者必須依賴行文的脈絡才能理解文本，強行並且將這些差別分得太細膩，可能讓讀者徒然擁有一個白淨淨、但並不真實的模式，而讀者接觸文本時，到底所為何事，我們也無從知曉了。還有，雖說優勢解讀模式最初確實是為了分析新聞及時事評論而設計，而該模式如果直接用於分析那種類型的材料，最為容易，但如果將它應用於其他材料，倒也不見得像某些批評的人（包括 Corner, 1991）說得那麼困難。舉個例子，那些虛構的文本，仍然存在著層級森明的論述位階，日日為之，並且通常繞著一個或多

個優勢角色的觀點而打轉，既然如此，則移花接木，將原本用來分析古典真實之文本的模式，轉用於虛構的領域，顯然可行（參見本書第四章）。

此外，以後見之明看來，有些學者(C. Brunson, 1989; Gripsrud, 1989)的評語，要大家留意，不要被潮流捲著跑，致而將文本盡情解消於閱讀的過程，可以說是呼應了（譯按：十六年前）考尼漢(M. Counihan, 1973)批評查尼(D. Chaney, 1972)的意見。當時，查尼叫嚷著分析訊息本身，沒有什麼大用處，理由是「就內容本身來說，內容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但）內容只在與閱聽人互動時，方始能夠彰顯意義」。誠如考尼漢所說，就查尼說話的脈絡來看，他無怨無悔地解消訊息，單只看重閱聽人對於訊息的感知、使用與操弄，「彷彿是說，標舉媒介『文本』作為正式分析對象的必要性，說它在傳播研究領域裏，有其獨特地位，居然等同於是澈底拒絕了閱聽人的權利，否認了閱聽人建構所有意義的權利，實乃無可割捨」(Counihan, 1973: 43)。但無庸贅言的是，分析文本或訊息，當然還是有其根本必要性的，因為訊息並不因為有了多義性，就沒有了它本身的結構。閱聽人並不是想要怎麼看就怎麼看，因為一則訊息（或一個節目）並不只是通往世界的一扇窗子，它是一個建構之物。訊息並非一個客體而有其真實的意義，但話說回來，訊息之內是有其多種表意機制，它們揄揚某些意義、甚至是些優勢的意義，但卻同時壓抑其它的意義：這些就是訊息之中，必然衍生的設限圈地之現象。隨著每個聯想情境的變化，相同的訊息才說得上是可以讓人有所不同的詮釋。

這個論點，正是《全國觀眾》此一研究計畫第一部分所援用的分析程序（參見Brunson and Morley, 1978），當時，我們無意以此發現、分

析訊息的「真正意義」，而只是想要跟著「封閉式導航」（標題、高位階觀點……等等），找出主控解碼架構之內，可能可以如何解讀訊息。筆者無意宣稱這是唯一的解讀方式：分析本身必然是一種詮釋性活動；分析之後的所得，其意義如何，最後仍然必須由經驗性研究加以檢證，藉此我們才有辦法知道，閱聽人當中，是哪些部分的人，會在主控的解碼架構內解讀訊息，而不是以「協商的」或「對抗的」方式解讀。

### 「新修正主義」及其批判

異曲同調，柯蘭（J. Curran, 1990）與卡納相同，心懷高度批判的態度，認定大眾傳播研究中的媒介閱聽人探討，根本就是「新的修正主義」。簡而言之，他的指控詞如下：「這個……『新修正主義』……以原創及更新自居……自奉為解放的力量，甩脫了傳統的包袱……不再受其羈絆」（Curran, 1990: 135），但實際上呢？恐怕還是不脫「多元主義者的拼盤，只是溫熱重新端出來當作新菜餚而已」（ibid: 151）。柯蘭認為，這些「新修正主義者」（包括了筆者）「自以為是推陳出新，其實只是再發現的過程」（p.146），而至少就柯蘭本人看來，這些人也誤現了「修正主義」，他們以「肯定的口吻」將修正主義說成是「一種智識上的進步」，他們說在這過程中，「先前在錯誤中打滾的人，由混亂而轉清明」。

（譯按：真是這樣嗎？）事實上，「這些修正主義者」根本就是在「從事……借屍還魂的遊戲……重拾不再有人置信的古老牙慧」（p.153）。在柯蘭眼中，新起的這批研究成果，儘管聲稱「迭有進展」，但其實是原地跑馬，繞著「效果」及「使用與滿足」的研究傳統，猛跑猛跳，而他認為，從事這個研究取向的人，完全不知道這些主流的研究傳統。伊凡士（Evans, 1990）在若干程度裏支持了柯蘭的論點，他說詮釋派傳統的陣

營（亦即柯蘭所說的「新修正主義者」），傾向於弄些早期傳播研究之「皮下注射論」作為箭靶，以其缺失作為「稻草人」，然後再以此對照其他的一些立場，似乎也就凸顯了其他立場的複雜性。

我們可以看出，柯蘭的主要策略是，引用先前主流閱聽人研究當中，籍籍無名的學者，柯蘭說，這些學者向來都是反對任何簡單式的皮下注射之「效果」理論，他們也再三強調閱聽人接收媒介內容時的社會情境，因此，柯蘭認定晚近強調閱聽人積極性的趨向，其實只是新瓶裝舊酒的把戲。柯蘭的論據有兩個問題，頗堪質疑：一個涉及歷史學者的態度，這是關於「故事」所具有的地位之問題；再一個則涉及後見之明總是比較清楚的問題。

我們先挑出第一個問題，對於許多晚近事關歷史的爭辯，柯蘭置若罔聞，事實上，多年以前，賴特（P. Wright, 1985）以及其他入已經將整個問題推進，成為眾所關注的重點，而這個問題正是（任何）歷史在現代扮演了什麼角色。誠如賴特所說，過去的歷史並不是隨意可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反之，過去事蹟所能提供的敘事與召喚，其實是透過不同的方式而建構，它們因此在當代的文化、政治（或學術上的）辯論，扮演了緊要的角色——它們合理化了現在的這個或那個的反對意見或策略。對於歷史的這種性質，我們必須緊記在心。柯蘭本人的分析，正是這麼介入當代辯論的一個方式，這是相當讓人感到興趣的一個方式，它對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未來的閱聽人研究，提出了見解，筆者很樂意看到這樣的現象，但與此同時，我們倒也應該知道，柯蘭也是利用自己的歷史觀，想要以其作為動員工具，呼應一組特定的意見，告訴我們應該如何從事閱聽人研究。說了這許多，目的無非在於點出，柯蘭的歷史觀，必然涉及了更多的東西，超出了他明講的部分；



柯蘭只是想要在「讓人摒息以待的……傳播研究史營造聲中」，「樹立正史」嗎？(Curran, 1990: 146)。柯蘭說這個說法來自於他所抨擊的「修正主義者」，因此必須指正，但其實他是在倡導一種特定的(並且部分未經承認的)議題，而這樣的一種作法，同樣也會受到指控，說是某些特定的論題與問題，都被排除在未來的研究議程之外了。下文，筆者即將就柯蘭分析的這些盲點，再作闡述。

第二個問題與後見之明有關。柯蘭勾勒出來的歷史軌跡，相當具有啟發性，引領我們注意久已為人(包括筆者本人)忽視或不被認可之學者的成就。但我的論點是，這樣的一個特定史觀，(柯蘭或任何人)十五年前絕對沒有辦法寫出，因為彼時柯蘭極力批判的「新修正主義」尚未轉化我們對於閱聽人研究領域的了解，因此我們對於誰或什麼才是這段歷史上的重要人物或議題，根本也就還沒有轉化我們的認知。在我看來，正是在歷經了這層轉化以後，類如柯蘭的史事研究者，才能返回從前，重新解讀傳播研究的歷史，而歷經這層轉化以後，我們現在才能正視這些著作應有的卓越意義，然後以後見之明察覺這些著作，原來可以看作是這些「新修正主義者」的先驅。重點在於，也只有在此「修正主義者的分析」造成了衝擊以後，我們現在才能看清楚先前著作的意義。早先那段時期，這批著作當中，有許多是被看作是脫離了主流傳播研究中心之軌跡的，是邊緣的。誠如塞特等人(Seiter et al., 1989a: 14)所說，如果「學術的吊擺，擺盪在再發現(re-seeing)與修正主義(revisionism)兩極之間」，那麼，「重新觀察」(re-visioning)(或說重新概念化，而這也就是不斷更新我們的視野)的工作，正是這個領域得以保持動力的核心因素。就這整個事例的本質來說，我們應該已知知道，若說要責備別人誤解了歷史，說別人不知道歷史只是在他們眼前衍展

的軌跡，其實有其困難，因為這樣一來，我們在最終也就陷入了不妥當的地位，徒然只是明顯地或隱然地爲了自己的論點，致而聲稱相信這樣或那樣的歷史觀。

根據布倫樂、古勒維區與凱茲 (Blumler, Gurevitch and Katz, 1985: 257) 的看法，「主張焦點對準讀者，詮釋他們解碼過程的人，心弦應該已經響起了陣陣歡愉之聲……因爲……若說是要探討 (譯按：人對訊息) 反應的多重性，他們正是最有經驗的一羣人」。與此類同，羅森格蘭 (K. Rosengren, 1985: 278) 也有類似的聲稱。他認爲，羅薇 (Radway, 1984b) 的著作，「以間接的方式，強烈確認了使用與滿足研究取向的正確性」，他接著又聲稱，「羅薇以她獨具的方法，重新創造了……滿足研究。」

但誠如伊凡士 (Evans, 1990) 所言，就兩者之間的關聯性來說，我們的首要之務，並不在於蒐羅證據而證明文化研究及使用與滿足研究取向，兩者確實存在著如假包換的同一性，反之，我們應該注意的是，(譯按：他們這些人的) 企圖，事實上是不是有些亂點鴛鴦譜，造成了誤導，錯把詮釋學的多種概念，當作滿足研究取向的語彙。第二點 (而誠如史羅德 (K. Schroder, 1987: 13) 所說，實在有些讓人難以啓齒的) 問題是，「爲什麼失傳的一個社會學傳統，倒要一位文化研究的學者來挖掘才得以出土？」史羅德對於這個問題所提出的答案，筆者相當能夠同意。他說，儘管柯蘭及其它一些人現在紛紛以後見之明，認出了那些現在認爲是質化媒介閱聽人研究的「先驅者」，並且對他們多所禮敬，但「事實仍然具在，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他們那些質化的研究……(是) 被犧牲了，在眾聲沉默無語，形成一種現象的情況下，他們企圖研究的東西，在主流社會學看來，都是不可能、無法研究的文化意義與詮釋」(ibid.: 14)。

除了這兩點以外，柯蘭對於這些問題的解剖，另有許多值得進一步商榷的地方。隨手舉個例子，柯蘭信手只大致作了兩大陣營的區分，單是將學術視野二分為「馬克思主義者」與「多元論者」，但這個分法，對於我們清楚認識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葛蘭西與阿圖塞的差異觀點，並沒有幫助。就此而言，他的分析重複了艾伯克倫必等人(Abercrombie et al., 1978, 1984)的謬失，後者在批評「主控意識形態提綱」的時候，也沒有弄清楚葛蘭西與阿圖塞的分野(本章稍前，筆者在談及媒介分析之微觀與宏觀過程的關係時，已曾論及葛蘭西與阿圖塞的差別，請參見)。其次，文化研究這個取向，在借力符號學的過程裏，徹底地改變了我們對於訊息這個概念的認識，訊息不再只是傳輸內容的輸送帶，我們吸收了語言學的睿見，更能洞悉訊息的內涵(雖說形式語意學的模式仍然有其問題，而我們也必須超越它，開步走向社會符號學〔social semiotics〕)，但柯蘭對於文化研究者已對訊息有不同的認知這件事，卻沒有能夠了解其意義。

筆者將在下文指出，美國大眾傳播研究者的若干早期著作(參見Merton, 1946)，在許多方面是相當細膩精緻的，他們已經廣開言論，提出「說服的真正過程是些什麼」的問題，他們也開始研究「抗拒說服性論點的過程，是些什麼」(引自Morley, 1980: 3)，我們可以說，這些研究成果，預見了後來記號語言學就近分析這些議題的若干貢獻。所以，墨頓(R. K. Merton)堅持，我們必須就訊息所生發的文化脈絡，詮釋訊息。可惜的是，往後這個傳統的研究，並沒有能夠長足地景隨墨頓的洞見。在這個節骨眼上，吉爾士的看法是，美國傳播研究者的最大毛病，在於他們其他方面的概念，容或非常細密，但他們對於什麼是符號傳播的過程，卻僅僅具有最初步、最基本的認知。因此，他是這麼說的：

意識形態的因與果，二者之間存在著哪些連結，似乎變成是偶發而無從預測的，這是因為相連兩者的要件，亦即符號形成這個自主過程，幾乎沒有人解析。無論是強調當事各方出於利益契合而產生意識形態作用的理論，或是強調其中一方受制於壓力，因此而產生了意識形態作用的理論，兩者都是直接從來源的分析，跳到了結果的分析，二者都沒有認真檢視意識形態，沒有從互動符碼的體系、犬牙交錯之意義類型來評析意識形態。他們是列出了分析的主題(themes)，當然；甚至，他們也在其內容分析計算了主題出現的次數。但這些計算的結果，並沒有與其他主題扣連並舉，也談不上運用了任何語意理論，研究者只是想當然耳地回溯，認定它們一定是反映了特定的效果，或是往前追索，認定它們一定是扭曲了社會真實。但情緒(sentiment)怎麼轉換而產生意義(significance)，然後得到社會人士的理解與消受，這中間涉及了什麼樣的意識形態過程，卻沒有人聞問了。(引自 Hall, 1974: 278-279)

筆者將要論稱，正是這樣的一個議題，正是文化研究含納了語符學的成果，所以從事文化研究的人，才有辦法在墨頓原初創見提出多年以後，推進他的洞識，畢竟，長久以來，墨頓的見解大抵是被主流研究忽視的。

最後，柯蘭總合在「新修正主義」旗幟下的多種不同的學術傳統，似乎是必須作些區分的。柯蘭與古勒維區最近編輯的《大眾傳播與社會》(*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Curran and Gurevitch, 1991)，內文的結構，主要是環繞著一些假設性的說法而安排，認為媒介研究的激烈



而基進，與主流的傳統已然「聚合」（亦請參見 Schroder 1987; Jensen and Rosengren, 1990）。以這本論文選集的文氣來看，安與赫曼（Ang and J. Hermes, 1991）等諸位後結構主義者的著作，隱然被拿來支持一種（譯按：不甚妥當的）論點，說得粗暴一些，這個論點最終就是要聲稱，傅柯（M. Foucault）眾多著作的主要意義，乃是在於展示自由多元主義者是正確的（或說，至少是比馬克思主義者正確的），因為他（譯按：與多元自由主義者）所談的，正是權力的「分散」（dispersion）。在我看來，混同文化研究所含納的眾多傳統，最終是毫無助益的，儘管我們知道後結構主義者的傾向，往後回返而又重拾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存在著許多問題。

不過，柯蘭之見倒有一得。他說，晚近媒介研究從傅柯著作所得到的遺產，實在是曖昧游移，因為我們所看到的解讀傅柯的文字，雖然偏頗，卻位居主控地位，它所倡議的方向，已將媒介研究支解而沒有了中心（decentring），在這等情況下，誠如柯蘭所說，「媒介的角色變成只是一連串的讀者與文本之接觸，而社會脈絡則可以分解成為一系列的具體事件……此時，外在於論述的權力，完全被撤離了」（Curran, 1990: 140）。柯蘭接著又說，這個視野之下，權力的引信變成是被拆除了（defused）而不是無所不在（diffused），而這其實與美國自由多元傳統主義的權力觀，相去不遠。他說得對。最後，我們還得說，雖然柯蘭宣稱的目標流於寬泛，沒有界定「新修正主義」的內涵，但他批判的核心焦點似乎另有其人，此即費斯克，畢竟，晚近文化研究（主要是在美國）的變化，受到費斯克著作非常巨大的影響（亦請參見 Schudson, 1987）。

## 走向「語符民主之路」？

無庸置疑，若是就引介文化研究，使一整個世代的（主要是美國的）學生與其展開接觸而言，費斯克的著作居功厥偉，但另一方面，筆者認為柯蘭的論點，有其正確性。他指出了費斯克對於文化研究的特殊看法（參見 Fiske, 1987b），問題頗多。最近一些從接受面研究媒介現象的文獻（reception studies）相繼鋪陳證據，認定閱聽人是自主的，這些文獻也以樂觀與救贖的心情，解讀了主流媒介的文本，它們不僅被用來挑戰先前那種頭腦簡單的效果模式，它們本身更是佐證了後現代多元主義的語符民主時代，媒介的影響力其實並不存在。一味追求閱聽人愉悅、爽（pleasure）<sup>⑧</sup>，輕易地就落入了文化的相對立場，而誠如柯蘭所誌，這個立場很快就會被民粹的新自由言詞吸納，不再關注文化價值的有無——或說，不再重視電視的「品質」（參見 Brunsdon, 1990b）——這樣一來，反倒是強化、合理化了全心全力想要解除（譯按：公權力之）管制（譯按：而聽任市場邏輯）者的立場，他們全意要摧毀任何形式的公共廣電體系。誠如塞特（Seiter et al., 1989a: 5）簡要的斷語，他們說，「在我們一頭栽入閱聽人的愉悅、爽當中……我們等於也是身陷險境，持續地為好萊塢支配全球電視市場而背書」，而不消說，這樣的結果當然是與文化研究者的媒介關懷軌跡，背道而馳。

柯蘭的觀察很是入裏（Curran, 1990: 148），他說，費斯克歡欣鼓舞地慶賀「語符民主」的到來，說是人們在一個自主的文化經濟體之內，從變幻廣泛的次文化及團體座標，取得並建構他們各自的意義，實在

⑧譯註：這個英文字來自於法文 *jouissance*，但未能表達法文所具有的動態感覺，倒是漢文的「爽」與法文原意比較貼近。

是很有問題的論斷；確實，而這樣的論斷，很輕易就會被消費者主權 (sovereign consumer) 這種多元主義的保守意識形態所整編，同樣也是大問題。但筆者以上的看法，絕對不是否認費斯克的洞見，絕對不是說流行文化之意義的形成與誕生，沒有費斯克所說的那麼複雜（參見 Seaman, 1992, 該文正是誤解費斯克論點的一個例子）。筆者已經在另一篇文章指出 (Morley, 1989)，除了費斯克的論文以外，其他學者的研究 (Bennett and Woollacot, 1987; Browne, 1984) 也都長足地扭轉了我們的眼界，我們因而更能正視文本意義，其實具有跨越單一文本的本質 (interdiscursive nature)，任何想要以簡單的方式，抓取並孤立單一文本而作分析，是很困難的。

葛羅斯堡也認為，「非但每一個媒介事件都由其他文本中介，事實上，我們根本不知道文本的界限何在，閱聽人所詮釋的、他們真正消費的東西是些什麼，我們無從知道」(Grossberg, 1987: 33)。這是因為文本並不是固著於特定位置而不移動，文本總是以不同的方式，被移動、被置放與被接合於其他文本。但這個說法，亦有必須反駁之處，亦即強調文際之文意關係 (intertextuality) 雖有新意，但它甘冒了數個危險，尤其是文際脈絡的議題，將壓倒了、並且過度決定了各個文本，以及這些文本的特殊性。現在的問題是，順著這條思路走下去，我們可能得到的結論是，文本不復存在，唯有文本的多重解讀才有正身。

費斯克正色指出，我們必須重新理論化電視的文本，唯其如此，我們才能借用巴特的「作品」(work) 與「文本」(text) 之分，探究文本的開放程度。巴特認為，作品是許多「能指詞」(signifier) 建構得出的物理東西，而只有在人閱讀之時，作品才成為文本。從這樣的角度論事，文本也就不可能是一個固定或穩定的東西，而是持續必須由作品

重新、再三創造的。費斯克確實如此認為，他說，「根本沒有『電視觀眾』這回事（請參考 Hartley, 1987），就人的經驗來說，不存在這個可供觸摸的對象……我們現在已經混同了『文本』與『閱聽人』，不再認為它們有些什麼差別……沒有所謂的文本，沒有所謂的閱聽人，有的只是收看的過程」（Fiske, 1989: 56-57）。雖然說了這麼多，但可怪的是，費斯克分析電視猜謎節目的時候，居然重走回頭路，又再主張、強調文本的核心重要性，他自道之詞是說，他覺得「沒有必要以閱聽人作為對象，調查為什麼這類型節目會大受歡迎」，因為「對於節目廣受歡迎的理由，我的理論……認為最好還是研究文本本身」（Fiske, 1984: 5）。

費斯克論及（譯按：霍爾的）「製碼／解碼」模式時，認為這個「理論的價值……在於它的分析重點，從文本轉向了讀者，認定讀者才是意義生發的場所」，他接著又說，方誌學研究方法的主要價值，是因為它「讓我們能夠解釋多元性的問題」（Fiske, 1987a: 63）。費斯克以他個人之見，如此解讀的疑點有二，(1) 這種解讀製碼／解碼模式的方式，忽略了該模式主要精神其實在於強調文本以哪些策略，封閉了意義的解讀（「優勢解讀」〔preferred readings〕等等）；(2) 方誌學的研究目標，事實上是在於發現行為、解碼與回應的規律與類型，至少是與多元性的發掘（或慶賀），同等重要。依此而論，筆者同意安（I. Ang）的看法。她說，方誌學的批判長處，並不只是它能夠很有效地「發現多元與差異，並證實其存在……方誌學可以擎舉雄心，更加勇敢地揭示，多元與同質其實是以幽微細膩的方式並存交錯」（Ang, 1990: 257）。

費斯克流於偏頗，他將文本當作是意義封鎖的唯一場域，同時，他又把社會（解碼這個部分）當作是唯一變動而多元的場域。這樣的看法，還是有兩方面的問題。第一，社會這個場域仍然是閉鎖的——因為哪



類人可以取得哪些符碼，然後據以解碼，其實是由他們的社會位置所規範的（參照 Corner, 1991）。第二，將文本與閱聽人對立，然後認定文本的固著代表了負面而反動的價值，而變動與多元則是相應的正面價值，是反抗的根源（「人們仍然覺得不舒服、不受紀律之管束而桀傲不馴」），這本身就是難以讓人苟同的看法。隱藏在這個提法背後的概念模式，似乎是來自於任意自由地解讀巴特早年的論文〈今日神話〉（Myth Today, Barthes, 1972），根據這樣的解讀，所謂意識形態指的是（主流）意義定著（與物化）的（壞）過程，而另一方面，所謂（好的）反抗，則本質上，只能存在於意義的游離與不穩定。說來很是詭異，心理分析的旁觀（spectatorship）理論雖然另有其問題，而它與巴特之說亦明顯有極大的分野，但兩者問題的對比，相當有意思。

這個理論的核心問題之一，在於它通常在無意之間，對於變動與不穩定的狀況，無端地表示慶賀，但它卻天真地以為，我們無需定著與穩定的認同感，它卻不了解這些正面意義的生產，對於我們來說，十分重要。葛雷西（Gledhill, 1988）說過，這是篤信心理分析學派的人，對於古典寫實文本的效果之批判，他們批評這些文本在旁觀者（spectator）心中，製造了定著而穩定認同的意識形態。但誠如葛雷西所說：

非主流的團體（social out-groups）力求本身的認同，期望能夠因此而抗拒主流的再現形象……他們需要足資辨認、理清意明而自重自尊的自我形象。採取了特定的政治立場，也就必然意味著在那個時候，採取了穩定而負責的認同身分。是以，（譯註：我們的攻擊目標）不應該是前述意義之下的認同感，而是主流意識形態，以其全盤而毫無矛盾、毫無變動可能之方式所建構的認同感。（Gledhill,

1988: 72)

提出這樣的論點，用意只在表明，無論是個人層次（如精神病）或社會文化層次（如受迫害團體），欠缺連貫的認同感，其實與「定著」於主流文化形式所意識形態化的認同感，至少在政治上都是很有問題的。多年以前，社會學家例行地（或許也有些殘酷罷?!）區分了兩種社會評論家，一方或可以說是「心畏整合者」（integration-fearers），另一方則比較妥當的稱呼是「心畏不連貫者」（incoherence-fearers），前者當然是包括了心理分析學派（參考 Mann, 1970）。任何具有進步意義的文化（或政治）策略，必須努力追求，不但應該避免自陷於不落入不連貫不穩定的漩渦（the Charybdis）之中，也應該避免被只求定著而陷於物化之女巫（the Scylla）所吸引。<sup>⑨</sup>

交代了這些背景以後，我們再來看看費斯克立場的一些晦澀難解之處。費斯克延伸了他的論點，進而主張一個「讀者解放運動」，它主要的內涵涉及了閱聽人解讀理論：

它主張讀者有權利（rights），應從節目中，自造文本，求能與節目的論述相連，連結至他或她活生生的社會經驗，而這樣一來，等於也就是節目、社會與閱讀的主體，三者合一而共同積極在閱讀的那剎那間，創造了活生生的文化。（Fiske, 1986: 207-208）

筆者固然同等關切「讀者的權利」，但我終究認為，放在這個脈絡

⑨譯註：以漢文化的理解，這段話的意思也就是要我們避免不歸於楊則歸於墨的險境。原文的典故出於西洋神話故事，大意是描述行船至現今義大利西西里島（Sicily）海域的人，往往陷入雙重困難，既要閃躲海中漩渦（Charybdis），又要不被亮麗的女巫（Scylla，原意為岩石，文學作品已將它擬人化）樂聲吸引而誤蹈漩渦。

之下的「權利」概念，其實很有問題，因為問題的重心，或許還不在於讀者是否有權利自得其所，從節目中任意取用他們想要有的意義（這個說法另外又已認定，我們需從概括層次，先行有個道德或哲學上的論述），問題的關鍵還在於權力（power）的有無——比如，擁有或欠缺權力或文化資源，因此得以或無法領悟某些類型的意義，而這等權力或文化資源之有無，最終說來，總是一個經驗性的問題（參見 Gripsurd, 1989, 該文針對任何一種形式的「讀者解放」模式，提出了更進一步的批判，因為這些模式令人不安之處是，它沒有能夠處理文化素養之高低有無與分配狀況，事涉社會結構化的問題）。

費斯克在晚近的一些著作，已經轉向柴頭（M. de Certeau, 1984）靠攏，尤其是弱者的「戰術」（tactics）這個概念，它指的是權勢人物之戰略，固然控制了主控的結構與制度等等，但它們是留有間隙的，弱者則從中扒取符號與物質的好處。柴頭的著作當然是讓人感到興味十足的，但以偏頗之姿加以詮釋是有問題的，因為這個偏頗的態度過分強調（如果說還談不上美化、浪漫化）民眾抗拒之成分，許多人已經清楚指認這個缺失，其中福佬（J. Frow, 1991）說得尤其好。

伊凡士觀察的很是真確，他說，他稱之為閱聽人研究的「詮釋學者」（interpretivist）之傳統，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原先，霍爾提出製碼／解碼模式之時，它的重點在於強調優勢解讀這個概念（亦即讀者順著文本原有的企圖，理解文本），雖說它也承認除此之外，另有協商與對立解讀的可能性（Evans, 1990）。但就如伊凡士所說，後來這個模式卻被扭曲而變形，引用它的人經常聲稱，大多數的閱聽人每一天每一日都在「修正或歪解」媒介內容所顯現的主流意識形態（參見 Fiske, 1987a: 64）。

## 守成的與「救贖的」解讀

巴德等人 (B. Budd, Entman and Steinman, 1990) 認為，時下流行的閱聽人研究，不假思索地就逕自認定「人們慣常使用主流媒介內容反制其人之身，並且在反制之後，強化了自己的能力」，而既然如此，許多當代美國文化研究所傳遞出來的重要「訊息」，都是樂觀有加的：「無論製碼過程如何，解碼這一端都能提供救贖。媒體的支配情形並不嚴重，也沒有什麼效果，因為人們總是能夠自得其樂，開創意義」；或者，換個方式說，「人們每天花個把小時看電視、消費電視的影像、廣告與價值觀，又有什麼好擔心的。他們不止深具戒心，他們更是活躍而具有批判能力的觀眾與聽眾，他們不是文化笨瓜，媒介操縱不了他們」(ibid: 170)。當然，筆者不可能重蹈覆轍，不致於再回返閱聽人是「文化笨瓜」這樣的模式看待事理，但再說回來，巴德等人確實話中有深意。誠如他們所說，這個「守成」模式的建構基礎，雖然毫無根據，但卻逕自以為人們接收音訊 (reception) 這一刻，是各個傳播過程最終唯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階段 (參見Frith, 1990)；有了如此的認定，則各種文本建構過程所遭遇的種種經濟的、政治的與意識形態的壓力，全部被撇在一邊，視若無睹了，忽略了這些問題，竟然也因此得到了正當的理由 (參見 Brunson, 1989)。其他的先不去說它，我們也擔點腦袋瓜子胡思亂想的指責，我們倒還真可以說這樣的一個假設，似乎正是這麼一個稀奇古怪的基督教義之表現，此際，工業 (或說訊息) 的原罪，在其「死後」而為人接收的剎那，得到了救贖。

其間涉及了一個重要問題，在人們消費媒介訊息或解碼的過程，研究者透過方誌學這種通常很是特別的方式，察知了人們的文化顛覆



行為，但這個發現應該具有多大意義呢？巴德等人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們指出，費斯克針對澳洲原住民所作的研究，推論得很不妥當。費斯克描述原住民小孩在收看關於黑人的電視劇時，經過了哪些機制而重構了劇情及其意義，使得他們的理解符合並支持了這些小孩對於本身的了解。他們認為費斯克（Fiske, 1986）的筆法讓人憂心，它顯示他想要急速概括得自於這個研究的發現，但這個澳洲研究畢竟只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例子：在費斯克詮釋下，身處非常特殊環境而有的這類型的另類(alternative)反應，被褪除了脈絡，然後被當作是一種模式，足以作為所有「解碼過程」的參照。所以，誠如巴德等人所說，「部分變成了整體，而例外化作通則」（亦請參見 Schudson, 1987, 下文將引用）。

柯蘭早年（Curran, 1976）對於媒介分析的質化形式，曾經指出了不少缺點，在我看來，正就是同樣扣合諸如此類的憂心而有感而發。正是因為拒絕了所有形式的量化作法（這倒變成了一種方法論的——倫理的原則），才造成了如此輕率的、極不妥當的概括推論。史羅德以近似的筆調，如此寫著：

擺在前頭的工作之一，將是構思一個方法使我們能夠整合並保存質化資料，其過程必然涉及量化，唯其如此，研究者才能辨明收看反應與人口類型之間的關係，比如，各人口學變項團體內，以及全部人口之內，各有多少比率的「優勢」與「脫軌」的反應。

（Schroder, 1987: 27）

順著這個路線批評，巴德等人提出了其他質疑。他們說，「美國的文化研究呈現了一股守成而肯定現制的趨勢」，流風所及，這股趨勢四處遊竄，想要在各個地方找尋（並慶賀）「對立」的軌跡。誠如他們所說，

即便我們真可以在閱聽人身上，發現對立的解讀事例，「我們還是必須追問，對於權力的多種關係，（他們）又有什麼不同的看法：……當然，……看電視本身是可以有些對立於主流內容的解讀。但除此之外，這樣的心智活動，什麼也不是」（Budd, Entmann and Steinman, 1990: 176）。與此類同，簡森（K. B. Jensen）也認為：

對立的解讀方式，其本身並沒有能夠展示政治權力……文本這個層次的對立，究竟是不是能夠產生更為寬廣的影響，取決於這樣的對立解讀，能否化作社會及政治上的運用，亦即是否能夠在媒介接收這個相對隱私層次之外，另在外界脈絡發生作用。（Jensen, n.d.: 3）

伊凡士則提出了更進一步的問題。他說，「這些詮釋派的人」，經常誇大其詞，居然聲稱他們的觀點本身，已經足以賦予閱聽人權力（empowering），但伊凡士認為，這種推崇讀者地位的說法，事實上只是幻覺。誠如伊凡士所說，諸如此類的遣詞用字，似乎是說，就在學究式的特定取向之分析下，「人們」（the people）就此得到了力量或優勢的地位，但實際情況可能是「身為學院中人，我們陷於一廂情願，我們把想要抗拒現行意識形態體系的想法，化作浪漫之情，甚至造成了烏托邦的幻覺，認定我們所研究的人們，足以體現我們的願望」（Evans, 1990: 12）。這是一段說得相當好的論點，福佬的說法與此不謀而合，他說，我們應當注意，切記不要流於民粹主義者的腹語喃喃（populist ventriloquism），「中產階級（middle-class）知識分子的話語，取代了流行文化使用者的聲音」，切莫身陷此境而不自知（Frow, 1991: 60），或者，後面這類人僅只是被召來作為賞玩部分戲局，照本宣科，拿著分析家

建構並（隱然）形塑的腳本，品讀一番。這也就是安所說（Ang, 1990），有些版本的文化研究，其研究者不再只是具有批判意圖的局外人，反之，他或她搖身一變，成為參與戲局的一員、一位自覺的流行迷，打著消費者文化民主的旗幟而發言，並且慶賀不已。安接著又說，這裏涉及的問題是，「閱聽人也許各以五花八門的方式，展示他／她們的主動性，使用並詮釋著媒介……但饒是如此，興高彩烈地將『主動』等同於『權力』，則實在完完全全離譜」（Ang, 1990: 247）。

紐康與賀許（H. Newcomb and P. Hirsch, 1984: 69）認為，由於電視觀眾「能夠在意義的製造過程，取得與『節目的』創造者足堪匹配的地位」，因此訊息生產者與消費者是旗鼓相當的。但這個說法純屬皮相之論，它忽略了柴頭（de Certeau, 1984）所作的區別（參見前文），亦即弱者能夠擁有的僅只是「戰術」，權勢人物卻能夠掌握戰略（或者，我們亦可套用西伐史東與筆者在另一篇論文中所說，這也可以說是力足以詮釋文本，以及力足以建構並呈現文本所內含的議程，兩不相同〔Morley and Silverstone, 1990〕）。觀眾所能夠擁有的權力是重新詮釋文本之能耐，但中央化的媒介機構卻具備了論述權力，得以建構觀眾進行二手詮釋的文本，這兩種權力幾無相當之處；若是認為兩者能夠相提並論，簡直就是愚笨至極。

文本當然沒有任何直來直往的決定性可言，這話不錯，然而，我們倒也不應該就此天真地預設文本具有完全的開放性，我們不能以為文本有若「一個具有想像意義的購物中心，閱聽人自由自在地穿梭其間，任意挑選符合他需要的東西」（Murdock, 1989b: 36）。與此類同，梅鐸評述自己所作有關家用電腦（computers）的研究之時，曾經說大多數家庭使用者，仍然只限於操作現成的軟體，他們的選擇範圍其實是由

他人設定的：

利用家用電腦玩電動冒險遊戲，從電視購物節目採買財貨，或是回答電子民意測驗，這些當然也是選擇，但這些選擇是在別人精心設計下出現的。在此，我們必須追蹤的緊要問題，並不是「這些科技產品過程了哪些愉悅？」我們理應追問的是，「誰人得有權力，控制雙方互動必須在什麼狀況下進行？」(Murdock et al., 1989: 234)

## 認同、差異與分析家的位置

學術研究者以及他們的(「我們的」?)電視觀看主體，不但各有不同的社會認同，而且這些認同所得之評價並不相同，因此，這些差異在訪談過程與研究者稍後準備「資料」以作陳述時，都發生了作用。誠如塞特內省之後有感而發，她說，爲了將訪談所得書寫成文而發表，以她自己爲例，研究者必須深入作些編輯工作，她必須賦予這些主體情感與意向，並且借用「真實的經驗主體」的「正統地位」，支持研究者提出的概括論述 (Seiter, 1990: 68-69)。

如果，如同費斯克 (Fiske, 1990: 91) 所說，方誌學研究者有時可能會變成他／她所研究之觀眾或讀者社羣的一部分，並且也部分參與了他們的文化經驗，那麼，輕易地混同了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認同，仍然是存在的危險。若說電視的閱聽人研究讓人入迷，是因爲它似乎提供研究者接近「他人」(other) (比如，勞動階級、女性或黑人閱聽人)，但我們也不能就此幻想自己會變成這個閱聽人他者的一部分，我們也不能乾脆就認同這個「他人」而採取了熱情迷的立場，因爲這樣的操弄根



本只是掩飾了研究者，就擁有文化資本的質量來說，實在是支配了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參考 Seiter, 1990: 69；亦請參見 Gripsrud, 1989）。

誠如薛德森（M. Schudson）所說，「由於學術出身使然，原本就具備了這個能力的人類學家或文學批評家，容或能夠將流行文化當作一個指標，讀出其間巧妙，容或能夠以後設的評論觀點，講述文化形式，儘管這些都是事實（但對不住嘍，吉爾士與滕納），這並不代表所有參與這個文化的所有人（或是在其他時候、其他角色之下的人類學家或文評家），一定能夠以那個方式解讀文本」（Schudson, 1987: 64）。薛德森接續往前論稱，他說我們理當抵擋誘惑，切莫在不經意之間，浪漫化了語符過程本身，致而忘卻了分析權力之多種社會關係的整體脈絡。針對這種類型的形式主義者之符號學（semiotics），多年以前，霍爾的針砭相當強而有力。霍爾論稱：

若是從語言層次的運作……看待意識形態，則這些意識形態展現了具有絕對優勢的「外顯形式」，揭示這個事實，乃是符號學極大的貢獻。然而，如果從媒介化的社會過程及行事來看，我們又不能只是從製造意識形態的（譯按：語言）形式規則，研究意識形態被納入結構的問題，我們同時必須將意識形態的位置，納入社會形構之內，才能真切理解。（Hall, 1973b: 5）

單只是進行符碼的形式分析，並不足夠，雖說缺符碼則無表意的可能。因為，誠如椎查（H. Dreitzel）所論，

研究傳播行為則必須正視事實，亦即並非詮釋的規則都只是一成不變地彰顯了社會生活世界的本質，因為這些規則本身也受到其

他社會過程的影響……（而）……社會世界不僅只是被語言結構化，社會世界也在物質生產力與物質生產模式，以及支配體系的約制下，呈現了特定結構。（Dreitzel, 1972: 16-17）

我們不能只是將語言當作是一個封閉體系而研究，語言不止是一個傳播的技術工具：語言置身一整個社會政治關係的領域，而傳播於這些關係中發生，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千伯（I. Chambers）正是站在這樣的立場，批評巴特及其形式主義的眾多信徒：

他們以暫時存而不論的態度，或根本沒有認知到問題的存在，率爾就放過了他們所檢視之行事過程與作為的物質條件，他們只將它們與社會看作是一個符號體系；結構主義與符號學依舊深深陷於特種意識形態之中，而他們原先正是想要暴露這個意識形態的呀。（Chambers, 1974: 50）

他接著繼續批評：

符碼與觀念相同，並不是從天空掉下來的，它們由生產的物質行事過程，油然向上升起。只可惜，巴特將生產化減，變成了只是該過程的一個定點：「文本」；而那個定點也轉成一個足以自成格局的整體，脫離了它的物質軀殼。（ibid., p. 52）

## 普羅閱聽人與文化批評

誠如薛德森所誌，「閱聽人並不是有如海綿一般地吸收文化，固然沒錯」，但與此同時，「所謂普羅閱聽人（popular audiences）能夠自行注意、反省與建構文化……並不是說普羅閱聽人總是能夠作出創造性或

批判性的回應……而同樣地，菁英閱聽人也不能夠」(Schudson, 1987: 64)，因為是否能夠如此，總是有所變化而取決於社會脈絡，畢竟，語意符碼只能在相關的脈絡運作。尤有進者，「非常具有批判力與主動追尋意義的小說讀者，很可能在演唱會中讓音樂沖昏了頭……對於戲劇挑三撿四的消費者，也有可能依賴『品牌』而決定舞步」(ibid.: 64-65)。

另外，這些觀察與文化價值，最終應該有些什麼關係，也是問題——我們的答案不一定是要一個相對的結論。這也就是薛德森所誌，「普羅閱聽大眾積極而踴躍懷抱大眾文化的素材，沒有錯，這是我們必須謹記在心而理解的重要事實，但這樣的事實不應該變成激素而鼓舞我們接受時下那種大眾文化」。整個人羣中的不同次級團體，各以互異的方式回應相同的文化客體，或是在面對某些不為菁英認可的地方或本地色彩鮮明的文化形式，各自發展修練而有不同的批判習氣，這些，其本身已具有重要意義，而我們由此也可以辨認存在於社會的重重鑑賞品味，我們也可以知道，究竟是哪些教育形式導致了此等現象，「不過，這並不是說……所有的文化形式都是平等的，並不是說所有的詮釋都有效度，並不是說所有的詮釋社羣都自成格局而不必受人批評」(Schudson, 1987: 66)。

在這個節骨眼上，莫蕾斯基 (T. Modleski) 曾經指出，我們面臨了一個險境，大眾文化的批判，竟至勾搭上了消費社會。莫蕾斯基的論點是這樣的：

閱聽人並沒有完全被操弄，而是或許能夠攫取大眾文化產品作為己用，這是一個洞見，但這個見解卻不當地引喻失意，至而有些馬克思主義批判家，似乎不再認為大眾文化是一個問題……如果

(譯按：一九四〇至六〇年代的)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問題出在其成員自外於他們所檢視的文化太遠，那麼，今天的批判者，似乎正巧面對相反的問題：他們一頭浸淫於(譯按：大眾)文化當中，半遮半掩地與他們的研究主體發生了愛戀，有些時候，他們也就因而不再能夠與受其檢視的文化體，保持貼切的距離。結果一來，他們或許就在不經意間，一手為大眾文化寫下滿紙的歉語，一手卻又緊抱大眾文化的意識形態。(Modleski, 1986: 11)

莫蕾斯基認為，強調閱聽人／消費者的積極活躍角色，簡直過了頭。不過，她同時引以為憂，擔心研究閱聽人這個學界行動，好似轉了身，等於是以前某種形式與(大眾文化)工業，互通氣息。更為根本的一點是，莫蕾斯基以贊同的口吻，引述了伊戈頓(T. Eagleton)❶的評論，說是社會主義者的評論「最主要的並不是關切消費者的革命，而是要以接管生產工具為職志」(引自 Modleski, 1986: 12)。

莫蕾斯基的觀點似乎是說，關於閱聽人的經驗性研究，必須設定為是有汙點的，而原因只在於許多經驗性方法，曾經(而現在亦同)為商業行銷研究所用。更讓人在意的是，就在地直接引用伊戈頓的措詞時，她等於是又重新回到了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分析模式，而這個模式的弱點也正是它就消費的眾多問題，視若無睹而毫無建樹——而實況確實如此，它傾向於獨尊生產領域的研究，至而排除了社會形構的其它所有層面的研究。但這也正是問題所在，畢竟，唯有放在流通

❶譯註：重要的英語世界馬克思主義文藝批判家，他的著作《文學理論導讀》(1983)有吳新發中譯本，1993，台北：書林。李爽學稱此作具有「經典地位歷久而彌堅」，吳氏中譯則「明白曉暢，頗見匠心……譯作中罕見上品」(引自李爽學，〈意識形態的空想家〉，《誠品閱讀》雙月刊，1994年2月，頁36-39)。

與交換領域，關於生產的研究才能落實；就此而言，筆者終需極力主張，關於消費的研究，是完整了解生產所必不可少的（參見 Marx, 1973）。

再就莫蕾斯基對於《全國觀眾》這個研究的解讀來看，她的主要切入點是方法論的問題，她認為那些問題或許「煉鑄了樂觀之情，充斥於莫利的著作之中」（Modleski, 1990: 38）。她所提及的方法論問題，筆者將在後文（第八章）再談。但這裏所不能不言者，乃是學者從方法論角度，批判經驗性研究，目的卻在於為最糟糕的批評形式（出於內省而假設推斷的形式）撐腰，是否另有問題？因為對照之下，分析者根本沒有訴諸任何形式的經驗性探索，就逕自以本身對於特定文本的解讀，當作是他們或她們本人「代表」閱聽人所作的詮釋。另外，筆者也要知道，莫蕾斯基到底從哪裏得來的證據，竟至說我《全國觀眾》這本書充滿了「樂觀之情」。論及本質，筆者並不是樂觀之人，因此，我也只能假設莫蕾斯基自己太過於悲觀，以致於她竟然投射了自己的悲觀，在稍稍讀到《全國觀眾》所附加的少量而有限的解碼變異之證據時，居然表現得那麼驚訝；然而，諸如此類得自於經驗研究的變異情況，其本身其實也只不過證明，霸權的過程，總是而必然是不穩定且不完整的，但莫蕾斯基彷彿以為（譯按：《全國觀眾》這本書的有限證據，還能得出更多的推論）。若說《全國觀眾》這個研究提供了反證，駁斥了那種頭腦簡單的主控意識形態之說法，是筆者同意而泰然接受；但如果說這表示我是一個樂觀的人，那麼筆者也只能自忖，莫蕾斯基與我心之所憂，其實是相當不同的事罷？！

筆者的論據是這樣的，對於任何商業產品廣受歡迎，我們或許希望能夠提出批判性的（或政治性的）評斷，但不要忘了，這與我們亟需了解它們廣受歡迎的原因，完全是兩碼子事。品味乃至意識形態的運



作，都是商業世界所以能夠成功的因素，商業動機成功地製造了產品與節目（消費財），聯繫了普羅閱聽人感同身受的慾望（參見 Miller, 1988, 以及 Fiske 本章所引的論文段落）。如果沒有能夠完整而十足地了解商業產品的成功因素，則管見以爲，這不單是學術的退化表現，而更是政治上的自戕行爲。持此論點，絕對並不意味掉落威廉森(J. Williamson)等人所說的陷阱，她們大聲提出警語，指出未加批判就慶賀流行文化廣受歡迎，實在是感人的引誘，但其實這只是「抱著某種粗俗的邏輯而逕自以爲……人民／大眾／普通的勞動階級消費者……是『好的』（亦即不是愚蠢的）；而這些人喜歡電視／流行服飾／消費花錢……等等，所以，後列那些東西也是『好的』」（Williamson, 1986: 15）。誠如威廉森所說，由於學術界的人，站在一個優勢的位置而可以取得許多符碼與相關素養 (competences)，他們也就可以從秩序井然的文化品味之不同位階，對流行文化的各種品項，肆行多種「救贖性的」解讀，但如果說要將這等消費經驗作個概括推論，則顯然根基不穩不妥當。究其實，威廉森的論點，等於是複述了伯恩斯坦(B. Bernstein)的立論，他認爲，中產階級或許可以使用精緻與粗糙而有限制的 (restricted) 符碼 (伯氏的用語)，面對不同情境時，他們也就援用不同的符碼，但勞動階級卻只能使用粗糙而有限制的符碼。威廉森的論點與此呼應，她說，出身中產階級的流行文化分析家，是有可能使用多種不同的文化形式，「但對於(流行文化)是他們唯一的文化之人而言，情況卻大爲不同」(Williamson, 1986: 14)。

當然，筆者很是同意梅鐸(Murdock, 1989b)的意見，他說慶賀閱聽人的積極創造性與愉悅，很容易就會變成現有媒介權力體系的共謀，而現勢則是大多數另類或反對聲音與視野，已被排除或被邊緣化。誠

如梅鐸所論，「流行節目……提供了許多愉悅與爽，人們可以不同方式加以詮釋，這些都沒有錯，……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的努力目標，想要在現有體系之內，在最大可能範圍內，推廣文化形式的再現與多元程度，純屬白費氣力而可有可無」(Murdock, 1989b: 229)。

但言而總之，假使我們真要理解霸權的運作實況，如何經由商業流行文化的過程而成功達成目標，那麼，分析並追探流行文化究竟讓其消費者感受到了哪些愉悅、爽，仍然很有必要。若說霸權之運作與流行之成功，二者完全自外於彼此，則明顯是不足取信於人。誠如馬汀-巴貝羅(J. Martin-Barbero)所論，「霸權並非凌空而降，從一無所有的狀態而支配我們，遠非如此，霸權滲透了我們」，與此同時，所謂流行，也不應該被等同於相應而生，發自內裏或自發的抗拒形式。反之，問題應該是如何了解「霸權／臣服的交織關係、抗拒／歸降的滲透穿插，反對／共謀的表裏變幻」(Martin-Barbero, 1988: 462)。就筆者個人看來，正就是這個節骨眼上，傅柯(Foucault, 1980)嚴詞厲色的批評，才真正產生了意義，他說，若要了解權力體系的運作，與其認定權力是由上而下的強制，不如研究權力到底如何由下往上，汨汨滲出。

## 多義性及其限制

安德森與艾佛瑞(J. Anderson and Avery, 1988: 362)論稱，詮釋性研究的特徵，「在於它轉而想要賦予閱聽人力量」，巴金與古勒維區(S. Barkin and M. Gurevitch, 1987: 18)則說電視「是一個空空如也的容器，什麼都可以裝，什麼人都可以用」。但問題是，誠如卡瑞基(K. Carragee)所說，這些種類的詮釋性研究，通常不當地以為，閱聽人活動「重於生產過程，而其實是生產過程結構化了媒介內容，以及該內容的文本

質性……（它沒有能夠）將媒介閱聽人放置在其應有而合適的脈絡」（Carragee, 1990: 84），它也大抵忽略了影響媒介文本的組織及經濟因素，使得這些文本變成自主的表意體系，脫離了它們的組織慣例與程序的起源。

更為一般性的問題是，由於（通常並不清楚地意識到）根源於現象學及符號互動論，我們可以說，許多這類型研究並沒有掌握制度性力量的重要性，但究其實，正是這些制度性力量形塑了主體性、詮釋性社羣與價值觀；只是舉證這些主體性與價值，作為解釋為什麼會產生不同的個別的（或集體的）解碼，卻沒有適當地指出，這些現象與它們自身的歷史與結構性因素之間，存在著什麼關聯。借用伯恩斯坦的術語，意識到了這些事項，也只不過是合宜地體認，團體與階級因素的中介作用，以及明瞭「歷史的角色與過去經驗沉澱之後，兩兩相加而如何塑造個人建構其社會世界」（Bernstein, 1978: 16）——而由此則往前一步探詢，他或她可能以何等方式解碼媒介材料。有了這層說明，我們可以再來看看李筆士與凱茲那本廣為引用的著作（T. Liebes and Katz, 1991），審視他們所作關於“朱門恩怨”（Dallas）的研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書中，他們動用了一個概念（他們受訪者的「文化價值〔cultural values〕觀」），但卻沒有對此概念提出任何質疑，他們只是說，受訪者得有這些價值觀，隱然是因為具有其所屬詮釋性（文化）社羣的成員身分，然後他們就只是拿著這些文化價值，解釋其研究所發現的不同解碼方式。就此問題而言，巴靈頓-摩爾（Jr Barrington-Moore）論稱：

所謂文化價值觀，並非憑空而降，也不能影響歷史的動向。文化價值是一些抽象概念的組合，由一個觀察者根據他或她的觀察所

得，提煉多個團體在不同情境中，歷經了一段時間之後，表現出來的若干相似之處。以這類抽象觀察所得作為基礎，我們或許能夠準確預測，在短期之內，個人與團體將會有些什麼行為，但即便如此，這些觀察並沒有解釋（譯按：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行為。

（Barrington-Moore, 1967: 486）

誠如他所誌，除非我們同時解釋不同文化「價值」的社會起源，否則，單單只是憑藉指出這些價值的存在，就逕自聲稱已經解釋了（收看或其它任何形式的）行為，其實只是一種偷懶、簡化的分析。

我們可以將以上的論點，換到另一個脈絡——以文化價值或文化符碼的角色作為例子，解釋不同社會背景的學童，何以能夠取得教育上的成功或失敗。比如，假使我們知道勞動階級的學童，懷抱著不利於學校成就的一整套預存立場（Bernstein, 1974; Rosen, 1972; Keddie, 1973; Willis, 1978），如自欺欺人、低貶學校及校方處罰的價值、自暴自棄；又假如他們帶有某些文化傳統，敵視學校而幾乎讓他們自絕於教育體系。那麼，接下來的課題是，我們必須確切地知道，出於什麼樣的過去與現在的經驗，致使這些文化價值與傳統充盈於他們內心而持續至今？

類同的道理，誠如卡瑞基所誌，許多晚近的閱聽人研究，都：

沒有能夠將媒介文本與媒介閱聽人，安置在具有意義的歷史、社會及文化脈絡之內。強調閱聽人之詮釋能力，並據以執行研究的學者，固然正確地指出了解閱聽人對於媒介訊息之解碼，非常重要，但他們卻忽略了影響這些詮釋活動的外環脈絡與壓力。結果一來，他們也就無能探討關於政治及社會權力等等惱人的問題……包括了無能將媒介文本當作是組織之產物而研究、鮮少注意

文本的質性與結構，以及經常在證據不足情況下，逕自宣稱媒介文本之多義性。(Carragee, 1990: 87)

就最後這一點來說，卡瑞基說得對，至少這樣的「多義性」必須展示出來，而不是假設它們的存在就算了事，而多義性的範圍又有多大，也是必須更為清楚地加以標示才對，尤其是，如果能夠知道不同環境下，互異的文本形態與類型，各有多大的多義性範圍，更是妥當。康娣 (Condit, 1989) 認為，「多釋性」(polyvalence) 這個詞，整體看來，很可能比「多義性」(polysemy) 來得好，雖然「多義性」是人們使用更為廣泛的一個概念；她所說的「多釋性」，意思是「許多閱聽人共同了解了一個文本的外延意義，但他們對於這些外延意義的價值，各有不同的判斷，以致於他們對此文本提出了顯著不同的解釋」，康娣認為，若是說要解釋特定訊息，為什麼會有多重的解碼方式，那麼，多釋性比多義性來得有用與貼切。何以見得？康娣說，這是因為有許多事例顯示，「觀眾的歧異詮釋，並不是為了文本意義具有多重性或不穩定，而是由於這些觀眾儘管對於這些文本的外延意義都能同意，但卻對它們提出了不同的評價」(Condit, 1989: 106-107)。若再從康娣提出的分梳來看，則李筆士與凱茲就“朱門恩怨”所作的研究 (Liebes and Katz, 1991) 的若干重大缺失之一，在於他們完全不能確知，所謂「多義性」(或就說「多釋性」罷)，究竟是節目本身或是組成節目的各個元件，他們也不能確知，他們在研究中所辨認的意義之「開放性」，“朱門恩怨”觀眾所作的不同文化評價，究竟是來自於節目本身的特徵、來自於劇情故事，或是來自於觀眾的反應 (關於這些問題，較為完整的分析，參見 Morley, 1991)。



伊凡士議論得很不錯 (Evans, 1990)，他說，「若說有人舉了一個例子，說這就是『抗拒』（或「反對」）式的解讀，則我們馬上必須接著問：抗拒些什麼呢？」至少，總是要有些關於主控意識形態或主控而成套的意義這樣的概念，我們也才能夠指出，究竟抗拒些什麼，而所謂「抗拒」或「反對」也才有任何意義可言。話雖如此，許多研究分析仍然含混其詞，未能明講「反對式解讀」真正包含了些什麼內容。費斯克曾以瑪丹娜 (Madonna) 作為對象，解讀青少年對她的反應 (Fiske, 1987b)，日後這個例子並廣為引用。伊凡士則以此作為討論的事例，然後提出了相當富有邏輯趣味的一個論點，內涵正是有關到底什麼才算是反對式解讀。誠如伊凡士所誌：

如果沒有仔細而詳盡的脈絡說明，任何讀者的特定反應，即便不同於其他讀者（或不同於分析者的期望），我們也只能稱之為變異而已（譯按：而不能說是「反對式解讀」）。但是，若說一個特定的文化團體，比方說，就以青少年為例吧，其典型特徵是反叛性，那麼，就社會學意義而言，再要說具有反叛性的青少年之解讀方式是反抗的，則顯得並不協調；說實話，在這種脈絡之下，沒有反叛性的反應，那才真正是反抗哩。（Evans, 1990: 159）

容許筆者再次置換另一個脈絡，這次相關事項的複雜性例子，是由巴塞特與維比 (G. Bassett and Z. Wiebe, 1991) 所提供的。他們的研究對象是一個單親家庭，其中，母親是意志堅定的女性主義者，習慣與十多歲的女兒們，一起收看電視節目「我愛紅娘」 (Blind Date)，但她又覺得非要邊看邊指東道西不可，因為她深恐女兒受到節目所透露之父權意識與性別歧視觀念的影響——但她的女兒惱怒得很，她們總覺得

母親那種邊看邊批的評論，破壞了她們看電視的享受。暫且撇開這等動態情境而心理感受又極複雜的事實，我們不禁要提出一個很好的問題：以這個例子來說，構成主流論述的是些什麼，而優勢解讀、對抗式解讀，或是「反抗的」瞬間，又是相對於什麼而由什麼構成？

對於近來勃發的趨向，直以浪漫情緒美化了媒介閱聽人，把他們當成「語符游擊隊」，卡瑞基深以為憂。卡氏如此擔心，確實有理，因為這種趨向，只會說閱聽人自有反抗式解讀法，卻從來不仔細看看，這些所謂反抗的解讀，在在必須透過不等的方法，在「文化工業」局促迫人的力量之限制下，殘喘運作。閱聽人根本不是什麼「不受歷史情境約制的自由流動的行動者……他們無法以如此身段參與社會實體的建構」，如果這麼定位閱聽人，那實在是忽略了「閱聽人與媒介的多重互動，百般受制於文本的、歷史的與物質的影響」。為什麼呢？卡瑞基轉用馬克思的文句，然後這麼說：如果媒介閱聽人參與了意義的建構，則「他們的建構活動（譯按：並非自由自在，而是在）壓力與外環較大脈絡所圈定範圍內為之，並且部分是由後者所決定」（Carragee, 1990: 92）。

## 方誌學研究的政治

筆者先前服務於布魯那大學（Brunel University）時，曾經與西伐史東協同進行了一項研究，「資訊與傳播科技的家庭使用類型」（Silverstone and Morley, 1989）（參見本書第四部分），稍後卡納（Corner, 1991）針對這份研究提出了批評，認為它內含的主要問題是強調重點的移轉，先前在《全國觀眾》這個研究時（參見本書第二部分），重點是單一媒介文本的詮釋，現在則是強調外環脈絡與背景對於媒介使用所產生的建

構性作用。在卡納筆下，這裏涉及的問題是，任何大力仰仗脈絡環境作為詮釋依據的理論，都要甘犯一個危險：「脈絡究竟伊於胡底？包括些什麼而止於何方？」(Corner, 1991: 23)。卡納又說，「『眾多生活世界』所波及的範圍與細膩微妙之處，是必須了解，因為我們的所有收視行為都是在它們之內進行的，而有了這份了解之後，可以增進我們對收視行為的了解，但是，這份了解並不能取代雙耳所聽雙目所視的行為」，筆者雖然完全同意卡納這個嚴格的評斷，但卻不能不反對卡納在行文議論之際，硬是將事理兩極化了，而他的立論基點正是依此二分手法而來：一方面是(譯按：前文所稱那種重視脈絡的)方誌學研究，另一類型的研究，則其主要關懷只是媒介權力。但就筆者的認定來看，(譯按：兩極二分的看法，並不可取，因為)重視脈絡的方誌學研究，具有價值的真正原因，正在於它能夠增進我們對於媒介權力的了解，缺此研究，則我們也就無法扣合兩端，此端是消費的微觀脈絡，彼端則是宏觀的結構過程之問題。如果單只是從微觀層面進行研究，則不免重複提出「那又怎麼樣？」的問題，而如果它們只是不斷積累，堆積了無窮無盡的方誌學的細描白寫，那麼，任何霸權理論，如果沒有根基於充分的消費過程之分析，同樣也會流於過度的系統化，因此到頭來也就沒有什麼用處(參見下文第十三章)。

卡瑞基的批判(Carragee, 1990)，足以與卡納匹配。他說，晚近的一些研究，過分專注於大眾媒介產品之家庭內消費狀況，但由於研究者設定的家庭範圍太過有限，因此也就大抵不能將家庭放入外環更為寬廣的社會脈絡之中。卡瑞基清晰而正確地意識到，「羅耳固然說是要將家庭的特徵，定為『私化的社會單位』(Lull, 1980: 199)，但家庭當然是著床安身於社會與政治環境之中，家庭成員詮釋外界訊息總是受此事

實之影響，而他們的身分也與外界這個更大的集體認同發生關聯」(Carragee, 1990: 89)。正也就是基於這番考量，筆者的《家庭電視》(Family Televisoin) 與《資訊與傳播科技的家庭使用類型》(Household Use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兩項研究有了一些修正，我企圖將相關的分析，納入包括多種媒介角色的大架構之內，期望循此而接合私人與公共領域，期望這樣一來，我們可以接合這些微觀的分析，將它扣連於大視野的宏觀社會面向，如政治、權力與文化等等議題。

了然這個緣由以後，我們對於傅柯的戒令，更是應該注意有加：「一整個歷史，仍然有待於從『多重空間』(spaces) 的角度去書寫——而這同時也是『多重權力』的歷史……沿線直下，從地緣政治的大戰略，一路直放而至棲息聚居的小戰術」(Foucault, 1980: 149)。筆者已經協同羅賓斯(K. Robins) 在其他一些論文裏(Morley and Robins, 1989, 1990 及 1992)，開始探討這些議題，事實上，只要我們在後現代地理學的術語之內，思索各種傳播過程(參見 Harvey, 1989; Soja, 1989; Massey, 1991b)，只要我們開始思索，各種傳播活動持續建構與再建構社會空間與社會關係，扮演了何等角色。(譯按：那麼，我們其實已經開始思索傅柯式的問題了。)

就筆者目前的目的來說，最重要的論點在於指出，現今的媒介工業已然透過重要而獨具特色的方式，捲入了這些社會——空間的運動過程。所以說，羅賓斯認為，「環繞傳播政治的議題，已經重疊聚合於空間與場域的政治：涉及傳播的多重問題，也就等於是社羣組成之本質與範圍的問題」(Robins, 1989: 146)。由此而延伸的進一步問題是，這個類別的理論建構，雖然已經納進這些問題，但卻都是從一個非常抽

象的層次立論的，而主要是放在國際地緣政治的脈絡中進行。不過，上文所引之傅柯論點的力量，當然還是適足以再三提醒我們，「地緣政治的想像力」以及它對於傳播與地理關係的再調整而重新聚焦，誠如傅柯所誌，必須適用於「棲息聚居的小戰術」(little tactics of the habitat) (參見 Moores, 1988)，一如必須將它適用於「地緣政治的大戰略」(the great strategies of geopolitics)。各方傳播體系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如果正是接合不同空間(公與私，國內與國際)，並且在執行這等功能時，跨越了不同空間的疆界(家庭內的疆界或是環繞國境的疆界，均同)，那麼，我們的分析架構必定能夠同時適用於微觀與宏觀兩個層次。這等企圖，這等雄心，主導了這篇導論之後的各篇論文，是否有成，則有待讀者評斷。



第一篇  
理論架構



## 第 1 章

# 批判電視觀眾研究史

---

全面而窮盡的解說主流大眾傳播之社會學式研究，並不是本章之目的。不過，本文倒是想要提供一個簡歷，記載主流研究策略的主要流派及其互有差異的強調重點，最根本的理由有二：第一，因為筆者本人的研究，實乃脫胎於相當不同的研究典範，這些研究所賴以觀照事理的理論視野，在許多方面都與傳播研究領域的主流典範不同；第二，另一方面，先前那些研究仍然有若干重要的「斷點」，沒有人承繼發揮，就某些切入點而言，筆者的取向到是有意作些接棒的工作，或者說，筆者有意另以不同的理論架構，探詢主流研究已然扣門問津，但一直沒有貫徹追蹤的議題。

我們可以說，支配主流研究的一個基本概念典範，其實就是對於法蘭克福學派的反動，主流典範的建構，正就是針對「悲觀之大眾社會理論」之批駁而來。那個悲觀理論的由來，反映了當代（一九三〇年代）德國社會崩解而為法西斯浪潮襲捲，而造成崩解的部分原因，則又是傳統聯結與結構的鬆盤，致使人們變作宛若原子一般，暴露在外來勢力的影響之下，尤其更是容易受制於權勢領導分子的大眾宣傳手法之壓力，其中，最為有效的工具則是大眾媒介。「悲觀之大眾社會理論」所強調的是，「大眾文化」的保守與和稀泥的角色，在其籠罩下，閱聽

人同樣是保守而和稀泥。現實社會存在的一些矛盾現象，在大眾文化壓抑下，變成了「單面向世界」，其「潛能」無法發作，甚至不為人知；能夠保持否定與超越之質性的唯一力量，只有藝術，只有出以虛構而戲劇性形式的藝術。

隱含在這個認定背後的假設，也就是媒介的「皮下注射」模式（'hypodermic' model），它認為媒介的力量，足以將具有壓制性的意識形態，直接「注射」到大眾的意識之中。論及這個說法的時候，凱茲與拉查斯斐（P. Lazarsfeld）如此寫道：

過去一些年來，研究者沾沾自喜的大眾傳播過程，首先是這樣的：數百萬的讀者、聽眾與看電影的人，聚積起來而成爲「原子化的大眾」，他們等在那裏準備接收訊息。其次，……（當時）每一個「訊息」都（被當作）是一個直接而強有力的刺激，能夠吸引注意力，並且引發立即的反應。（Katz and Lazarsfeld, 1955: 16）

一九三〇年代，法蘭克福學派（譯按：具有猶太後裔身分）的許多領導成員（如阿多諾〔Adorno〕、馬庫色〔Marcuse〕與霍克海默〔Horkheimer〕），相繼從德國逃離，移民美國，致使一九四〇與五〇年代應運而產生了一個特殊的「美國」學派的發展。但法蘭克福學派如此「悲觀的」命題，認定「大眾社會」（mass society）與法西斯主義（Fascism）之間存在著關聯，並且認定媒介居中扮演了強化兩者關係的角色，在許多美國研究者看來，難以令人接受。他們論稱，這個「悲觀的」命題所設定的媒介影響力，太過於直接而未受中介，等於是閱聽人束手無策；它說領導階層／媒介與社會大眾之間，所有的中間性社會結構已全部崩解，實在過火；它並沒有真正反映美國社會多元的本質；這樣的一

個模式，簡而言之，根本是社會學上的無知。媒介是有些社會效果，沒有問題；這些效果則有待檢視、研究。但同等重要的是，這些效果既非無所不能，也不是簡單地運作，更不是直接了當所可以解釋。至於這裏指稱的複雜性與間接程度，其本質又是些什麼，更是必須展示，必須研究。有此認知以後，作為反動於法蘭克福學派有所偏好於批判社會理論與追求質化、哲學式的分析，美國的眾多研究人員也就另闢蹊徑，順著量化而實證的方法論之路，以經驗性手法研究收音機聽眾，建構了「大眾說服的社會學」。

不過，必須在此附註的是，無論是「樂觀」或「悲觀」的典範，兩者都隱然共同運用了權力與影響力的理論面向，它們都認定，有權有勢的人（領導階層與傳播者）與無權無勢的人（一般人、閱聽人），二者的聯繫正在於權勢的使用。大致說來，鑽進這個典範運作的研究，其風格與策略再怎麼不同，都可以說是游動於兩個有時還真是對立的端點，在傳播與指令的線鏈：一端是鎖定訊息的研究，這又分成數種情況，從訊息的內容分析一直到訊息對於閱聽人的效果探討；再一端則鎖定了閱聽人，它的研究焦點是閱聽人的社會特徵、環境，以及隨後而來的一些研究問題：閱聽人從訊息得到了哪些需要，或者，反過來，訊息反映了閱聽人的哪些需要。

在這典範之下，最具特色的許多發展，通常是包括了兩種情況。其一，重新精煉訊息／效果的連帶關係，其二，開發檢視閱聽人及其需要的不同方式。追隨第一個策略（訊息／效果）的研究，直到晚近主要是行為主義者的天下：閱聽人的行為，以何等方式，反映了訊息加諸他們身上的影響印痕。（譯按：行為之外）如果認知因素引進了研究設計，那麼，它也只是修正了，而不是取代了行為取向的探討：只有在



心理發生了變化，並且隨後又產生了行為的變化，我們才可以說訊息產生了效果（比如，廣告宣傳導致了商品選擇的變化）。第二個類型的研究（從閱聽人出發），大致採取的是結構—功能主義的取向，研究焦點是不同閱聽人的社會特徵，認定這些特徵反映了閱聽人對他們所接收訊息的「開放」程度。此時，如果認知因素引了進來，則同樣地，研究者只是修正了，而不是取代了這種功能視野：閱聽人反應之形成差異，原因是個別閱聽人的需要與「使用」並不相同。

以下，筆者將利用一些篇幅，省視這個基本的概念典範，在主流研究籠罩下，發展出了哪些分歧的策略。一直要到晚近（譯按：指一九七〇）年代，主流研究領域才出現了與此典範斷裂的概念，它並不從功能、也不從行為效果，而是企圖從社會意義的角度理解傳播現象。筆者將斷裂以後的研究，稱作是「詮釋」（interpretative）典範，以此對立於更為具有支配地位的「規範性」（normative）典範，而前者真的可以說是明顯與傳統的主流取向，切斷了聯繫。筆者的取向與「詮釋」典範接近的程度，多於傳統的典範，但我還是必須指出，我的用意是批判「二者」，然後提出有別於現今所熟知並操作的典範內容。

## 「規範性」典範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的大眾傳播研究者，從三方面批判悲觀的大眾社會理論：否認非正式的傳播在現代社會中，只扮演一個微小的角色；否認閱聽人僅只是整個社會所有原子化個人集合起來的一羣烏合的大眾；否認內容直接等同於效果的可能性。

墨頓（Merton, 1946）在早期的一項研究首先發難。他以高度精煉的概念架構，以史密斯（Kate Smith）的美國戰時公債銷售作為個案，研

究《大眾說服》(Mass Persuasion)的過程。日後，人們在回顧傳播研究領域時，墨頓這項研究雖然仍然有人提及，但它所開創出來的雋永切入點，卻從來沒有人深入耕耘。墨頓當時的論點是，先前的研究幾乎都是一頭栽入了「內容，而不是宣傳的效果」。墨頓承認，這類型的研究，對於過去的研究重點還是再三致意，還是相因承襲，因為它的焦點也是「宣傳材料所使用的訴求手段、修辭排列、刻板印象與情緒性語言等等」。但它所沒有檢視的是，「說服發生的真正過程」，而這樣一來，原本只是研究材料的訊息，也就被設定為或推論為已經產生了「效果」，尤其是那些憂心忡忡之士，紛紛認定「暴力」內容具有不良的效果。墨頓提出挑戰，對於這種從此到彼，只由內容就推論預期的效果，提出質疑。

從許多方面來看，墨頓早期的研究都是特立獨行的，其中之一正是這些研究，均企圖串連訊息的分析與效果的研判。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指向了「價值所在，而這些價值正是我們極力想要了解的」。但是，墨頓跟著就問了，「哪些誘人的詞句具有說服性，而哪些則沒有呢？另外，是哪些人耳朵軟而被說服，又是哪些人抗拒著說服性的論據呢？再者，涉及這些說服與抗拒的過程，又是些什麼？」墨頓的見解很是正確，他說，為了打開這些問題的謎底，我們必須「同時分析宣傳內容與閱聽人的反應。分析內容的好處……在於我們或許可以從中知道產生效果的訊息，是哪些部分。分析閱聽人的反應則可以讓我們反過來，檢驗訊息是否產生效果」。我們從這句話清楚看出，墨頓心中存有念頭，仍然認為訊息舉足輕重，扮演了決定閱聽人反應的角色，但他同時又指出，若是認為訊息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若是認為訊息與反應的因果簡單而直接的，則又未免離題。事實上，他所堅持的是，

「如果將訊息抽離它所寄生的文化脈絡」，訊息「也就不可能充分地得到應有的詮釋」。

墨頓的主張並沒有得到廣泛的回響。日後的訊息分析，仍然因襲舊章，沒有長足的改進。弔詭的是，這番批評反倒是促成了另一種逆轉的形式，它開啓了新頁，致使有許多研究，幾乎只是醉心於接收與接收情境的分析，不再旁騖。此時的強調重點，移轉到了小團體與意見領袖的評量，首先開發這些概念的人，正是墨頓自己所提煉出的「有力影響分子」(influentials)與「參照團體」(reference groups)，其後則有凱茲與拉查斯斐。後二人與墨頓相同，他們都反對影響力是由媒介直接走向個人的說法；究其實，他們在《親身影響》(*Personal Influences*)這本書裏，利用小團體研究架構所得出的結果，凝煉了「二級傳播模式」(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與「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等等重要的概念(Katz and Lazarsfeld, 1955)。根據凱茲與拉查斯斐的說法，這個領域當時已有許多研究成果，大抵都證實了「大眾媒介的影響力，……不但與有力的影響人士平行……而且還要受到最終消費者的個人環境所映射」。

從此之後，在「重新發現了原級團體」(primary group, 譯按：指家庭、學校、同儕團體等)，以及它在個人回應傳播訊息過程中所扮演的決定性角色以降，學界已經決然地拒斥了「皮下注射模式」(直接了當、未受中介的媒介效果)。早在《人民的選擇》(*The People's Choice*, Lazarsfeld et al., 1944)這本書，學者即已辯稱，鮮有證據顯示人們改變其政治行為，是因為媒介的影響：書中的看法是，團體形成了一個「保護幕」，圈罩了個人。而(譯按：聞名遐邇，以最小效果論著稱的)克萊波(J. Klapper, 1960)的總結，正是以此說法作為根據的，他說，「說服性傳播的功能，更多

時候只是強化現狀，而不是改變的策動者……學者發現，強化，或說至少是維持意見的恒定，是典型的媒介主流效果」。

### 由「效果」盪向「功能」——然後再盪回來

以上勾勒的著作，尤其是墨頓的研究，是傳播領域的一個分水嶺。筆者稍盡詳實，多著墨了些，因為後來傳播領域雖然另有新的創見，但它們大抵都忽略了這批早期著作，沒有注意這些著作觸及的論點，蘊藏發展契機。

以筆者論述的目標作為判準，那個階段以後的研究著作，在許多方面來看，都是更為沉悶，收益更為淺薄的。內容分析更加走向唯數量是問，目的是裁修大量的「訊息材料」，因應效果分析之所需。而所謂訊息，主流的定義，指向一個簡單的「外顯」訊息，至於是否外顯，則又以總統或廣告宣傳戰作為判準；尤有進者，訊息內容的分析，再次又化減了，套句貝洛森（B. Berelson, 1952）的話，它只是「傳播外顯內容的量化描述」。墨頓的史密斯公債研究，其繁複細膩之處，不復可見。與訊息分析的遭遇類似，「效果」研究也更為量化、更像只是例行公事。在這樣的氣氛下，貝洛森與其他人也就預測，大眾傳播研究緣盡情了，進入死胡同矣。

學者是提出了許多新的視野，但較常見、較為人知的觀點卻是來自「社會體系」取向，以及它的近親「功能分析」（functional analysis）（Riley and Riley, 1959），他們關心的主題是媒介為整個社會所執行的一般性功能（見 R. Wright, 1960，他企圖擬就一份「功能庫」哩）。另一種功能主義者的研究取向，分析層次不同，關心的是個別使用者的主觀動機與詮釋。在這方面，凱茲（Katz, 1959）論稱，這個取向的主要假設是，

「如果個人所生活的社會與心理脈絡，使得個人不去『使用』媒介，那麼，即便是最爲有力的大眾媒介，通常也不能影響個人。這個『使用』取向假設人的價值、他們的興趣……結社伙伴……社會角色，先於媒介潛能而發生作用，人們是以有選擇性的方式，形塑他們所聽所視」。相同於這個思路而推動的研究，當然，重新在英國的「使用與滿足」取向冒出了頭，並且在它沉潛長久以後，被學者歡呼爲開啓了大眾傳播研究的進階之門。

這些層面不一的功能主義者的取向，就在歡呼聲中，被說成是「效果」取向之外的另一個選擇；但再怎麼說，主流學者關注效果之情，仍然存在，至少媒介批評者與一般社會大眾，對於效果，還是念茲在茲。這股關注媒介之有害效果或「負功能」的情緒，旋即被導入一連串的社會心理學的實驗研究，而究其實，它根本就是景隨功能主義者的插曲而來。支配（譯按：美國）一九六〇年代大眾媒介研究的取向，正是這個，企圖將競爭中的功能主義模式的任何一個操作化，並不是主流：企圖透過刺激—反應、模仿與學習理論等心理學取向，在實驗室情境下，釘住小但可以量化的效果而作研究，先前在樂觀論者的批評下，留存了下來。

班度拉（B. Bandura, 1961）與貝考威茲（L. Berkowitz, 1962）是最爲主張進行這類風格研究的人，他們的研究焦點放在訊息是一個簡單的、視覺的刺激，足以引發模仿或「讓人跟著試一下」，他們的注意力則放在探討，個人暴露於媒介暴力描述或「電影中的侵略角色模式」，可能會造成哪些暴力行爲或青少年犯罪的後果。英國的哈洛蘭（J. Halloran）就電視與暴力關係所作的研究，起點也是從前述研究開始的。

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至末期，電視暴力鏡頭的效果研究重新復



甦了，它的研究焦點也調整了，原因是學生運動顯現出來的叛逆性，以及美國黑人在他們的貧民區大起暴動（參見《美國暴力原因與防治委員會：衛生總署的報告》〔*National Commission on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 the Surgeon-General's Report*〕）。許多研究人員與政府代表都參與了這項研究計畫，他們的結論認為，電視並不是引起暴力的一個主要因素，反之，電視只是一個輔助性因素。如同全美委員會這份報告的許多作家，他們也承認「電視當然是運作於社會環境之中，而毫無疑問，它的效果也在其它社會影響力的作梗下，已見舒緩」。話雖如此，雖然這些人都作態表示，另有其它舒緩或中介社會力量，影響了電視的效果，但骨子裏他們都還是相信，四處充滿著暴力的媒介，一定有些直接的效果。問題只在於，側身主流典範的研究人員，還是無法形成決定性結論，不能確認媒介所帶來的衝擊。在衛生總署出版了報告以後，密集的辯論隨之而起，環繞著媒介暴力是否將對社會大眾產生「足資量化的測量效果」，從這個爭論我們可以看出，企圖「證明」直接的行為效果，引發歧見與無所定論的程度，確實仍然存在而難以解決。

### 「詮釋性」典範

就在同一時期，與前項趨勢逆向而行的另一個社會學視野，開始在傳播研究（communications research）領域，開疆闢土。先前，這方面的研究向來假設社會的所有成員，都共同分享一個穩定的價值體系；而這正是詮釋性典範質疑之處，它認為，特定的一個行動之意義，並不能夠視為理所當然，而必須假設涉及的行動者，均會出以懷疑的眼光看待。所以，互動也就是一個涉身其內的許多行動者，在一個特定的情境中，「交互類型化」的過程。

這個典範出現以後，情況改觀而有了些進步，它強調語言、符號、日常傳播過程、行動的詮釋，此外，它也強調互動過程中，「得到領悟」(making sense)的重要性。但不可否認的，透過方誌學方法論的形式，開拓了詮釋性典範之路（它把「規範性」典範，倒過來走），很快就暴露了缺點。可以這麼說，規範性取向，總是把焦點對準個人的行動，認定個人行動完完全全是共享而穩定規範的再生產，但詮釋性模式，在其方誌學方法論形式的裝扮下，卻又認定每一個人的互動，「生產」了新的實體。這裏涉及的問題是，儘管方誌學方法，對於人際互動的微觀過程，具有撥雲見霧的啓迪之功，但順著它往前望，我們卻看不到任何制度性權力，或是階級與政治的結構關係，後二者與互動變成不相連屬了！

這個從互動視野往下望的若干角度，稍後又為李斯特大學大眾傳播研究中心（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at Leicester University）借用接收，該中心當時的主任哈洛蘭，論及電視的社會效果時，使用了一些術詞，足以顯示它是有意與規範性典範，劃清界限；哈氏是這麼說的，「強調觀眾有如白紙……等在電視機前面，吸收所有向他發射的節目，這個趨勢，已經遠離我們。現在，我們的思索起點，在於認定媒介與閱聽人的關係，是交換與互動的，現在，學者認為每個觀眾趨近電視的觀看情境時，身上都帶著複雜的過濾裝備」（Halloran, 1970a: 20）。

同時，哈洛蘭這篇文章強力主張，我們必須考量「情境與事件的主觀定義」，但又不能給人印象，以為我們回歸到了「使用與滿足取向」的立場。哈洛蘭重新鑄造了「電視效果」的啓人疑竇之問題，不同的只在於此時他使用的術語是「外力提供給我們的世界圖像、情境與問

題的定義，以及哪些才算是真正的解釋，而哪些又是另類的解藥與解決方案」。這個階段的李斯特大學傳播研究中心，其經驗性研究清楚標示了轉彎的痕跡，先前是行為的分析形式，現在則是認知的分析形式。在《示威與傳播》（*Demonstr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這本書裏（Halloran et al., 1970b），他們的企圖是要將「傳播過程當作整個過程」而分析，研究的是「生產過程、再現與媒介內容，以及閱聽大眾的觀看與閱讀所產生的反響」。後面這一個面向，在艾利特（P. Elliott）《一齣電視劇的製作》（*The Making of a Television Series*, 1972）這本書，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揮，尤其是書中提及的觀念，將對於社會大眾所作的傳播，視為一個循環圈，「從社會這個來源」，轉輸訊息到了「社會這個閱聽大眾」。

## 使用、滿足與意義

大眾傳播研究領域之內，既然廣為承認媒介對於閱聽人產生的「效果」，其實並不能直接測量，不能認定媒介內容直接絞住了被動無依的心，因為事實上人是會含納、選擇或排斥媒介的傳播內容，那麼，這樣的認知也就造成了壓力，逼出了「使用與滿足研究取向」的出現。哈洛蘭也說，「思索傳播現象時，我們必須不再想媒介對人作了什麼，而必須轉而想想，人們使用媒介來作些什麼？」這個取向標示了相當重要的事實，它指出大眾媒介閱聽人當中，不同的成員可能各以自己的方式，使用並詮釋特定的一個節目，而這些方式，又與傳播者原來的意向非常的不同，不同閱聽人又彼此互異。它強調閱聽人是建構意義的要角，說得很對。

然而，這個「使用與滿足」模式至少有兩個致命的缺失：

1. 誠如霍爾（Hall, 1973a）所論，若就它過度高估訊息的「開放性」

來看，

多義性並不同於多元主義。衆多內涵符碼本身的開放性，並不均等。任何社會／文化，都以不等的封閉性，試圖將它的區隔標準……它對世界的分類標準……強加於其成員身上。文化總歸還是存在著一個主控的秩序，雖然這個秩序並非單音而沒有人反抗。

(Hall, 1973a: 13)

內藏於訊息的潛在解讀方式，是不止一種，而「接收的人，是否會針對某個文本，提出某種優勢或主控的解讀方式……而這個解讀又正巧是訊息生產者的製碼方式，我們並不知道其間存在著任何規律可以預測」(ibid)，唯一可以確知的是，訊息仍然無法脫離優勢解讀的「支配結構」。所以說，「製碼」這個環節已從生產這一端，發揮了「廣泛」效果(雖然並非全面而命定的封閉了所有的可能性)，扣緊而約制了傳播鎖鏈的後續環節。

誠如艾利特所論，「使用與滿足」取向的一個根本毛病，在於它所隱含的傳播過程之模式，沒有能夠考量電視消費，事實上是：

節目是否能夠讓人明白，而不是觀眾的選擇與否……(就此而言)是否明白又取決於熟悉程度……觀眾接觸、了解某些他們熟悉的類型，部分原因是他們了解節目的語言及手法技巧，同時也是因為他們確知這個類型節目的社會意義。(Elliott, 1973: 21)

唐寧(J. Downing)的批評與此相當近似。他說，內含於「使用與滿足」視野的一些假設，是很有問題與限制的。唐寧質疑道，媒介之多種訊息的「等差詮釋」，怎麼可能是沒有結構化的組合呢？他說得好，

特定的一個「內容」，原則上固然可以讓觀眾以不等的方式詮釋，但，

就事實來說，在絕大多數人口裏面，只存在著這些觀點的小小的一部分，這些觀點的另一些更大的部分，只存在於社會中非常少的一羣人身上。（為什麼如此？）因為成套的文化規範與價值，長存於社會整體而取得支配地位，這是既定事實（比如，罷工是優勢規範與價值觀所不喜歡的），此外，這又必須加上一些刻板印象（比如，發動罷工的總是因為勞工或工會主動挑起的），面臨這個情形，若要挑戰這些既成而深入的價值觀與規範，只能在出現了一個罷工以後，憑藉小心論證而採證仔細的節目，加以呈現，並且，這樣的節目，必須持久才行（Downing, 1974: 111）

2.「使用與滿足」視野第二個不足之處，在於它欠缺社會學認知的涵養。就其本質而論，「使用與滿足」是打從心理學出發的提問方式，它所依賴的是，從個人的社會情境抽離個人的心理陳述、需要與過程——就此來看，「當代的」使用與滿足取向，遠比早期美國同行運用這個架構的企圖，來得少了些「社會學」味。早期的研究，處理的是特定的脈絡形態與特定的閱聽人類型，但「當代的」使用與滿足則一味尋求心理結構，想要從中找出需要與滿足的根本原因，但卻未能合理地將這些心理現象，錯落於任何社會—歷史架構之中。

艾利特認為，使用與滿足研究所處理的「個人內部的」過程，「容或可以概括而成為個人的集合體，但他們並不能以具有意義的方式，轉化變成社會結構與過程的一環」（Elliott, 1973: 6），這是因為此時此際的個人，如同稍前的「刺激—反應」模式，都把個人從團體及次文化抽離，而閱聽人也只被看作是一個已被原子化的個人之總合，不與團



體與次文化等提供行動意義的架構，發生任何關聯。

這個看法，其實也就是極力主張，意識的本質在於社會，因為意識的成形過程是透過語言而完備的，這就是佛羅史諾夫(V. Voloshinov, 譯按：著名的俄國語言社會學家)所說：

畢竟，唯有在一個人的意識與另一個人的意識互動以後，才有符號的出現。而個人的意識本身也是由符號充塞的。意識之所以成為意識，前提在於它必然充塞著意識形態的（語符上的）內容，因此也唯有在社會互動過程才會產生。（引自C. Woolfson, 1976: 168）

對於這段話，武夫森（C. Woolfson）有如下的註解。他認為，由於符號在這裏是被視為社會傳播的工具，被視為充塞於個人意識之中。因此，意識也就被視為是一個社會—意識形態的事實。站在這樣的立場，武夫森這麼論稱：

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其本質完全都是社會屬性。言語總是對於某些東西的某種反應。它是一個人際關係的產物，因此它的重力中心，錯落在個別說話者他或她之外。（Woolfson, 1976: 172）

依此看來，言語絕對不能當作是一個個別的、特色獨具的心理表達，反之，它是由社會規律約制的，既是由當下而立即的社會情境所規約，也是由外環的社會—歷史脈絡所制約；形形色色的言語，形成了「川流不息的兩造相互關係之對話，而特定的社會集體意識，正是由此過程生成的」。（p. 172）

武夫森的論斷，是認為「個別的」言詞之分析，需要重作界定——亦即必須從「社會性的個人」（social individuals）之傳播言詞之分析著手

——筆者則景隨這個看法，但分析對象轉變成個別的觀看類型與反應（譯按：然後就此提出質疑）。我們必須從根和使用與滿足取向斷絕關係，對於它的心理學導向、強調詮釋的個別差異，我們必須全力抨擊。雖然總會存在著一些個別的、私人的解讀方式，但我們的任務，卻是發掘這些個人的解讀，在多大程度內，已經被整編成為文化結構與叢結的秩序中。我們需要的是，找出一個取向，使之能夠往前延伸，觸及個別的差異詮釋，並且能夠向後搭橋，聯繫社會之社經結構；循此則可以讓我們知道，不同團體與階級的成員，究竟以什麼方式，共享不同的「文化符碼」，並且以不同的方式解釋特定訊息，這個差異不單只是展現於個人的、獨特的層次，而是因為社會經濟地位等所形成的系統因素使然。簡言之，我們必須明瞭，（1）閱聽人之不同的次文化結構與形構，以及（2）不同團體與階級所各自共享的不同文化符碼，究竟如何決定不同類型的閱聽人，以哪些方式解碼。

哈洛蘭論稱道，「大眾傳播研究人員的真正職掌，……在於確認不同次文化的存在，並將他們勾勒成圖，然後，他們還應當確認特定廣電或文化政策所掌控的意定領域，其各種次元符碼的重要意義，是些什麼」。哈洛蘭說，這麼做有其必要，因為我們必須將「電視訊息……不僅只是當作一則訊息……而是當作一個含帶訊息的工具箱，而箱中訊息具有哪些意義，則又由現有的符碼或次元符碼塑造。每一個工具箱可能藏著哪些相關的次文化，則是我們必須知道的」（Halloran, 1975: 6）。這裏所建議的模式，對於閱聽人採取了不同的看法，他們不再是個別人物的原子化集合體，而是當閱聽人是次文化形構的成員，或是當他們是團體「成員」，而這些人由於具有那些團體成員的身分，理所當然地就會以特別的方法，共用解碼訊息的文化定向。於是，閱聽人必

然是由基於社會因素而區隔的個別讀者組成，他們個別的解讀方式，勢必受到某些共有的文化形構所框架，也勢必受到先個人而存在的現有秩序之影響：其次，這些背景近似的人，是具有共同的「定向」，但這些定向卻是由個別讀者在階級結構的客觀位置所決定。雖然不能說是以機械方式「決定了」閱聽人的意識，但這些客觀存在的因素卻必然設定個人經驗的範圍——透過次文化層次與意義體系，人們才得以了解他們的處境並作因應。

以上這些文字的討論，立刻讓我們醒悟，問題在於探索社會結構與意識形態的關係。伯恩斯坦 (Bernstein, 1971) 的著作，以及教育社會學界其它人就此領域所作的研究，明顯與此問題有關，筆者先前 (Morley, 1974) 已曾提出一些思索，探詢這部分作品對於媒介閱聽人研究的意義，可能有哪些。接下來，筆者並不是要詳細地複述當年的論據，我只是利用下一節的篇幅，簡單地勾勒階級與符碼之關係，存在著哪些惡名昭彰的問題。

## 階級、符碼與二者之對應

有關「決定性」，或者有關階級結構與意識形態的關係之問題，相關的辯論很多，其中，最為重大而引人沉思良久的看法之一，由賀斯特 (P. Hirst, 1976) 與他的同僚提出。他們的見解是，企圖進一步分梳決定性的意義，注定流於前後不一，這是因為決定性(譯按：是全有或全無的選擇)，如果是全部而整體的決定，任何意識形態的分梳，或是表意行事與過程的層次之分梳，都將失去意義；或者，換至另一個方向，若是承認了自主性 (autonomy) 的存在，則再要分梳意識形態有哪一個形式的決定性作用，也都沒有了必要。當然，這個論點的前提，也就拒

絕了阿圖塞所提出的「相對自主」這個概念，他們尤其認為文化研究這個領域，不應使用這個概念（參見 Coward, 1977）。

埃利思景隨賀斯特的論據，順著這個觀點說話（J. Ellis, 1977）。他認為，企圖從階級立場推演人的期望，或是人的意識形態／政治行事作為與過程，毫無意義；此外，他還認為，類如得自於帕金的製碼／解碼模式，明顯地認定存在著「典型立場」的說法，根本就不可靠。他論稱這個認定並不合理：「碰到適合的時機，比如說，店老闆可以投票給共產黨，並且對於集體性努力，抱持信心」（Ellis, 1977: 58）。所以呢，碰到適合的「時機」（conjuncture），店老闆可以在不受結構約制的情況下，使用許多不同的架構／符碼，解碼各個節目。

以這麼「激進的」方式，重構關於表意／意識形態的行事與過程之自主問題，似乎有兩方面的缺失。第一，輕率地否認身處社會結構之不同立場的人，可能因為特定的文化脈絡而得到不同的選擇範圍，不啻是只求關心個人的（隨機）行動（投票、解碼），但卻置社會—歷史脈絡於不顧，或說，最多只注意到了特定剎那（但又沒有明講的）時機。這於是又回到了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假使我們還希望堅持閱聽人不能獨立存在，而是生活於種種社會集體意識的複雜結構，那我們理當拒絕這種觀點。

第二，而也是更重要的是，埃利思／賀斯特的取向，徒然在倒出浴盆的水之時，也把孩子倒出了。「普查資料的職業項目，直接就反映了政治與意識形態的色彩」，當然，我們顯然要否認這麼機械式的詮釋，這是毫無疑問的正確之舉，原因正是為了這個取向如果成立，則我們等於也就沒有必要探索意識形態再現過程的真正問題（Ellis, 1977: 65），我們只需設定甲類目的成員，必然基於經濟情境的理由，認同於乙類

型的信仰。

但是，埃利思與賀斯特，一下子就從這個立場，轉而論稱「所有」透過階級結構，想要釐清決定論的企圖，都是誤解問題而徒然無功，則又毫無理由。因為，果真如此論據，則選擇方案就兩極化了，變成是「非彼則此」，而任何一極都是荒謬的：若不是完全的決定，就是完全的自主。

問題在於，店老闆的行動，根本不符埃利思假想情況。資產階級的政治學，即便是對於資產階級本身也能產生意義的原因，正是爲了它所探索的是一個結構化的領域，其間，階級決定性只是在統計機率的層次上，產生相關與類型。好啦，若說我們數數這些類型的數目，究竟是多少，或許可能是相當平凡的動作，但否認這些類型的存在，實在荒謬至極；研究人員正應該探索這些類型，探索他們與階級結構的關係。

在此，不妨作個比較。一方是埃利思／賀斯特，再一方則是羅森（Rosen, 1972）。羅森提供的正是既不機械式、也不經濟化約的解釋，他討論了階級如何決定語言，而語言又怎麼對階級形構產生作用，若依埃利思／賀斯特的說法，羅森提出的解釋，根本不可能。但事實上，羅森攻擊伯恩斯坦的原因，正是因爲後者的分析，流於機械式而經濟化約。確實，伯恩斯坦著作所透露的勞工階級，是尚未分化的整體，具有共同的經濟立場。然而，在意識形態與政治行事作風與過程這個層次，另有一些因素，使得「利物浦（Liverpool）碼頭工人與卡文翠（Coventry）汽車工人所使用的語言」（Rosen, 1972: 9）並不相同，而這卻給忽略了。但羅森不以此爲滿足，他極力拓展分析所用的概念、語言，因此也就將這些因素視如具有決定性。他認爲，單是「共同的職



業功能」就能決定語言符碼，是不可能的，他主張，若要就眾多階級類目之內，以及貫穿這些類目的變項，作個區分，則必須援用意識形態賴以建構的實際作為或行事：「歷史、傳統、工作經驗、氏族源起、住家類型，以及組織位階」（ibid: 6）。

但最重要的問題仍然存在。亟待切入的論點，事關「語言與階級」。這個論點的吸引力，在於它直接從意識形態的、論述的與政治的行事與過程，進行分析，而不是採取伯恩斯坦那種機械式的經濟論斷。此處，羅森也將這些因素鑲入階級決定論的整體觀一併討論，而長期以來，將他們帶入解碼領域而後分析，一直落後——但表意行事與過程的相對自主性，並不是說這些解碼過程，不受階級因素的結構限制。到底結構性限制是「如何產生的」——不同層次的閱聽人，他們與語言、階級與符碼的關係，呈現了哪些排列組合情況——則是「必須經由方誌學途徑，才能探查清楚的」（Giglioli, 1972: 10）。

真正要問的是，難到這注定非此即彼，不是本質至上而流於完全自主的論調，就是機械式的命定說？筆者的論點是，機械式的說法，難以充實其內涵，無法自持。事理至明，各個結構、文化與生物體的形構（請見 Critcher, 1978 的討論大綱），很明顯就走脫了全盤決定或全盤自主的兩極說法，因為，有了這些不等的結構，種種周邊疆域也就設定了，它們所決定的是文化選擇與反應的範圍，而不是直接決定其他層次的行事與作為。這麼看來，整個問題叢結顯然是這樣的：在避免掉入機械式觀念的同時，階級結構在多大範圍內，決定了文化素養的程度、符碼的分佈與解碼的狀況。

《全國觀眾》這項研究，原本的用意，是探索最初的製碼訊息在多大限度內會被以優勢（或主控）的方式解讀。不過，隨後又有相關於

這個問題的另一面向出現了，亦即這些解釋或解碼過程，其實也會受到閱聽人所接觸的其他符碼與論述之影響，但影響到什麼地步呢？這就是問題。就此而言，我們關心的是，不同部門的閱聽人之間的文化符碼之分佈，以及貫穿於他們的文化符碼之分佈，究竟在多大程度內，是由社會規律所決定的？換句話說，閱聽人具有多大範圍的能力，他們有多少的解碼策略與素養？

提出這個作為研究問題，已經等於是認為，碰觸文本的人及主體，會怎麼得出文本的意義，無法逕自從文本的特徵，直接「讀出」而歷歷不爽；並且，事理應該是「一個特定的文本，會被如何使用，它在特定環結、特定制度性空間的功能是什麼，它與特定閱聽人之關係，又是什麼」（Neale, 1977: 39-40）。文本不能孤立看待，文本自有其生產與消費的歷史條件。

所以說，我們必須明白，文本的意義必須放置在特定的環境考察，然後想一想，它接觸了哪些其他論述，並再評量，這個接觸又會如何重新結構該文本的意義，以及那些論述的意義。閱聽人具有哪些論述能力（知識、偏見、抵抗等等），他（她）又如何運用這些能力理解文本，決定了文本意義的建構方式，而閱聽人具有哪些論述能力，則又是影響閱聽人／主體與文本的接觸，將以何種面貌出現的緊要因素。當然，就此而言，「不同的人與這些一套套的論述，是會有不同的關係，因為他們在社會形構中的位置、他們在現實情境的進退位階，將會決定特定的一個人，他（她）可能接觸到哪些論述，而又是以哪些方式接觸」（Willemen, 1978: 66-67）。

狀極明顯，魏樂門（P. Willemen）再次返回了前面提及的議題，亦即社會立場與論述形構的關係，究竟若何；在這方面，教育社會學之

著作，向來就很關注，在英國以伯恩斯坦最爲知名，在法國則另有其人（Bourdieu, Baudelot, Establet）。尤有進者，魏樂門的著作，可以說是這方面理論的一個重要進展。誠如他所論，所謂決定性的影響，不應該當作是一個封閉而終結的過程：

我們已認知現實（the real）具有決定性力量，與此同時，我們亦須認知現實從來不是安居不移，若借用一句拉康（J. Lacan）的術語，則我們應該說現實總是，而且也只是被掌握、建構而成爲現實，換句話說，現實是經由論述而存在的……現實大體上決定了論述的接觸、決定了現實本身與論述的接觸，但另一方面，這些接觸也結構化了、生產了實體，並且隨而影響了主體在現實中的運動軌跡。（ibid：67-68）

——或者，我們也可以套用尼爾（S. Neale）的話，就說「經濟方面的、政治方面的，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理由，決定了閱聽人」（Neale, 1977：20，強調部分爲筆者附加）。

4

## 第 2 章

# 心理分析理論： 文本、讀者與主體<sup>①</sup>

晚近幾年，研究閱聽人的眾多視野之一，是源起於心理分析理論，而主要發為電影理論的一些著作，它的關懷點正是主體究竟如何被文本建構。

就文本／主體關係的模式之發展來看，儘管這類型的著作，理論上的複雜程度極高，但直到現在，這個模式對於閱聽人的經驗性研究，沒有什麼貢獻可言。為什麼如此？原因也可以說是很簡單，問題出在就此傳統作研究的人，整體看來，覺得自己既然能夠從文本的結構，推知閱聽人的種種反應狀況，則他們已經心滿意足。果真他們只是停留在這種自得的模樣，則筆者認為，雖說這類研究在其他方面的理論性成就匪淺，但心理分析作為基礎的研究，最終說來，可以說是動員了另一種版本的效果皮下注射理論——因為至少就其原初的、基本的一些想法來說，它都是以一種普遍適用的理論之姿態，企圖解釋主體何以必然會被文本定位。若是從閱聽人研究的角度檢視，這類研究令人難以接受的原因，在於它既然聲稱其理論足以普同適用，則我們也

①這篇論文最初是由筆者與布蘭敦（C. Brunsdon）合作的，用意是要擴展《每日電視：“全國觀眾”》（*Everyday Television: 'Nationwide'*）這本書的理論，尤其是與閱聽人有關的論述。本章現在也參納了以下數人的評論：Dorothy Hobson, Adam Mills, Alan O'Shea，而又為了由 Stuart Hall 出版，這篇論文又作了大幅修改。



就很難找到任何理論空間，查訪閱聽人是不是自有差異的解讀方式，是不是自有不同的詮釋或反應。這全是爲了源自心理分析的電影理論，根本就是想要提出普同適用的主體形構理論，然後用概括的通則，企圖削足適履，解釋特殊的文本／讀者之關係。

站在這個視野往外望，則必然強調心理分析過程是普遍而與生俱來的，主體則在這個過程被建構了出來。接著，文本也只被當作是複製、再生或重生這個原本就存在的主體位置，而任何特定的解讀則以此事實作爲基礎。筆者的論點則是，這樣的假設極有問題，我們必須加以質疑，因爲，並不是所有的特殊論述效果，都可以在一個單一、普遍的心理機制之下得到解釋，也不能如此化約的——這種說法像極了伯拉圖式的理論，它認定任何特定情況都不能免脫在它的表現之外。這種形式的心理分析理論，自行暴露了本身的主要議題，其實在於它完全從主體這個層次，而不是從被建構的主體與特定的論述立場之交互滲透，審度符號具的政治問題（內在於語言的意識形態抗爭）——也就是說，它沒有從召喚(interpellation)的角度看問題，若如此看，則論述主體其實是在許多不同、但又相關的論述空間之中(interdiscursive space)運作的。

提出這個論點時，筆者援引的，是霍爾針對拉康視野的批判。霍爾認爲，「如果欠缺進一步的研究、欠缺專殊化，那麼，佛洛伊德(S. Freud)與拉康論述所稱的伊底帕斯情結(the Oedipus complex)之機制，也就只是普遍性的宣示，沒有歷史感，因此只是一種本質至上的論調」(Hall, 1978: 11)。依此而論，霍爾論稱，就其普遍性的形式來看，這些概念實在沒有用，因爲它們流於粗糙而欠缺分殊、欠缺錘煉，不足以分析具有歷史意義的特殊社會形構。

這個企圖，是想要掌握兩種主體觀的區別：一種是認為，主體的建構沒有時空之差別，它是一般性（或神祕性的）主體；再一種則認為，一般說來，主體總是被特定社會的論述形構召喚的。這也就是堅持：緣於語言而形成的主體，必然不同於經由召喚過程而形成的主體，因為後者是徵召特殊的主體，進入論述形構的主體位置。這個堅持，等於是認為這些召喚並非既定而絕對的，而是隨情境轉移，並且暫時性的，因為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抗爭，就是經由召喚的接合／剝筭（articulation／disarticulation）過程而進行的；另一方面，這也就是認為，每一個解讀方式，均相當特殊，主體位置的原初結構並不能先行決定之。

一九七〇年代，英國《銀幕》（*Screen*）這個刊物（譯按：引進法國拉克等）理論立場，固然影響力巨大，但是有一個主要的問題，誠如尼爾所說（Neale, 1977），它賴以推動其理論的是「抽象的文本—主體關係」。這個理論認為，先前的其他論述形構與社會關係，對於主體的建構，並無關聯。此外，按此理論，主體在任何時刻，也只是與一個文本發生關聯，或說，換成另一種說法，所有的文本被認為是根據單一的「古典實存文本」（classic realist text）之規則而運作。然後，這個理論再借助普遍性的、與生俱來的心理分析過程（伊底帕斯情結、「鏡中階段」、閹割情結及其解決），嚴正而詳細地解釋古典實存文本的運作規則，再根據拉克對於佛洛伊德的解讀，「主體」就這麼建構出來了。在此闡述之下，文本只是複製、再生或重生這個與生俱來的主體位置，而其後任何解讀的基礎，盡在其中。

這麼看來，盡是援用這個普遍性的理論，單是借助一般性的主體觀之形構而論事，困難是雙重的。其一是文本／讀者的關係是特殊的，

容不得如此解釋，其次是文本與讀者與所有社會及歷史結構的接觸，被排除在外，「並且」這些文本與其他文本的接觸，也被視若無睹了。若是以此觀點審度閱讀／收看的過程，正也就忽略了其他文本與論述，其實是不斷介入（譯按：原先文本的讀／看過程的）。再就文本的接觸來看，事實上，儘管引起注意的是特定的文本，但與此同時，其他論述總是隨時嬉伴在側——論述總是取決於其他的論述形構，它總是透過主體在其他文化的、教育的與制度的等等面向的位置，產生其意義。所以，這些其他的論述，等於也是設定了若干條件，任何特定的文本會有些什麼意義、如何為人評估，其實不能脫離這個背景而產生。「銀幕理論」（screen theory）忽略了其它論述在與文本／讀者接觸時的相互作用，或許它會說這個忽略並無不當之處，因為它自有假設，認定所有的文本根本就是依據同一套的主體位置而運作，認定這些位置共同形構了主體，因此這些位置也就沒有任何其他獨特的作用可言。但這個假設正是筆者所要質疑之處，要說單一的、普遍存在的一套心理機制之運作，足以解釋所有特殊的論述效果，或說這些論述可以化約成為這個機制，在我看來，實在不可信。

費朝詩（M. Pêcheux）提出了「交叉論述」（interdiscourse）的概念，非常重要也非常有用。伍茲（Woods）對這個概念的詮釋非常好，他說，

各個主體的建構，相對於每一個主體，必然都是特殊的……我們可以將此情況如此看待：先是存在著一個單一的、原初的（而神祕的）召喚（interpellation，亦即進入了語言與形象過程），它建構了一塊「空間」（space），而許多相互召喚的主體於此持續的交相作用，每一個主體對於論述過程，都具有決定性的形構作用。因此，具

有論述本能的主體，必然都是「交叉論述」，都是主體本身生活史上，所有論述的行事及過程之交叉效果的總合產物。(Woods, 1977: 75)

## 交叉論述與召喚

根據這個提法，關於主體，重要的區分如下：一種是主體的建構沒有時空之差別，它是一般性的（原本就如此的、神秘的）主體；再一種則是，這個一般性的主體，是以主觀的形式（論述的主觀位置）被召喚的，而這些主觀形式則又取材於現有的繁複論述，組成了特定社會形構的論述形構（亦即交叉論述）。所以說，「銀幕理論」費力想要抵除兩者的差異、想要抹去兩者之間的空間距離；「緣於語言而形成的主體」（subjects-for-language），必然不同於經由召喚過程而形成的主體，因為後者是徵召特殊的主體，進入論述形構的主體位置，銀幕理論意欲混同二者，但費朝詩又將兩者的區分，重新打開了。對比之下，「銀幕理論」所暴露的「符號具的政治問題」（內在於語言的意識形態抗爭），完全屬於主體這個層次，另一方面，費朝詩卻從被建構的主體以及特定的論述位置之交叉滲透，審度這個問題——換句話說，費朝詩認為此一問題發生於召喚這個位置上。這個區分，至為重要。

依「銀幕理論」來看，在主體與文本（論述）介面之間，不可能找到抗爭的位置，因為在心理分析這個層次，一些矛盾的立場已先被決定了。費朝詩接受了這個主體形成理論的一部分，但卻沒有照單全收，也就是否認主體／文本接觸之時，所有關於意義／詮釋的抗爭，已然在解讀本身之情境以外，全部被決定了。借用阿圖塞式的術語，「銀幕

理論」所認定的是，任何一個解讀，即便再怎麼特殊，都早就被主體位置的原始結構決定了，但費朝詩則將解讀所可能得出的結果，當作是一種汎層決定（over-determination）。這兩個結構（主體／詮釋的建構、特殊論述位置）彼此接合，但卻並不同，彼此都不是對方的複本。

這個說法與拉克勞（E. Laclau）提出的論點，已經相當接近，他的論點在兩方面與此相關，一是意識形態論述的運行，有賴於召喚的存續，並且依賴的程度很大；其次是，特定論述之召喚結構，必有意識形態的抗爭才能進行剝筭／再接合的工作。「召喚」這個詞本身就相當曖昧，歷來已有不同的界定方式。阿圖塞（Althusser, 1971）在〈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這篇論文引進了這個詞，固然將它當作從拉康「借貸」來的術語，但並沒有說清楚在拉康理論當中，這樣的借貸具有什麼樣的地位。換句話說，阿圖塞並沒有廓清，在什麼程度之內，他接受拉康的論點：他所說的召喚，在援用最初的心理分析過程，已完全被解釋了。在前舉論文的第二部分，阿圖塞提出了廣為爭議的一句話，他說「除非具體主體存在，否則別無意識形態存在」，他又加了一句，說意識形態的運作，總是透過「主體的類目」而進行。但他所說那個（譯按：主體）類目的建構，在他筆下，並非在心理分析層次完成，而是在意識形態論述本身的運作中完成——換句話說，在阿圖塞論點的這個階段，主體也就是一個論述類目：「由於意識形態具有將具體的個人建構成為主體的功能，是以在我加入主體類目的同時，所有的意識形態都已立即由主體建構而成」。稍後，他提出了更具有拉康色彩的說法，說個人在被意識形態論述招手（hail）前，總是已經存在於意識形態中——「個人總是已經是主體」——但即便如此，對於這個說法，具有多少的決定性，阿



圖塞仍然保有幾分曖昧。尚未出世的小孩，也早就有一個意識形態目標與命運，等著他／她：但阿圖塞(譯按：並沒有如此截然地說)，他只是這麼說：

很顯然，這個意識形態上的局限與預先的安排，以及家庭中的養育禮俗與教育，都與佛洛伊德就前生殖器與生殖器「階段」的性慾研究，有些關係……但再次地，且讓我們將這論點厝置旁邊。

相較於阿圖塞，在援用「召喚」這個術語時，拉克勞(Laclau, 1977)更為公開的表示了不可知的態度。他從來沒有就心理分析層次談論召喚的主體。反之，他景隨阿圖塞，因此從論述這個層次談論主體：「是什麼東西構成了一個意識形態論述的統一原則？是被召喚的『主體』，是經由這個論述而被建構出來的主體」。極為明顯，拉克勞並沒有採取拉康式的說法，他並不認為在嬰兒成為主體的那個瞬間之前，召喚結構已建構完成，因為拉克勞整個論據的精要，正是在說明這些召喚並不是既定而絕對的，而是隨情境而移轉，並且暫時的，隨著意識形態而展開的抗爭，正是經由召喚的接合／剝筭過程而進行：「意識形態怎麼可能發生轉換變化呢？答案是：階級抗爭！而這又經由主體在建構與生產，以及論述的接合／剝筭而進行。」這樣看來，這個立場似乎是費朝詩採取了拉康式論點的一部分，但費氏只將主體空間的建構，當作特殊意識形態論述之運作過程中，先行發生決定作用的一個要件。拉克勞則完全從論述抗爭與論述戲劇的層次，審度詮釋的問題。但他們兩人都贊同，意識形態的抗爭，必須放在主體與論述之交相作用的層次，才能清楚了解。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引進矛盾的召喚(contradictory interpellations)

這個概念，藉此廓清並修正帕金(Parkin, 1971)與其他人的社會學取向，他們說工人在抽象意義上，已經承認了「主控意識形態」具有正當性，他們又說，但是在具體行事作為這個層次，工人所採取的卻是一個「協商的」或「視情境而定義的」意識形態。換句話說，借助這個分辨，我們可以廓清矛盾意識形態立場的問題，尤其是對於已被統合或派系的階級意識等形式，提出說明，但卻不必回復到「虛假意識」這個前提論事。帕金說，這個證據顯示，「意識的分裂」。不過，如果我們引進召喚這個概念，我們應該就不再會以為階級意識的形式是前定的、一統的或同質的。這樣一來，同樣一個工人（他／她是一個矛盾主體、不同的論述盡數向他／她衝來），如何受到不同的、矛盾的主體立場或召喚之「招手」，這些分歧點如何接合並存，也就得以確知並作爬梳了：比如，主流新聞媒介的電視論述，可能以「民族國家之主體（子民）」之名，召喚他／她，但他／她的工會組織或互助工人會，可能以「階級／派系的」主體召喚他／她。如果採用這個取向論事，則這些矛盾的召喚，其彼此之相對強弱，以及它們可能接合於哪些政治行事與作為，實乃取決於主體被召喚當時的環節情境（conjuncture），而無法從其他地方（比如，在主體形成這個層次）決定。

強調召喚的矛盾性，也就是強調角度與立場的不穩定、臨時性與動態質性，因此也就不會掉入靜態社會學式的描述（如帕金的「意識的分裂」這個概念）。後面這個說法，只是將意識區分作固定的若干成分——某些時候主體認同於主流論述，而另一些時候則他／她可能反對這些主流論述。筆者再次要說，拉克勞提出的概念，認為意識形態亦有其剝筭的過程，非常緊要，並且（譯按：與筆者的論點）極為相關——尤其是他指出，是有些論述，足以將對抗的意志與矛盾的現象，轉成只

是淡然與漠視，這樣一來也就將潛在的敵對狀態，中立化了。依此見解，則強調的重點轉向了意識形態過程與抗爭本身，於是也就再度質疑，文本／讀者／主體的關係，怎麼可能是先驗地已作規範而固定了呢？

費朝詩使用「交叉論述」這個術語，似乎是用來說明任何社會的論述形構，都是非常之複雜，並且這個形構提供了已經存在的主體位置（「先已建構的」），作為論述發生作用的一個必有類目。極為明顯，一個文本對應一個主體的說法，在交叉論述這個概念的衝擊下，已經轉變為多重文本／多重主體的關係，此時，文本與主體的接觸不再能夠孤立看待，而只能在他們結合的那些時刻，才能見出真章。

還有，每個主體都是有其歷史的，這是「銀幕理論」所沒有考慮的另一點。假使文本／主體的單一對應關係不存在，而是現在當下，存在著多重文本／多重主體的關係，是個正確的說法，那麼，過去的種種召喚對於現在的召喚經驗，亦有影響，也是事有必然。雖說這些傳統的與制度化的「軌跡」（traces，套用葛蘭西的術語），其本身並不能決定現在的召喚，但它們確實建構了交叉論述的眾多要件，它們也框架了各個後續的新接觸。葛蘭西說的是眾多傳統要件的重量，拉克勞則說是眾多人民傳統的「相對持續性」。或許可以這麼說，拉克勞推得還不夠遠，他並沒有深入檢視這些「已先建構的」要件，對於眾多意識形態論述的現存召喚結構之接合／剝筭過程，如何產生遲延而阻礙的作用。其結果是，拉克勞提供的圖像，由於沒有長足地剖析傳統要件的影響，致使這些這些論述之間的對抗，顯得過度開放。

作為一個「空間」的主體，如何被建構出來，以及作為特定召喚之下出現的主體，二者並不相同，但「銀幕理論」並沒有就此做個區

分，既然如此，它也就從文本所提供的主體位置，推論主體，並且將此二者（譯按：文本與主體）視作相同。如此一來，透過它的特殊論述策略，「古典實存文本」等於是重述了與生俱來的過程所建構出來的主體位置。在這二種結構之間，存在著一個同一的認同與完全的互動性，而這就「銀幕理論」看來，事實上是相同的一個結構。因此，若說實存文本是「解讀出來的」，不如說它只是經由讀者可以取得的唯一一批位置——那些寫入文本的位置，逕自直接消費／攫取。根據這個說法，解讀時刻生產意義的可能性，也就預先被封閉了。照「銀幕理論」之說，這個時刻被雙重決定了——第一，被與生俱來的多重主體位置所定，它們將主體寫入了語言；第二，透過實存主義的策略，那些位置又給重新寫入了文本。由於這些程序被解釋為普同適用的機制，也就沒有人要求「銀幕理論」，就不同的、歷史上特定的「實存主義」，是否可能存在，提出說明；也沒有人問它，被寫入的實存解讀方式，是不是可能被拒斥。於此，讀者只不過是在無意識之下，成為本身位置的負載者或傀儡，讀者變成只是由（單一）實存論述結構所複製。但這樣一來，「銀幕理論」又違逆了結構語言學先前建立的最重要的兩個進展：任何符號與根據符號而來的論述，原本都具有多義性，而所有的解讀，都具有詰難與擴張的本質。從許多方面來看，堅持「文本生產性」的「銀幕理論」，由於認定實存文本，只是重彈他處建立的位置，正也破壞了「文本生產性」這個概念。

與此論據相矛盾，不錯，但筆者仍然意欲強調，「優勢解讀」這個概念的某些想法，還是應當保留。這也就是說，主流論述（discourse）的一個文本，確實會偏私或選取某個特定的解讀方式。接著，我們可以就此再作推論，這些主流文本得以被優勢解讀的部分原因，是因為

它們進入了某些優勢論述位置，致使這些論述狀似「自然」，通體透明地連繫於「真實」，而且可信。但是，這一定不是解讀嵌入文本的唯一方式，而這當然更不是不同讀者唯一可能有的解讀方式。論述之多義本質的理論，必須緊守「製碼」與「解碼」之間，存在接合的可能性，但與此同時，它所採取的立場，卻不應該是認為兩者相同或「必然對應」。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實體效果」(the reality effect)的內涵，並不是經驗主義者的主體在實存論述中，必有的複製產品，而是論述本身所完成的結盟效果，由論述而連結了主體與文本。

### 意識形態的問題叢結與議論問題的模式

即便是「古典實存文本」，若是要為人理解，則條件之一是嵌入文本的多重主體位置，可以由不同的主體佔據，因為無論是過去(由於其他文本／論述／制度之召喚之故)或現在，這些主體都已在這個交叉論述空間，被賦予位置。但這並不是說，由於特定文本已嵌入了特定而完整的位置，讀者也進入此位置而可以充分了解該文本，因此他／她將因為這個單一理由，服膺於該文本的意識形態叢結。(譯按：因為)主體在與其他文本、問題叢結、制度或論述形構發生關係之後，已另有(多個)立場，而文本也就可能與這(些)立場，產生矛盾。換句話說，佔據了由外所嵌入的主體位置並採取了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叢結，不同於採信主流的文本解讀方式，二者有異，不可混同。所以說，我們不能假設一個文本嵌入了一個召之即來的主體，我們只能假設文本／主體的許多特殊關係，究竟如何演變，部分取決於文本多重性所設定的多重主體位置，(已經)造成了多大程度的矛盾主體性，畢竟，在「主體空間」之內，每個主體不但相互作用，而且彼此對抗。



尼爾說，意識形態的問題叢結(ideological problematic)與議論問題的模式(mode of address)，兩者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區別。根據他對兩部納粹宣傳影片（“最後的猶太”〔Der Ewige Jude〕與“Jud Suss”）的分析檢視，顯示兩部影片具有大致相同的意識形態之問題叢結，但二者議論、處理問題的模式，卻迥異其趣。「如果說“最後的猶太”算是與“Jud Suss”在種族、秩序與他們的再現問題叢結方面，具有相同的見解，我們仍然可以注意到，二者接合問題叢結的模式，並不相同：它們的文本議論模式，各有不同」。尼爾將這個論點往外推衍，談及了交叉論述的效果；所以說：

雖說我們可以分析文本議論而得知其效力，但議論(address)與文本議論(textual address)，並非同義詞……；特定的一些立場，以及立場所顯示的模式，是兩種東西的聯合產物：文本議論及緊密而立即與其相連的論述。這些論述則是支持文本議論之器物(apparatuses)的一部分，必然環繞著文本議論……再下來，這些論述與文本議論，以及它們與文本互動而造就的立場之特定模式，具有什麼樣的屬性呢？這就取決於整體環節的意識形態之作爲與行事了（取決於意識形態抗爭的狀態了）。(Neale, 1977: 34)

這裏所說的意識形態的問題叢結，並不是一成套的內容，而是界定清楚的一套運作規則(a defined set of operations)：一個問題叢結認知、組織，並同時從中選擇參照領域的方式。組成這個問題叢結的東西，包括了問題與題旨的特定議程、可見或隱藏的前提與命題，或是一整套有人問／沒人問的題庫(及擬議的答案)。這些命題所組合而成的方塊矩陣，也就構成了一個相對一致的運作空間。一個問題叢結可以

界定一個文本的主流或優勢題旨。但界定這些文本的問題叢結，可能多於一個，儘管只有一個或一套相當局限的問題叢結，主控、支配了全局。

尼爾援用「議論問題的模式」這個概念，特別是要用來探討主體取得位置的過程：

論及論述的再現問題與意識形態之關係，也就是論及了主體的位置：每一個論述的再現，都建構了一個主體位置，這是合致地，或偶爾斷裂地生產與組合意義的一塊地方。(Neale, 1977: 18)

但他接著又說，「這些主體位置並不必然受到單一的、特殊的議論模式之影響」。不過，若要更為有用的界定這個術語，也許必須將它與所有那些相關的論述規則，相提並論，探討兩者的關係，因為這些相關論述正是企圖建立並界定文本／讀者關係之形式。但我們也得小心，切忌認為嵌入文本規則的知識位置，必然都為所有的讀者接受。此外，文本所獨厚並在其論述規則所規約的位置，相比於具體的個人（成功地或不充足地）被任何單一的文本所召喚的過程，二者並不相同（至於具體的個人，其實還是早先就被建構成為論述多重性之主體了）。總而言之，個人並不是單一文本的禁臠。（譯按：文本與主體之）成功對應，必須當作是一個（譯按：費力獲致的）成就（accomplishment），而不是既定之事實。它是一個接合的結果；若非如此，也就沒有剝筭的問題了。

「銀幕理論」經常置具體的個人於不顧，不把他的／她的建構當作是一個「為了論述而存在的主體」，它經常閃避事實，不認為論述的主體位置，是由特殊的論述行事與規則所建構的。就分析的層次來說，這些概念都必須分開來看，否則，我們也就不能了解，在二者「沒有

必然對應關係」之情況下，主體／文本的關係是些什麼。當然，特殊的一些組合——比如，特殊的問題叢結與特殊的議論模式——在特定歷史過程，還是可能存在的，此時，它們變成了在特定環節界定社會形構之際，基礎穩固的、主控的或再三出現的類型。在一個特定的場域或機構下（比如，好萊塢電影），這些類型可能因為行事的制度化而固定了下來。但即便如此，這些對應的情況也不是「永遠如此」或普同不變的；它們是被人爭取來的。究竟是哪些行事與機制，再三地將主體與文本，一個接著一個地安置在某些地方，我們可以找出。但除非我們承認並沒有一個單一的意識形態，有的只是主控的意識形態（譯按：及不受其控制的另一些意識），否則，這個已然狀似自然而然的對應關係，也就必須經常重新解構，我們也必須展示它是一個歷史上的具體關係。由此推論，存在於世的必然是不同的實存現象(realisms)，不是一個單一的「古典實存文本」而涵納了所有的實存文本。並且，這些實存現象與特定的一個意識形態之問題叢結，二者之間，並沒有必然的對應關係。

## 個人、主體、「主體」

在一篇重要的論文裏，魏樂門指出，「銀幕理論」經常無理地混同了文本的主體與社會主體。他說：

「實存的」讀者／作者，以及建構於、作記於文本之中，被「嵌入」文本之中的讀者／作者，兩者不同，存在著不可跨越的鴻溝。實存的讀者是歷史上的主體，生活在社會形構當中，而不止是單一文本的主體。這兩個類型的主體，並非互成比例而如影隨形。

但爲了在形式上求得一統，實存的讀者也就被假設與建構出來的讀者，當作相同。(Willemen, 1978: 48)

此外，哈地等人 (Hardy, Johnston and Willemen, 1976) 也說，「嵌入文本的讀者」與「受邀而採取這個立場的社會主體」，必須作個區別。葛雷西 (Gledhill, 1978) 就心理分析的與歷史的「主體」，提出了問題；而強斯頓 (C. Johnston, 1979) 的回應則是，他呼籲研究者應該跳脫迷障，不要再將文本當作一個自主的研究對象，而是應該更爲複雜一些，採取歷史的／社會的眼光研究主體性的問題。女性主義電影的實際表現，不再能夠只是當作再現體系的一環來看待，反之，我們必須將它當做是由主體生產的、生產主體的過程，而這些主體則已經先是社會上的實際作爲與過程，既然如此，這些主體必定涉及了異質性的、而且經常是矛盾的意識形態立場。

在稍早的一篇論文，哈地等人提出了「交叉互鎖的主體性」模式，指的是社會性主體，身陷於許多形象體系的網路，其間，社會主體「總是超越了文本所隱設的主體，因爲他／她也是由文化體系之異質性建構的，它不可能與全盤文化文本的單一片段(亦即一個影片)所建構之主體，同時並存」(Hardy et al., 1976: 5)。所以說，文本所隱設／暗指的主體，必然是已被決定的社會形構之中，不同社會行事作爲所蘊涵的主體——而不是一般形象意義之下的主體。這些主體是被特殊的、歷史的社會性所建構的：

就其最絕對而與個人無涉之性質來說，這個主體本身就生活在歷史當中：論述……決定了主體的活動條件，歷史中的主體有其生活空間，亦即個人於社會形構的特定時空所取得的意識形態上的

位置，是衆多競爭中的論述交會場所，其力量的組合關係則決定了論述如何改變。(Willemen, 1978: 66-7)

諾威-史密斯 (G. Nowell-Smith) 正確地指出，尼爾的取向有其特殊之處，因為他打破了前例，不再以非歷史的而且未經特別表明的用法，探討主體這個類目。總結尼爾的立場，諾威-史密斯指出，「就政治意義來說，(宣傳)……觀眾看電影的時候，總還會受到這些影片為他們提供的社會位置之影響」(Nowell-Smith, 1977: 5)。這「一方面是文本關係本身以及議論模式的問題」；但同時這也是「政治—歷史接合點」的問題，因為「觀眾受到約束的過程」(或說，筆者另要加上不受影響的過程)「並非只是經由形式的機制而進行，而是另要考慮社會性規約在一些特定時空，如何於文本及其他場域發生作用」。這個論點對於文本與主體如何被概念化，均有影響。它賦予論述層次合適的特殊性與效力，但它並不把文本當作自主的表意體，它也並不認為表意過程，具有無所不包的效果。對於「文本的生產性」(the productivity of the text) 這個詞，它提出了更為確切的修正與補充。

魏樂門筆勢一轉，重新又把讀者的社會位置與論述形構之關係等整套的問題，放回議程，但這次是從論述之內的立場發言。這些問題，如果套上社會學形式，則是伯恩斯坦(Bernstein, 1971)早期論著的核心。這些社會學風的討論，消失無蹤，不消說，原因正是為了「銀幕理論」慣於批判社會學的取向，在那個陣營裏，任何文本，單只是被冠上「社會學」這樣的但書，就足以背上黑鍋，被人玷污為理論的廢物（參見 Coward, 1977）。伯恩斯坦是有些論點，頗惹人物議，主要是他早期的著作，對於階級與語言的關係，說得過度決定論了。這個立場遭來了廣



泛的批評，而從那時候到現在，伯恩斯坦這部分的論點也有些修正。整個論點據以進行的假設，是很可以被人批評，但它提出的問題，並非沒有理性的基礎。社會學式的形構，基本的問題是它們不假思索就認定，社會結構與論述之間，存在著非常簡單、一對一的對應關係：他們認為階級位置選定了語言，而語言也嵌入了階級。這樣的立場不值一辯，也難以持久成立。它所推論的基礎，倚仗的概念流於幼稚，弄不清階級是如何被建構的，它只是說有些固定的意識形態，附著於整個階級。對於什麼是表意行事與作為，以及它們相對的自主與特殊效果之問題、（譯按：社會學式的）概念，目瞪口呆啞口無言。

這個立場的缺失，毋須在此贅述。要言之，階級並不是一個單一的類目，也不是只在經濟層次發生決定性作用。若就階級在建構而言，經濟的、政治的與意識形態的，三者之間並沒有一個簡單的對應與聯結關係。各個階級並沒有固定不移的、單一的世界觀。套句普蘭查(N. Poulantzas, 1971)的術語，這些不同階級的人，並沒有排次對號，他們並沒有在自己背部貼上號碼牌，標示自己的世界觀。拉克勞認為，「如果孤立來看」，即便是「意識形態的要件，也不必然具有階級的色彩，並且，也唯有在具體的意識形態論述情境中，透過這些意識形態要件的串連接合，才能形成階級的色彩」(Laclau, 1977: 99)，所謂的意識形態要件，其實就是在特定的環節裏，這些論述與階級實際作為與行事的接合結果。然而，類如帕金(Parkin, 1971)等人，傾向於採取本質論與階級化約論，固然是事實，但另有一個想法，與此恰是背道而馳：它的前提是認定了絕對自主性的存在，而若要追究論述形構與階級形構的關係，則一定是化約論者的說法無疑。但這樣的立場也實在讓人難以接受。若要解決這個問題，則必須先行思索兩個明顯矛盾對立的

說法，並且必須將它們的隱含意義，想個一清二楚：第一個說法是，論述不能經由階級而解釋，更不能化約為階級，因為這只是純粹經濟層次的理解；第二個說法則說，但再怎麼說，「閱聽人『是』由經濟、政治與意識形態所決定的」。第一個說法認為，從經濟內涵定義的階級，永遠無法取得合適的論述位置。但第二個說法則堅持主張，階級的經濟與政治成分，對於各個代言團體的論述分配，必定有些真正的影響。

（筆者在這裏只處理論述的階級化約問題，但我們總須記得，其他結構與關係——比如，兩性與父權關係，雖然不能化約為經濟問題的問題，但它們對於哪些論述將作何種分配，同樣具有一個結構化的效果。）

簡言之，各個階級／意義一體系的關係，必須從根從頭模鑄，而論述層次居間所發生的完整作用，則須全盤納入考量。這些論述發揮的作用相當大，它們制止了，或是打消了任何人的化約念頭，再沒有人可以從語言運作的層次，往回倒推，說語言的運作狀況可以由經濟階級位置預測。所以，在特定的讀者／文本接觸之時，我們並不能說，由於讀者的社會經濟位置如此，因此他／她所援用的論述架構，一定如此。但我們倒是可以說，社會結構的特定位置，是有其結構化（structuring）與限制性（limiting）的效應，約制了不同部門的閱聽大眾，可以取得哪些庫存的論述或解碼策略。對於庫存論述的分配類型，它們是會發揮特定的效應。尤有進者，特定閱聽大眾之素養高低與種類，是受到了社會結構力量的局限，但我們並不能因而決斷地說，這些力量的根源來自於經濟意義的階級位置。分配論述語彙與素養的主要場域（跟隨伯恩斯坦與寶笛的若干說法），很有可能是家庭與學校，或者，就像阿圖塞（跟隨葛蘭西）所說，是家庭／學校這對連體嬰。借個寶笛的術語，這正是分配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主要制度性場域。造成

形構與結構化效應的其他因素，還有許多，比如，性別、當下的社會脈絡或文化環境，它們不僅會影響特定的文本／讀者接觸之狀況，對於讀者操用哪些庫存符碼，它們同樣發揮影響力。大眾媒介與其他文化管道器物，輸送分配了哪些論述，對於已然被結構化的閱聽大眾的論述素養之分化，同樣將產生結構化效應。

雖說前述命題有待具體層次的進一步分析，但未來應有的工作方向已經相當明顯。究其實，日後必須進行的研究，目標應該放在深化前述論點的各種蘊涵：任何一位讀者，當他／她援用論述處理其接觸文本的經驗時，我們不能說這是論述與「真實」之直接關係的效果。若非如此，那又怎麼分析呢？答案是我們應該從社會關係與結構（特別的論述〔extra-discursive〕）下手，研究它們對於論述空間（亦即「交叉論述」）的結構化，有些什麼效果。這些結構化的關係，並不能製造出非此即彼的特定解讀方式；但它們確實力足以限制（就是說，力足以決定）論述空間的形構，承此而來，這又在特定的文本／讀者接觸之際，對於讀者的解讀方式，產生了決定性的效應。這個取向昭示我們，任何「主體的表現，決定於文本」的說法，殊不可信，說是二者之間自動或「毫無問題的」對應，實在不能取信於人——畢竟，這樣的取向只不過以文本決定論，取代了社會決定論。這個取向提供了一塊理論空間，此際，主體與表意鍊環的關係，不再是一個「被規範好的過程」。

筆者認為，以上就是最近的心理分析之作，必須面對的一些主要難題。這些著作的理論視野，隱設了一個單向而片面的立場，卡住了讀者，認定他或她只能困頓於結構之中，而這樣一來，也就製造出了單一而確定存在的效果。至於文本可能將主體安置於特定的位置，使其接受某些觀點，或是文本的運作，可能讓某些解讀方式，優先於其

他解讀，都是可能存在的事實；但若說是否能夠確定 (guarantee) 必有某種解讀，則文本並不能打包票——這必然是一個有待經驗檢證的問題。

就文化與歷史的特殊性而言，心理分析理論明顯有所不足，但若說我們有必要將電視的主體理論化，則我們正須從文化與歷史下手。唯其如此，我們也才能夠超越論事，不再認定主體只是普遍相同而具有共通的心理分析過程；唯其如此，我們也才能體認，關於意識形態的抗爭，也發生於文本／主體接觸那一剎那，因此不可能在心理分析層次，「總是已經」被先驗地決定了。<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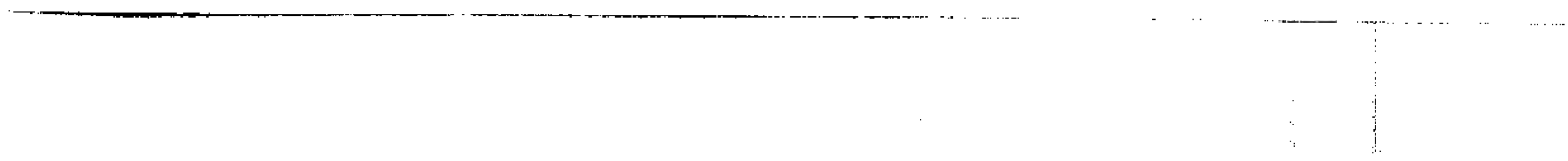
---

②企圖研擬開發一個心理分析的視野，免除普同主義之問題及稍前提及的抽象化問題，參見 Walkerdine (1987)，詳細就此提出的評論，參見 Morley (1989)。

第二篇

階級、意識形態與詮釋





## 第 3 章

# 詮釋電視：“全國觀眾”的閱聽人

傳播過程中，意義如何產生？筆者援用兩種獨特的分析模式（符號學與社會學），分析意義產製過程的兩種壓力類型，它們分別是：（1）文本／訊息／節目的內在結構與機制，這些結構與機制引來某些解讀方式，但卻阻礙了其他方式的解讀（符號學可以闡明這一部分的問題）；（2）讀者／接收者／觀眾的文化背景，這個部分則必須出以社會學式的研究。這兩個部分的交叉互動，將產生富含約制性的結構，決定了文本意義的底線——唯其如此，才能跳過雙重陷阱。一是認為詮釋文本的方式是個別而無限多的，另一個陷阱則是形式主義者的傾向，認為文本以絕對性的姿態，決定了意義。爲了將這些理論性問題弄得更爲清楚一些，本章將引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筆者參與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之成果作爲引證來源，就此提出論證與說明。這項研究的分析對象是“全國觀眾”這個電視節目，開始的時候，它將稍盡詳實地依次分析這個節目的若干特定形式設計，分析它對閱聽人議論的某些特定模式，以及分析文本組織的一些特定形式。到了第二個階段，這項研究展開探討，試圖了解不同社會背景的人，各有什麼詮釋節目素材的方式，目的是建立文化架構的角色，看看這個角色如何決定個別人物對於節目的詮釋。在後面這個階段，筆者進行了

一些閱聽人訪談，以下就是這些訪談資料的呈現，筆者希望它們能夠展示，社會人口學因素（如年齡、性別、種族與階級）與相同節目素材之不同詮釋，兩者之間是存在著一些關係。

這項研究的分析焦點是一個特定媒介（電視）的特定模式或類型（電視雜誌／新聞時事）的特定節目（“全國觀眾”）。我們的企圖容或是要提煉通則，擴大其適用範圍，但我們亦須注意，我們分析的節目、類型與媒介，畢竟有其特殊性。其次，雖然有此特殊性，我們仍必須承認有些結構性因素能夠在若干程度內，解釋相同符號的差異性，因此，分析文本／閱聽人的動態交叉關係時，我們必須善加考量這些結構因素：儘管這些結構因素發揮的效應，可能隨著傳播領域的改變而異動。

筆者關心的是，讀報紙、看電視的每日經驗，我們如何理解這些訊息，以及在我們透過媒介而消費這些訊息之時，我們如何詮釋等問題。而一旦我們提出了閱聽人詮釋訊息的問題，我們等於已經是否定了媒介機構的訊息，對於其閱聽人會自動產生效果的假設。筆者的中心論旨，與此假設對立，我所分析的問題是，對於媒介提供給我們的世界觀，我們是怎麼理解的。這樣一來，我們坐在客廳收看電視的活動，不再只是「接收」或「消費」訊息的被動過程，而是一個主動而積極解碼或詮釋的過程。我們所看到的、聽到的聲光影像，若是要對我們產生意義，則我們必然需要積極地涉入詮釋的過程。首先，我們得學習將螢光幕的無數光點，以特定組合的一些方式，看成是世界的再現——人、房舍、田野、樹。我們必須學習詮釋電視的基本符碼——我們在無意識之下所運用的符碼。一個人穿著特殊、語調奇特，在某種情境中坐在某種椅子上，我們如何理解這些事實，均有賴於這些符碼所建立的規則。諸如此類的符號，也就告訴了我們這號人物的一些質

性，以及他或她的地位。

人們經常以為(廣播從業者當然是這麼想的)，收看電視是由家人在家一起進行的活動。雖說這顯然是個合理的假設，但隨之而來的卻是一個讓人懷疑的說法——也就是說，「收看電視」是個被動的活動，而我們只是坐在電視機前，吸盡了電視機放射出來的所有訊息。但究其實，我們或許可以回想一下，在客廳中與其他人共同「收看電視」時，我們不是有許多與人爭辯的場面嗎？我們認為趣味盎然者，別人可能覺得索然無味。電視上，政府發言人對經濟政策提出的最近說明，可能得到某甲正面的評價，但某乙可能大起反感，想要一把砸爛電視機。

依筆者個人經驗，而很有可能讀者你／妳也有類似經驗，只消看個幾下子的電視新聞，朋友或家人與我們就有些話要說，至少就新聞的某些說法有些意見了。或許，我們可能只是因為看了電視的畫面、接觸了其訊息以後，「引發了」另一些完全不相干的討論。但筆者這裏要強調的是，閱聽人是有潛能，可以積極而活躍地，甚至是自有己見地與媒介訊息展開對應。因為在看電視的時候，我們已經將得自其他生活領域的討論與再現經驗，帶入觀看的過程，我們得自於媒介的訊息，並非孤立地與我們發生關係。這些前後不一的訊息、經驗，彼此交錯互涉，明顯或隱然，得自於其他人、資訊來源或我們信任的對象。我們總是在無意識下，篩選並比較各種訊息。所以說，我們回應媒介訊息的方式，正巧是取決於我們先前在其他生活領域所得到的其他訊息、觀點，在多大程度內，與這些訊息相互契合或矛盾。

費朝詩(Pêcheux, 1982)將這個現象命名作「交叉論述」。這個名詞的意思是，由於我們存活於不同論述、不同訊息體系的領域，我們必然也身嵌於這些不同體系之間。所以，我們經歷了多重的論述，我們

所存活的空間為許多不同的論述穿梭而過，其中，相互支持呼應者固然在所多有，另有一些卻彼此矛盾，有些彼此正面相關，另有些卻相互排斥。但基本上我們應該謹記在心的是，在解碼與詮釋媒介訊息時，無論我們是否明顯意識到，其他訊息與其他論述總會加入這個解碼與詮釋的過程。舉個例子，如果我們將九點鐘扭開電視看新聞的動作，當成孤立事件看待，那麼我們也就不能了解媒介傳播的過程。因為這只不過是整個複雜傳播領域的一個瞬間，而我們所須力求了解的，卻是那個瞬間與所有其他的傳播線索交織而成的關係之本質。我們必須力求了解，單一訊息與其他成套的再現形象、想像、刻板印象等等閱聽人所熟悉的內容，到底有些什麼關聯。媒介的傳播內容，必然會與個人的與機構性的傳播領域之內涵，發生聯繫，因為閱聽人不止是閱聽人，他／她們還是選民、家庭主婦、勞動者、逛街購物者、人父人母、嗜好溜冰者或軍人。設定人之位置的所有這些機構，所有的這些角色，都會製造自有的訊息而與媒介訊息交錯相交。收看電視新聞的人，因此是錯落於複雜的傳播領域，他／她涉入了解碼媒介材料的過程，其間，一整套的訊息或論述，契合於或受到另一組訊息的折射修正。

## 大眾傳播的循環圈

完整地分析大眾傳播過程，似乎至少涉及三個不同的成分：第一，研究媒介產品的產製；第二，研究產品本身——研究電視節目被建構成為成套的符號單位，內含了訊息；第三，閱聽人所積極涉入的解碼或詮釋這些符號的過程。以下材料，呈現的是來自不同社會與文化背



景的人，如何各以自己的方式，解讀相同的電視節目。假使我們將這個過程所涉及的諸多元素（生產、節目與閱聽人），孤立而分開看待，則必然無法充分了解大眾傳播現象。事實上，我們或許可以說，長期以來，支配媒介研究的關懷，是一種可以稱作是「吊擺效果」（pendulum effect）的心態，研究者的注意力，要不是全部放在訊息，就是全部放在閱聽人，但卻很少結合二者而作並聯觀察。有些時候，研究者只是貫注在訊息的分析，然後逕自假設這些訊息自動對於那些看或聽它們的人，產生了巨大而直接的效果——可以從訊息之本質設定或直接推演得知。如果我們有了這些假設，那麼我們等於是免除了責任，不必再深入探討閱聽人解碼的過程。我們或許可以將它稱作是媒介巨大效果的「皮下注射」模式，按照這個模式，所有的媒介訊息都已被假設能夠對於其閱聽人，產生直接的效果。從這樣的視野往外望，則研究者所必須從事的，似乎只是將分析訊息的方法，再作精煉，能夠如此，則媒介訊息的真正本質，已在其中。考尼漢寫了一篇論文，回顧了大眾傳播研究史的發展，他的總結是：

從前……憂心忡忡的評論家，兀自認為，當時新近出現的大眾傳播媒介，具有無所不能的力量。若是依照「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則媒介完全是由狡猾的一羣統治階級掌控操縱的，這些人善用技倆，向大眾傳送了腐敗的文化與新法西斯主義者的價值——暴力、喪失人性、性、消費者洗腦、政治上只知被動……等等。這些用來說服的工具在一邊，另一邊則是同質性很高而容易受人影響的大眾，這兩者的連結是一個簡單的刺激——反應模式。然而，隨著經驗性研究的進展，研究者援用了調查及實驗方式，

試圖測量媒介改變「態度」、「意見」與「行為」的能力。接著，人們更進一步發現，閱聽人與媒介的關係，並非如此簡單，也不是那麼直接，實際它是複雜而又另有中介的。「效果」如何，只能由中介於媒體與閱聽人之間的其他因素，推測而知。其次，研究重心，也從「媒介對人作了什麼」，轉至「人拿媒介來作什麼」，因為此時研究者發現閱聽人對於媒介訊息的「注意與接收」，是有選擇性的，閱聽人對於不利他們的一些特定觀點，很容易就會忽略或微妙地重作詮釋。現在，研究者恍然大悟，媒介根本沒有什麼自主而足能說服人，或擁有什麼天大的其他反社會力量，沒有的，媒介的角色其實相當有限，而且在社會中隱設了一個良性角色；媒介的角色不是什麼改變，而是「強化」先前的預存立場，不是什麼涵化「躲避逃跑的傾向」或養成被動的習性，而是力足以滿足許許多多的「使用與滿足」；不是夷平文化的工具，而是文化民主化的催生者。(Counihan, 1973: 43)

從這個視野看去，大眾傳播的「諸般效果」，極具變幻之能事，必須取決於個人對於訊息的回應與詮釋。尤有進者，依此看法，除了強化原先就已經存在的態度與意見以外，它認為媒介對於閱聽人，絕少產生直接的效果。由此視野外望，很明顯，傳播研究主要只是關心，媒介在日常生活的儀式行為裏，扮演了什麼樣的局部角色。

哪裏得到證據呢？芬蘭的諾登斯敦(K. Nordenstreng)所做的研究，提供了最為重要的一些證據。他的研究顯示，雖說百分之八十的芬蘭受訪者，每天至少接觸一次廣電新聞，但次日訪問他們時，卻鮮少有人能夠記得昨日廣電新聞的任何特殊內容：受訪者唯一留存腦海的印象是，「沒有什麼重要的事啊」。根據這樣的發現，諾登斯敦進而論稱，

「閱聽人對於新聞的內容，無動於衷」（Nordenstreng, 1972: 390）。他的結論是，對於觀眾來說，看電視「只是一個儀式」而已，他們的態度或意見，根本不因此受到影響（參見本書下文討論諾登斯敦的部分）。

若有人否認「看新聞」有其儀式性的一些面向，則實在愚不可及，因為我們大多數人，在每天的固定一些時間，確實如此，但再說回來，若就此推說看電視新聞，純粹是儀式行為，再無其他內涵，逾此則無多大意義可言，那麼，這也同樣是錯誤的說法。關鍵在於，所謂「效果」，言人人殊，到底我們怎麼定義效果，才是重點。

或許應該這麼說，純粹從閱聽人或資訊層次來討論媒介的立即效果，實在是弄擰了問題。哈特曼與哈士本（P. Hartmann and C. Husband, 1972: 439）這麼說：

完全以態度是否改變來評估是否產生了效果，可能是弄錯了。企圖展示大眾傳播的效果，卻沒有得到任何結果，造成這個情況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研究問題的本質使然……也許媒介對於社會科學家所習稱的態度，是沒有什麼影響，但媒介似乎是另有其他重要的效果。尤其重要的是，媒介似乎在非常重要的程度內，為人們決定了哪些才是重要的問題，而討論這些問題時，又應該使用哪些語彙與框架。

閱聽人記不得特定的內容——比如，部會首長的名姓——難道就是廣電新聞沒有「任何效果」的明證？話不能這麼說。其實，重要的是，雖說閱聽人記不得任何特定的資訊，但他們對於「事情重要次序的定義」——沉澱於這些特定內容之結構的諸種意識形態，卻是保有記憶。果不其然，哈特曼與哈士本的研究，其焦點正是媒介對於種族

問題的界定架構，產生了什麼作用，他們研究的並不是特定態度或資訊層次的改變與否。這些研究人員發現，對於媒介閱聽人看待他們居住地區的黑人之態度，媒介雖然似乎沒有什麼影響，但這些人是怎麼想「種族」問題的，媒介是產生相當大的衝擊。因此，媒介的影響力，是在「建構詮釋架構時發生作用的，亦即媒介影響了人們透過哪些概念、語彙與重點來衡量與種族有關的事務，而不是直接對於態度產生影響」(ibid., 440)。這也就是從設定社會問題之議程的角度，評估媒介效果之有無，從提供這些問題的思索術語言詞，界定媒介效果之有無。

### ①

筆者已在第一章指出，就這些問題進行爬梳，並且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取向是「使用與滿足」的研究，我們或許可以說，它所隱設的媒介觀比較正派溫和，它認為媒介並沒有強加自身的訊息於閱聽人身上，反之，媒介實乃提供了多種刺激，而閱聽人則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詮釋，並得到不同形式的滿足。但是，使用與滿足視野所關注的是，個人層面詮釋訊息的不同方式。所以說，你可能那麼看，而我可能這麼看某一則訊息（比如，“不是九點新聞”〔Not the 9 O'Clock News〕），看法之不同則是因為我們的人格互有差異（比如，取決於外向的喜劇明星是否能夠吸引我們），或是因為訊息是否與我們不同的興趣與嗜好有關（比如，取決於我們是否對政治或園藝感到興趣）。然而，我們應該這麼說，以不同方式詮釋訊息，並非是如此個人化的一個問題。筆者想要指出，這不只是個人不同心理效應的問題而已，它是不同層次文化所涉及之個人的差異問題，這些人又各有不同的社會經濟背景。這也就是說，人們如何詮

---

①譯註：作者這裏提及者，就是美國傳播學界主流所說的「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說。

釋特定訊息，當然總是會因人而異，但又爲了什麼而造成這些個人差異呢？很可能是受到文化差異的框架之影響。這樣一來，論點也就轉向強調不同個人所能夠參照的文化架構，並不相同，而這個不同有其重要意義——所以呢，如果筆者以達蘭(Durham, 譯按：英格蘭北部大城)煤礦工人的身分，詮釋政府的經濟政策，而這個詮釋與你這位東安格利亞(East Anglia, 譯按：英格蘭東部，近海)的銀行經理不同，則這樣的差異並不能說是我們的心理狀態不同所致。對於這則訊息的回應，你我之所以不同，必然與我們的不同社會背景有關，因為這些背景提供了不同種類的文化工具、不同的概念架構，畢竟我們都是依賴它們才能闡釋媒介的內容。關於這個論點，梅鐸說得很好：

假使我們想要給個滿意的答案，了解人們使用大眾媒介與他們本身之社會情境與意義體系的關係，那麼，我們的分析起始點應該是社會情境而不是個人；我們必須以結構性矛盾這個觀念，取代個人「需求」這個想法；其次，我們必須引入次文化的概念……

社會結構當中的特定團體，在其企圖以集體的力量，與他們共有之社會情境中出現的矛盾，取得妥適關係時，他們也就發展出了次文化，亦即這些團體的意義體系與表達模式。尤有進者，次文化代表了意義與表達方式的積累，透過這些次文化，結構上位居受支配位置的團體，也就企圖與主流控制的意義體系取得協商或對立的關係。所以說，次文化提供的是一整個庫存的形象資源，特定的一些人或團體，因而能夠從中汲取符號，企圖藉此詮釋他們自己的特殊情境，並建構一個足資辨認的身分。(Murdock, 1973: 213-14)



## 訊息分析

這項研究以「英國廣播協會」(BBC)的電視節目“全國觀眾”作為對象，研究其節目結構。首先引來的問題自然是「為什麼研究“全國觀眾”這樣的節目？」何以耗費那麼多心力，就只分析、發現本身都不甚自視的節目？套句一位前製作人的話，這個節目「做些無關緊要的事，至少對我們是無關緊要」。這是電視從業人員泛泛而作、要言不說的節目。他們認為自己是茶餘飯後的節目，設定的觀眾，是趕忙要將小孩弄上床睡覺的人，是下班後的人，是啜飲茶水的人，與此對應，他們覺得主要的論點是要提供「娛樂」與「人情趣味」。這個節目固然有時也會企圖處理一些「嚴肅的問題」，亦會談論國家大事、作為國家子民的我們之主體問題等，但重要的是，凡此種種議題，都在該節目基本視線內，都是例外之作。

筆者想要論稱，儘管節目製作人自視不是很高，甚至流於自棄，但類如“全國觀眾”這樣的節目，卻在傳播過程扮演了一個緊要的意識形態角色，所以呢，就其結果而言，分析它們尤其具有重大意義。說得真確一些，就某些考量而言，理解類如“全國觀眾”這種節目，甚至比理解明顯看來，更是引人「爭議」或「嚴肅」的節目，如“全景”(Panorama)，還要來得重要許多。這是因為“全國觀眾”這樣的節目，包括了許許多多當代的「人情事故」之個人心得實錄，這些東西富含了非常重要、整套隱設的訊息，傳遞了基本的態度與社會觀。這些價值觀與態度，總加起來，似乎也就建構了人們的思考線索，我們由此而對於當代英國生活，可能會是些什麼，也就產生了一些「基本」假設，而對於我們應有些什麼「合情合理的」態度，才能面對種種的

「社會問題」，同樣也另有假設。這並不是說節目中有什麼明白的陳述訓誨；不是的，實際情況是，從節目的特定內容中，我們得到了一整套的假設（譯按：並且，更）重要的一點是，這整套的假設打造了地基，而我們可以說，其他更為嚴肅的廣電節目，如“全景”與新聞報導，是在這個基礎上受到觀眾的評價。很顯然是平平凡凡、不談公共等嚴肅事務的節目，它們卻建構了框架，而更為明白、更為引人爭議的訊息，卻必須被安置在這樣的框架中，才能得到人們的理解。

這只是在論稱，以言電視，沒有什麼「純潔無知的文本」這回事——沒有任何節目不值得我們詳加嚴正注意，沒有任何節目能夠聲稱自己只是提供「娛樂」而無愧，因為任何節目都透露了關於社會的諸種訊息。即便節目的外顯內容似乎再零碎細索不過了——比如，“湯姆與傑利”（Tom and Jerry）卡通（cartoons）——但情況仍然很可能是這個節目的文本結構，已經含納了許多關於社會態度與價值的重要訊息。舉個例子，社會學家馬特拉（Armand Mattelard）與多弗曼（Aerial Dorfmann）研究「唐老鴨」（Donald Duck）這個漫畫主角時，他們指出，住在「鴨堡」（Duckburgh）的人，他們古怪的動作似乎顯得沒有什麼惡意，但它們卻飽含了許多意識形態上的假設，它們對於個性、自由、「如何致富」，以及兩性關係與家庭的「本質」等等，都有一套看法（Mattelart and Dorfmann, 1979）。

每個節目都提供了多種不同的明顯資訊——事實、故事與圖象等。尤有進者，廣電機構又提供了我們理解這等「資訊」的某些「框架——《收音機周刊》（*Radio Times*）、《電視周刊》（*TV Times*）<sup>②</sup>」，透過一

②譯註：*Radio Times*是英國不播廣告的公共廣電協會BBC發行的刊物，名為收音機，其實是電視周刊；*TV Times*則是播放廣告的獨立電視公司ITV發行的刊物。在一九九一

位知名的人物，告訴我們某個節目的影響——然後這些「框架」再將特定的節目帶入整個廣電節目的流程，這樣一來，它也就提供了一些線索，引導我們對於這個節目有所期望——比如說，讓我們對於這個節目，主要是抱持著娛樂或獲取資訊的預期心理。

然而，節目所傳播的訊息，不止是其明顯（外露的）內容——它們另外還透過隱喻、假設或內涵意義而傳播潛藏的訊息。假使要了解這個層次的潛在的或隱含的傳播內容，我們必須超越常識層面的觀察。我們在這裏遭遇到了一整套方法論的問題——我們應該建構什麼樣的分析方法，才能讓我們了解這些更為複雜的傳播訊息？

一旦我們提出「這個節目說的是什麼？」這樣的問題，我們必須同時進而再問，「這個節目之內有些什麼東西被視為理所當然（「不言而喻的」是些什麼）？」經此一問，我們也就進入了問題的核心，我們得知了節目的諸般假設是些什麼、節目的哪些東西隱而「不見」，而在節目的架構之內，哪些問題「不能」被提起？是以，我們也就開始追問，除了節目所呈現的內容之外，明顯呈現與隱而不顯的訊息，兩者之間的關係若何？這就是要進而探詢，節目所呈現的論述，是不是有某些特定的盲點、知情而不言？果真有此情事，而如果我們也想要知道節目中出現的特定項目之意義，則我們必須了解這個呈現／隱藏的類型。於此，我們又扯出了關於分析的方法論之整套問題。分析媒介訊息的方法論取向，不一而足並且相互競爭。然而，儘管內容分析或結構分析兩個取向，互有差異，但兩者對於訊息／閱聽人的關係，仍然具有共通的誤解之處。簡言之，兩者似乎都援用了媒介／閱聽人的「皮下

---

年三月以前，英國的電視周刊是特許事業，BBC 與 ITV 以外，他人不能經營。

注射」模式。這兩個取向似乎都認為，只要知道訊息的特徵，你／妳也就能夠從中推知閱聽人的效果，而這樣的知識則可以借助日益複雜的文本分析取得。但由此我們也就看出了問題的所在，我們似乎也陷入了某種近似的情境，永無止境地想要追探神祕的獨角獸——訊息的「真實的」或「最終的」意義——但伊於胡底呢？

不過，就此目的而言，符號學分析的某些形式，或許可以提供若干更有用的助益，因為它們專研的目標，並不在於找出訊息「真實的」或「最終的」意義，而是在於蒐尋能夠產生意義的傳播，其基本條件為何？這個取向移轉了我們的注意，使我們得以檢驗隱含或外顯於訊息的符碼——唯其因為有這些符碼，所以閱聽人才能從訊息發現意義。確實如此，稍後的符號學分析，逐漸不再認為訊息只是傳送至一個位置已定的主體，而是慢慢地努力探究，個別的主體性本身被建構的過程。這也就是接受（佛羅史諾夫〔Voloshinov〕，1973）的一個根本原則，亦即任何訊息都是多義性的（polysemic），一則訊息所生產的意義或詮釋，總是在一個以上，因此也就絕對無法化減至一個「最終的」或「真實的」意義。這個分析形式同樣可以與「使用與滿足」取向的若干洞見，相比並列，它們都指出，不同的人對於相同的一則訊息，將有不同的使用與詮釋。

但整體情勢遠要來得複雜一些，因為我們必須知道，由於廣電從業人員講求「清晰」與「有效的」傳播，因此他／她們也就不可能任由訊息自行發展，廣電人員勢必另謀他法，而不是讓訊息同等地開放，聽任「任何的」詮釋。就在這點，我們與「使用與滿足」的研究，分道揚鑣，因為後者只是把訊息當作空盒子看待、當作只是一則刺激，而解碼者可以按照他／她的喜好，任意地使用。由於廣電人員受到限

制，必須力求「有效地」傳播，因此他們必然遵循某些規律，試圖在訊息結構之內，提供「定向」或「封閉式地」解讀，而其目的則是在眾多可能的解讀方法中，建構「一個」「優勢或主控的解讀方式」。

單就節目的結構而言，已經存在著多種形式，足以顯示封閉式解讀是如何鋪陳的：比如，標題、圖(照)片的解說文字，或針對電影報告而作的評論，告訴我們如何詮釋我們眼見之影像的意義。其次，節目中的發言者之地位，亦有等差之別，而各種特定的發言情形亦各有不同呈現的方式加以框架。再者，節目內眾多呈現者之目標，亦是問題，他們可能企圖運用什麼方式，取得其閱聽人之某種認同？如此一來，他們期望能夠贏得閱聽人對於優勢解讀方式的共謀或同意，至於何謂優勢解讀，則當然脫離不了節目之論述的框架與構連。然而，我們也不能認為這些試圖培養封閉式解讀的策略，必然能夠奏效。違逆始作俑者的原意，總有可能，節目之論述固然有其意定的「優勢」解讀企圖，但另有詮釋而不與之同，可能性仍然存在。

單只是分析內容是些什麼，還不足以解析節目。我們必須更進一步，追究躲藏在這個內容之後，是些什麼假設。對於我們閱聽人，這些節目必有其假設，如果我們想要了解節目所傳達的隱藏「訊息」，或是它明擺著說些什麼，則我們必須將這些假設弄得一清二楚。所以，節目將我們當作閱聽人，然後向我們發言的模態是些什麼，而這些「發言模態、議論(問題的)方式」，又如何建構我們與節目內容的關係，如何責成我們與其相較之後，採取不同的立場。這也就是強調電視論述的角色，並不止是強化已然建制化的主體位置，而是積極建構著這些觀看電視的位置。因此，“全景”這個節目，或許可以說直接把我們當成國家政治社羣的個別公民，然後向我們發言。“先生與太太”(Mr and



Mrs) 與“世代遊戲”(The Generation Game) 則似乎是認定我們都是家庭的成員，因此也就主要從家庭成員的角度，向我們發言。其他節目似乎主要將我們當作個別人物，向我們的私人興趣與嗜好作訴求，如“園藝世界”(Gardner's World)；另有其他節目則把我們當作消費者看待，針對我們的抱怨而發言，再三地查驗市場的困難與問題。

“先生與太太”與“世代遊戲”演出之前，並沒有社會學式的開場白向觀眾說以下的節目，已假設觀眾都羣居於家庭之中。它就逕自以為，我們住於家庭之外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對於這些製作節目時，明顯存在的假設，我們必須明白加以揭示——因為它們是節目站立的基點，這些節目就在這種它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架構內，呈現特定事理。發言模態、議論問題的模式(mode of address) 這個概念，能夠襄助我們以更為精確的方式，衡量(比如說)文學批評架構之下，所謂節目的特定「風格」，指的到底是些什麼。筆者援用「發言模態」這個概念，目的在指涉特定的傳播形式與節目的實際狀況，具有何種獨特風味。尤其緊要的是，此處我們關注的其實是，一個節目如何企圖透過其再現風格，建立它與閱聽人的特殊關係形式。但與此同時，我們卻不應該認為任何節目的企圖，必然能夠成功地「定位」(positioning) 其觀眾。比如，以時事新聞節目作為例子，節目中藉由「街頭」素材所呈現的形象，以及較為隱然於後的假設，認定「普通人的／常識性的」某種觀點，到底多大程度內，會得到閱聽人的認同？這些是我們必須提出的問題。出現在節目中呈現言詞的不同人物，他們(隱然)聲稱的說法，得到民眾多少的認同？接受他們的呈現風格，認為這就「貼切」傳達了其認同觀點的觀眾，是哪部分人？進一步言，難道接受或認同於節目呈現者的風格，也就等於整個接受了呈現者據以包裝其報

導的理解架構嗎？對於閱聽人來說，呈現者的「總結」評論所具有的內涵符碼、所「圖繪」出來的特定意涵，具有何等分量？不同部分的閱聽人，他們與呈現者／訪問人所設定的「我們」，具有多大部分的重疊？在多大程度內，不同部門的閱聽人，認同於訪問人並且覺得他們自己正在授予他／她閱聽人的權威，使訪問人力足以「代表閱聽人」而探查公眾生活人物？

到頭來，這些都是經驗性問題，我們終究必須評估若干閱聽人研究的經驗性證據，唯其如此，才能進一步窺知真相。在進行這項工作之前，我們還必須更清楚地釐清理論架構，循此才能將閱聽人的概念，再作精煉。

### 訊息：製碼與解碼

這個取向的前提，建立在以下三個基礎：

- (a)製碼同一事件的方式，不止一個；
- (b)訊息的潛在「解讀」(reading)方式，總是不止一個。訊息期望並偏好某些解讀方式，但這些解讀方式絕對不可能完全定於一尊；它們仍然具有多義性；
- (c)不管這則訊息如何顯得透體通明而「自然」，解讀訊息同樣是一個問題重重的實踐過程。

這樣看來，這個取向具有雙重指涉。第一，它沒有認為訊息是一個單方向的符號運動，並不認為符號失去了其意識形態上的「流動性」；第二，它又與使用與滿足的研究取向有所差別，它並不認為訊息是個乖離特異的符號，並不認為符號可以根據解碼者的心理狀況，「任意」

解讀。此處，佛羅史諾夫所提出的分辨，爬梳「符號」(sign)與訊號(signal)的不同，相當管用；在他看來，結構主義者的取向，似乎已將前者當做後者來使用——換句話說，結構主義者將符號當做是具有固定意義的東西。(譯按：但結構主義者的這個認知卻是錯誤的，因為)電視訊息是一個複雜的符號，它雖然內刻了一個優勢解讀方式，但只要解碼者以不同於製碼者的方式解讀，則同一則訊息仍然具有傳播不同意義的潛能。所以，訊息雖然被結構化，但仍然具有多義性。這個論點的最重要內涵之一，在於強調訊息所可能具備的「所有」意義，並不「同等」存在，整個情況是，意義的「完全封閉」雖然不可能，但優勢的解讀方式卻已被結構化(structured in dominance)。尤有進者，「優勢解讀」本身就是訊息的一部分，訊息的語意及傳播結構之內，可以確認此優勢解讀的存在。

所以，一旦分析重點轉移至製碼訊息本身這個「瞬間」，則我們應該分析的對象有兩種，第一，就訊息之傳播形式與結構而言，它透過了哪些機制，致使產生了力足以壓過其他解讀方式的優勢解讀；其次，製碼者使用了哪些手段，企圖「贏取閱聽人的首肯」，使閱聽人一頭栽進他對訊息的優勢解讀。

訊息在對閱聽人產生「效果」之前，必須先行解碼。這樣看來，「效果」也只是個簡寫，用來說明閱聽人對於向他傳送而來的訊息，自有其不同的解讀方式，並且閱聽人在其當下處境與經驗下，如何根據這些意義而行動；但不消說的是，以「效果」這個詞作為這些現象的描述，並不充分。我們的假設是，傳播鏈製碼與解碼這兩端，並沒有必然的「吻合」或透體通明的關係(參見 Hall, 1974)。正就是因為並無此透體通明的情事，而傳播後果又將是如何亦無定論，因此，我們

需要再做探討。

從訊息傳送至訊息接收，符碼仍有可能從這個大眾傳播循環脫鏈，我們已就此申論。所以，關於傳播「效果」的問題，我們現在可以重作計議，所謂效果，其實可以說是原初訊息製碼之後，在此訊息所內含的優勢（或主控）解讀方式之限制下，解碼所能發揮的範圍。然而，對應於這個問題的另一個面向是，不同閱聽人部門亦各自擁有符碼與論述能力，因此這些詮釋（或說解碼）在多大程度內，反映了或受到了這些能力的影響？其次，不同閱聽人部門之間所分佈的多種文化符碼，透過哪些方式而由社會力所決定：這整個問題也就是閱聽人具備了多大範圍的不同解碼策略與素養。

以此做為一個研究問題，等於已經擺明了說，主體與文本接觸之後所產生的意義，無法直接從「文本之特徵」讀出。文本不能孤立於其生產與消費的歷史條件而論處：「我們必須確認的是，特定之文本，其使用為何？在特定環結內其功能為何？而文本在特定的制度性空間、文本與特定閱聽人之關係，又是些什麼？」(Neale, 1977: 39-40)。誠如西爾 (J. Hill) 所說，分析媒介的意識形態不能只是分析生產與文本；究其實，合理的分析必須包括一個讀者理論與消費的分析：

電影的意義，並不能夠純粹只是從文本來發現，反之，電影的意義必須從文本及其使用者的互動關係建構……符號學早先的說法，自認為透過一個內在的分析，已足可以解釋文本的運作，這顯然是毫無根據的，因為它沒有能夠體認任何文本體系，只有在與並不純粹是文本的符碼發生關係時，才具意義，並且，符號學亦沒有體認到這些符碼之所以得到認可，以及這些符碼的分佈與

促動，實乃隨著社會與歷史條件而變異。(Hill, 1979: 122)

所以，文本的意義究竟為何，必須考量它是在什麼樣特定的環境裏，接觸了哪些論述——我們亦須慮及，這個接觸將會如何重新結構文本的意義，以及文本所觸及的論述。人們將根據其論述(知識、偏見、抗拒等)來理解文本，因此文本意義的建構也由此而產生不同：閱聽人／主體，以及文本的接觸，將會產生什麼結果，緊要的因素取決於閱聽人所能支用的論述範圍。這樣一來，社會位置可能也就設定了潛在解讀方式的範圍，其具體途徑則是透過近用不同符碼的結構(比如，來自黑人家庭的勞動階級成員，不太可能在歌劇符碼之下受到「教育」；同理，來自上層階級的白人也不太可能感受到雷鬼[raggae, 譯按：源自西印度羣島的流行音樂與舞蹈]音樂符碼的「教育」)——某些社會位置容許其成員近用較廣泛的可用符碼庫，另一些則僅能提供較窄的選擇。

到底一個節目是否成功地傳輸了優勢或主流意義，必須取決於它所觸及的閱聽人，究竟持有的符碼與意識形態，是不是與該節目所使用之符碼與意識形態相互對應，若是對應，則成功；其次，如果節目所觸及的閱聽人，其持有的符碼與意識形態，與該節目之符碼與意識形態多少產生了衝突，則失敗。

如果「優勢解讀」這個觀念還有任何價值，則它並不是一個抽象化的「定著」手段，它並未認定某個詮釋一定優於其他詮釋，它其實只是幫助我們解釋，在某些條件、特定脈絡之下，何以(至少某部分)閱聽人容易以某特定方式解讀某個文本。

## 重新定位閱聽人

閱聽人並不是毫未分化的大量個人之集結，我們應該視閱聽人爲一個複雜的類型，包括了許多重疊的次團體與次文化，而許多個別人物則側身其中。我們不能採取命定論者的立場，不能認爲個人的社會位置，會自動地決定其概念／文化架構，然而，我們卻也應該謹記在心，清楚了解社會脈絡提供資源並設定限制範圍的方式，畢竟，個人憑藉這些資源並在此範圍內活動。

特定次文化的成員共享相同的文化定向，因此也就容易以特定方式解碼訊息。客觀的社會結構位置決定了人們共享的文化形構與實踐過程，而後者則框架了這些人對於訊息的解讀方式。這並不是說個人的客觀社會位置，以機械方式決定了他的意識；人們透過其身屬的次文化及意義體系，了解自身的處境並作回應。

我們必須從根與「使用與滿足」取向劃清界限，這個取向完全從個人心理層次詮釋人們的差異，我們必須抨擊。我們所需要的取向，必須能夠連結兩端，將不同的詮釋安置於社會結構之中——它必須能夠顯示不同團體與階級，在各有不同文化符碼之分享下，如何超出個人／獨特的層次，並以具有系統的方式，與各自的社會經濟位置相應合。簡單地說，我們需要知道不同閱聽人的次文化結構與形構，以及在這些不同的團體與階級之中，文化符碼與素養之分佈，如何對於不同部門之閱聽人的訊息解碼，產生結構定型化的作用。

假使我們要取得社會學式的視野，一探大眾傳播的過程，則必須將閱聽人回應媒介訊息的無窮盡個別變異情況，預作畫分與類型化。就此而言，帕金的理論相當管用，他說，我們大可預期不同社會階級



的眾多成員，必然各自具有不同的「意義體系」或意識形態架構(Parkin, 1974)。由此延伸，我們可以說這個模式，亦可用來解釋不同階級之成員，如何解碼其媒介訊息。

帕金認為，就「西方社會」而言，我們可以區分三個相當有用的主要意義體系：根據不同社會來源而做的區分；根據「階級不平等之不同道德詮釋」而做的區分。依此，帕金說這三個體系是：

1. 主流、主控的價值體系，其社會來源是主要的制度性秩序；而這個道德架構則透過等差設計，強化了現存不平等狀態；
2. 臣服的價值體系，其社會來源或產生這種體系的環境是地方勞工階級社區；而其道德架構則鼓勵人們以調適的方式，回應不平等與地位低下的事實；
3. 激烈而基進的價值體系，其社會來源則是勞工階級的大眾政黨；而其道德架構則倡議以對立的姿態詮釋階級不平等的狀態。

景隨帕金的立場而修正之，我們可以說解碼者面對已然編製成碼的訊息，將有三種立場。他或她可能完全採取訊息本身所偏好的詮釋架構；在此情形下，解碼的過程也就側身主流符碼之內，或與其聯結。第二，解碼者可能大致上採用已編製好的意義，但又會將訊息與某些具體的或當下的情境結合，而由於這些情境反映了他或她的立場與興趣，因此讀者可能修正或局部反映了優勢意義。景隨帕金，我們可以說這是「協商式」解碼。第三，解碼者很可能了解訊息是在什麼脈絡下被製碼的，但其人卻置之於不顧，並自行找來另一個參考架構，強力將此訊息另作詮釋，致而完全與原製碼所意定傳達的訊息「背道而馳」(oppositional)。諸如此類的解讀沒有什麼「錯誤之處」。反之，更正

確的說法，應該是將它們當做是對於優勢解讀的持續批評。

經過仔細構建的帕金模式，是他用以了解不同階級成員，在各擁典型位置的情況下，如何與社會之主流意識形態產生關係。就我們的關懷來說，更重要的是，不同的閱聽人流派，可能具有多大範圍的位置足以讓他們與特定訊息產生關聯。依前所述之帕金的基模，邏輯上，我們可以得到三種可能性：解碼者或將分享、部分分享或乾脆拒斥特定訊息的意向。狀極明顯，這只是一個非常粗略的基模，而這些堪稱寬泛的類目——主流的、協商的與對抗的符碼，其內部另需劃分才能解釋在此基模內所出現的變異情況；比如，主流符碼大可另有不同的形式或變異。再有多少的缺失，帕金的基模是讓我們得有架構，將閱聽人視為社會結構化之產物，以此而言，這已是相當大的進步，擺脫了先前將閱聽人當作是未經結構的，而只是無數個人之總合的模式。

此處尚得聲明，前述架構另有意猶未盡之處。筆者堅持主張個人解碼訊息的情況，必須放在其社會／文化脈絡中，才能理解，但這並不代表筆者隱設個人的思想與行動，僅只是由其社會位置決定，或是由其社會位置所直接「明白傳達」。若是這麼主張，則不啻是粗暴決定論(determinism)的翻版，這會長足地抹煞個人這樣的類目——一個人是社會世界的行動者，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社會階級這樣的類目——而這麼一來，彷彿等於是說，所有關於個人的種種資料、事實(以及個人解碼某個訊息的特定方式)，均可化約為社會階級的問題，只消知道他或她屬於哪個階級即可。但我們實在不應該自縛手腳，不應該將這個問題視為非彼即此：換句話說，我們不應該認為，如果解碼不是個人漫無限制的活動，就是可以從其社會位置直接而命定的推論，特定社會階級的所有成員，必然如此解碼。反之，我們必須戮力建構這兩

個面向的關係——一個別的、自有變異的經驗與反應，它存在於特定的社會脈絡，並在那脈絡所許可的文化資源之內活動。這樣的認知，也就是將社會上的個人——一個別的解碼者，放在特定的結構化社會脈絡中評估。

這就引到了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論點。若說要整編社會學式(如帕金)的著作，使之變成傳播理論的一部分，則必將遭遇到一個緊要問題。或許可以將此問題稱作是「社會學主義化」(sociologism)的傾向——筆者使用這個詞的意思是，它總是企圖立即將社會類目(比如，階級)轉變成意義(比如，意識形態上的立場)，但卻沒有適當地處理在此「轉化」過程所涉及的特殊因素。換句話說，如果僅只是將社會變項(如年齡、性別、種族與階級)當作是決定解碼的因素，但卻沒有特別地解釋這些因素在傳播過程，到底如何介入，則這種做法並不足夠。到底經由哪些的特定機制使得這些社會因素，被接合至某些論述，顯然必須加以注意。我們不能自行認定，不能自以為社會因素，總是就這麼地「介入」了傳播過程。只有透過論述的接合(經由特定階級取用及經歷的意義體系或符碼)，這些因素才有可能對傳播產生效果。

所以，舉個例子來說，為什麼不同階級的成員，對於相同訊息有不同的見解呢？這種情形怎麼「解釋」呢？難道我們就只是直接從階級背景或立場，做出推論？個人的階級立場「介入」解碼過程的方式，與獨來獨往的山巡員並不相同，並不是單刀衝入敵陣然後將敵手擊退。我們確實應該認清，唯有當它是接合於符號及論述這個層次時，階級立場才與解碼過程有所關聯。

## 探索閱聽人的反應——《全國觀眾》研究計畫

爲了要彰顯前舉眾多理論問題，凸顯它們的重點，以下本章將引用取自於《全國觀眾》這項研究的若干證據。這項計畫的第一階段是分析《全國觀眾》，進行的程序包括了連續數個月，大家一起看這個節目並做討論，目的是要找出它所重複出現的主題與呈現的形式，與此搭配進行的研究，則是詳細地分析了該節目某特定集次的特定文本結構<sup>③</sup>。透過對於節目之特定文本結構的分析，以及不同團體對於相同節目材料的不同詮釋之經驗性調查，我們期望清楚釐清觀眾與節目互動的本質，我們期望探尋，在此過程，觀眾如何從文本這種組織有秩的形式所透露之材料（文字、影像），製造得出多種意義。

尤具特殊用意的是，這項研究企圖透過霸權這個概念所張舉的理論問題叢結，分析媒介材料的「解碼」實踐過程。簡單地說，由於霸權(hegemony)這個概念，我們也就能夠理解，在任何社會內，意義建構的過程都是在整套權力關係的脈絡裏進行的，此時不同團體競相爭取「詮釋」事件與價值的「權力」。但（譯按：其他研究）通常只是以抽象過程視之，並沒有真正將它置放在社會情境當中，並沒真正將它當作是整套特定的傳播交換過程而分析。我們在《全國觀眾》這項研究所做的關懷則有不同，我們先問霸權何以能夠持續存在的理論性問題，然後再以經驗性資料證驗之：一個特定節目究竟如何演練，致使它能

---

<sup>③</sup>這個節目的分析，由布蘭敦與筆者完成並寫作，後已出版（*Everyday Television*, 1978, London: BFI）。其後的閱聽人研究，由筆者完成，研究資助者是「英國電影協會」（BFI），後以《“全國觀眾”的觀眾》爲名出版（1980, London: BFI）。

「偏好」某套意義或事件之定義。

其次，不同團體對於該節目，究竟是採取什麼形式的協商與反抗，我們亦須探查——換句話說，節目所接合的種種「霸權」定義，在多大程度內（限制內），已為節目觀眾吸納並接受。所以說，我們關心的是，在哪些條件下，反霸權或對立的意義，會在該節目所引發的傳播交換過程中出現。這個計畫的目的，因此其實是要以經驗性方式，找出潛在的霸權意義是經過哪些特定的傳播形式而彰顯。我們的具體做法是，找來社會背景差異極大的一些團體，讓他們觀看兩集“全國觀眾”的節目，然後訪問他們，找出其詮釋節目的類型。

觀看第一個節目的團體共有十八個，來自不同層級的教育體系，社會及文化背景亦有差異，有些來自該節目播放的英格蘭中部，有些則來自倫敦。這些人的身分，有的是學齡孩童，有些則是半工半讀（part-time）與全時學生，他們接受高等教育的年數均有不同。

觀看第二個節目的團體共有十一個，有些來自教育體系的不同層級，另有些則來自工會與經營訓練中心，此次的受訪者主要來自倫敦。這些團體包括全時及半工半讀的高教學生、全職與兼差的工會幹部，以及銀行與印刷業的經理人員。

經由這個步驟，我們的目的是確知受訪團體，原本已經存有若干體認，自覺他們已是一個社會實存體——至少在研究進行期間是如此。然後我們引導這些討論的進行，使其與這些團體各自熟悉的路徑契合，與此同時，我們也播放合適的節目影帶，使其貼切於他們已然建立的體制背景。

團體成員數，主要是在五到十名之間。觀看影帶之後，我們也將隨後的討論錄影下來（通常是三十分鐘左右），並做文字轉錄，提供基本資

料以做分析。

觀看這個電視節目時，每個人所面對的是成套的符號，專業的廣電人員以特定的組織與結構方式，呈現這些符號，致使觀眾被誘導而「偏好」某種特定的解讀或某個範圍的解讀。然而，觀眾收看節目時，並非「文化上一無所有」——反之，以觀眾身分看電視節目時，他已然有本身的整套文化符碼與架構，據此而接觸文本，至於這些符碼則得自他的社會與文化情境及背景。在觀看節目的那個瞬間，觀眾所能掌握使用的符碼與論述，也就充當了過濾器，篩選了節目的符碼及結構。經由這個接觸所產生的意義（筆者希望下文引自《全國觀眾》研究計畫的摘要，可以如此顯示）將以系統性方式，與觀眾所涉及的其他多種論述與符碼，產生關聯。這樣看來，觀眾將如何從節目得到意義或「解讀」，將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原節目製作人對節目結構所做的安排，二是觀眾接觸節目文本時所擁有的詮釋符碼。

## 研究設計與方法論

這整個研究計畫可以說是脫胎於艾科（Umberto Eco, 1972）的大綱：

1. 研究所援用的各個方法與概念，其理論上的定義為何，必須廓清。
2. 分析訊息的目的，在於闡明訊息所指涉之意義的基本符碼，在於弄清楚訊息的再現類型與結構，在於找出訊息所依附的概念與類目，到底隱藏了什麼意識形態。（這個研究所涉及的這些層面之分析，已另文發表為〈每日電視：“全國觀眾”〉，內中亦論及節目分析所產生的問題。限於篇幅，這裏只簡單勾勒該文所用分析方法的概要。該文



主要著力於分析這些節目的建構過程：各種題目如何被接合在一起；視覺與口語效果，如何配合新聞背景與解釋架構；專家的評論如何被整編進入節目；如何監控與進行訪談及討論。經此分析，目的並不是要提供一個單一的節目解讀方式，而是要就其主要的傳播與意識形態結構，暫時提出若干解讀可能性。特別引人關注的是，用來使這些節目的題材「清楚易懂」的傳播技巧與策略是哪些，而它們對於節目意定的觀眾又有哪些特定意涵。）

3. 透過田野訪談，則可以知道先前分析的訊息，事實上是否已為不同結構位置的媒介閱聽人，各以自身的方式加以接收與詮釋；這裏所使用的分析架構，包括了下列三種可能性：
  - (a) 可能狀況之一：閱聽人賴以詮釋的基本符碼，與訊息傳送者相同——比如，雙方都「盤據」主流意識形態；
  - (b) 可能狀況之二：閱聽人賴以詮釋的基本符碼，與訊息傳送者處於「協商」的關係——比如，傳送者以主流的意識形態製碼訊息，但接收者加以七折八扣；
  - (c) 可能狀況之三：閱聽人賴以詮釋的基本符碼，與訊息傳送者處於「對立」狀態，他／她用以詮釋訊息意義之符碼，截然與傳送者不同。
4. 在蒐齊了這些訊息如何被接收的資料以後，我們再將之比對先前就訊息所做的分析，目的是要確認：
  - (a) 是否這些接收訊息意義的情況，有些完全出乎我們先前分析的意料之外；
  - (b) 不同意義的「能見度」與受訪者的社會經濟地位，關係若何；
  - (c) 不同部門的閱聽人，到底在多大程度內，以不同方式詮釋訊

息，而他們又有多大空間可以自由地將他們本身想要的意義，加諸訊息？比如，我們也許可能發現，使用媒體的各社羣是有這樣的自由，他們可以擅自解碼訊息，致令媒介的影響力量，遠遠弱於我們的設想。或者，情況也可能相反。

### 《全國觀眾》這個研究的步驟

研究目標如下：

1. 建構解碼範圍之類型 (typology)；
2. 分析這些解碼方式為什麼產生變異，有些什麼變異？
3. 展示不同詮釋方式是怎麼產生的；
4. 將這些變異情況與其他文化因素的關聯性找出來：階級、社會經濟或教育地位，以及文化或詮釋素養／論述／符碼之間，其「吻合」(fit) 的本質為何？

第一優先要做的是，弄清楚不同部門的閱聽人，究竟是共享、修正或拒絕廣電人員所製碼的題材？這就涉及了確認廣電人員與受訪者所使用的「語彙／參照體系」，我們可以援用米爾士 (C. W. Mills) 的提議，製作一個語彙的指標分析。他認為我們可以：

定位一個心有所思的人之屬性。方法是確認他所差遣使用的語彙包含了些什麼，而這些語彙所透露的具體意義之微妙之處，又是什麼，如此，則我們可以知道他在政治與社會上的位置。就在鑽研其語彙時，我們已可察知隱藏其後的種種評價與集體行事之類型，已可得知其社會行為的線索。人在選擇其遣詞用字時，已然昭示了他的社會與政治上的論理基礎。就社會意涵來說，語彙是

思想的引導。(Mills, 1939: 434-435)

所以，我們必須追問的是：談及某個題材的諸般面向時，閱聽人所差用的語詞，與廣電人員相同嗎？受訪者心中對這些面向的優先性排列，與廣電人員相同嗎？該論題有沒有一些面向，是廣電人員所未論及，但卻由受訪者特意提出？

尤有進者，在語彙層次之外，最緊要的一些問題是：對於「輿論」素材所呈現的閱聽人形像（以及，透過其他更為隱設的定義與假設而指認的常識／一般人對於某事的觀點），閱聽人的認同程度如何？不同節目的主持人，聲稱他們隱然已有閱聽人的普遍認同，實情是否如此？哪個部門的閱聽人接受哪種主持人的風格，致而認為這對他們是個「合適的」認同點？再者，接受或認同，難道就等於說閱聽人就此全盤接收了主持人的敘事架構？難道主持人包裝其言詞的後設訊息，就此被觀眾承襲？若就閱聽人所取用的內涵意義之符碼而論，論者就“全國觀眾”這個節目所做的「總合」評論，具有多少分量，閱聽人理解節目主持人的言詞，是否參照這些評論？如果閱聽人的當下處境與利益，與節目內涵有些「距離」，哪個部分的閱聽人比較可能與主持人／訪問人所設定的「我們」產生聯盟的關係？多深的關係？不同部門的閱聽人，在多大程度內，會對訪問人有多少的認同，會感覺他們是在「授予」他／她閱聽人的權威，讓訪問人代表他們質問公共人物？

### 偵測解碼：語言的問題

所謂語言，必然對於個人的思想與行動等問題，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誠如麥英垂（Alasdair MacIntyre）所說：

我所想要做的，總受到一些限制，此即我所能用以描述的語彙之限制；眼前我能用到的語彙，來自於我所身屬的社會團體所習用者。若說行動的限制與描述語彙之限制，二者合而為一，那麼，分析時下社會（或其次級團體）所流行的種種觀念，也就等同於明白找出了理性的、有意圖的行動，在此社會（或次級團體）所必然移動的範圍。（引自 Morley, 1974: 12）

以這些詞彙來說，所謂的思考，其實也就是選取與操縱「可供差遣的形象符號，而什麼樣的團體有什麼語彙可供其使用，又須取決於社會結構之限制下，不同文化選擇與素養的分佈狀況。誠如米爾士所論，「唯有利用其團體所通用的符號，人才能思考與傳播、溝通。語言是由社會所建構與維續，它體現了隱設的告誡與社會評價」（Mills, 1939: 433）。米爾士接著引用了柏克（Kenneth Burke）的話：「事物與運作之名姓，夾帶了好與壞的內涵意義——單是一個名詞，往往也就帶有某種隱而不見的形容詞、一個動詞與一個隱而不見的副詞」。他繼續說：

習得了語言的種種類目以後，我們等於也是習得了一個團體之結構有秩的「行事手法」（ways），而我們借助語言，則又習得了隱設在這些「行事手法」背後的價值。我們的行為與認知、我們的邏輯觀與思想，均在語言體系之控制下進行。習得語言的同時，我們也習得了整套的社會常規與價值。語彙並不只是文字的堆積；內在於語彙的是社會紋路——典章制度與政治上的對應關係。

——這其實也就是米德（G. H. Mead）「概括化他人」（generalised other）這個概念的修正版，而所謂概括化他人，指的是：

思考者所要對話的閱聽人，已被他內化：行為與經驗之社會領域，隱設了若干焦點集中但又抽象化之態度……就社會功能來說，這些態度自有其局限，亦有其限制他人之用……閱聽人制約了談話人；他者則制約了思考者。(ibid: 426-427)

不過，米爾士緊跟著也提出了最重要的幾點但書(就這點來說，以下的批評，同樣適用於對拉康之「他者」概念的批評)：「在我看來，(米德雖然認為)概括化的他人，大到足以統攝『整個社會』，但我卻以為，所謂概括化他人，其實只代表了被選擇的社會部門而已。」(ibid: 427)這樣說來，此處所倡議的並不僅是一個社會與心理理論，它更是政治理論，探討的是語言與思想如何被決定。

### 「語言各有不同」：研究方法

純粹採取量化實數的取向，也是假設所有不同受訪者，他們回答特定問題之「是是是」與「不不不」總加起來，有其意義，但只消我們質疑以上這些回答，是否指涉相同的東西，則不難察覺這樣的取向頗堪令人懷疑。誠如德意區所說(I. Deutscher, 1977: 244)，「在回答相同問題時，受訪者的口音『呀』(yah)、『達』(da)、『噢』(oui)或『是』(yes)，真得都指涉相同意思嗎？或者我們應該說，不同語言的肯定語氣之內涵意義，類型不同？」他接著繼續說：

一句簡單的英語「不」(no)，聽在阿拉伯文化的人民耳中，可能被解釋為「是」(yes)的意思。若真要說「不」，必須再加強調語氣；單只是說「不」，表示有意再做協商。同樣地，只說「是」而未做

任何強調，經常會被當做是婉轉的拒絕（p. 244）。

尤有進者，他論稱，此等差異並非僅止存在於語系截然不同的文化；事實上，「相同語言」的族羣，其內亦各有不同的語系及輕重聲調。誠如米爾士所說，「書寫流佈各個閱聽族羣之時，各帶有微妙的意義差別……同一個文化體之內，實際位處不同文化羣體或階層的人，亦將對相同符號有不同的解釋。」（Mills, 1939: 435）

針對這點，辛士如此說道：

這種情況在雙語時，亦甚為明顯；我們並不認為，爲了某些商務目的而將英語當作第四語言使用的孟加拉人，其世界觀會深受英語的造句結構之影響……我們必須知道的是，單語情境同樣也是很有問題的。並不是所有地方的人，都以同等程度、同樣情形，或爲了相同的事務而使用語言。（引自 Deutscher, 1977: 246）

所以呢，筆者首先就傾聽受訪者實際言談的錄音帶，而不是只登錄他們的回答資料，目的則是處理表達形式這個層次的問題，檢視受訪者語彙及媒介言談形式所用之語彙之間，兩者「吻合」程度是高是低（雖然這方面的研究尚待開發）。基於類似的理由，筆者使用的是開放式討論，而不是預先備妥題目次序井然的訪談問卷；筆者甚至認為，受訪者怎麼排列各個問題之順序，其本身也就是研究的重要發現。

### 焦點訪談

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是焦點訪談（focused interview）——「預先由偵測者分析特定的一些傳播情境……然後決定受訪者對這些情境的反



應，究竟為何。」(Merton and Kendall, 1955)這樣一來，也等於是提供一個方法，讓研究者準確知道，「暴露於先前已被分析的情境之時，受訪者的主觀經驗是些什麼，而這麼做的目的則在於確認受訪者對於情境的釋義 (definition of situation)」。

最初幾個階段的訪問，並沒有任何的預設方向；稍後，由於爲了想要找出受訪者的參照架構以及他們用以定義情境所使用的語彙，筆者這才根據先前的分析所得，引出有關節目素材的問題。再次景隨墨頓，筆者企圖在訪談過程引進一些特殊問題，使其直接穿插於聊天閒談之中，但又對彼此的交談不致於產生干擾，最終則是希望順著受訪者提出的話題，續作對談與發揮。所以說，整個談話的進行，由開放式的提問(比如，「你／妳覺得這個節目怎麼樣？」)，移轉至更爲結構化的問題(比如，「妳／你覺得使用那個字眼描寫 X 妥當嗎？」)。由於彼此有機會討論，因此初期的討論等於是提供了機會，讓受訪者重新精細地建構他們對於節目的想法，而稍後的一些階段則是直接的檢視，看看根據節目分析所得，是否可以察知受訪者認爲重要的事務是些什麼。簡而言之，我們的研究策略之起點，是比較符合自然情境的一些反應方式，然後一路盤旋直上，探索更爲具有結構意味的假設。

## 團體訪談

選取團體情境而不是個人做爲訪談對象，原因是許許多多的個別訪談，缺點都出在個人變成了社會原子，脫離了他們的社會脈絡；其次則是我們的資源有限，無法兼做個人與團體兩者，二者兼顧對我們來說，太過奢侈了。

這項研究結果證實了皮坏等人 (A. Piepe et al., 1975) 的發現，他們

說，雖然「人們使用報紙、收音機與電視的情況各有變異，但它就次團體之內而言，情形卻相當一致」。以特定的一些項目來說，各個不同團體之內的成員，雖然對於其解碼，亦有不同意見與爭執，但團體與團體之間的差異，遠比這些團體之內的差異層次，來得大多了。這樣的情況似乎也印證了我們起初決定，正確無誤——當初我們正是覺得，研究目標在於找出種種不同的詮釋，究竟如何透過團體情境中，受訪者之間的交談與意見交換而集體建構——我們並不認為個人是一個自主的個體，任何人無法自擁成套的個別庫存之「意見」而孤立於其社會脈絡之外（參見本書稍前所論，〈導論〉的「方法論個人主義」部分）。

### 分析訪談錄音帶

筆者關注的檢驗目標如下：實際上的說話形式、使用的語彙、隱設其中的概念架構、形構問題的策略及其邏輯基礎（各種詮釋或解碼均根據這些邏輯而建構）——簡單地說，筆者致力於發現諸種文化素養的表現機制。由於現有的方法論不足以支應此一複雜而又非形式化的論述分析，我也就另行開創了相關的一些訪談分析策略。

以言第一個層次的分析，筆者企圖找出不同團體的庫存語彙，具有哪些可知的特殊之處——亦即找出特定語詞及成語套句之類型，圈選的標準則是它們必須足以標示不同團體之論述界線。就此層次而言，尤其具有特殊意思的是，不同團體之論述，透露了彼此整體視野的差距，致使相同的詞彙，在此差距籠罩下，顯現了不同內涵。

以言第二個層次的分析，筆者想要確認不同團體最主要是提出了哪些觀點、展現了哪些類型的論點，以及以哪些方式援引證據。舉個例子，筆者企圖先確認節目分析中所發現的核心題旨（「常識」、「個性」、

「家庭」與「國族」等），然後找出不同團體如何形構這些觀念。依此而言，特別重要的是筆者企圖找出，就「常識」這方面來看，以及就不同團體之諸種參照點來看，「好的電視」之意旨各有什麼不同？畢竟這些團體是根據自身的參照點評估特定的節目或節目的某些面向。研究者在這裏所遭遇的困難在於，諸如此類的「想當然耳」之概念，很難在理論上求得解釋。當研究者有此企圖時，經常直接地遭遇了受訪者的抵制，因為他們很可能認為，諸如此類想要精確講明「清楚明瞭」的語詞之定義，等於是剝奪了他們（譯按：某些權利），使他們不再能夠「操持這些想當然耳或模糊的語詞及套語，因此他們身為該團體之成員的素養，其特色也就不再存在」（引自 Deutscher, 1977）。

以言第三層次，筆者關注的是，這些論據及其邏輯均呈現一定的結構，但隱藏在這個結構後面的，到底是哪些基本認知或意識形態？葛本納（G. Gerbner, 1964）的命題分析（proposition analysis）不失為一個有用的導引。誠如葛本納所說，這個形式的分析，目的主要是彰顯隱設其中的命題、假設或常規，由於有了它們，人們所提出的特定觀點或意見，才能得以為人接受。依此論事，我們也就可以使用支持或做為其基礎的簡單命題，重新建構宣示性的陳述（比如，透過訪談問題彰顯某些假設，或許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假設，提出該問題才能為人理解）。舉個例子，以“全國觀眾：今日中英格蘭”（Nationwide: Midlands Today）這個節目所訪問的兩位學術研究者來說，節目中出現了下列這個問題：「但這個研究成果對於我們有什麼用？它可以為我們做些什麼？」隱設在這個問題背後的前提，可以如此建構：「大家都知道大多數學術研究了無新意。那麼你真能樹立自己的公信力，顯示你目前正在做的研究真能發揮實際的使用價值嗎？」

## 假設與樣本問題

進行這項研究之時，我的企圖是找出一些樣本團體，足以代表「主流的」、「協商的」，以迄於「對立的」解碼架構。透過這個樣本，筆者不僅希望確認差異的關鍵點，而且冀望能夠因而找出不同團體之詮釋，可能有哪些重疊——原因是我並不認為（譯按：社會背景與文化認知之間）存在著直接而排他的對應關係，亦即我並不認為一個團體只能佔有一種符碼。走筆至此，我所想要表達的意思，應該已經非常明顯：一個團體的成員，是有可能佔用不同領域的符碼，而這些符碼則可能在不同情境中，產生具體的作用；反之，雖說或許會有不同的形式，但不同的團體也有可能援用相同的符碼。

本研究計畫的目的，在於確認解碼過程，是否可能因為下列條件而變異：

- (a) **基本的社會人口學因素**：受訪者在年齡、性別、種族與階級結構所佔的立場；
- (b) 涉入種種形式之「**文化架構與認同**」的程度：又分兩種情形，一是涉入正式結構與制度之層次（如工會、政黨或教育體系的不同部門），二是涉入非正式的不同次文化之層次（如青年或學生文化，或是以種族及文化少數團體做為基礎的次文化等）。

由於本研究拒斥任何形式的機械式論調，因此很明顯將以(b)層次的情況做為主要關懷點。話雖如此，探討這(a)與(b)兩個層次的關係，以及它們與解碼類型之關係，仍然是很重要的，因為這麼做可以讓人檢視，或至少勾勒這些基本的社會人口學

因素，在多大程度內，已經使得受訪者的文化及意識形態符碼，產生了特定的結構與類型（而不是直接了當地被人口學變項決定）。

在這兩大層次問題之外，我們亦有必要探索解碼過程，在多大程度內會因為下列條件而變異：

- (c) **題材**：原則上，這主要是要了解節目所處理的題材，是否與特定團體的親身經驗及其另類資訊及視野，處於「抽象」而遙遠的關係，或是這些團體可以更為具體感知這些題材。是以，就這個層次而言，我們主要的行進路徑是要借光帕金(Parkin, 1971)與曼(Mann, 1973)及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據以了解人之意識的「抽象」與「具體情境」的問題。這些學者的論題如下：在抽象層次上，勞動階級的意識之特色，在於他們經常接受主流意識形態的架構，但是，與此同時，勞動階級卻在具體情境這個層次，修正並重新詮釋前舉抽象的主流意識形態架構，然後，勞動階級將再根據其特定的社會經驗，參酌既經修正的思索，建立其在地的意義體系。簡言之，正是因為不同位階之意識或概念，游動於矛與盾之間，符碼或意識形態才有「協商」的空間，畢竟，協商的意識雖然位居主流意識形態架構之下，但並沒有完全被其整編。

假使媒介所描述的事件，解碼者亦有其親身經驗，則相較於閱聽人完全從媒介得悉該事件的情況，二者的解讀將有何不同？是我們亟需精確了解的。是不是說有了直接經驗以後，是不是有了接觸非主流媒介之另類說明以後，人們就比較能夠採取協商或甚至對立的訊息解碼方式？如果是如此，則這樣的情況是不是僅能短期存在？或是僅能出現在某些種類的訊息之解

碼——比如，直接與解碼者本身利益或興趣有關的訊息——或是說這種情形可能產生某種「擴散」效應，致而這類協商或對立之解碼情況，可以適用於所有的或是範圍極廣的訊息種類？以上三個層次以外，筆者原本另有一個衷心想要探討的議題，但最終囿於時間與資源的欠缺而作罷，此即就脈絡因素這個層次來看，比如，在多大程度內，解碼可能會視下列情況而變異：

(d)脈絡 (context)。在眾多脈絡之中，特別引人興味的是，相同的受訪者在教育或工作情境之時，與他／她在家庭中的情形，對於相同節目的解碼狀況，是不是會產生什麼不同。

如果這些節目最初是在家庭中被解碼與討論，然後又在其他脈絡中被重新討論與重新詮釋，則這當然是最好的情況，本研究欠缺這個面向，說來是有些遺憾。但我仍然要指出，筆者的研究成果並不致於因為這個欠缺而無效，這是因為我將提出另一個更為根本層次的假設，使其解碼可以橫跨脈絡而同樣適用。在家觀看電視迥異於在教育機構內集體看電視的經驗，這個差異是一個情境上的差別。但到底一個人擁有哪些文化與語言符碼，足以便利他們解碼，是遠比情境更為根本的問題。在詮釋領域內，變異是可能因為情境變項而出現。但該領域的限制，是在更為深層的層次被決定的，亦即決定於人們所能使用的語言／符碼這個層次——它是不會從根被情境的差異所抹煞的。誠如佛羅史諾夫所說，

當下的社會情境及其當下的社會參與者，決定了話語 (utterance) 的「偶然」形式與風格。而此一話語的結構之深層，卻是由更為持久與更為基本的社會網路所決定，基本上，發話人是在此網路



中產生接觸的。(Voloshinov, 1973: 87)

除此欠缺以外，本研究另有一項較為嚴重的缺漏，這也就是說，家庭脈絡中男人與女人的不同解碼之問題（參見本書第六章對相關議題的探討）。這個做法與傳統的家庭假設大相逕庭，傳統上，家庭被視為是沒有敵對關係的解碼脈絡，因此是訊息的「消費單位」。學界對此領域的研究興趣，最初起源於一九七二年的一場礦工罷工，當時曾有人針對媒介對於沙特利門（Saltley Gate）罷工糾察線情況的報導，進行了解碼之探索（派克〔Charles Parker〕慷慨地提供了這項研究的結果給我）。根據研究所得，參與沙特利門罷工糾察的礦工，以及他們坐在家中從電視得知事件的妻子，對於整個情境的理解，差異巨大，並且，夫妻之間很難妥協，雙方都認為自己對於事件的理解，方屬正確。這檔素材提醒我們，作為觀眾一員的「家庭主婦」，甚有必要加以探討：舉個例子，單只是就她與薪資勞動經濟體無關的立場論事、就她在家庭中的地位論事，就已經預設了她的解碼方式，其實相同於勞資衝突中，媒介「唯消費主義者」之呈現方式，筆者在另一篇論文曾就此有所說明（Morley, 1976）。①

## 節目大要

### “全國觀眾”節目 A，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九日

在相當程度內，這個節目所混合的題材，是典型的“全國觀眾”風格——奇聞怪談（婦女重訪攻擊她的獅子）、特異風俗與學舌（主持人走

①譯註：媒介在報導勞資衝突時，通常都會提及這個衝突可能導致「消費者」在生活上會有哪些不方便，但忽略了每個消費者，其實也都是「勞動者」、「生產者」。

訪諾夫克郡的百老士〔Norfolk Broads〕、美國人在索夫克跳穀倉舞），混雜著望之令人生疑的現象（學生計畫從垃圾堆中做出有用的東西、化腐朽為神奇）以及「有益社會的事務」（發明了能夠讓盲人繪製立體三向度的圖畫）。下文的摘要將特意引述兩個訪談資料，一個是訪談奈德（Ralph Nader），一位力主消費者權益的美國人，以及訪談米漢（Patrick Meehan），節目播出當天，從終身監禁中，獲得假釋。

這個節目說奈德是「推動美國消費者事務首屈一指的人物」，刻正在英國「工業安全展覽會」發表演講；節目中又提及，「大會以兩千英鎊邀請奈德演講」。該場訪談（三分鐘）的背景是「全國展覽中心」建築物，鏡頭在奈德與訪問人的頭肩之間流轉。訪問者以略帶敬意的態度採訪奈德，賦予奈德某種「專家」地位，不過，訪問人所提出的一些問題，卻對奈德之動機與責任有所質疑。訪問人問奈德為什麼「捲進這些全然不同的領域」、質疑他是否具有「足夠的專家知識來做這些事」，又問說，對於「被許多人說成是煽動家」，奈德感受如何。

由於具有「專家」地位，也因為他在面對訪談時展示的實際技巧，奈德在節目的論述中，也就能夠得有餘地，議談他的論點，是以，奈德也就設法重新界定這些問題，使其更為有利他抒發觀點，並且能夠提出一個正面的答案。在整場訪談過程，訪談焦點集中在他的觀點與政策，比如，「就工業安全來說……你的觀點是什麼？」

訪問米漢的情形則另有不同，除了說他坐監七年以外，再沒有任何關於他的其他細節，也沒有談及他所涉入的事件，而徒然只是「七年牢獄大多數時間是單獨囚禁，以示對於他的罪名之抗議」。整個訪談的重點是「兩小時以前，他被釋放了」，而“全國觀眾”這個節目則「稍早之前『獨家』錄製了這場訪談」。

這次訪談共長四分鐘，鏡頭持續拍著米漢，坐在搖椅上緊張兮兮地抽著煙。整個訪談的畫面，大多是拍著米漢的顏部，並且多數時間是近接特寫，而米漢則倒述著他的經驗，訪問者的聲音話語與鏡頭分離，由空而降。

打從頭開始，整個訪談就很著重渲染當下情境的戲劇性與情緒性，焦點則放在米漢對於坐監經驗的主觀感受與反應。訪談問題均與米漢的感受有關，以致於整個事件的背景資訊，反倒付諸闕如。主持人問他，現在已經「自由而被釋放」，感覺如何；「過去七年來是不是有任何時間，讓你覺得此生再也無法出獄」；以及（問了兩次）「每天在監獄中的例行公事是什麼？」。若就節目的許多類目來說，米漢只是一個「普通人」（雖說經驗極不平凡），他

- (a)被問及的內容，不是他的觀念想法，而是他的感覺感受；
- (b)並沒有任何發揮其他想法觀點的餘地、空間；
- (c)沒有權力重新界定問題的內涵。

米漢是有意想要談些事件的政治背景，但每次都給砍掉了，然後訪問者又把他拉回同樣的問題，問他是不是對於這番經驗深表苦楚。

（訪談稍後是洩露了米漢一度是英國情報單位的雇員，被遣送至東歐之後，又被懷疑是雙重間諜。訪談中曾提及「英國情報單位」，但在這六字之後馬上被攔腰一新。）

### “全國觀眾”節目 B，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這是一個討論「預算」的「特別」單元，對於“全國觀眾”這個節目來說，相當地不尋常，它處理政府財政預算公佈後引發的經濟與

政治議題。

主持人包法蘭 (Frank Bough) 對這個單元的介紹如下：

六點二十分時，哈德森 (Halma Hudson) 與我將以具有代表性的三個家庭為例，看看這個「或前或後的」預算，對您將產生什麼影響，對這個國家將有何意義。我們將訪問……工會領袖史侃蘭 (Hugh Scanlon) 與企業家弗雷塞 (Ian Fraser)，請他們發表意見，談談這個預算的經濟意涵是什麼。

該節目單元的主要部分，是用來檢驗：

這樣的一個預算如何影響三個典型的家庭，大致說來，我們幾乎可以說，這三個家庭代表了大多數英國人的身分了……幸運的百分之十專業經理人員、遠較不幸的底層五分之一人口，所得偏低，以及絕大多數位居中間的人。

接著，節目主持人逐次討論這三個家庭的情況。每一個「個案研究」開始時，都先播放一段影片，包括了家庭及其經濟景況的描述，然後是訪問，最後則以丈夫回答下列問題作結：請問您希望財政大臣怎麼運用這筆預算？三個選定的家庭包括了農場勞工、一位工具室裝修技術工，以及一位人事經理。該節目單元的主題是，這個預算根本「無法為每一個人提供完整的服務」，其中，人事經理的困境得到最長時間的處理。

該單元的另一個主要部分，是這麼說的：「好啦，希利 (Healey, 譯按：當時英國工黨政黨的財政大臣) 先生十億英鎊的減稅計畫，雖然還是要徵求另一回合的給付同意；但我們所有的人，無論是否具有工會成員

的身分，事實上已經任由工會擺佈了。」這段話之後，緊接著是包法蘭所主持的一場雙邊座談，參加的人是工會領袖史侃蘭與佛雷塞（代表勞斯·萊斯 Rolls Royce 車廠），他們討論的焦點集中於英國工會的權力，已經足以指使政府薪資政策的制定。當時，佛雷塞與包法蘭聯手「直接」問史侃蘭，「嗯，史先生，您是期望再對薪資做個限制的罷，不是嗎？」此問題一出，史侃蘭也就立刻成為注目中心；另一方面，佛雷塞被問到的問題，卻讓他能夠充分界定「他所認定的企業責任是什麼。」（「佛雷塞先生，是不是可以談談在此情景下，你對企業責任的看法？」）

## “全國觀眾”的觀眾調查

依我們的研究目標，以下擇要列舉本研究計畫所訪問的二十九個團體，主要可以區分四種類型：

### 1. 經理人員

- (a) 刻正接受在職訓練課程的銀行經理人員；主要為男性；年齡24～52；全部為白人；中產階級。
- (b) 印刷經營訓練員；全部為男性；主要為白人；年齡22～39；中產階級。

### 2. 學生

- (a) 大學藝術科系學生；全部是白人；男女皆有；年齡19～24；中產階級。
- (b) 培訓教師之專科學生；主要是白人；主要是女性；年齡19～46；中產階級。

(c)延長教育(further-education)學生；主要是女性；主要是黑人；  
主要年齡 18~25；勞工階級。

### 3. 學徒、見習生

全部是白人；主要是男性；年齡 18~24；勞工階級。

### 4. 工會成員

(a)刻正接受在職訓練的工會幹部；全部是男性；全部是白人；  
主要年齡35~45；勞工階級。

(b)店員；主要是男性；全部是白人；年齡 23~40；勞動階級。

筆者的關注點是，在多大程度內，個人對於這些節目的詮釋，將因為個人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而產生系統性變異。我的焦點放在這樣的背景，究竟提供了不同團體之個人哪些文化庫存資源，使他們得有取用並詮釋節目的文本。

## 訪談腳本

### 1. 經理人員

(a)銀行經理（看節目 B）

問：（〈預算〉這個特別節目所）隱設的架構是什麼？

答：我想他們沒有什麼架構罷……節目中並沒有一個主題……  
並沒有一個（預算）的大綱。

問：你覺得“全國觀眾”這個節目怎麼樣？

答：這是喝茶閒聊時用來娛樂的節目……這個節目讓人發窘、  
有一種牧民與君師的態度……這個節目利用了人的原始情



緒與感官……我們在節目中聽到了什麼？就只是許許多多人的意見，卻又不見得有事實做為根據……所有那些話都只是那些人的反應……沒有什麼深思熟慮……讓人無法忍受……真是可怕極了……你只是聽到了一大堆變來變去、沒有定見的東西……如果真要了解預算案的意義，我大有可能寧願仰賴隔日的報紙……比如說，《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 譯按：英國質報中，發行份數最大的日報，論政立場右偏)……或是看看“錢”(The Money Programme) 這個節目。

問：就關於預算案的訊息來說，這個節目的表現如何？

答：坦白說，並不足夠……這個節目對我沒有什麼用……我覺得這種東西……相當讓人困窘……我真為他們邀請的那些人而坐立不安，覺得難為情。

(b)印刷經營訓練員（看節目 B）

問：若就論政立場而言，你認為“全國觀眾”這個節目的傾向如何？

答：基本上這是個社會主義色彩的節目。我是說這是 BBC（英國廣播協會）的情況。「獨立電視網」（ITV）不可能具有社會主義色彩，因為它是一個私人產業。BBC 則是一個國營的貨色，所以具有社會主義色彩……“全國觀眾”這個節目的主觀色彩濃厚……受邀上節目的人非常支持工黨……他們總是心存偏見。⑤

問：就個人而言，你對於“全國觀眾”這個節目的整體評價如

---

⑤譯註：這位英國受訪者對於其本國的廣電情況，認識並不完整，關於英國廣電沿革與現狀，請參見《統理 BBC》一書，尤其是頁3-12，台北：遠流，1992年。

何？

答：我來自一個非常保守的家庭。我有許多次很想拿起電話告訴“全國觀眾”的製作人；我看到了許多人在節目中被整得很慘，就只因爲他們很有錢……“全國觀眾”這個節目的人認爲他們是「豬仔」，是搶奪他們錢財的社會「豬仔」……他們真是將這些人弄得灰頭土臉，就只因爲他們是生意人。

問：在你看來，節目中的討論，是不是平均地在經營管理階層與工會的利益之間，做了平衡？

答：……工會來的那個傢伙搶盡了風頭，然後節目主持人向勞斯·萊斯的人丟出一個問題，但工會傢伙總是保有最後的發言權……他們並沒有給他任何機會，那位代表經營管理階層的傢伙。

## 2. 學生

(a)大學藝術科系學生（看節目 B）

問：在你看來，一個「典型的」“全國觀眾”節目之內容，可能是些什麼？

答：按理它應該是關於典型中低階級或上層勞工階級的事務……但究其實，如果你看了節目，你並不會因此而多知道一些這些人的情況，也不會對於他們再做什麼多些了解。

問：在你看來，這個節目的呈現風格，有沒有什麼意義、重要性如何？

答：這個節目想要讓人覺得我們都是一家人，我們整個國家都

是一個快樂的大家庭，我們勤力共事盡勉於此……整個節目想要讓你覺得主持人是一個非常好的傢伙。

問：在你看來，節目中的討論，是不是平均地在經營管理階層與工會的利益之間，做了平衡，或是有所偏頗？

答：在我看來，（節目製作人）並沒有意思想要偏向哪一方……主持人只是複述、只是挑出每個人心中想要提出之問題的多種意涵。

問：在你看來，這個節目所設定的觀眾，是些什麼樣的人？

答：這個節目是播給婦女、家庭主婦看的……她們是每天六點鐘時唯一在家的人……所有那些點點滴滴關於預算的……簿記的……東西，自然都是指向婦女的……到底（作為家庭主婦的）婦女，將得到多少錢？就這些所有大大小小的情形說來，總是某某女士、作為太太的人，買不起這買不起那……即便是對那些自有工作的婦女……他們還是說，你是如何花「他的」錢的——但她也賺錢啊。

（b）培訓教師之專科學生（看節目 B）

問：在你看來，這個節目所設定的觀眾，是些什麼樣的人？

答：“全國觀眾”這個節目是提供全家人看的……就像媽媽忙來忙去，每天弄好晚餐……這個節目的設定對象，是那些從來不認真聽（受訪者有誤，但照錄）新聞時事節目的人；就是那些“全景”（Panaroma，譯註：時事評論節目）上，他們立刻轉台收看“警網雙雄”（Starsky and Hutch，譯註：娛樂節目）或其他同型節目的那些人……我想，在那樣的時段，給那

樣的觀眾看，電視台並不想要提供任何會刺激、強迫觀眾思考的素材……這個節目的目標對象，是那些對「深度」報導沒有任何興趣的人……（這個節目）相當於電視的《太陽報》（*the Sun*）或《鏡報》（*the Mirror*）<sup>⑥</sup>

問：你覺得主持人怎麼樣？

答：他們想要突出自己的風格，或說他們想要你這麼看待，讓你因而認同他們；主持人稍後的一些動作，正是這個意思……如果他咧齒而笑，你就知道這表示很好玩的意思……如果他拉長了臉，你就知道事態嚴重，必須認真點……他們想要將自己的人格一股腦帶入你的家庭……他們認為我們必須站在他們那一邊……他們想要讓觀眾涉入地更深。很不幸，這是對我產生了壞的效果，因為它讓我的生活為之興奮……過了一會以後，它讓你的神經繃緊了。

問：訪問米漢那段，你覺得怎麼樣？

答：那一段是整個節目還有點看頭的部分……米漢那回事……還真是新穎有趣……如果他們真深入挖掘，內中還真有些潛力……這是整個節目當中還有些趣味的部分……“全國觀眾”繞著這個主題而迂迴……問些米漢的「例行公事」……他們只是將這個主題說成是這個傢伙的一種「人物評論」……以及他的感情……這個例子的細節，未見交代罷，交代了嗎？如果“全景”這樣的節目來做……他們很可能重新來過……而非常非常詳細的部分……極為細緻的部

<sup>⑥</sup>譯註：英國小型報銷數最大的兩家日報，編採均極具煽情之能事。

分，都應該會得到呈現。

(c)延長教育學生（看節目 A 與 B）

問：訪問米漢那段，你覺得怎麼樣？

答：我只聽說他剛從監獄出來……他因為莫須有的罪名入獄……這些就是我耳聞的全部。

問：“全國觀眾”這樣的節目，是為你這樣的觀眾而製作的嗎？

答：門都沒有，它根本是為年紀較長、中產階級的人而做的節目……為有錢人而做的節目……如果真是為我們而製作，為什麼他們從來沒有訪問馬利（Bob Marley）？

問：你覺得“全國觀眾”可有些意思？

答：“全國觀眾”這個節目「簡直」煩透了。實在搞不懂還有些什麼人會看它……BBC 的所有節目根本都是煩人透頂……就像「政黨政治廣播」一樣……像那種東西上了電視以後，我呼呼大睡去也……老天，真是廢物一堆……真應該禁播這些東西——它們令人煩透啦……這種節目哪能真正吸引你……吸引我——它什麼也不能吸引。

問：節目中說，「英國每個人應該都已經落入這三個類目之一」，然後他們又說，他們訪問的某些家庭相當具有代表性。對此說法，你覺得如何？

答：沒有哇。這個節目並沒有訪問單親家庭，也沒有訪問住在地方政府房舍的家庭——節目訪問的所有「這些」人，似乎都有車子，有自己的房子、財產……他們的眼中哪裏有一般的家庭？……他們是播了……就像所有的先生與太太

努力賣命地工作，克服問題……但他們並沒有播放衝突、抗爭等等我們知道經常發生的事情。我是說，對我說來，這根本不是一個真實的圖像——整個節目顯得太過詳和、太矯柔造作了。

問：什麼原因讓你對此節目心生厭倦？

答：每次“全國觀眾”說得愈是詳細……它就愈發顯得煩人……他們進入了背景的說明……愈是深入……“全國觀眾”就這麼一路往下鑽……他們等於是繞著圈子猛兜，不談正題……他們就這麼說，反覆一直說……「今天」(Today)的這個單位短了些……也就沒有那麼煩人……接著則有「十字路」(Crossroads)。

### 3. 學徒、見習生

問：在你看來，主持人在引介議題之時，是不是有些偏倚？

答：他們只不過是做項工作而已，這與每個人都一樣……我想他們是偶爾可能滑向一個怪異的評論……然後改變一些……但那整個也只是深入了一些而已，不是嗎？

問：你覺得主持人怎麼樣？

答：都是主持人的功勞，他使得整個節目緊湊有物……珠璣不時可見，適時穿插……他為人熟知……新聞每天在變，你總是很高興有些東西永遠不變……你就這麼走進客廳，然後想著「這是什麼？……有人掉進了運河」……接著你看到了柯因(Tom Coyne)而說，「嘔，是“全國觀眾”……！」這樣一來，你就有了一個印象，以為迎頭而來的柯因是代



表你在螢光幕上出現的地方人士……這些主持播報的人必定是最具有權威的，因為大多數的人你都看到了……對於他們訪問的人，坦白地說，你可是一點都不相信罷，難道不是這樣嗎？我是說，由於你不認識他們，你就心生狐疑，你知道他們出面是爲了自己，但訪問人可不是如此，他只是在播報節目而已。

問：你可認同節目中的人？

答：我想，出現在“全國觀眾”的大多數人……我們看到在接受訪問的人，其實似乎都是一些勢利的人……我並不是說他們都是上等階級的人，但一路往下看……你倒也不會認爲有任何一個人是在工廠做工罷——夜晚的那個時間：對他們來說，六點是喝茶時間，每個人都在家……一種真正是中產階級的態度……他們所報導東西，根本就是中產階級幹的事……你可以想見所有的觀眾，都是坐辦公桌的人、通勤的人。

問：訪問米漢那段，你覺得怎麼樣？

答：真是煩透啦……說他在監牢待了七年……這是整段節目最讓人厭煩的一部分。

問：主持人訪問米漢後所說的那段話，你覺得怎麼樣？

答：他們所說的，再稀梳平常不過了，不是嗎？……很明顯，他說的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他做了總結……收束結論。

問：米漢說得那一段，你覺得怎麼樣？

答：他是不是真被冤枉，我倒不能確定……你知道……這也有可能只是他「說」他被冤往……你知道，節目收尾時主持

人詳細地做了解釋……我看出來了發生什麼明顯的事了；在此之前……我真得什麼也不覺得，因為我了解得不夠多……說不上他是對的或錯的……我壓根不知道米漢是幹什麼的……而主持人卻全國知名，所以他說的（譯按：一定算數囉），你知道。

問：訪問奈德那段，你覺得怎麼樣？

答：“全國觀眾”這個節目並不是要弄錢的……奈德上節目得到了極高的報酬……“全國觀眾”作這段訪談是服務性質……他們願意畫下兩界之線……就說我們必須接受「某些」改變罷……但奈德的態度是……如果你不照我的方式做，那就乾脆不要做……他強有力，足以閉門關廠……奈德上節目就是爲了要錢……這根本是某種形式的詐財……他說消費者需要保護……但消費者才是最終付錢的人……他走到了不同的極端，無端造成金錢的浪擲，而付帳的卻是消費者——這個社會真需要他嗎？“全國觀眾”並沒有真得那麼爲我們這樣的人著想，並沒有像奈德所秀得那麼樣……他們只是讓我們知道，像奈德這樣的人，像個什麼樣子。

#### 4. 工會成員（看節目 B）

(a) 工會幹部（看節目 B）

問：你定期收看“全國觀眾”這樣的節目嗎？你認爲它與你自己有關嗎？

答：我發現還滿有趣的……每個人都可以從節目看點自己想要

的……這似乎是一個大多數人都能接受的節目。

問：對於主持人的評論，以及他對各個單元的穿針引線，你覺得如何？

答：基本上，他們說的只是我們當中許多人想的東西……他問的只是千萬人都想要問的……我想這算是個持平的節目……它說的是，沒有任何誘因讓人想要提升自己……我們談的是誘因……我們遲早要面對這個局面……他們這幫人在這個國家增加所得稅到了這樣的程度，使人做得勤快與否，再也無關緊要……我們必須坦然面對，成事敗事都是「全國工會總會」(Trade Union Congress, TUC)……基本上，代表著你我與全國的每個人，訪問者說的是，「如果你合作，我們就可以減稅」……我是說，再也……不是窮者愈窮、富者愈富……是「我們」越變越窮。

問：（「預算」Budget這個特別單元所）隱設的架構是什麼？

答：整個節目的假想情況，均從下列前提出發：除非中產階級這幫管理階層的人，得到高額的減稅，否則，這個預算案再怎麼擬，對於國家都沒有助益——這正是節目的主要前提，往後的所有訪談，均由這點出發。

問：就工會／經營管理階層的討論，你覺得呈現得如何？

答：訪問人把史侃蘭（工會代表）逼入了死角……將他搞到了死角，然後呢，他的敵手弗雷塞（經營管理者代表）多少也跟著主持人進了場，支持主持人對史侃蘭的攻擊（原先還認為弗雷塞應該是公平的呢）……我們察覺……媒介……嗯你知道，我們的工會……我們與地方媒介的關係很好——但我們的

時間還是一再被砍掉，相較之下，經營管理者的觀點就沒有這個問題。

問：在你看來，這個節目是做給誰看的？

答：嗯，不是做來給工會幹部看的！這是中產階級的節目……毫無疑問，這是做給「他們」認為是英國骨幹的中產階級看的。

(b)店員（看節目 B）

問：就政治立場來說，你覺得“全國觀眾”這個節目如何？

答：我想，你不能將“全國觀眾”孤立地看……我是說，把《太陽報》、《鏡報》與《每日快報》加進去，才是全貌，它們都是一堆屎……它們說的都一樣，說是工會「正把國家搞垮啦……」

問：你覺得這個節目呈現東西的風格如何？

答：娛樂性相當強……容易入眼……無需花太多精神……但重要的是，它弄出了有如秀場的那種玩笑氣氛……所有人都在嘲弄他們自己的不幸……一種嬉笑鎮靜的方式……彷彿你可以拿出一個令人嘔心的問題，然後又再將它包了起來不去看它……你是知道的，「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從頭到尾都說著「我們」……我們想要讓一般觀眾，全部想著「我們」。

問：你覺得對於經營管理階層與工會的報導如何？

答：嗯，談的是預算案罷，不是嗎？過去多年以來，預算案總是對於就業情況有些關係……而「他們」卻做完了整個節

目，但一丁點也沒有提到這一點——絲毫沒有討論投資、成長生產、創造就業機會……沒有人「提及」失業……沒有提及股票與股份……（譯按：似乎是說）在沒有人幫忙之下……（譯按：這些股票與股份）就積累了下去，錢就滾滾而來。

問：（「預算」這個特別單元所）隱設的架構是什麼？

答：……就是相信企業家的特殊技術，有了它，財富的創造有如奇蹟一般地進行……（譯按：是啊，）你知道那是什麼樣子的特殊技術，就告訴那些白癡該做些什麼……這整個現象真是與古典的社會理論有關，要點是這樣一來，你就把生產要素當做是輸入看待——工人……以及其他所有的東西（譯按：都是輸入）……是那些經理、是經理的幹部，只有他們才能夠截取這整個技術庫與機械的長處，只有他們才能創造出利潤，因為生產利潤的是他們的判斷與技術——創造利潤的不是第一線的工人……你是知道的，那代表了兩種完全背道而馳的詮釋，這是基本的差異，財富何處來，各有解釋。

問：這個節目呈現議題時，你還覺得公平嗎？

答：一點也不公平。一點也不公平。他們對於中產階層的經營管理，表達了更多的關懷。即便是用 BBC 所說，也沒有什麼中立可言。

## 詮釋記錄

下一節將提供若干文字，詮釋訪談各種團體所得之結果。這些詮釋只能說是暫時性的結論——畢竟，訪談的團體數目很少，不足以保

證他們的代表性。因此，閱讀這些詮釋文字時，應該採取批判的態度——這些文字對於訪談紀錄之意義的彰顯，可有多少的助光？各個團體之間的差異，還有多少沒有能夠得到解釋？而不同團體之反應及重疊的部分，又有多少相近之處需要解釋？

## 1. 經理人員

### (a) 銀行經理

這個團體特別引人興味的有一點，此即他們對於節目內容，鮮有任何評論。他們似乎認為“全國觀眾”的內容，無非是一些常識，他們知之甚稔，以致於節目中所述，對於他們來說，幾乎沒有任何爭議可言。這樣的解讀方式，對照於工會團體的反應，尤其強烈——在工會團體看來，這個節目是有一個非常特定而高度明顯的內容，它所透露的「題旨」，顯示中級經營管理人員的利益，高過一切。由於這樣的「題旨」難以為工會團體接受，工會團體也就明察其存在，並且他們的大多數評論也就集中於此。

所以，經營管理人員的注意焦點也就集中於該節目的發言／議論模式——對此，他們嗤之以鼻，說它「只不過是喝茶閒聊時用來娛樂的節目……這個節目讓人發窘、有一種牧民與君師的態度……這個節目利用了人的原始情緒與感官」。他們習慣的發言模式，必須可以確認是「嚴肅而認真的時事」——他們提及了《每日電訊報》與“錢”這個節目，認為它們才是這些議題的「良好報導」之示範，然後他們以此做為標準，挑三揀四說“全國觀眾”不符合這個架構的要求。對比之下，在若干程度內，店員倒是能夠接受這個節目的發言模式：他們目光的焦點是“全國觀眾”形構這些「議題」的意識形態，他們並



且拒絕接受這等意識形態。

#### (b)印刷經營訓練員

就某個意義來說，這些年輕的培訓經理，位居政治光譜的極右(擁抱一種強硬的自由市場邏輯，採取一種「激進保守主義」的立場)，我們或許可以說，他們對於“全國觀眾”的解讀，是一種右翼的「對立解讀」——他們認為這個節目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的節目。在他們眼中，“全國觀眾”以複雜的方式，混合了「激進民粹主張」(radical populism)，其實只是解消為「激進主義」而已：以此論事，他們認為該節目對於經營／工會問題的呈現，嚴重偏向工會那一邊；當然，這樣的解讀與工會團體的解讀，恰巧完全矛盾——工會的人認為這個節目反工會的情況，根本就像瘋狗一樣。

以言政治意見光譜，類如經理與工會的解讀之南轅北轍、全然矛盾對立的例子，確實提供了最為清楚的例子，向我們展示，相同的一個節目或「訊息」之「意義」為何，取決於觀眾在解碼情境時所擁有的詮釋符碼。

## 2. 學生

#### (a)大學藝術科系學生

整體說來，這些團體的解讀方式，清晰可辨，既協商又對立，他們也比較能夠重新界定節目原定的詮釋架構。就“全國觀眾”所展示的主要大項，如休閒、家庭、個人與他們的嗜好等等，他們的解讀方式，確實是如上述的情形。如同銀行經理，這些學生也對“全國觀眾”的風格與發言／議論模式嗤之以鼻。相同於教師培訓學院的學生，由於這個團體堅持主張教育論述的意義，因此他們也就以「是否相關」

與「資訊價值」做為標準，衡量“全國觀眾”——而這樣的批評，實乃取自「認真而嚴肅」的「時事」廣電新聞。以此論事，則“全國觀眾”顯然有所欠缺：它所提供的知識形式，並不充足。在他們眼中看來，“全國觀眾”只對感官、戲劇性有興趣，亦即只重視事件的表面形式。

尤有進者，由於他們的特殊教育背景使然，他們持續地製造了「解構式」解讀——換句話說，對於“全國觀眾”之論述賴以建構的方法，他們特別地注意。

然而，到了談及更為直接與政治經濟事務等實質內涵有關的內容時，尤其是“全國觀眾”對於工會與經理的呈現，他們的解讀方式也就趨向一致，沒有那麼對立了。就這些議題而言，這些團體傾向於接受，並且整個承襲“全國觀眾”的意定架構，不加質疑。與銀行經理非常相像，他們的評論焦點擺在他們的認定，直說該節目「君師態度」鮮明，而其「瑣碎的」發言／議論模式令人難以接受——而節目所設定的架構，圈住了勞資關係的呈現，顯得無所爭議，因此對於他們來說，一如銀行經理的情形，這樣的架構也是不存在的。

工會團體認為“全國觀眾”的呈現嚴重不利於他們，但這些學生團體不作此想（「我想，他們並沒有以任何方法對我們不利」），就此而言，他們接受“全國觀眾”主持人的說法，聲稱他們「為我們發言」，我們這些夾在經營管理階層與工會衝突之受害公眾。

我們在這裏看到了就特定團體而言，隨著不同的題材，解碼方式可能產生變異的狀況：換句話說，各個團體並不僅只是各自擁有不同的符碼——在相同團體之內，亦有其更為內涵的、近接的差異存在——就此情況而言，一個團體與不同種類的主題或材料之關係，可能

會造成實際解碼過程的不同。我們得有一個例子，顯示某團體就甲類目的解讀是對立式的，但與此同時，它對另一個類目的解讀，卻又符合主流的解讀模式。

(b)培訓教師之專科學生

雖說這些團體與學徒的政治傾向，與保守黨相近，但他們所受的高等教育起了作用，篩選了他們的解讀，使之移向「協商式」而非「主流式」的區位。以受訪者所擁有的教育論述能力做為一個變項，我們也就可以比較這些團體與黑人延長教育學生團體，比較他們的解讀方式是否有別（比如，兩類團體之不同，明顯表現在「詳細」這個詞，是不是被援引作為評估節目的價值判斷）。

這些刻正接受師資培訓的學生，對於什麼是「認真而嚴肅」、「教育性質的」電視，具有高度評價，他們關心的是資訊與「細節」的提供。他們用以判斷「好」或「有價值」，或是「瑣碎」的節目，標準在此。

另一方面，黑人延長教育團體則可以說是抗拒著這個論述（因為它似乎是負面地評價了他們自己的文化資質），或是，更為牧民而君師的態度是，因為他們沒有近用教育體系之文化（精煉的？或種族主義的？）符碼的機會。站在黑人學生的角度論事，“全國觀眾”實在是「詳細地過了頭」——因此，也就造成了「煩人」的結果。這個節目沒有能夠符合他們心目中「好電視」的定義——亦即娛樂而讓人發笑，是好節目的主要內涵。對於師資培訓班的學生而言，“全國觀眾”不夠好，卻是因為它沒有「足夠的」細節或資訊，不夠認真／不夠有價值。因此，我們可以說，師資培訓學生團體與黑人「非學術的」學生團體，兩者涉入正式教育的論述，程度有別，這就造成了他們對於節目的反應，有所差

異，也建構了他們彼此有異的架構，使其接合這些不等的反應之方式並不相同，他們用以合理化這些反應的理由，因此也就相左。

不同視野之判若涇渭，在這些團體身上顯現得最為尖銳，因為他們分別位居教育論述光譜的兩個極端。身為師資培訓班的學生，這些團體很有可能是所有樣本中，最為堅持該種論述的團體；而來自勞動階級的黑人團體，亦最有可能是最為疏離於正式教育論述的一羣人。

### (c)延長教育學生

這些學生幾乎全部來自黑人（絕大多數是西印度羣島後裔）都市貧民區、勞工階級的社羣——他們解讀這個節目素材的方式，直接就反映了該社羣文化符碼與“全國觀眾”之文化符碼之間，存在著脫落的現象。

對於這些團體來說，“全國觀眾”的論述完全是疏離的，因此他們的第一個反應是「以靜默代表批評」，而不是對立式的解讀：其實應該這麼說，就算他們對於節目中的任何部分有了反應，通常也很貼近於接受節目本身的定義。從某種意義來說，他們根本就無意或說無法與節目之論述展開對話，因此也就不能解構或重新界定節目的意義。節目所呈現的整套再現符號與學生次文化氛圍所激生的符號，兩者之間根本就脫了節。

黑人學生鮮少與“全國觀眾”的論述產生任何關聯。“全國觀眾”的關注重點與文化架構，根本不是黑人學生世界所關心的。他們心知肚明，了解這不是他們的節目；它沒有處理他們的特殊興趣，也未能滿足他們心目中「好電視」的標準——意思是歡笑與娛樂（就這些品項來說，一般看法是，“今日”這樣的節目與ITV比“全國觀眾”及BBC更能夠讓他們滿足）。

在這羣人眼中，“全國觀眾”「怎麼這麼煩人，一點都不有趣，（他們）弄不明白為什麼還有人會要看」。兩者之間出了斷層，左是他們自身文化的論述，右是“全國觀眾”包括在內的整個「認真而嚴肅以對的」電視與政黨政治。尤有進者，這些人拒絕接受該節目對其生活的「描述」。節目中關於英國現今的家庭問題之論述，沒有辦法讓人找到「認同點」——（譯按：而有趣的是，）該節目主持人卻聲稱「所有英國人」都會在此論述找到自身影跡。他們那種又是黑人、又是都會貧民區的勞工階級之社羣，有其特殊的家庭結構之經驗，但節目中根本沒有將其列入考量。這個節目對於家庭生活的描述，對於他們來說，根本就毫不貼切。

### 3. 學徒、見習生

這些勞動階級團體分居二處，一方面，他們的論述是由保守思維支配的，另一方面這些論述卻又受到民粹主義思維的支配，全盤否定了政黨政治體系。整體來看，他們對於節目的反應，犬儒嘲諷與疏離情緒，兼而有之。他們排斥這個節目的發言／議論模式，就一般層次而言，他們認為它太過於「正式／中產階級／BBC——傳統」，但又同時擁抱著與節目同調的「民粹」意識形態，這樣一來，他們在解碼特定的一些項目時，也就與文本製碼之際所想要傳遞的優勢解讀方式，亦步亦趨。

此外，有些時候他們對於訪談問題，頗具敵意——對他們來說，要再將他們認為那麼熟悉明顯的諸般事務，說出個所以然，使其相關，似乎非常困難。同時，他們的言詞表現，也有防衛性或策略性的作用——諸如「較好／煩人」等價值判斷性字眼就只是從他們嘴中脫口而

出，絲毫不加解釋，事實上他們以「這只是常識呀，不是嗎？」為理由，不肯解釋。

他們認為“全國觀眾”這個製作小組，「只不過討生活，執行工作而已」——一件技術性工作，處理一些技術或傳播問題而已。若要問到“全國觀眾”所產生的實際社會政治效果，他們認為，實在「太過認真了罷」。

在所有團體裏，最為貼近節目主流符碼的單位，正是學徒這一組——而大致上，他們的解碼方式，與“全國觀眾”的主流或優勢意義，「兩相吻合」。為什麼如此？似乎是因為這些人「常識上的」意識形態立場，與節目不能見容的某種民粹論述，產生了接合。雖然這個團體回應“全國觀眾”的主流聲調，語帶犬儒，抗拒任何人「強加事務於其上」，但大多時候，這些團體解碼該節目之時，其實都是在該節目所建構的主流或優勢解讀架構內進行的；另外，他們也傾向於接受節目主持人所提供或經由主持人而提供的視野。節目主持人覺得是常識的東西，對於這些團體而言，似乎「也很明顯地可以接受」，因此“全國觀眾”所提出的問題，亦被當做是「自然的」、「明顯的」，因此也就是無庸置疑的。

#### 4. 工會成員

筆者已多次指出，解碼類型不應該只是視做階級立場的延伸，而是必須從接合的觀點論事，看看社會立場如何在不同的論述形構過程，接合個人的立場。就此而言，解碼類型之差異大矣，單只是工會「成員」或根本不是工會成員的團體，以及積極涉入工會主義論述的團體，二者之間形同涇渭——雖說這兩類團體，成員背景基本上均相同，都



是勞工階級。工會幹部這些團體傾向以協商方式，解讀訊息；店員的解碼則完全與主流對立——相較之下，比如說，學徒這些團體，由於純屬工會成員，但並不活躍，因此他們就傾向於複製了節目的主流解碼方式。當然囉，在這基本類型之內，另有一些變異；不同類別的工會幹部，解讀方式也就有別——但在我看來，這些情況可以說萬變不離其宗，都是環繞一個基本主題而變異。換句話說，造成解讀電視方式之不同，並不只是因為勞動階級的身分——而是因為社會立場，接合上了特定的論述（以此而言，亦即工會主義的論述），因此在特定方向上，「反映了」解碼的類型。

再者，店員那種完全對立而接合良好的解讀，相比於工會幹部的協商式解讀，其間差別相當明顯。為什麼這樣呢？我覺得是因為店員並沒有那麼直接受到整編的壓力，但全職的工會幹部卻必須面對這種情境，因此店員也就盤據了一個更為「左翼」的工會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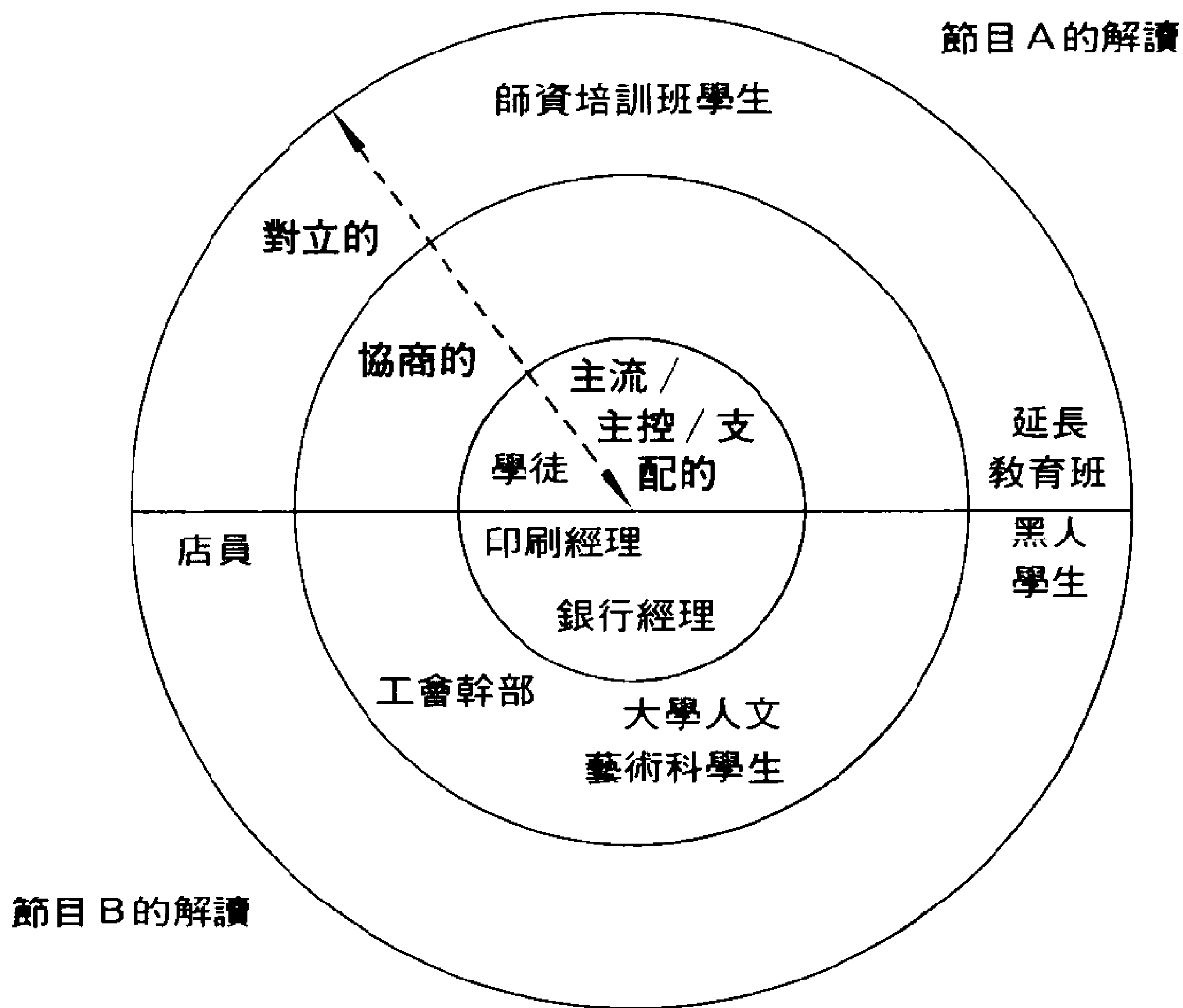
整體來看，工會幹部盤據的是一種民粹色彩的協商符碼，他們擁抱著工黨之內的右翼視野。他們規律性地收看“全國觀眾”，並且對其發言／議論模式與意識形態之問題叢結，表示贊同。他們接受該節目強調個人式的主題，並且同時接受它對國族的定義，對於該節目將國族社羣建構為一個未經分化的整體、該節目所謂這個社羣正受經濟苦難的說法，工會幹部未加挑戰；就此而言，他們確實是認同於該節目論述所建構的「我們」這個國族。不過，這是就抽象而概括的層次來說的——如果放在一個更為具體而在地的層次（直接與經濟上的「工會」事務有關者），他們的態度則批判多了，在此類目之內的一些特殊題項，因此也就更是以對立之方式解碼了（參見 Hall, 1973, 論「協商」符碼之結構）。

接合最爲完整無縫，同時又完全對立於主流的解讀，來自於店員團體。對於該節目的口氣，想要告訴我們什麼才是「我們的怨懟」，以及它企圖建構一個國族的「我們」，這個團體都加以拒斥。由於這個團體重新界定了該節目所呈現之議題面貌，因此我們可以說它精確地符合了對立解讀的標準。它的眾位成員抱持批判態度，看清了該節目討論經濟事務時，「遺漏了哪些重要的項目」。更勝於此，他們的批判性解讀同時也涉及了再造新的模式，在節目以外另行融鑄參照條件：他們先在某一點上，解釋“全國觀眾”隱設著財富源起之「理論」，實乃脫胎於古典經濟學，然後他們再進一步，跟著就以價值的勞動理論取代了前舉論說。

## 解碼類型：綜觀與部分結論

這些團體的各種解碼策略，可以系統性地展示如下圖。這個圖是以空間而不是線形關係表達的，後者只能表達單面向的連續關係，由對立而降至主流之解讀；但解讀關係的排列，卻又不好說是由這樣的直線關係表達。比如，根據我們的發現，延長教育的黑人學生並不能夠說比大學生更具有對立解讀的表現，因為他們運作的面向各有不同，他們與“全國觀眾”的關係，並不相同。

這裏記錄的不同反應與詮釋，並不能說只是出於個人心理狀態的差異。他們之所以不同，必須從沉澱於社會結構之內的文化差異找尋——這些文化叢結一方面限制，另一方面則引導個人詮釋訊息的方式。如果真要了解特定訊息的所有潛在意義，我們必須描繪訊息的設定閱聽人之「文化圖譜」——這張圖譜必須能夠顯示該閱聽人當中，藏有



哪些不同位置的次團體，而他們各自又擁有哪些不同的文化庫存與符號資源。一個文本或訊息的「意義」必須從兩方面的互動才能理解，一是文本所內含沉澱的符碼，再就是閱聽人當中，不同部門者所佔據的符碼。

論稱個人對於訊息的「解讀」，必須由其社會脈絡下手，絕對並不同於主張採取某種模式的決定論，因為若是這麼做，則個人的意識變成直接由社會位置所解釋了。事實上，誠如前述紀錄腳本所示，比如說，再怎麼說階級位置也並沒有與解碼架構產生直接關係。

這裏提出的模式無意直接從社會階級位置推知解碼方式。問題總

是社會位置加上特定的論述位置，然後才會造成特殊的解讀方式，這整個過程是受結構限制的，因為近用（access）不同論述的結構，由社會位置決定。

就此而言，我們必須了解任何社會形構的論述多重性之運作過程，以及解碼媒介材料的過程，二者究竟如何交錯進行。這些論述勢必以多種方式，反映解碼的情況——因此，就解碼的每一個主要類目來說（主流的、協商的或對立的），其實都還有各自的變異狀況，但我們為了進行總體比較，也就暫時撇開類目之內的變異，而逕自命名為（主流的、協商的或對立的）「符碼」。這樣看來，帕金的意義體系之基模，只提供了一些粗糙的類目，我們必須在這些類目之間與以外，作個一連串的區別，唯其如此才能發展出一個更為適切的閱聽人模式。

更應注意的是，在每一個團體之內，仍然總是存在著內部的差異與分歧，而在不同脈絡裏，不同團體將以不同的解碼策略，面對不同種類的材料。主流／協商／對立這樣的模式，僅屬基本，除非再大幅度地精煉，否則它還不是一個充分的概念架構，唯有在精煉以後，它才能夠在基本的符碼類型之內，容適所有相關的次級分殊與等差。

## 第 4 章

# “全國觀眾”的觀眾： 一個批判性的弁文

本章旨在於明確標示《“全國觀眾”的觀眾》(*The 'Nationwide' Audience*) 這本書 (Morley, 1980), 有哪些問題與漏洞, 本章可以說是擴大了 (或許就若干意義來說, 只是重作表白) 該書「結語」所述的不確定之處。本章的主要目的, 在於重新形構進行觀眾研究的架構, 但是, 本章第一節仍然將以同等篇幅, 探討文本分析的問題, 稍後再探究觀眾研究的問題。事理至明, 任何形式的觀眾研究, 既然是針對文本的「效果」或「使用」或「解碼」而做偵察, 則必然得要就文本之本質, 提出命題或假設。基於這個道理, 則澄清文本此一概念的種種問題, 似乎亦有其必要, 在《全國觀眾》這本關於觀眾研究之作, 筆者僅只是提出或逕自設定了這個概念而已。

在《“全國觀眾”的觀眾》這本書之中, 筆者提出了兩種不同形式的決定作用, 二者均與意義的生產有關。第一, 經由特定形式之符號文本組織所製造的意義, 亦受某種決定性作用之影響。我這裏是指涉了符號學的研究領域、文本的有效性之觀念, 表意實踐之特殊性等等。就《全國觀眾》計畫的重點來說, 這就涉及了某個文本之優勢解讀: 這就是說, 這文本可以說被納入了特定的組織, 致使它所能產生的潛在意義之範圍, 為之縮小——換句話說, 符號的潛在多義性, 事實上

不能脫離文本有其封閉性的限制。第二，我亦關心傳統的社會學／結構的變項(如年齡、性別、種族與階級)，對於意義的決定性作用，究竟有多大？這麼說是因為社會形構過程中，一個人在這些結構所佔據的位置，可以說決定了他／她近用哪些論述。這樣的企圖，等於是景隨辛士、寶笛與伯恩斯坦的中心關懷，鑽研一個社會形構的不同部門，究竟會在社會結構何等的效力下，「分配得到」不同形式的文化素養。這個計畫的設計，是要用來研究「解碼的」過程，審度這兩個面向彼此交錯滲透的情況——如此一來，筆者希望可以避開兩種局面，其一是避免只就抽象意義考量表意的過程，不要只做符號學探討而忽略了其存在的社會歷史條件；另一方面，筆者亦盡力避免純然是社會學式的取向，避免忽略了表意實踐過程的特殊性。

## 符號學的問題

### 製碼／解碼模式

首先，筆者先要指出本研究受惠良多的製碼／解碼之隱喻，究竟有些什麼問題<sup>❶</sup>。我想，至少有三方面的難題：

1. 走位而滑向人的意向 (intentionality)；
2. 電視被當做是一個先定的訊息或「意義」輸送帶，這個模式並沒有將電視當作是在(in)表意實踐中，或是透過表意實踐過程時，對於意義生產的理解；
3. 原先很有可能是分立的過程，卻在「解碼」這個字眼下，變得模糊了。

---

❶ Parkin, 1971。尤其是第三章，帕金的模式日後為霍爾修正後，應用於媒介閱聽人的分析，參見 Hall, 1973。



## 意向的問題

這裏所需注意的問題，在於分析焦點很輕易就可能從文本質性的檢視，滑向發掘送訊者或任何特定訊息的作者主觀意向。這樣一來，我們也就沒有充分地掌握到，文本的意義經常免脫於作者意識以外，而這樣的模式也就隱然滑落至混淆的地步，混雜了文本意義與作者意向。這個難題在「優勢解讀」（關於這點，詳見下文）的問題上，重新又出現，而這個概念又隱然在廣電人員身上，引發了意向的問題<sup>②</sup>。致使事態更為複雜的是，廣電人員是自有其意向：他們的意向就是要「有效地溝通、傳播」、「確保平衡」、「娛樂並作告知」等等。我們也必須知道，這個層次的意識，其意向與行動的本身根本就運作於潛意識的整套意識形態框架中，受其限制而不自覺。這點正是阿圖塞(Althusser, 1971)有關意識形態之深邃無意識本質的論據。不過，誠如霍爾所正確指出<sup>③</sup>，我們亦應記住，阿圖塞廣為引述之箴言的結尾語，對此另有其見地——彼處，他指出，正是「在這個意識形態的無意識陣中，人取得了特殊無意識的那個新形式，而我們稱之為『意識』」。誠如霍爾所說，「廣電人員的意識必然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領域，因為他們的存在（意向的位階）並不是其他事務的起源，正巧相反，這個意向的位階實乃由意識形態這個領域所製造的，而意識形態，當然是意向以外的東西」。筆者所進行的“全國觀眾”研究計畫則將這個領域（廣電人員的專業意識形態），摒除在外，筆者以並不輕鬆的心情，先將它存而不論。

②參見 S. Hall *et al.* 的 'The unity of current affairs television', CCCS, no. 9,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1973; 亦見 Brunsdon and Morley, 1978。

③S. Hall, 'Once more round preferred readings', mimeo, CCCS, 1978。

### 意義的輸送帶？

讓人不悅的是，製碼／解碼的隱喻相當接近於早期傳播的一些模式，至少這是因為人們可能認為這個隱喻，隱設了一則訊息的某些概念，以為訊息首先形成（於作者之心中？），然後緊接著被製碼成語言而作傳輸。這就引發了意識與語言之關係的種種問題（這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尤其是，隱含其下的概念是語言僅只是傳送訊息的「工具」或機制，而不是將語言當作是意識賴以生發的媒介。這樣一來，意識之表意可能性，其範圍雖然受到了現有語言形式之結構化限制，但這個問題並不是人們注意的焦點<sup>④</sup>。何況，這個模式也造成了另一個印象，讓人以為形式與內容可以二分，這實在相當不好——因為在此認知下，只有訊息的內容才是重要的，而根據這樣一個模式的認知，所謂訊息的內容在製碼成為語言形式以後，自然就可以供他人使用。但這樣的（譯按：一個模式，這樣的一個認知，這樣的一個隱設，）實在是忽視了語言形式的轉換效果——這裏的意思是說，經由不同語言形式而製碼的「相同」內容，必然具有不等的意義。

### 「解碼」

由於解碼這樣的概念，指涉的是閱讀一個文本的「一個單一行動」，它很可能混淆了許多原本應該分開處理的一些過程。涉入其間的也許是一「整套」過程——注意、認知其相關性、了解、詮釋與反應——「所有」這些步驟，都可能是一個單一觀眾坐在螢光幕面前，必須面對的情境。即使沒有造成以上的混淆，「解碼」這個模式似乎至少模糊了兩

<sup>④</sup>Voloshinov, 1973。

種軸線的分野，一個軸線是符號之了解／不了解，另一支軸線則是同意／不同意；這是因為這些符號所能夠創生的命題意義，具有眾多形式。

### 優勢解讀

提出這個概念，目的是要連結兩端，一端是關於霸權之一般性／理論上的論據，再一端則是傳播、溝通交換過程之特定的／經驗性的觀察。這裏所遭遇的問題在於，整體地看，霸權被當成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人們寬泛地使用這個概念，用以指涉建構「主流意義」的整個文化過程——但其特定的一些過程究竟為何，卻並沒有任何細膩地檢驗。進一步言，這個概念的提出與開發，部分目的是讓人在兩個同樣是令人不盡滿意之立場，尚有定向可供導航。可以這麼說，這個概念的目的之一，在於避免讓人以為一個文本只具有或只能強加一個固定的意義：畢竟，這樣的觀念無法與實際狀況配合，因為證據顯示，文本之詮釋確實不同，不是只有一種。另一方面，霸權這個概念也想要避免讓人以為文本完全開放而任由讀者詮釋——文本不只是讀者建構意義的場所。後面這一種「讀者就是作者」的論事立場，似乎統合了具有明顯差別的「使用與滿足取向」，以及巴特的《文本的愉悅》（*The Pleasure of the Text*）之取向。不管是兩者的哪一個，都已經完全不再認為文本組織之特定形式，實乃限制了意義的生產：前二者認為，文本的內涵變成了無窮無盡，向所有的詮釋可能性，同等開放。面臨這等兩難局面而另闢蹊徑的企圖，在下列廣為周知的引語，表露無遺：「閱聽人製造意義，但遠非從心所欲，而是必須根據生產者已經先行挑選、已經以特定方式組織得出的材料，再做因應」。依此論事，則它企圖援

引使用與滿足理論，強調讀者行動，但與此同時，它也引進現存社會歷史條件，將行動放進這個背景看待——所以，讀者的地位仍然是在從事生產性工作，但其工作條件已先被決定，不是他所能自行選擇。歷經以上說明，筆者仍然要指出，對於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分析新聞及時事新聞來說，雖然「優勢解讀」這個概念舉足輕重，但它引發了一些問題。

第一個困難是，一旦我們想要將此概念挪做他用，從新聞／紀錄片／時事等文本的分析，轉而分析其他形式的文本，則麻煩隨之而來。比如，假使我們企圖要圈定某虛構文本的優勢解讀——那麼，（相較於“全國觀眾”這個節目主持人的框架陳述）有哪些文本特徵可以讓我們說，關於某連續劇的優勢解讀已經出現？或許，優勢解讀這個概念的適用對象有其限制，而最適用於那些聲稱自身的描繪均與事實陳述有關。等到我們想要將它適用於虛構情境，並將「優勢解讀」等同於「敘事的封閉」（或論述的科層結構），則我們總是在冒險，可能會將一個虛構的文本，化約作僅只是具有實質意味、但卻平庸的陳述，然後將之稱為「意識形態」工具。但明顯的事實是，具有實質意味的命題、陳述這個層次，並不能窮盡所有的意義。所以，舉個例子，一齣電視戲劇的封閉性敘事，可能激生的優勢解讀方式，大有可能與同一劇碼（文本）的其他場面與要件，處於緊張關係，因為後者可能戳穿了「封閉」（譯按：使之產生缺隙）。

其次，優勢解讀這個概念的地位若何，也是問題。優勢解讀難道是文本「本質上」的屬性嗎？或說，我們透過某些足資辨認的程序（以及「技巧有致的解讀方式」），可以「從」文本將它解讀出來？或者，所謂的優勢解讀是分析家所預測的那一時刻，大多數閱聽人將從文本得出

的解讀方式？簡而言之，所謂優勢解讀究竟是文本的屬性、分析家的屬性，或是閱聽人的屬性？

再者，我們亦須決定，優勢解讀是不是可以歸因於某套特定的文本特色（意有所指的封閉性等等）——換句話說，是不是可以歸因於文本當中，整套分立有致的要件？文本與封閉性之間，界線是否清楚可辨？相連成氣的這些符號，是否除了這些（分立的）封閉性以外，構成了具有無窮無盡之多義文本？此處我們遭遇了一個問題，亦即一旦我們要將佛羅史諾夫的概念（多音性〔multi-accentuality〕）從符號這個層次，轉移至文本這整個層次時，我們大可以說，文本所具有的多義性，截然不同於說一個特定字眼或影像所具有的多義性。後面這個陳述相當合情合理，這也是為什麼佛羅史諾夫說字詞是符號，在一定範圍內有其潛在意義，佛羅史諾夫並不說信號具有固定的意義。情形確實如此，這是因為在不同脈絡下，字詞或影像可能製造出不同意義——而這裏所說的主要脈絡則是其他字詞與影像。除了特定一套的（分立）文本之封閉性以外，文本是具有多義性的，這麼說固然沒有錯，但卻忽略了一件事實，此即文本亦由建構而來（套些索緒爾〔F. Saussure〕的術語，一個文本的造成，是若干典範配套的選擇，以及這些選定之要件結合整編成為文章構成單位的結果）。在分立的符號／字詞／影像之間，建構文章構成的關係，其實也就已經（在文本封閉性開始成形之前），縮小了這些符號各自分開獨立時，所可能具有的潛在意義之範圍。

所謂多義性（譯按：與否及其「多」的範圍）在分立的眾多符號被組織而成爲文本時，已經先被結構化而有所局限了，但目前關於「優勢解讀」的形構，似乎略過這個層次的問題而不談——這種談法好像是說優勢解讀純然而排它地運作於文本組織這個更高的層次，是「框架」

設計等等所致<sup>⑤</sup>。舉個例子，在一則新聞報導裏，同時出現「黑人／年輕人／街頭／犯罪」等字眼，已經先行縮小了各個字詞獨立存在時，所可能具有的潛在意義或參照點的範圍——在該則報導受此框架圈定而成形之前，你我所接觸者。果真如此，則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的優勢解讀並非、或至少並不只是單獨由分立的各個文本機制所激生的，雖然《每日電視》這本書（譯註：曾經不當地）如此認為。

### 語言形式與意識形態意義

原先，推動“全國觀眾”這個研究的假設是，特定語言形式與特定範圍的意識形態兩者之間，具有結構性關係。不過，先是在接觸了佛羅史諾夫的著作，後又受惠於論述分析之後，這個研究的重心有了移轉，筆者轉而想要了解語言形式與意識形態意義之關係，究竟如何變化。造成這個轉變的重點因素，在於筆者已經了解，放在不同脈絡，相同的語言形式可以產生不同的論述功能；反之，在特定脈絡下，不同的語言形式可能發揮相同的論述功能。後面這個論點似乎呼應了尼爾那段雋永的論點<sup>⑥</sup>，他提及形式特徵不同的兩部影片（一部被界定為「宣傳」，另一部則被界定為「寫實」），可能具有同等的論述功能（放在納粹德國的脈絡，二者均具宣傳功能）。此處浮現的問題是，如果這個論點能夠成立，則它反而會造成規避有理的現象，亦即避開形式及功能／意義之特定連結類型的探討，反倒變成可以接受了。換句話說，以上所言體認了一個理論上的可能性，此即特定的一個語言（或說電影的、電視的）形式，或有可能在不同脈絡中產生不同功能；但這樣的一個體認反倒

<sup>⑤</sup>關於這些論點，筆者特別要向 Tony Trew 致謝。

<sup>⑥</sup>Neale, 1977。



壞了另一樁事，它變成了護身符，每當我們難以或無法找到形式與功能之間，在經驗上確實存在著結構化的關係時，前句的提法剛好被拿來當做藉口。依此論事，假使我們發現語言形式 X 並非在所有情況下的所有時間，都產生了意識形態的意義 Y，這也並不意味語言形式 X 可能以均等的機會，傳達各種類的意念。總是會有一些主流，佔據支配地位的連結類型，有待解釋（參見 Fowler, Trew et al. 等人的著作）<sup>⑦</sup>。

現在，假使我們再翻查“全國觀眾”觀眾研究計畫的實際演練狀況，則當不難發現，該計畫顯現出來的一些缺失，全部與前述困難有關。第一，它確實只集中於分析，對於特定訊息之孤立要件，觀眾如何反應，尤其是只分析孤立瞬間中，觀眾在意識形態方面，針對特定訊息所做的反抗。就此而言，《每日電視》所展示之論述的複雜性（我們企圖從中確認“全國觀眾”論述之主題核心），根本沒有在閱聽人研究當中，得到應有的對待。依據節目分析之定義，該則風格具在而井然有序的論述體系，在若干程度內，已經被化約／被剝筭而變成觀眾訪談之諸多構成要件——然後這些要件又等於是提供了證據，顯示我們是把“全國觀眾”論述當做「一筆一筆」孤立的單元，而不是將它當做是一個井然有序的體系而產生反應及詮釋。

一旦我們回想起“全國觀眾”研究計畫原先自稱的目標，則這些問題顯得尤其相干。筆者在《“全國觀眾”的觀眾》這本書提及，我們必須將受訪者的實際言談，整個當做原級資料，而不是僅只處理其實質內容（譯按：卻又棄形式、表意脈絡等於不顧）這麼立論的前提是，意義取決於表達的形式：粗糙地說，回答「不」、「你生活中所沒有的」與

---

⑦分別參見 Kress and Hodge, 1979; Fowler et al, 1979。

「糾雜成堆」，雖說很近似，都包含了負面的意思，但用做回應一個特定問題時，很可能意指不同東西。基於這層考慮，當時筆者論稱，我們必須探討「受訪者語彙與言談形式，以及媒介之語彙及言談形式兩者之間的吻合程度」。不過，筆者雖然信誓旦旦，聲稱必須處理語言形式之問題，但整個研究卻滑了位，形式的問題變成了邊緣題旨，而整個主要的焦點已然轉至文本所顯露的意識形態叢結，在多大程度內，相容於或歧異於不同部門觀眾所接合之意識形態叢結。

## 社會學方面的問題

閱聽人研究所援引的社會學方面的問題叢結，亦有一些困難。雖然研究所想要了解的是年齡(age)、性別、種族與階級等結構所造成的影響，但只有階級這個項目得到略近於系統性的處理。種族與性別是從一個相當「特設的」基礎，被舉做解釋的因素；年齡是提到了，但並沒有深入探究它是否是一個結構性因素。很顯然，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年齡及性別這些面向，對於“全國觀眾”及婦女在家庭領域地位之建構，尤其是具有重要性。最低限制來說，這等於是過度強調了一個結構性因素，但卻犧牲了另一些結構性因素。

但是，筆者雖對此有些體認，但卻也不會因此而認為我們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窮無盡，亦不致於認為所有這些因素，具有同等效力。所以說，我們可以說，並沒有什麼「先決的」理由斷定我們必須停留於年齡、性別、種族與階級——因為決定了解碼實際過程的因素，不一而足，從宗教、地理，直到個人傳記都是。沒有「先決的」理由反對無止無盡的加長這個結構變項之名單，這是一回事，但另有可觀的經驗性證據顯示，是有一些因素具有更大效力，足以決定一整個範圍的

文化論述及實踐過程，這又是另一回事。根本以言，這是一個無法純粹從理論角度解答釋疑的問題，唯有出以經驗性證據，才能斷其是非。眾多結構因素與諸般文化實踐之間，其複雜關係的類型究竟若何，有賴精探細察，而“全國觀眾”的閱聽人研究僅只浮光掠影，對此，筆者只能頷首稱是；若要知道什麼才是發展有致，對此關係之探究，才是植基於更為堅實龐大的經驗性資料，則請參見寶笛的著作<sup>⑧</sup>。諸如此類的關係僅能說是具有或然的概率，事理至明（換句話說，位居社會立場 X 的人，近用一個特別形式的文化素養，也只是比位居 Y 立場的人，「來得有可能些」而已）。我們必須知道（只有透過經驗性觀察才能得知）的是概率的結構。誠如馬特拉所說，「觀察經驗性事實，非常重要，不能僅只是聽任唯經驗是重的人（empiricists）為之」。

實情甚明，《“全國觀眾”的觀眾》這本書對於階級的形構，很有問題。整體地看，書中對於「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這些術語，僅止於描述而沒有解釋。部分原因可以歸因於本研究最初的計畫，是根據帕金、或說脫胎修正了帕金的階級結構之模式——而究其實，它只是一個職業位置的模式（許多方面均相同於主計處的類目形構）。隱設其後的是韋伯式的階級概念，僅以所得／市場／消費領域做為界定階級的基礎，而不是從生產關係的角度界定階級。其次，經驗上可以觀察得到的團體，它們與階級概念的關係若何，亦是問題。在筆者那項研究裏，團體的地位往上指涉，以至隱然具有一個代表性的地位：它們已被當做是社會各部門的代表——就此而言，即是階級的代表。實質以言，由於這裏所研究的樣本很小，則它所得到的結論是否可以概括化，

<sup>⑧</sup>Bourdieu 刊登於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 (3), 1980 的論文，尤其值得參考。

不無疑問，我們實在不好說這就必然代表了這些團體的本質——我們只能說，這些團體具有潛能，可以略作示範性展示。

## 重新修正解碼模式

脫胎自帕金的意義體系之模式<sup>⑨</sup>，實乃根據若干假設而來，在踏前一步，探討它與這個領域是否相關之前，我們必須先對這些假設再作澄清。第一，這個模式假設研究者處理的對象是廣泛意義之下的政治傳播形式。解碼立場的範圍究竟有多大，則是根據解碼者的位置與社會之中央／主流價值之關係而定——換句話說，取決於這個「中央價值體系」所關建的立場／定義，究竟與行動者保持了多遠或多近的距離。根據這個模式，到頭來，它自身所處理的訊息其實是由這個價值體系所指定的。

最先開啓解碼模式這個面向的是戴爾（Richard Dyer），在評論“犧牲者”（Victim）時<sup>⑩</sup>，他說，如果文本之優勢解讀似乎並不能現成地套用主流符碼，那麼，利用那個模式探求文本關係，困難也就出現了。其次，由於解碼模式的分析焦點，擺在探討不同部門的閱聽人，如何根據文本之實質意識形態主題或問題叢結之差異，而被安放在不同的位置，卻沒有合宜地探討這些部門的閱聽人，如何根據文本本身而轉移位置——不要忘了，是有文本的形式以後，這些意識形態主題才能找到接合的場域呀。善事作此區辨，則衍生自帕金的解碼模式之算術失誤，也就被戴爾很正確地指正了：假想狀態的「解碼立場」應該是六個，不是三個。重新做此接合，首先是體認了觀眾對於做為一種特

<sup>⑨</sup>參見 Parkin 前引書：Hall 前引書。

<sup>⑩</sup>Dyer, 1977。

殊文化形式的文本，其反應可能正面，也可能負面——他們享受著文本，覺得為文本所煩，或是體認了文本與他們之關懷，自有相關？戴爾認為，我們必須先行回答這些問題，然後才能探討對於文本的諸多意識形態命題，他們究竟是「贊同、反對或局部贊成」。基於這點認識，帕金模式的三個類目，均須沿此面向再做區分，於是主流、協商與對立之解讀方式，又各自有兩個版本。究其實，這些重新構建的工作，只不過是拆解隱藏在「解碼」模式背後的諸多困難而已。筆者下文想要建議的是，如果我們移轉對於解碼模式架構的關注之情，投入類型理論(genres theory)，則我們或有可能得出一個文本／閱聽人之關係模式，更具有彈性，並且比派生自帕金的模式更具有適用性。這似乎涉及了兩個步驟。第一，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處理的主要對象，並不是外顯傳播之政治面向。第二，我們所必須處理的情況，更可能是解碼過程時，解碼者覺得相干／不相干、了解／不了解的面向，而不是直接詢問解碼者接受或拒斥實質的意識形態主題或命題。

在我看來，踏出這些步驟以後，我們或許得有空間，以文化人工製品之類型(genre)這個更為具有彈性的觀念(比如，由雷爾〔Tom Ryall〕所提出者<sup>⑪</sup>)，取代帕金「意義體系」的概念。就此而言，雷爾認為，我們應該將類型當做是生產意義所遵循的成套規則——眾多符號排列組合而成為特定的範型，自有規則加以模鑄，而這些範型則規範了作者所生產的文本，並且也規範了閱聽人對於文本的解讀。如果做此代換，我們也就找出了一個提煉更為精良的概念，以社會形構中展現出來的類型形式與文化素養之複雜庫譜，取代解碼模式的三個符碼。

<sup>⑪</sup>Ryall, 1970。

### 由意義體系而至類型 (genres)

以上所提的事例，或許也有可能僅只是換湯不換藥，術語是變了，但概念仍然沒有廓清。但既然已經往這個方向移動，筆者將再試著指出，歷此重新轉換以後，可能涉及什麼樣的重點轉移。筆者將借用馬特拉關於文化帝國主義 (cultural imperialism) 之論述，並將此一論述與柯亨與羅賓 (P. Cohen and D. Robbins) 關於青年文化的研究，相提並論以做觀察●。

馬特拉認為，認為帝國主義以單一同調的方式「入侵了」一個社會的不同部門，是一個早就應該放棄的觀念。他建議我們另謀出路，以一個更為精確的分析取代之，此時強調的是社會的特定部門或環節，迎合或拒斥某個範圍的不同特定意識形態形式之「滲透」。假使我們移用這個論述邏輯，將其論述適用對象縮小至國境之內的脈絡，則我們可以將馬特拉的基本論點，轉換而用至柯亨與羅賓關於青年文化的研究。柯亨與羅賓關注的是，眾多文本的一個類型(功夫影片)，為什麼特別地在社會的一個部門(都會區／勞工階級／男性／青年人)，那麼受到歡迎。他們的論點是，該類型流行受歡迎的原因，是爲了它與該團體所能使用的文化素養 (cultural competence) 之形式「吻合」。

現在的問題是，兩位作者並沒有真正解釋爲什麼會有這樣的吻合：他們只是說，這些小孩「在無意識下認知了這些電影的敘事風格或文法，竟然與他們所有者相同，因此他們也就能夠『不費吹灰之力』地『解讀』這些電影」。然而，若說要做爲合適的解釋，「敘事風格」或

---

●參見 Mattelart and Sieglau, 1979; 以及 Cohen and Robbins, 1979。譯按，關於「文化帝國主義」較周詳的討論，請見 J. Tomlinson 的 *Cultural Imperialism* (1991)，中譯《文化帝國主義》(1994，馮建三譯)，時報出版社。



「文法」這類字詞與概念，不是很明顯必須再做精確表白嗎？好啦，此處我們確實可以整理得出一個有用的論點。柯亨與羅賓並沒有說，這純粹只是一個客觀對應的問題，並不是說電影的內容與居住在都會惡環境的經驗，兩相對應——果真如此，則不啻是「等同契合」了（identification）。反之，他們論稱，緊要的因素是「集體再現」之兩個形式的連結——勞工階級文化的某些口語傳統之形式，以及媒介所製造的某些類型——換句話說，對應的是形式，不是內容。此時，他們的論點是，就此事例而言，由於這些小孩能夠使用這些口語傳統所建構的文化素養形式，因此，他們也就以此使用這些電影——如果沒有這些形式的素養，則這些電影大受歡迎的原因，也就不可理解了。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英語研究小組」曾以「女性羅漫史」為題，提出類同論點<sup>●</sup>。以此例來說，研究人員企圖找出某些小說類型的「敘事文法」，以及學校中英語教學（一個歷史制度之內，一種特定文法的實踐），兩者之間是否有某些形式的對應關係。再次申明，以上做法的企圖，主要是要找出各種論述之連結形式，看看在命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哪些特定類別的讀者，可能鍾情於哪些特定的文本形式。

以此取向研究文化消費的形式，明顯已經貼近寶笛的著作。舉個例子，寶笛論稱，如果沒有經由非正式的資產階級之養育而獲得文化素養，則你也就不能領受藝廊、歌劇院等等的內容。可惜的是，一般說來，這個論點僅止於關注高雅藝術的部分，亦即寶笛想要找出，社會結構之中，得有文化素養形式而能解讀高藝術的人口羣，其在社會結構位置的下限，位在何方。現在，我們或許能夠整理出一個更為複

---

●Hall et al., 1981。

雜的模式，處理許多不同樣態(mode)或類型的文化消費組織——由高藝術而至連續劇。不過，勾勒這個論斷之前，很值得做的是澄清(此處所論之)取向的一些基本術語，此即文本／閱聽人之關係。

走筆至此，我們或許可以重新檢視，到底一個特定的文本，如何召喚、如何建構它自己的意定讀者。不過，筆者尚須以下列數點，補充前述說法：

- 1.「文本所建構、銘記的讀者」這個概念，是指讀者與不同類型文本的關係，不是指讀者與個別文本的關係；
- 2.「意定讀者」須做專殊化，主要是用以指涉解讀不同類型文本時，必須具備的不同文化素養之形式；
- 3.情況或許是這樣的：根據魏樂門所做的區分並為《“全國觀眾”的觀眾》這本書採用，只辨別了文本所建構的主體與社會性主體，但這個區分或許並不足夠。就此而言，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英語研究小組」曾援引瑙曼(M. Naumann, 1973)的做法而進一步畫分如後：
  - (a)實質接收者(recipient)：實質而當下時空的讀者；
  - (b)意定接收者(addressee)：作者所想要傳達的對象，認定其文本將為他或她所解讀；
  - (c)接收者(reader)：一個形式的、文本所界定的實體。<sup>①</sup>

### 多種文化素養的分佈：連續劇、時事節目、電視及其「解讀」公眾

此處以這兩個領域的電視做為例子，筆者想要說明，各個例子可

---

①參見 English Studies Group, 前引書, p. 239。

以說就是雷爾所說的類型。每個類型的觀眾都必須具備某些形式的知識素養，他／她並且也必須熟悉若干慣例與手法，畢竟這些慣例與手法是構成特定一些命題的基礎或架構。所以，誠如布蘭敦所論<sup>⑮</sup>，收看連續劇的觀眾，必須對於家庭之內的人際關係之符碼，保有一定程度的素養。觀眾必須具備一種特殊形式的文化資本——依本例而論，亦即預測就家庭／熟悉的領域而言，行動所可能產生的後果，到底有多大。與此相應，若要看懂時事電視新聞，則觀眾必須在議會民主及經濟等事務，具備符碼方面的素養。此時，觀眾必須具備若干特定的知識與技能形式，因為這些節目之內，鮮少會將其報告／討論的要點明白說出。

這樣看來，假使無法使用這些符碼，那麼，內含於這些節目的特定內容／要項，終究還是無法理解的。借用這些觀點，我們非常輕易地就可以察覺，本章先前所說的文化素養之結構性分佈理論，事實上與這些觀點前後呼應。觀看、品讀肥皂劇的多種文化素養，哪些人最容易擁有呢？正是那些透過女性主義色彩(femininity)之論述，在文化上擁有特定結構位置的人。其次，觀看、品讀電視的時事新聞節目之多種文化素養，又是哪些人最容易擁有呢？正是那些透過男性色彩(masculinity)之論述，在文化上擁有特定結構位置的人（附加一筆，就後面這個情形來說，另一羣擁有這些文化素養的人，大有可能是中產階級或上層階級的白人）。霍布森(D. Hobson)曾對廣電新聞及時事新聞與性別之不等關係，進行研究<sup>⑯</sup>，柯瑞根與魏理士(P. Corrigan and Willis, 1980)的

<sup>⑮</sup>Brunsdon, 1981。

<sup>⑯</sup>D. Hobson, 'Housewives and the mass media', 收於S. Hall et al., *Culture, Media and Language*。

流行文化研究<sup>●</sup>，兩項研究都提供了論點，足以告訴我們，我們在這裏所提出的說法，很顯然是太過簡化，而實情是遠較錯綜複雜的。實情如果真是如此，則我們或許將另有領會。比如，「流行電視」整個領域的節目，假使真正是製作給女性及勞工階級的男性觀看、品讀，是這類人士的文化素養所習知的，則其可能產生的意涵是些什麼？同理，「嚴肅電視」整個領域的節目，假使真正是製作給男性中產階級觀看、品讀，是這類人士的文化素養所習知的，則其可能產生的意涵是些什麼？很明顯，以上我們僅只是描述了在思索閱聽人之建構時，我們至少必須考慮哪些因素——而至今為止，我們不但只考量了階級及性別的角色在建構閱聽人類目時，可能產生的影響，並且這些考量也還是不夠的。相當緊要的是，界定這些閱聽人類目的標準，應該是各種不同的文化素養；緊隨其後，我們接著應該做的是，這些不同的文化形式，又根據什麼樣的方式，分佈於不同閱聽人的各個部門，並與其社會結構位置產生關係。

相當有意思的是，就這方面來說，文學研究的某些發展亦曾重新對焦，專研「讀者角色」。以下這段話是引自文學界的研究，它對這個相同的問題，曾如此敘述，應該能夠照亮我們的意思：

就此而言，這個個別的讀者，其實是一整個閱讀公眾(reading public)的一部分；有此體認以後，我們或許可以說，特定的一些閱讀公眾……，其與特定作品或類型(genres)的關係，也就變成我們的探究焦點……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是，「誰讀了什麼？」假

---

●P. Corrigan and P. Willis, 1980, 'Cultural forms and class mediator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 : 2.

使我們使用更為正式的問題引伸前述問句，則我們要問的是，一個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分，如何在一個特定時候，影響或甚至決定了一個人的閱讀習慣與品味？<sup>18</sup>

筆者自己的關懷是，究竟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閱讀的方誌學」(ethnography of reading)，將會有些什麼發展。這個關懷的意涵可能有哪些，也許可以從另一個對立的方向來探索，亦即「說話的方誌學」(ethnography of speaking)，我們可以借用辛士提出的命題，看看從生產面而不是接收面的關懷，能夠給我們什麼提示：

一般見解是，所謂「說話」，只不過是語言及語言學這個領域之外的實際操作與變異而已。歷經了這麼久，大多數時候的語言學理論的發展，純然只是抽象地進行，彷彿語言能夠自外於語言使用的各種脈絡，可以置多元性之各種來源於不顧。但是，我在這裏提出說話的方誌學……我所理解的是……說話的理論是文化體系的一整套體系……它必然涉及了多元性之組合問題。<sup>19</sup>

以上這個命題的理論基礎，在某些大面向說來，實乃脫胎於佛羅史諾夫，尤其是佛氏對索緒爾的批評，因為索緒爾認為說話的行為，僅只是個人的一個行動，不是必然的是一種社會現象。若就這個命題的原則來說，它的立論原點是認為，「說」的行動及「聽」（或讀）的行動，必然是一個社會現象，此時，這個命題留給我們解決的是，對於

---

●參見S. Suleiman and I. Crossman (eds), 1980, *The Reader in the Tex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32。

●D. Hymes,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收於J. Pride and J. Holmes (eds), 1972, *Socio-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組合這些多元性的各種文化規則，我們是否有能力了解。



第三篇

性別、家庭娛樂與收視行為



## 第 5 章

# 研究發展： 由「解碼」而至觀看脈絡

本章篇幅較短，筆者打算簡略勾勒，說明“家庭電視”(Family Television)這個研究計畫，延續了“全國觀眾”那項研究的主旨。回首前塵，筆者的這些早期著作，主要的關注焦點略有下列數點可供斟酌。第一，由於“全國觀眾”的閱聽人研究，全數在受訪團體的家庭之外的場所進行，困難也就隨之而起——換句話說，這些困難起因於他們並未在其「自然的」家庭收看環境中，接受訪問；第二，相同的人可能針對不同形態的節目材料，產生矛盾性質的「解讀」，但“全國觀眾”那項研究卻沒有提供充分的機會讓我們作此考量。

現在就讓我們逐項檢視這些問題，先談看電視的脈絡這個問題。相對說來，這是一個簡單的事，因為就“全國觀眾”這個研究而言，筆者訪問的團體共有兩類，一是在其就學的院校環境，或是在其它聚合的公共場所，他們本來就已經自成團體了。這是一個明顯的優點，亦即筆者可以在成羣的團體已經存在、發揮作用時，近身訪談，但與此同時，這也是缺點，因為這樣一來，我就沒有辦法在人們日常收看電視的情境下，訪問他們。其間的問題在於，在家收看電視的經驗，相當不同於在公共場合的收視行為。確實如此，蕾米士(D. Lemish, 1982)寫了一篇論文〈在公共場所收看電視的若干規則〉(The rules of viewing

television in public places), 其中, 她提到了一些觀點, 解釋在家中以外收看電視的許多情況, 如何、為什麼不同——身為丈夫的人, 躺在百貨公司所展示而即將出售的沙發裏, 兩眼看著電視, 而他的太太則在購物; 一位婦女在餐廳進用午餐時, 收看著她最喜歡的連續劇, 或是旅客在機場候機室收看著新聞節目等等。所有這些情境, 對於收看電視來說, 均相當不同, 人們在這些場合收看這些節目, 必然不同於人們在家收看的情況。我自己的興趣已經日漸走向研究人們是「如何」收看電視的——意思是說, 筆者想要將收看電視的過程當做是一種活動, 然後再求了解。這樣的一個認知, 等於是說, 對於收看電視之過程的了解(亦即活動本身), 優先性還要高過了解人們對於特定形態之節目素材的特定反應(“全國觀眾”正是針對這個層次而進行的研究)。基於這層考量, “家庭電視”這個計畫也就屬意以家庭作為單位, 在家中訪談家庭成員——期望能夠因而能夠了解在「自然的」家庭情境下, 人們如何收看電視。筆者期望進而論稱, 我們必須將個人對不同形態節目的特定反應, 放在這樣的一個架構中, 才能理解得真確。

再看第二個問題, 關於相同的人可能針對不同形態的節目材料, 產生矛盾性質的「解讀」, 筆者所要討論的要點如下。就“全國觀眾”這個觀眾調查而言, 經驗上可以察知的特定團體, 在若干程度內, 被拿來當做是各階級的「代表」, 相應於此, 我們也可以推論說, “全國觀眾”這項研究隱設了團體中的個別反應——在此情境下, 指觀眾從這些節目取得一些特定的解讀方式——或許也可以說, 相對於整體的文化風貌, 這些反應「代表了」他們根本的、本質上的立場。所以, 舉個例子, 如果一位店員收看“全國觀眾”的「預算」單元時, 他採取了對立解讀方式, 則我們很可能就此假設, 在其他情境下, 他在另

行解讀其他節目時，亦可能採取近似的對立傾向。

關於主體被納入特定立場的過程，以及我們的眾多主體位置處於矛盾之狀態，歷來已有很多辯論，它們都已經相當貼近地涉及了此處所論及的問題。佛佳斯(D. Forgacs, 1985)在評論拉克勞與莫非(E. Laclau and C. Mourffe)的《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的戰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這本書時<sup>❶</sup>，曾經提出若干相當有趣的觀點。誠如佛佳斯所論，拉克勞與莫非確實對本質論者的說法，不假詞色而大加批評，本質論者認為個人與階級都是前後相連、首尾一貫的主體，他們的行動與意識反映了他們的基本質性。與此對峙而立，拉克勞與莫非認為，人的主體性根本不是人們行動與社會關係的來源，事實上，它是後二者的效果、結果。他們認為，唯有站在我們的社會關係之內，我們才會採取「主體的立場」，不但如此，他們還認為，我們的主體認同是具有多重面向而被「多重、泛層決定的」(over-determined)。換句話說，人的主體性是從許多不同的關係網路中建立起來的，其間各個部分只有局部地重疊。比如說，相同的一個人，大有可能同時是生產工人、工會成員、支持社會民主政黨、消費者、種族主義者、擁有自宅的人、打老婆的人，以及，一位基督教徒。拉克勞與莫非認為，以上這些「主體位置」，沒有一個可以邏輯地從此推至彼；沒有一個是「本質」而構成其他位置的基礎。

筆者的論點是，雖說拉克勞與莫非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他們或許是說過了頭，他們的主體分崩離析之說，流於過火，致而再沒有可能找到任何的連貫性。沒有一個主體位置可以邏輯地從此推

---

❶譯註：本書已由陳璋津中譯，1994年遠流公司出版。

至彼，固然屬實，但這並不是說，這些主體位置中，沒有一個是比其他位置更具力量或更具有生發之力量。這些主體位置都是處於相同的一個邏輯平面，這是事實，但就經驗法則來看，這並不是說它們都是對等的。其中的某些位置可能比另一些來得強有力，甚至有些主體依賴於其他，這些仍然是可能的。所以說，筆者可不願意自尋短路，我並不認為在不同情境下，人們將有可能對於文化對象的「解讀」或解碼，產生完全不相連屬的情況，因為這麼論斷，等於是假定情境的變異幅度，足以全部抹煞基本的結構因素。就在這裏，我們必須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或許，如果我們假想一種情況，就說有一位白人男性勞工階級的工會成員（就像是“全國觀眾”計畫所訪問的其中一位），他若是在家中收看電視，那麼，他對“全國觀眾”這個節目可能會有什麼反應？這麼一想，這個問題也就可能清楚了些。第一，在家收看的時候，由於沒有同伴店員的團體規約之支持／規範，他們感受到的壓力也就減輕，因此他們以「對立方式」解讀全國觀眾之「新聞」影帶的強度，可能隨而減輕。不過，我們還是來看看，如果他必須面對“全國觀眾”之不同題材，他可能會有些什麼反應。如此一想，或許可以說，他的勞工階級之立場促使他涉入了工會的論述，因此，儘管家中情境所提供的強度弱了一些，但他還是應該會以對立的方式，解讀第一個題目——有關最近一次的裁員。不過，由於站在勞工階級的位置，他對都會區內城（inner city，譯按：中下或下階層住居所）的房舍問題，將有一種特殊的態度，而（譯按：就英國的情況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大量印度移民的湧入，內城的文化形態在他眼前已經完全改觀了，此時，（譯按：英國）「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最能接近他在地的那種沙文式恐懼，



唯恐「他的」區域將被改變；所以，耳聞年輕黑人在街頭犯罪的案件時，他也就傾向採取種族主義的立場了——換句話說，這一次他倒是接近於優勢、主流的解讀方式了。但另一方面，由於他自己住在內城的經驗，足以告訴他，警察也不是什麼天使保姆之流。所以呢，等到下一個節目單元討論到了英國監獄暴動時，他則以協商方式解讀之，既懷疑年輕黑人也懷疑警方。看到這裏的時候，這位仁兄覺得累了，不再想看“全國觀眾”，於是他轉台收看情境喜劇，此時男女各佔據了傳統立場，而由於他生活在男子氣概的勞工階級之文化當中，他也就更為可能以優勢、主流方式，解讀那個節目。

這樣一來，我們也就看清了事實，此即同一個人在不同情境時，可能以不同方式解讀相同的素材，也有可能就不同題材，提出不同的解讀——時而採取對立，時而採取主流立場。確實，他正是「被許多論述交叉輾壓而過的一個主體」，但是，進行解讀工作的是「他」，是這一位特定的人（代表了諸如此類論述之特殊結合／貫穿方式）在解讀，不是論述以任何簡單方式在向他「發言」。反之，這些論述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庫存，讓他據以做工。

提出這一點，目的是要強調，許多早期的文化研究都帶有阿圖塞式的傾向（不消說，“全國觀眾”這項研究也是如此），流於將解碼者化約成特定結構的人格化產物，而各種論述則貫穿主體性而向他「發言」。不過，在此引發爭議的人，並不只是阿圖塞一個；許多從心理分析角度討論意識形態理論的著作，同樣擁抱這個被動的主體觀念，此際，論述建構了個人的主體性，並且這些論述又向這主體「發言」。筆者想要提出、採取一個立場，這樣的立場可以讓我們看清，儘管由於他或她的結構位置之影響，致使其文化資源非常有限，但人還是積極而活躍

地生產著意義。

粗糙地說，這也等於是論稱，《全國觀眾》這項計畫的缺失是，它認為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s, 比如，階級位置）對於文化作為，產生了直接效果。現在，筆者想要對此說法再多做一些澄清，我想要詳細地檢視一個特定的「深層結構」，如何在特定的脈絡裏，自行脫穎出繭，我也想要重新申明，人實際上是積極而活躍地實踐文化的。誠如戴爾所說，「沒有一個人能夠從他人的階級、種族、性別與性定向等等，直接推論他或她會如何解讀一個特定文本（雖然這些因素可以告訴我們，她或他可以近用哪些文化符碼）」。<sup>1</sup>同時，她或他如何考量、感覺她／他的社會處境，這也是一個問題（Dyer, 1977）。或者，複述一下沙特的話，他不是說，雖然歷史造人在先，但人究竟會如何造歷史總是另一個問題的嗎？

另一個是孰輕孰重的問題。就《全國觀眾》這項研究而言，個別受訪者針對研究者提示之各種材料的反應，是一回事；至於受訪者在未受提示前，究竟會認為這些材料與他是否相關，那又是另一回事。但對於研究者來說，是前者或是後者，應該得到較多的重視呢？如果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先處理的面向是解碼與詮釋的「相干／不相干」及「理解／不理解」，而不宜逕自探求受訪者是接受或是拒斥某些特定的意識形態，後面這個做法得自於帕金的「製碼／解碼」模式，有其根本限制，因為這個模式最後必定觸及某個特定的命題，到底是以什麼方式解碼？是主流、是協商、是對立？如今想來，筆者倒是覺得，先前“全國觀眾”的觀眾調查，應該先行弄清楚，接受調查的人，如果沒有那次的安排，有多少人根本就不會看這個節目？其次，即便他們在家中的那個時刻收看了這個節目，但如果沒有接受訪問，他們

是不是會收看特定的那個單元？事實上，針對“全國觀眾”不同團體收看其特定單元所做的訪問之前，是應該先有這些了解。簡單地說，到頭來，《全國觀眾》這個計畫所得到的成果，雖然是受訪者的反應，但他們很有可能覺得，這一系列素材並沒有什麼重要性。事實上，我們有的只是他們對於這個素材的一種解碼，因為這是在我們刻意安排下，由他們接觸的。或許，更為有趣的問題是，他們想要收看的素材有哪些，而他們並不想看的素材又有哪些。極為明顯的是，這些人到底是以主流、協商或對立方式解讀某種類型的節目，重要性遠不如他們志願之下，到底會願意收看哪個類型的節目。在這聯結點上，林德洛夫與勞德（T. Lindlof and P. Traudt）所引用的布魯默（H. Blumer，譯按：美國社會心理學界形象互動學派領導人之一）著作，說得很好；布魯默提供了一段有用的描述，幫助我們了解個人使用大眾媒介之時，涉及了哪些詮釋程序：

他們的興趣、他們對於訊息的接收或無動於衷或反對的形式、他們城府深納或純稚天真，以及他們既有的看待事物的架構，凡此種種都鋪陳了他們最初收受訊息呈現(presentation)的方式。在這些呈現之訊息，將其殘餘效果留存於經驗及行為之前，通常會先經過一個中介的階段。透過分析與批判性的判斷，個人也就在此階段進行其詮釋過程，並將這些訊息之呈現再製為不同的形式，使其成為個人的經驗。個人的這個詮釋過程則明顯受到其他人的導引，尤其是建構他的所謂「參照團體」，透過其刺激、線索、建議與定義，更是對個人的詮釋過程，產生了莫大影響。此外，集體定義的過程亦須兼顧，因為它以不同方式形塑了這些組成閱聽

之個人，究竟以什麼方式詮釋並回應來自於大眾媒介的種種訊息。

(引自 Lindlof and Traudt, 1983: 267)

就筆者看來，這裏的重點是，前段引句起首所論及的種種接收或漠視形式，相對說來，應該給予多大的重要性？誠如我已說過的，這說不定是一個我們必須探索的根本問題；至於受訪者經過特意安排在房間內，然後提供他看了特定節目以後，會做什麼樣的詮釋，應該不是問題的關鍵。“家庭電視”這項計畫所企圖探索的，正是這個線索的思考。基於這個理由，不同家庭成員或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家庭成員，到底覺得不同類型的節目，是否妥當、是否醒目，也就在“家庭電視”這項研究當中，取得了較優先的順序，而他們對於特定形態的節目素材，究竟是採取對立的、協商的或主流的解讀或詮釋，則放在第二順位，是在解答前述問題之後，再做深究。

## 第 6 章

# 家庭收視行為的性別架構

---

以下的報告涉及兩個研究問題，一方面是電視觀眾如何詮釋電視的問題，再一方面則是不同家庭如何使用電視素材的問題。

過去多年來，涉及詮釋及使用的問題，一直是不同研究傳統的專屬天下——一個來自於文學／符號學的領域，另一個則來自休閒社會學領域。這種分離區隔的形式，於事無補，而本研究計畫的設計旨趣，正是要避開這種情況，因為筆者相信，唯有採取一種更為全面的視野——亦即兼顧兩種議題的視野——我們才能成功地探索亟待回答的電視觀眾的問題。

位居核心的題旨是，這些變化多端的電視收看類型，唯有放在家庭休閒活動的整體脈絡中，才能得到解釋。先前這方面的研究，焦點都流於狹隘，不是偏向相關議題的左側就是右側，但事實上，這些議題應該合併考量：觀眾怎麼理解他們所看到的材料，以及他們收看電視時所涉及的（主要是家庭的）關係。

電視至為明顯是一個室內媒介，而收看電視至為明顯是一個家庭的室內活動，這些雖是事實，但也經常為人忽略，或只是被輕描淡寫帶過了事（被當做其他活動的既定背景），但卻沒有人直接檢視家庭收視的情況。收看電視或許是一個私下的活動——比如，對比之下，看電影

則不是——但它仍然大底進行於社會關係之內，不是自外於社會關係之外（居住在單人家庭的情況除外）。

筆者這項研究的前提是，我們應該知道，電視的基本消費單位是家庭，不是個別的觀眾。有此認知以後，接下來提出的問題是，在家庭裏面，人們如何處置電視機、如何決定（哪些家庭成員決定什麼時候收看什麼節目？），而家庭成員對於不同的素材，又是如何反應等等。簡短地說，這表示筆者企圖將個別的收看活動放在家庭關係之內，然後再做分析，畢竟看電視是在家庭關係裏運作的。

忽略了這個脈絡的閱聽人研究，自然也就不能了解有哪些重要因素，決定了收看的「選擇」及反應——亦即白天與晚上的家庭之內，權力、責任與控制分化的問題。

筆者另一個假設是，如果我們真要了解電視的使用，則必須將看電視的行為，放在其他競爭而又互補的休閒活動中（嗜好、興趣與消遣活動），一起觀察與研究，因為人們看電視之際，同樣也從事這些活動。電視明顯是一種主要的休閒活動，但先前的研究只流於將休閒的多種選擇，分開陳列看待，好像它們互不相干，但其實它們互有關聯。

## 「看電視」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不能逕自認為任何人、在任何時候收看電視，都是一個單面向的活動而具有相同的意義或重要性。因此，筆者的興趣是，隱藏在「看電視」這個描述之後的多種歧異，究竟應該如何確認並做探查？為什麼觀眾會選擇收看不同節目，而又為什麼在收看相同的節目時，觀眾會有不同的注意與理解？這項研究所探究的一組歧異，涉及了不



同觀眾收看不同節目時，所做的不同層次的注意——然而，在他們都「收看」一個特定的節目之典型說法下，這些歧異被遮掩了。

筆者想要探究兩個層次的歧異，第一是家庭之內的個別成員之差別，以及位處不同社會與文化脈絡的家庭之差別。我將論稱，唯有在這個脈絡裏（框架收看行為的社會及文化等決定性因素，這些是更為寬廣的領域），我們才能理解個別的選擇與反應。

尤有進者，這個計畫想要詳細地探究，在家庭這個相當有限的空間內，「如何」與「為什麼」收看電視的種種問題，雖然許多大型調查研究對此已有著墨，卻只是淺嚐即止，它們並沒有對收視行為的類型，提出解釋。我則希望提出一個更為精緻的概念模式，期望將看電視的行為放在家庭休閒的脈絡中看待，其間則探查下列類型的因素：節目形態、家庭位置與文化背景，他們如何相互關聯而造成了動態的家庭看電視行為。

簡而言之，我們已將看電視的行為，放入家庭生活的脈絡中探討，而眾所周知，家庭生活是一個複雜的現象。若有人期望收看電視的他或她，有如自由而完全競爭市場中的理性消費者，個別地選擇收視節目，則世上之事，再沒有比這個更為荒謬了，人在家庭中生活而有此選擇，純屬無稽。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看電視的情境有如「客廳的政治學」那般（S. Cubitt, 1985），在客廳裏，誠如這位作者所說，「鏡頭推我們向前，家庭引我們向後」，在客廳裏，與你同居斗室的人，很有可能打斷（如果沒有粉碎的話）你與「角落那個箱子」的神遊。

我們再從另一個角度衡量這個問題：「傍晚我們很少看電視。等到我的老公真陷入了狂怒時，我們才看。他回到家，二話不說，扭開電視就看。」（Bausinger, 1984: 344）

誠如包辛格 (H. Bausinger) 所說，就此例子而言，「按鈕並不是說『我想看這個節目』，而是『我什麼也不要看、什麼也不要聽』」。與此相反，有時可能是「爸爸走進客廳，媽媽坐在長子身旁，跟他一起看著運動評論。她對它並沒有什麼興趣，她只是想用這樣的機會與家人接觸而已。」(H. Bausinger, 1984: 349)

在看電視這樣的情境裏，有多大的空間、什麼樣的空間留給了家庭的哪些成員？這樣的空間究竟如何組織了起來？而這些電視機與其他傳播科技又怎麼穿插進入了這塊空間？客廳是以電視機做為組織的中心嗎？所有諸如此類的問題，乍看之下，似乎盡屬平凡陳腐；但它們對於我們了解電視如何在家庭之內「運作」，確實意義重大。誠如林德洛夫與勞德所言，「人口密度高的家庭……在欠缺隱私空間的情況下，看電視可能發揮了特種功能，具有避免衝突或舒緩緊張的功能」(Lindlof and Traudt, 1983: 262)。

### 「什麼？」與「如何？」的問題

林德洛夫與勞德另外也提出了一個基本問題，對媒介研究來說，頗具參考價值。他們注意到，大多數研究人員都集中於「『為什麼』」的問題，卻排除了什麼與「如何」……(學者)老是企圖描述看電視的原因與後果，卻沒有充分地了解什麼是看電視、看電視又是怎麼進行的。」他們的論據非常正確，事實上，單只是爲了要「讓人更滿意地理出架構……作為探究具有核心重要性的理論及政策問題之依據，我們就必須先行回答，對於各個家庭成員來說，『看電視這樣的行動還另外帶來了什麼』，這是我們必須提出並探討的問題；作為探究之資，都已經需要如此，更不用說回答了。」(Lindlof and Traudt, 1983: 262, 強調部分爲

本書作者所加)

林德洛夫與勞德企圖建構的看電視模式，必須要能夠兼顧不同的注意層次、不同組合的家庭成員、不同的角色，以及它們與不同節目類型的關係。林、勞二氏想要擺脫相因成襲的想法，他們試圖指出，打開電視機的時候，並不是所有家庭成員的生活，都同等地受其支配。另外，有個觀念認為人們「要嘛」就在家工作而有其社會關係，「否則就是」在家看電視——人們好像以為這兩種活動相互排斥、互不相干。林、勞兩人正想挑戰這樣的觀念。

## 在家選擇電視節目

與筆者有關的另一類研究來自羅耳 (Lull, 1982)，他的關注點是家中選看電視節目的情況。其他問題之外，他還問受訪者，家人看電視時，由誰選擇？而這些節目選擇的過程如何進行，最後，家庭位置與家庭傳播型態又如何影響這些活動。最根本的一個發現是，每個人的收看行為其實沒有什麼選擇性可言，因為大家看的節目，經常是家庭另外一個人選擇的。通常這就是所謂的「強迫收看」，在收看團體的人數多於一人時，這種情況絕對不是不尋常的。此處的主要發現是，選擇節目的決定通常是複雜的人際傳播活動，它涉及了個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時間情境、家中的電視機數，以及頗有規則可循的傳播、溝通慣例（參見 Lull, 1982: 802）。

循此，我們已經進逼到了權力的問題。而在任何一個父權社會之內，權力中心必然就是父親。我們必須謹記在心，了解家庭關係一如所有的社會關係，必然都是包含了權力關係。羅耳最主要的發現是，就電視機的控制權而言，以美國為例，家中成員最聽父親的話，父親

是最經常長控電視節目之選擇的人。就本質而論，誠如羅耳(Lull, 1982: 809) 所說，「控制節目選擇過程的中樞，大致上由家庭位置決定」。所以說，考量家庭的社會關係之內，電視收看行為如何進行，也就是考量了權力關係如何左右了看電視的情況，此時我們必須查核不同角色的家庭成員，他們的性別與年齡角色，賦予了他們多少「不等的」權力。

### 權力與性別關係

權力與性別關係的問題，尤其引人關注。羅耳的著作提供了一幅圖象，我們因此得知家庭之內，男性權力與看電視的關係，筆者的研究也深深印證了這個發現。尤有進者，這個問題引發了另一個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此即婦女在家庭中，很難建構她們自己的休閒時間之空間——換句話說，一塊可以讓她們免除家庭生活之壓力的空間。順此線索思考，羅薇(Radway, 1984b) 所做婦女閱讀羅曼史小說的研究成果，提供我們許多有用的對比。羅薇的基本發現是，許多接受她訪談的婦女說，她們翻讀言情小說的原因，是因為除此之外，她們再找不到任何片刻的隱私可以躲避家庭與職業生活無止無休的索求。究其實，她的受訪者似乎是說，她們覺得閱讀浪漫小說，幾乎是「一種獨立宣言」，因為拾起這麼一本書閱讀時，她有效地在她與定期的家事責任之間，樹立了一道牆圍。誠如羅薇所說：

婦女手中拿起這樣一本書時，等於是向丈夫與小孩發出了訊號，要他們尊重並且不要打擾，她等於是在說「這是我的時間、我的空間，現在讓我一個人靜一靜」。翻讀這類書可以讓婦女有如釋重

負的感覺，不再受到責任與家務的羈絆，開出一片「空間」或「時間」，讓她可以悠游自若，照顧她自己的興趣與需要。

羅薇的結論是：「閱讀愛情小說，正是婦女一種言而不宣、最爲微弱的抗議，是對於婦女身陷父權網路的不滿之表現——這樣的行爲，讓她們畫出了一塊空間，身處其間，平日家人要求她們無私服務的聲浪，於是可以短暫地拋掉。」

### 電視是家庭活動的中心

古德曼 (I. Goodman, 1983) 曾說，心理學家經常以餐桌爲分析焦點，了解家庭的運作狀況。不過，她又說，由於電視已經滲透至許許多多家庭的生活，因此，電視或許是一個比餐桌更好的起點，我們循此可以知道家庭成員如何擬定與協商家中行爲的規則。假使我們以家庭進餐的習慣爲例，也許我們想要知道的是，家庭成員圍坐餐桌方式爲何？他們的餐桌進食禮儀是什麼？以及誰端菜、烹調及準備食物，還有，誰來割肉成片？吃飯時容許談哪些話題？所有這些問題都很有價值，知道了它們的答案以後，我們也就洞悉了家庭生活。但古德曼說，分析看電視的行爲，可以給我們相同的洞見。她的論點是，由於電視在家庭生活中，佔有核心地位，因此從看電視的過程，可以看出家庭關係的規則、決策方式、衝突及支配類型。

古德曼認爲，家庭可以視作一個井然有序的管理體系，其成員以組織有序而重複的方式運作，我們可以分析這個類型，以求發現掌理家庭生活的規則。家庭的規則有兩類——外顯而明示的規則，以及內隱而暗示的規則。誠如她所說，家庭看電視經驗的研究，焦點都對準

了看電視的規則，特別是父母對其子女所可以收看的節目內容與數量等等明顯的規則。但她的觀察是，這些研究只檢視了結果，但對規則的制定過程，不置一語。或許，這些研究對於掌理家庭過程的隱含規則，並沒有那麼敏感。爲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追問，一家之內，看電視的規則是怎麼定的？誰定規則然後強制施行？這些規則是否僅只是說說而已，或是成員遵守不渝？還是協商而討價還價？

## 研究典範

本研究抽取社會位置不同的樣本家庭數個，探究他們使用電視的變動類型；本研究設計的目的是探究不同社會位置的家庭，其間差異若何，以及子女歲數不同的家庭，在下列數個項目的差異：

- (a)家庭電視機的使用類型，變異情況日見增加，不單是用來接收廣電視訊，而且用來玩電動玩具、無線電讀等等；
- (b)對於不同類型的節目，不同的反應及支持類型；
- (c)家庭內的電視使用之動態關係：家庭成員如何表達與協商看電視的選擇過程；在一天的不同時段，特定家庭成員各有不等權力選擇收看的節目；
- (d)看電視與家庭生活之其他面向的種種關係——電視做爲一種休閒選擇的資訊來源，以及這些休閒興趣與工作義務（家庭之內與之外）如何影響看電視的選擇。

整個計畫的設計，都是要用來探究並確認，「看電視」這樣的無所不包之詞語，其背後隱藏著一些什麼差別？我們都看些電視，但針對不同類型的劇碼，在什麼樣的時段，我們究竟賦予多大的注意、多大



的支持與多少的回應？此外，誠如我們稍前所指出，目前的情況是，看廣電節目只是看電視的一種可能方法，打開電視時，我們尚有其他使用電視的方法。筆者想要探討的問題，有如下述。家庭成員的哪一位，哪個形態的家庭，在一天的哪一個時段使用他們的電視？造成不同類型的因素有哪些？而受訪者他們又怎麼理解這些因素？再者，當使用電視做為一般用途時，尤其是用來看電視時，不同家庭成員在遇有衝突的需求時，如何設定他們的優先順序？如何協商、解決這些問題？簡而言之，家庭的動態過程，如何與看電視的行爲產生互動關係？

## 方法論

這裏採用了質化的研究方法，我們深度訪談每個家庭，讓他們和盤托出種種說法，解釋在其理解下，電視在他們的全部休閒活動中，角色若何？目的是要透過這個方法，讓受訪者本身界定他們看電視的活動，而我們則從中篩選洞見。最重要的是，觀眾選擇及（正面或負面地）回應不同類型的節目及其流程時，自有其標準，而筆者則想從這些標準中，找出洞見。我相信這個取向是可以從這些標準中，得出洞見，弄清楚特定的收看選擇與回應方式，究竟是什麼。因此，筆者希望這個計畫能夠做為調查研究的一個有用的補助，畢竟調查研究通常只是詳細地告訴我們看電視的類型，但並不能夠解釋這些選擇與回應方式，究竟而又是如何發生的。

一九八五年春季，我們在這些家庭的家中訪問他們。開始的時候，我們訪問父母，然後每回訪問時，我們也邀請他們的子女參加我們與父母的討論。這些訪問大概都進行了一至二小時，我們會錄音，然後再全部過錄成文字以供分析之用。

此外，我們並沒有將訪談過程結構化，目的是要讓這一至二小時的討論，留有合理的空間供做提問、省思的餘地。因此，在一些重要的地方，我在不同的訪談階段，就從不同的角度，回到相同的主題。這也就是說，如果有人(有意或無意地)「在我面前做假」，給我們一個造作／刻版印象式的人模人樣，但這卻與他們的「真正的」活動毫不相干，那麼，在歷經我們相當繁複的質詢形式以後，他們倒還真必須能夠自圓其說才行。在此過程中，一個有力的安全瓣是家庭其他成員的在場，如果先生或太太似乎誤解了對方的活動時，其他成員經常就會以質疑或反諷的語氣，從談話中插嘴進來。

### 樣本設計

樣本包括了十八個家庭，全部取自倫敦南區的一個區域。所有樣本家庭都擁有一部錄放影機，均是雙親家庭而有兩個以上的小孩(最大年齡十八歲)，全部是白人。

由於取樣的地區之特性，這項研究的受訪者包括了相當高比例的勞工階級／中低階級的家庭——並不一定以收入衡量（我這個樣本其實包括了高低收入家庭），而是指在階級的所有其他面向（文化資本、教育等等），他們均有此階級屬性。另一個研究限制是這個區域的人口，非常穩定。我這個樣本的許多家庭，有很多一輩子都住在當地（經常他們的父母輩已住在當地），因此就地理歸屬感來說，是個相當穩定的團體，他們對地方社區的感情根深蒂固——因此，對於製作背景正是他們所認同之倫敦勞工階級區域的節目，他們自然產生了強烈而正面的反應。反之，在不同地理區流動的家庭，也就無法成為我的樣本戶。筆者無意聲稱英國的所有家庭均是如此。其實，真要是高教育程度的專業家

庭，有此特性時，已夠讓人吃驚了。不過，筆者是要聲稱，穩定而少搬遷的內城區域之勞工階級／中低階級家庭，他們確實具有強烈的性別之差異與傳統的性別角色之刻板印象，這個事實對於我稍後述及的電視收看類型，深具意義。

## 電視與性別：分析架構

訪談所確認的主要主題如下。由於不同家庭提及這些主題的次數相當頻繁，我們因此可以確知這些反應，是有其連貫性。貫穿所有訪談家庭的一個結構性原則，很明顯是性別的問題。這些訪談對於性別的效果，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包括：

- 1.控制節目選擇的權力；
- 2.看電視的風格；
- 3.有計畫及漫無計畫的看電視；
- 4.與電視有關的談話；
- 5.科技：錄放影機的使用
- 6.一人獨看電視與罪惡的快感；
- 7.節目類型的偏好；
- 8.全國性及地方性新聞節目；

在進入正題，遵循這些標題所引導的方向描述這個研究的發現之前，我想先就樣本中男女的收視習慣所顯現經驗性差異，提出一些概括性的觀察。我們將很清楚得知，就他們選擇收視節目的權力、看多少、看電視的風格，以及選擇特定的收看材料等等項目來看，男女的說法，對比強烈。但是，我並不是說造成這些經驗性差異的主要原因，

出在他們身為男與女所天生具有的生物性特徵。反之，我的論點是，這些差異是由於男女在家中的社會角色並不相同，因此有以致之。其次，筆者無意廣做推論，亦即這個研究發現的家庭性別關係之特定類型（以及該類型對於收視行為所造成的所有後果），並不必然會再現於不同階級與不同種族背景的核心家庭，而即便是相同的階級或種族背景，若是其家庭類型有別，則亦不必然相同。反之，問題總是性別關係如何與不同脈絡產生互動，而在這些不同脈絡裏，性別關係又如何形成。

除了這些附加說明以外，在家庭領域之內，男與女納入其位的方式，亦各自不同，這個至為根本的論點，亦當在這裏交代。在這個社會（當然，其下它所代表的次元單位，如筆者之樣本，亦然），兩性關係的支配模式顯然已將家庭界定為一個男性的休閒場所——迥然與他們在家以外的雇傭之「工業時間」不同——而對於婦女來說，不論她在外是否有專職工作，家庭則主要是一個工作的場所。這個簡單的事實等於是說，我們在研究收看電視的行為時，我們所探查的東西，本來就是男性比較能夠全神投入的，而婦女在看電視時，則似乎註定會分些神，也就有些罪惡感，這是因為她們持續地感受到必須盡責做家事。尤有進者，這個位置等差的納進過程，在家庭日愈變為主要的休閒領域時，益發顯得具有意義。

因此，我們評估以下的經驗性發現時，必須戒慎小心，應該將性別關係所建構、結構化的家庭環境，當做這些收視類型何以產生的背景。否則，我們很可能身陷危殆，流於將這些類型當做是男女「本質」的「本然的」或生物上的特徵，而收視類型則直接是這些特徵所造成的結果。

誠如布蘭敦（C. Brunson）就此研究領域之問題進行評論時所說，

我們很有可能：

錯誤地二分……一方面認為男人是專注的、自有節度的、容不得外務干擾的、全神凝視的；而另一方面則以為女人是漫不經心的、扭扭捏捏的、本來就是很忙的看電視姿態。這些特徵自有其若干經驗性的證據加以支持，但若只是將這些經驗上的真實情況當做是解釋，則造成了理論上的欠缺、不足……電視是一種家庭之內的媒介——而前述的男性／女性的差別，確實已經接近於……人們歷來對於電影與電視所做的區分。電影這種公共領域的視聽媒介，[要求的是]陽剛男性的凝視 (gaze)，而家庭之內的「女性陰柔」媒介，則沒有那麼高的要求，觀眾只需時斷時續注目之。參酌實際證據……這個類比昭示了一種男性觀眾的形象，這些男性企圖將這個家庭之內的領域，「陽剛而男性化」。但這麼一種看電視的方式，似乎還談不上是那麼地一種陽剛模式，它其實是一種權力模式。目前我們得自於兩性研究的證據，告訴佔據有利位置的是男性。(Brunsdon, 1986: 105)

安則將這個論點往前推了一步：

女性的電視收看類型，僅能與男性的電視收看類型一起了解，兩者關係密切：就某個意義來說，兩者彼此互為建構。所以，我們稱之為「收視習慣」者，並不是一個多少是靜態的特徵，他們並非附屬於一個人或一羣人的特徵；反之，它們是一個……動態……過程的暫時性結果……男性／女性關係總是充滿了權力、矛盾與抗爭的場面。(Ang, 1987: 18-19)

因此，誠如安所論，男性與女性收看電視的模式，並不是兩個分立的領域，它們並不是分離形態的經驗，它們並非清楚界定的靜態研究「目標」，也不是任何本質的表達。反之，我們不能只是將男女看電視的差異，當做既成的經驗性事實看待，我們其實應該深究，家庭內的權力關係之結構，究竟如何建構了這些差異。

### 控制節目選擇的權力

許多家庭的例子都明白顯示，男性權力在收視選擇的衝突場面出現時，都是最後的仲裁者。（「要看些什麼呢？我們就討論了。最大者為贏。而這就是我，我最大」。）這種情況在擁有遙控器的家庭，更是如此。這些家庭當中，沒有任何一位主婦規律地使用遙控器。許多主婦抱怨她們的老公，用起遙控器就像入了迷出不了竅，按來按去轉來轉去，常常使得她們沒有辦法看些想看的節目。極具特色地，遙控器這樣的設施是父親的專擅，為其持有（如果父親不在，則由兒子霸佔），「老爹坐在搖椅拿著遙控器」，幾乎都是他在用。這件器物是濃縮的權力關係之高度明顯可見的符號：

女兒：老爸保有兩具遙控器——他坐椅兩邊，各放一個。

主婦：是啊，我哪有什麼機會，因為他老是坐在那裏，身邊都放著遙控器，就是這樣囉……我可真是惱火，因為我可能看著一齣喜歡的節目，但他倒好，四處轉換頻道想要知道是不是有個他想要錄的節目。這樣一來，節目也就隨時閃爍轉台，他也東按西按。我只能說，「老天，別再轉了罷。」我根本沒有機會使用遙控器，我近不了身。



主婦：我沒有機會使用遙控器，只能讓他專有。這真是讓人惱火，因為我可能正在看個中意的節目，而他二話不說，突然轉了台想要找球賽的結果。

女兒：遙控器總是放在老爹的身旁。如果老爹在，遙控器就跑不遠。遙控器總是端坐在那裏。

很有趣的是，這個大類型之外，主要的例外的情形發生於先生失業而太太則出外工作的家庭。在這些家庭裏，較為常見的情況是，家人期望父親讓節目進行時，隨他們的意思看節目，而他則將想看的節目錄下來，晚些看或次日再看，因為他的時間表比家庭其他在外有工作的人，還要來得有彈性。我們從這些例子可以清楚看出，樣本中大多數男子得以掌握權力的原因（這點他們的妻子亦予以承認），並不是因為他們是男人的生物因素，而是因為陽剛男子氣之社會定義所造成，此時，得有就業（employment）機會（亦即「賺錢養家」的角色）是一個必要的部分原因。如果這個條件不存在，家庭內的權力關係類型之改變，改變幅度將極為醒目。

此處尚須加註另一個論點。我們必須記住，這項研究根據受訪者自行提供的行為資料而完成，訪問之外，我們並沒有任何形式的直接行為之觀察。值得一談的是，在展示他們是「一家之長」時，許多男人顯得焦慮而無措手足，而他們的焦慮正足以顯示他們在家中的權力基礎，相當薄弱而多少是不安全的，他們的權力並不是像他們所說那般地穩固而恆久「持有」。因此，或許實質掌握遙控器這樣東西，對於他們來說，具有相當重要的象徵意義。

## 看電視的風格

另一項主要發現是，男女在描寫其收視活動的時候，方式各具特色，迥然有別。基本上，男人表示他們是很明顯希望專注地收看電視，靜靜地不被打擾，「爲的是不要錯過任何一景一幕」。此外，對於他們的妻子與女兒看電視的模樣，他們大表大惑不解。主婦說，看電視根本是一項社會活動，包括了不斷的對話，並且至少有一項以上的室內活動(如熨燙衣服)，同時在進行。確實，許多婦女都覺得，如果只是看電視，卻沒有同時做些其他事，將讓人深覺浪費時間而不可原諒，因爲她們總覺得做家事是她們的義務。看電視而不做其他事，她們鮮有這種經驗，除了偶爾與女性朋友作伴，一起設法弄個場合，讓她們看想看的節目或錄影帶。這些主婦意識到，她們的先生總是「隨時準備要她們」住嘴，而這些男人也無法真正了解，如果她們同時在做其他事，爲什麼他們的太太還能跟得上節目的進展：

男：別說話。要說就讓他們說一些。

女：你就一直說「噓」。

男：看電視的時候，如果有人說話，我就沒法集中精神啦。但她們可以啊，她們可以邊說，同時又邊看。我們就只能看，全神專注。如果你張嘴說話，你可就失去了真正值得看的東西。我們每句話都聽。如果你邊看邊說，你可就要漏了重要的一些東西。我的態度是，要說話，「那就到別的房間去」。

男：這些傢伙(他的妻子與女兒)可以邊說邊做事，又兼顧節目，真叫我吃驚。在我看來，你要真能那麼做，那可不是什麼好事。

女：因為我們讓電視一直開著，電視就像是第二個自然一樣。我們看電視，同時又聊天說話。

女：我打著毛線，因為如果只是看的話，我覺得是在浪費時間。我知道節目在幹些什麼，所以就保持一瞥即可。

女：如果想不起其他事，我就全神看電視。我不會只是坐著看電視。我很有可能做些裁縫、做些針織。我很少只是坐著看電視——這根本不是我的習慣嘛。

女：總是有些其他事要做，比如，熨燙衣服。燙衣服的當兒，我們什麼電視節目都可以看。我總是邊熨邊織……妳總有些事要做，妳也知道，妳總不能就一直看電視。妳會想，「嘔，我的天，我該早就做這做那囉」。

布蘭敦的說法，對於我們了解這裏所報告的情形，頗有助益。誠如她所說，並不是婦女不想專注好好地看電視，而是她們的家庭地位，使她們根本不可能如此做，除非家庭中的其他人「都不妨礙她們」：

男女社會關係（譯按：的不平等）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儘管男人覺得在家看電視時，強行將自己的意願加諸全部家人，沒有什麼不對勁，但女人可就無法這麼覺得了。主婦已經找出了各種技巧，她們有辦法對付他們並不怎麼喜歡的電視節目……不過，一般說來，女人幾乎覺得不可能就只是像男人那般，靜靜地坐在電視機前，以電視為伴。她們是經常談及很想做這做那，但真要這麼做，總是必須以其他家人不在家為前提，這個事實，具有甚深的啟發。

（Brunsdon, 1986: 104）

我們再次從這個例子看出，這些獨特的看電視風格，並不只是男與女的生物本然特徵，反之，它們彰顯了家庭中，後天的陽剛與陰柔之角色的特徵。

### 有計畫及漫無計畫的看電視

整體看來，得有權力能夠對照報紙(或無線電讀)，然後計畫晚間的電視收看的人，是男性。很少有女人能夠得有這種權力，例外的情況是，主婦有時會預先知道哪些晚間哪些時段有她們喜歡看的連續劇，但若是如此，她們也就無須查看節目表了。事實上，這也顯示了整個看電視的態度是有不同。許多主婦都是多少抱著有就看、沒有就算了的态度，如果錯失了些什麼(除了她們最愛的連續劇)，她們可是一點也不在乎：

男：正常情況之下，我會把報紙看過一遍，因為妳(他的妻子)習慣於扭開「獨立電視網」(譯按：英國播放廣告的電視網之一)就看，但有些時候其他頻道另有些好看的節目，所以呢，我就做個記號——就像電影與運動等等類型的節目。

男人習慣於事先預作看電視的計畫，另有一個極端的例子。有位男士，在有些方面，表現得跟古典的利他主義者無異，直想要將快樂商數極大化，他的計算依據是收視的選擇與節目時間的估算，對照標準則是錄影帶是否有同等節目可供觀看等等：

男：我把今晚 BBC 的節目錄了下來，因為今晚是“朱門恩怨”(Dallas)呀。我是喜歡“朱門恩怨”，所以我們就從“河東岸的人”(East

Enders) 開始看……然後他們就放了“艾美達農莊”(Emmerdale Farm), 因為我喜歡呀, 我們接著又錄了“河東岸的人”, 這樣一來, 我們也就什麼都不會錯過了。反正, 通常我都是在星期日看的……我全把它錄在影帶上了。我並沒有在報紙上做記號, 但我知道有些什麼要上演。比如, 今晚是“朱門恩怨”, 然後九點是“寡婦”(Widows), 接下來依序是“布魯白克”(Brubaker)與新聞。所以囉, 錄影帶還真得一直錄下去……七點半演什麼? 嘔, “人生如斯”(This Is Your Life) 與“卡羅內辛街”(Coronation Street)。我想錄BBC 的節目要好一些, 因為沒有插播廣告的緣故。我們會錄下“人生如斯”這個節目, 畢竟只有半小時, 而“朱門恩怨”則有一個小時, 所以你只能錄個半小時……呀, 如果週二你看的是另一個節目, 你等於是必須從中途來過。我倒覺得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就看九點整的新聞……是啊, 週二九點是有一場電影, 所以我怎麼辦呢? 我把電影錄了下來, 以便能夠看“邁阿密風雲”(Miami Vice), 所以我可以稍後再看電影」。

——或者呢, 就像他在另一個時候說的, 「晚上這段時間, 我翻看了一遍報紙, 然後把我所要看的節目全部圈選出來」。

## 與電視有關的談話

訪問實況顯示, 主婦比較沒有那麼不願意「承認」她們與朋友或工作同伴談天的時候, 也談些電視。但很少有男人(參見下列的例外情況)願意承認他們常與朋友談到電視。這種情形似乎是說, 男人不願意承認太常看電視(尤其不願意承認節目重要到了值得一談的地步), 是擔心他們

的陽剛男子氣概因而受損(參見下列的節目類型偏好)。唯一的例外是男人直言他們喜歡電視上的體育節目。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根本就是女性之陰柔遠比男子之陽剛，還要來得適合於當做一種文化的表達模式。所以呢，即便婦女看得少一些，看的時候沒有那麼專注，她們卻仍然比男人更經常談些電視的事，儘管男性看電視的時候，神情更為專注：

女：其實，我媽與姊姊並不看“朝代”(Dynasty)，而我經常告訴她們一些劇情。如果我的姊姊收看，她會喜歡的。我就問她，「妳看了嗎？」她說沒有哇。但如果有天晚上的節目特別好，妳或許可以猜想到朋友可能對妳說「昨晚有沒有看某某節目啊？」我有好幾次錯過“朝代”。我就問朋友，「有什麼進展啊？」她就補述了一翻，但我總是跟著多數影集的發展。瑪莉安一直讓我了解劇情，不是嗎？她一直告訴我發生了這、發生了那。

男：有些時候我也許會提些電視上的東西，但真地，我可從來沒有與人談電視什麼的。

女：工作的時候，我們經常地談些“朱門恩怨”與“朝代”的情節。我們就一路數過去，挑出我們喜歡的與不喜歡的，然後想想下回會是什麼樣的光景。就是一般的談談聊聊啦。我的工作同伴是些女生，所以我們可就談開了……（工作的時候）我們確實有些真有趣的討論。電視以外，我們沒有什麼共同話題，因此我們談電視談得很多。

女：我走過同事旁邊，她就問了，「昨晚妳看了“卡羅內辛街”嗎？」然後我們就坐著討論了起來。我想大多數婦女與年輕女孩都是這樣的。我們總是坐著，話就跟著出夾「妳覺得她昨晚做的事是對



的嗎？她做了什麼？」或者，「我鐵定不會這麼做」或是，「這樣一來，她不就屈從於他了嗎？妳想他是不是會……覺得下一步該怎麼做？」我們就這樣奇思幻想，第二天我看到她時，她會說，「妳說得對」或是「怎麼樣啊，我不這麼告訴妳的嗎？」。

女：學校一些媽媽見著我就說，「最近有沒有看些好看的錄影帶啊？」

“皇冠寶珠”（Jewel in the Crown）播出的時候，是呀，我們就談了起來。如果看的是大史詩式的作品，或是大系列，我就會談這些東西。

男：工作的時候，我不會談到電視，除非有拳賽之類的節目。“卡羅內辛街”或“班尼山”（Benny Hill）等等節目，我是不會去談的。

在這概括類型之外，只有一個例外。情形是這樣的，這個例子的婦女，並沒有比其他婦女更不願意談電視節目，而是她的節目品味，與她居住地區的婦女之品味，不能相容。不過，這位婦女在描述她的困境，以及她不同的節目品味如何孤立了她的社會接觸時，她倒是很清楚地告訴了我們，為什麼住在同一區的大多數主婦，花這麼多的時間談著電視：

女：我所認識的婦女，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在家料理家務的，她們必須照顧小孩，這麼一來，唯一可以談的就是家事，或者電視——因為妳哪裏都沒有去，妳就什麼也不能做。她們總是說她們的小孩昨晚做了什麼，要不她們就談談電視——因為除此之外，她們再沒有什麼可做。

我們大可認為，許多男性受訪者自稱他們只看「事實性的」電視

(參見本章稍後)，根本就誤陳了他們的真實行爲。不過，即便如此，有趣的是，爲什麼男性受訪者竟要如此遮遮掩掩，覺得有這股驅力，直讓他們非以這種特定方式解釋他們的真正行爲不可？尤有進者，滿腦子不願意談他們看的節目，本身具有重大意義。即便在實際生活裏，男女收看的電視節目，範圍相同（而根據我的訪談，情況並非如此），但除了事實性節目或運動節目以外，男性既然不願意多談，這就已經表示他們看電視的經驗，迥異於樣本中的女性。由於意義的產生，並不只是在個人收看時形成，而是受到其後的討論與「消化」所看材料之社會過程的影響，因此，男人消費電視材料的光景，必然與他們的妻子大大地不同。

### 科技：錄放影機的使用

我所訪問的主婦當中，沒有一位廣泛地使用錄放影機，她們都靠先生或子女幫她們用錄放影機。就像遙控機一樣，錄放影機大抵是父親與兒子的專擅持有之物：

女：有些我想要看的東西，但我對影帶的了解不夠。她（女兒）知道得比我們多些。

女：我對這些我能夠看的節目，已經心滿意足，所以就不常使用錄放影機。我是說，他所錄的很多影片，我根本不看。在我們就寢以後，他就開始看這些影片。

男：我最常用了——我與這些男孩比誰都用得多——大多時候都是用來錄比賽，錄些因爲她們（女性）在看，因此我們無法看的節目。

女：我不會用錄放影機。我試著爲他錄下《寡婦》，但弄錯了。他簡直

瘋了一般。我也弄不懂出了什麼錯……我總是要他爲我錄，因爲我不會。我總是弄錯，我才懶得理它哩。

值得附加一筆的是，這些發現也在葛瑞(A. Gray, 1987)所做的研究，得到了證實。由於婦女與錄放影機的關係，若有若無，緊跟著也就造成了許多後果。比如，婦女因而沒有什麼權力決定租些什麼帶子來看；很少有主婦到影帶租售店去租帶子；家庭各個成員都有他們的「空白帶」，錄下瞬間即逝的節目時，我們經常看到，別人的帶子錄完了以後，主婦仍然聽任他們使用她的帶子。

既然主婦在家中慣常使用許多複雜的家用科技產品，那麼，前述這些基於性別而來的種種期望（主婦使用錄放影機的經驗所將遭遇的一些特定困難），必然傳達了大多數樣本中的婦女對錄放影機的疏離感。

很顯然的是，這個問題另有其他面向值得探討——主婦無能使用錄放影機，因此陰柔的女性「有賴」陽剛的男性之扶持幫助，這是由來已久的古典依附說法；另一個極端則情況或許是，就像葛瑞所說，也許主婦精心算計以後，覺得保持對於錄放影機的無知，最爲符合她們的利益，因爲這麼一來，操作錄放影機才不會又變成她的另一項家務。

## 一人獨看電視與罪惡的快感

樣本中，有許多受訪主婦說，她們最大的快樂是看個「很好的哭劇」，或是在家人都不在的時候，看個她們最愛的連續劇。只有在這樣的時候，她們才覺得解除了家事的責任，可以一如她們的丈夫平日一般，專注而耽溺於看電視。我們在這裏進入了布羅迪與石人(J. Brodie

and L. Stoneman, 1983)所說的情況，她們發現，不管是哪種類型的節目，做母親的人總是習慣於維持「家務總管」的角色，而丈夫則與此完全相反，他們在收看特別感到興趣的節目時，一股腦就放棄了他們的總管／父親之角色。每當主婦說，她們最喜歡在週末清晨看電視，而且此時最能享受看電視時，我們即可察覺這個現象清楚地存在，因為唯有在這些時刻，她們的先生與兒子還在「睡覺」，因此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她們才能專注的看電視，不必邊看還一邊想著，照管著其他人的需要。

這些主婦當中，有許多人會在午後安排其他婦女與她們一起看錄影帶。就處理衝突而言，這是最為典型而常見的方法(在本研究來說，也就是選擇節目的問題)：避而不見，或是「重新安排看」節目的時間(通常是在有人幫忙弄影帶的情況下)，透過這個辦法而讓自己看電視的時候，更為快樂一些：

女：如果他在的話，我們就不看這類節目了，因為他討厭遊戲節目，所以我們就不看。如果是我們女人自己在這裏，我會愛死了。我覺得這些節目可愛極了……如果我獨自在這裏，我會設法讓情景更讓人傷感掉淚一些，我端坐在這裏，哭了一會，宛如我是一個人生活。這樣的情形並不多見，但我還滿能享受它的。

女：如果我看到一部好影片，我鐵定會錄下它，尤其如果是一部賺人熱淚的片子。我會坐著，如果沒有人，我會坐著一動也不動，不知時間之流逝，尤其是在午後。如果我覺得疲倦了，我就放這部片子——尤其是在冬天——而這種感覺真好，因為妳可以一個人直坐在那兒，沒有人在旁邊。

女：如果有個節目爲我而錄，我大概都是一大早在六點鐘的時候看帶子……我總是很早起床，所以我就下樓來，週日早上六點或六點半就起來看。這個下午我已經坐在這裏一個小時，就看《寡婦》這個影集。我喜歡在沒有人來的時候補看漏掉的部分，……我喜歡週六的早餐時間。我獨自一人，因爲家人都要晚些才起床。我下樓來，真正享受看節目的樂趣。

女：如果老公不在，我就看一齣愛情劇。

男：是啊，我可不願意坐在那裏看那些東西。

女：是啊，能看的時候就是他外出的晚上。這種情形並不常見。

值得我們議論的是，爲什麼大多數主婦會覺得自己的快樂，竟是罪惡。整體地說，她們心甘情願地打算承認，她們所喜歡的戲劇及連續劇，實在「神經兮兮地」、「演得很糟」，或前言不搭後調。她們接受了男性霸權，跟著將她們自己的偏好說成地位低下。既然這麼接受了，則在衝突發生時，她們也就比較不能夠爲自己爭取權益，因爲照此霸權的定義，她們的先生所看的節目，比較高明一些。面對這種處境，她們就在情況許可下，獨自看電視，或是只與女伴一起看電視，並且，她們都將諸如此類的看電視時機，與她們的家務時間表，做了良好搭配：

女：我想，真正讓我喜歡的節目，就是典型的那種美國垃圾，但我愛看啊……都是一些美國垃圾，真的。我還愛看那些澳洲電影，我覺得這些可就真正是好片子了。

女：孩子上床以後，他就是最後的仲裁者。如果我堅持看自己想看的節目，總有些罪惡感，因爲他和小孩想看的節目是相同的，他們

並不想看只有女人才想看的節目……如果播放的是一支愛情電影，我會很快樂地看，他們可就不會。這就像是挑個影帶看，而不是看到一場傷感的愛情故事，我想，看到這樣的節目是不可能了，因為還有別人在場。如果我看這樣的節目，心中就會有罪惡感，因為我是得到了快感，但別人卻沒有得到任何快樂，因為他們根本不感興趣。

### 節目類型的偏好

就這個問題而言，筆者的受訪者回答得相當一致，陽剛男性的主要認同是對於「事實性」節目（新聞、時事與紀錄片），具有強烈偏好，而陰柔女性則偏好虛構性節目。這個觀察也許平凡無奇，但我們所發現的一致之強度，相當驚人，不管受訪者什麼時候被問及節目之偏好傾向，尤其是被問及他們會看什麼樣的節目、並且全神地看的時候，情況總是：

男：所有的紀錄片我都喜歡……我喜歡看那樣的素材……我是可以看些虛構的節目，但我並不是那麼愛看。

女：有一大堆連續劇，他都不喜歡。

男：這不是我喜歡的那一型素材啊。我喜歡新聞、時事，都是那類型的素材啊。

女：我與女伴倒是愛看我們的連續劇。

男：我整個時間都在看新聞，我愛新聞、時事，都是這類型的東西。

女：我倒不怎麼喜歡。

男：我每次都看新聞，下午五點四十分、六點、九點與十點，我都試



著去看。

女：我就看主要新聞而已，這樣我也就知道有些什麼事情。看一次也就夠了。再下來我就不感興趣了。

男人心中存在著一股隱情、節制，他們不敢像妻子那般地看虛構性節目，他們覺得看這類節目實在不合適，而且幾乎是「不負責的」活動，因為這等於耽溺在他們一向反對的幻想之中（試將此情此景，比做十九世紀的想法，認為讀小說是「女性化的」活動）。或許，以下這些夫妻的對話，最能夠傳達這種意思，兩例中的丈夫都反對他們的妻子享受「幻想式的」節目：

女：那正是（“朝代”）好看的地方呀。這樣的世界實在如夢似幻，可不是嗎？

男：這確是一個大家都想有的夢幻世界，但又——不，我可不能就這麼生活。

引述於後的父親則說，以這種態度看電視，實在是違逆了市民的責任：

男：人們已經迷失於電視。他們以如夢似幻的態度對待電視。電視取走了他們的生活……今天的人魚貫進入前廳，然後他們緊閉前門，就這樣。他們只認同擺在前頭箱子中的那個小世界。

女：對我來說，電視就是真實的生活。

男：這就是我說的情景呀。電視攫走了你的生活。

女：嘔，是嗎？我不在乎電視是不是攫走了我的生活。反正電視讓我快樂。

---

這位先生就這點所產生的深層感覺，稍後在討論他的一般休閒興趣時，再次得到印證。他是這麼解釋的，他說，現在他定期地在下午走訪圖書館，他接著有了一個評斷，說到他原先不知道圖書館這麼好——「我以為圖書館只是藏些小說、虛構之書」。很顯然，在他看來，「虛構」與「好」根本是兩個不能相容的類目。

第二，男人偏好事實性素材的節目類型，同樣也受到了外在框架的影響，因為他們心頭總蒙著一片陰影，認定看電視充其量是「次佳選擇」，比不上「真正的」休閒活動，而這樣的感覺，卻為大多數主婦所無：

男：通常我並不在這裏。如果沒有其他節目，我就看，但如果能夠選擇，我寧可不看……夏天時分，我寧可走出戶外。如果天還沒暗，看電視真是讓人受不了。

男：我喜歡釣魚，如果我要外出釣魚，我才不在乎演些什麼節目。電視演些什麼？管它咧。

男：如果天氣好，我們就到花園坐坐走走，或是走訪親友……老婆出去時，我總有本書與猜字遊戲等著去玩，我不只是看電視。

此外，一旦訪問真談到了男人也看的虛構性節目時，他們恒定地直說，他們偏好「寫實式的」情境喜劇（社會生活的一種寫實表現），他們拒斥所有形式的言情浪漫劇。諸如此類的反應，就「男性陽剛／女性陰柔」與電視的關係來說，實在相當地吻合粗糙的三段式論法：

男性陽剛	女性陰柔
戶外活動	看電視
事實性節目	虛構性節目
寫實式虛構	言情浪漫

或許有人要說，筆者在這方面的發現，誇大了男女看電視的「真實」差異，並且低估了二者收視行爲的「重疊」程度。無庸贅言，相比於一般調查研究的報告，筆者的受訪者所提供的資料，顯現的男女收視行爲之差距、分化，更爲明顯；畢竟，按照這些調查所得，我們所看到的情況是許多男人也看虛構性節目，而同樣也有許多女人收看事實性節目。不過，造成這等明顯矛盾的原因，大抵是因爲調查研究中，膨脹了「收看」這個行爲，使它等同於「專注地收看而愉快地享受」了。尤有進者，即便有人能夠證實我的受訪者，以系統性地方式，向我錯誤的報導了他們的行爲（提供了人們習以爲常的男性陽剛／女性陰柔之刻板印象，致而掩飾了他們真正行爲的複雜性），但這樣的虛掩說法，仍然還是相當引人興趣的社會事實啊，也就是說，爲什麼受訪者想要錯誤呈現的特殊形式，會是這些？爲什麼他們覺得被迫向人示意的是這些呢？尤有進者，這些習向（身爲男人，看了虛構節目，卻是口難開）在其社會生活中，是產生了真實的效果（參見本章前文）。

## 全國性及地方性新聞節目

誠如前文所說，習慣於宣稱自己對新聞節目感到興趣的人，是男性，不是女性。有趣的是，一旦我們考量地方新聞節目時，這個類型也就產生了變化，此時已有許多主婦說她們喜歡這些地方新聞節目。

多次以來，她們所說的喜歡理由，都非常有力。比如，她們說，到底什麼是國際經濟新聞，她們根本不懂，而就其經驗來說，她們也覺得這些新聞與她們的生活無關，對於這些新聞，她們不感興趣。不過，如果當地發生了犯罪新聞，她們立刻覺得有必要知道，不單是爲了她們自己，也爲了她們的小孩。這樣的情形也就直接連繫到了她們愛看的節目類型，比如“五警察”(Police Five)，或是對家庭有所威脅的示警節目。就以上這兩類節目的素材來說，二者對於他們都具有實用價值，它們有助於她們面對她們的家庭責任，因此她們也就表示喜歡看這些節目。反過來說，由於她們經常難以明白，全國新聞或國際政治新聞與她們有些什麼關聯，因此，她們也就不看這類節目。

## 結論

我們必須擴大我們的分析架構，焦點應該對準各種傳播過程的發生脈絡，尤其是應該針對階級與性別互爲接合的那些事例，詳加考量。在眾多應該列入分析的變項當中，這個遠較寬廣的架構也要分析收看電視的物理環境，以及社會脈絡。或許，遵循此道的論據可以先參照電影理論的發展。在電影理論中佔據最重要地位的是，它所處理的主體是文本的主體——電影(cinema)本身。以簡單的要求而言，筆者想要論稱，我們必須同等考量「收看電視的脈絡」以及「收看電視的客體」。簡而言之，傳統上看電影的場所相當固定，而了解這些場所，對於分析「影像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想要指出，整個的「影像宮殿」(picture palace)觀念，重要性與「電影」問題相同。這樣一來，我們也就引進了現象學的問題，「上電影院」(going to the pictures)因此涉及了(裝飾與周遭環境的)脈絡之「社會建築」，人

們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中看電影的。簡單明瞭的一件事是，到電影院看電影，還不止是看電影而已。晚間外出看電影，休閒鬆弛身心之外，另有找尋樂趣與刺激的意思。長久一段時間以來，電影院就習稱為「影像宮殿」，其實正掌握了那種經驗的一個重要部分。電影院出售的東西並不是個別影片，我們最好是把電影院當做在出售一種習慣，或說出售某種形態的社會化經驗。這個經驗則包括了一整個浪漫而神奇的風味、溫暖而多彩多姿的生活。這也就指向了上電影院那整個「時刻」的現象學考察——「影迷排隊、入口廳、休憩處、現金桌、樓梯、走廊、進入戲院、通道、座位、音樂、燈光漸暗、變黑，然後絲綢布幕緩緩拉開，布幕開始發出發出光芒」（Corrigan, 1983: 31）。分析電影而不及於這些脈絡的議題，不及於人們消費電影所必涉及的脈絡，在我看來，均不足以稱做是分析。但很不幸，許多電影理論猛做推演，卻正是欠缺對這些議題的研究，原因是電影理論源流於文學傳統，總認為文本的地位具有優先性，文本本身被抽離開了看電影的脈絡。

我的想法是，前述論點同樣也可以適用於電視研究。正如同我們必須了解「上電影院」的現象學，所以我們同樣也要了解一家之中的看電視之現象學——換句話說，我們也必須了解，家庭環境的種種物理及社會組織的模式，自有其重要性，因為看電視是在這樣的脈絡中進行的。看電視，看的還不只是螢光幕裏的節目——「不只是」的部分最為重要，它指的是收看電視的家庭脈絡。





## 第 7 章

# 起自“家庭電視”， 走向媒介消費的社會學

“家庭電視”這個研究計畫與許多其他研究相同，提出的問題多過解答的部分，不但如此，它也沒有能夠長足而有效地運用本身提出的資料，追蹤所有可能的分析線索。比方說，稍早的一些階段，筆者企圖勾勒一個新的概念模式，想要以此了解家庭之內的電視收看情況，但稍後所做的分析卻沒有能夠貫徹到底，該模式所蘊涵的所有理論意義，並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尤其是，筆者注意到，稍早時候我們雖然論稱，做為電視的消費單位，家庭有其重要性（而不是將個人孤立地當做消費電視的單位），但後來的訪問卻滑向了某種的對比式分析，此時變成了「個別的男性／女性」之分析，並沒有將家庭當做動態單位而做完整分析。

此外，原先筆者是打算父母與小孩一起訪問（正是為了探索這些家庭的動態關係），但實際著手時，這才發覺同時訪問大人與小孩，太過複雜，根本就不可能（同等重要的因素是，小孩子起初興奮了一陣子以後，很快就覺得厭煩了）。這樣一來，最後我也只好訪問雙親，並偶爾連帶訪問其他年紀較大的小孩，收尾的時候則分開再對年紀較小的孩子再做訪問。決定這麼做，也就移轉了分析焦點，頗為讓人扼腕，因為小孩子的想法與意見（尤其是那些年紀較小的孩子），在整份分析中，被排擠到了邊緣，

而原先筆者並不希望如此。

論電視與性別的那個部分，最重要的（幾乎是全部）焦點只集中於一個面向的分析——性別因素對於收看電視的影響。我在這裏也只能說，由於理論及實際上的限制，我一直沒有能夠找出、發展出一個更妥當的收視行為類型的分析，我所訪談的不同家庭之類目，要不是社會背景這些類目，就是家庭「生活階段」這些類目，筆者的樣本就是這麼建構出來的。這樣一來，分析結束的時候，性別面向所佔據的優先性，也就比原來設定的部分，來得大了許多，而這個特定的因素之效力，也被孤立看待，沒有與其他因素併連觀察（如階級與年齡）——但這些因素，以及這些因素與性別的互動關係，最終卻是檢視性別效力時，必須合併考量的。

## 性別本質主義的若干問題

歸根究柢，一個社會主體的認同，其組成單元實在難以窮盡，既非只有階級，也非只有種族，也不是只有性別（也不是任何單一的類目）。安與赫曼（Ang and Hermes, 1991）就此論點提出了強有力的批評，她們認為，眼前所見之趨向，可以說是一種「性別本質主義」在作祟，它將性別的諸種差異物化、絕對化了，它因此規避了性別定義、性別位置與性別認同之間必然存在的分野；此外，眾多性別類目的差異，也在性別本質主義作祟下被固定成套了，而它也在這些差異當中，虛造了幻覺般的合意假象。誠如她們就此所做的評論，「婦女並非永遠地生活在性別的囚房」；若是有人以為所有的婦女共享持續不已的經驗領域，而這些經驗也只有婦女可以分享，那麼，他們很可能已經將兩性的差異本質化了，他們也忽略了諸如雷利（J. Riley, 1988）與巴特勒（J.

Butler, 1990) 的著作所透露的力量，這些著作很正確地堅持，「婦女」(woman) 是應合特定的歷史過程，透過論述建構而成的類目 (參見 *Camera Obscura* 20-21, 1989, 該處已論列了〈女性觀賞者／女性的凝視〉[The female spectator/the female gaze] 等等)，並且，這個建構必然無法穩定。強調這個論點是很有必要的，因為誠如安與赫曼所說，我們在企圖發現不同變項的關聯性時，總要避免流於輕率，我們不能輕易地就說文本的意義，一定與社會人口變項 (如性別) 有關，因為我們如果這麼認為，則我們又與化約論者的分析，有何區別？這個說法只是將「婦女」當做是一個簡單的、自然的集體而具有恒常的認同內涵，它已將「婦女」的意義，當做內在於女性 (female sex) 這個 (生物) 類目之中。如此一來，性別認同的生產與維持，其實也就不再是一個持續充滿矛盾而必然不穩定的過程 (參見 de Laurentis, 1987)。如果忽略了這些複雜細膩之處，我們也就不能領略塞特等人 (Seiter et al., 1989b) 與普瑞斯 (A. Press, 1991) 的論斷，其實非常強勁有力，並且十分貼切。比如，他們說，不同婦女對電視之虛構節目所做的不等詮釋，其實肇因於階級差異 (對不住囉，參見 Modleski, 1984 這方面的論點)。

安與赫曼的主要論點，並非要否認性別差異，而是認為，這些差異到底具有什麼意義，總是相對的，總是必須放在特殊脈絡中，才能建構得出 (參見 Laclau, 1977)，「唯有透過具體歷史情境的接合，否則，實際的媒介消費所取得之意義，又怎麼能夠具有特定的性別色彩？」 (Ang and Hermes, 1991: 319)。

論及包辛格 (Bausinger, 1984) 時，安與赫曼說：

若要了解收視行為……性別並不是一個可靠的預測變項……媒介

消費徹頭徹尾是一個不確定的行事……在這行事中，性別涉入的方式，同樣是懸而未決，至少，在收視行為具體成形的脈絡之外，實在難以預測。(Ang and Hermes, 1991: 307)

在稍後的一篇論文裏，赫曼將此論點推進了一步，她點名批評“家庭電視”這個研究，認為我的分析過度「集中於家庭動態過程與性別／權力關係，這樣一來，反倒使得日常生活與日常互動，消失了蹤影……日常生活而化約做權力關係，等於是躍過例行的特定事項於不顧，但事實上，這些例行事項確實能局部解釋媒介之使用」(Hermes, 1991: 6)。赫曼與安稍前的那篇論文認為，我們應該體認「在媒介消費過程，性別的角色根本就是不穩定的。我們不能『預先』設定媒介消費的任何一個特定時刻，性別將扮演一個基本的決定性角色」(Ang and Hermes, 1991: 308)。強調過程以及不穩定性，這點筆者完全接受，而對於任何形式的化約形式，它確實也能夠發揮修正作用。不過，雖說我們不能認定性別因素一直會扮演基本角色，決定收視行為，但我卻想要論稱，我們是可以合情合理地假設，性別經常會扮演這個角色。完全「敞開心胸」(換句話說，沒有任何假設，沒有假設什麼因素最有可能幫助我們解釋哪些類別的差異)，等於是放棄了任何形式的社會分析，終極以觀，社會分析總是要從分類開始，而分類也者，按照其本質，原來就是化約成性。因此，在筆者看來，難題在於決定，分析哪些類別的材料，應該使用什麼樣的分類設計才適合。這樣看來，安與赫曼所說，“家庭電視”這項研究的分析，流於機械觀，因此「不太可能解釋在所有的時間、在所有的家庭，發現（莫里）所指稱的（這種）因性別而異的反應類型」，若要筆者回答，則我會同意這種說法(參見筆者下文就此的評論)，我同樣

認為，這樣的類型不致於存在於全部的家庭（亦即不分階級、文化或教育背景），但這樣的類型卻正可能存在於“家庭電視”所訪談的特定家庭。即便這個類型可能不存在於某些家庭，這也談不上是駁斥了我的論點啊——畢竟無論是概率，或是已成類型而有跡可循，總還是存在例外的。我的論點所提煉得出的通則（它所具有的危險之處，必然見於任何一個通則），只能說是彰顯、代表了這些特定形態家庭的性別收視類型。如果沒有這些通則，我們也就等於漂流於無邊脈絡之海域，浮沉於無垠無涯的差異分疏，此情此景之下，我們在憂心流於粗糙的情勢裏，不再願意提出任何通則。但不要忘了，布萊希特（B. Brecht, 1966）曾經提醒我們，即便粗糙，任何想法必有其用。

## 心理分析的視野①

筆者已在第二章詳細指陳，在我看來，有關觀賞者之電影心理分析的理論成果，存在著哪些缺點，而若要將那個模式移轉而適用於電視消費的研究，可能會出現哪些困難。筆者此處的論點，堪與佛爾（J. Feuer, 1989: 103）比擬，他說，「『我們設定的電視觀賞者』，不同於梅茲（C. Metz, 譯按：法國知名電影理論家）及包醉（Baudry）的描寫，他們的電影後設心理論，認為觀賞者是孤立的、無法動員的、前戀母情結的，但電視觀賞者並非如此，反之，電視觀眾是相當後戀母情結的、完全社會化的家庭成員。」這個論點與唐納（J. Donald）相同，他認為：

似乎，我們需要以新觀點詮釋主體性的形成，依此觀點，主體性

---

①這些觀點，許多得力於 V. Walkerdine 針對“家庭電視”研究所提出的有力批評。對於她這些意見，筆者深表感謝。

既非無意識的驅力之展現，也不是社會及符碼的需求所造成的效果。其實，由於無法認同或是抗拒認同的緣故，主體性是由心理及社會等雙重動力，在複雜的交互作用過程中逐漸標誌出來的。

(Donald, 1989: 6)

話雖如此，若是從心理分析的角度論事，則“家庭電視”的分析對受訪者答話的詮釋，尚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舉個例子，就說節目類型的偏好問題，尤其是男性再三表示，他們非常喜歡「寫實的／事實的」節目，我們或許可以將此情況解釋為，這是男人抗拒涉入虛構、幻覺或情緒的一種方式，因為一般認為這些情景都是陰柔的女性表現，而男人建構自己的認同時，必須由破而立（譯按：從反女性特質而確立自身）。當然囉，進一步的問題是，所謂的「真實／事實／重要」應該怎麼計算？而這些切題的定義又如何「染上性別色彩」（gendering）？

就看電視的風格而言，我們或許可以說，婦女看電視的時候，必須再三表白她們還在忙著做其他事，其實是一種指標，顯示她們認為自己與女性的特質，實在是「有助他人／毫不自私」，而這樣一來，也就造成這些婦女看電視之際，罪惡感油然而起，並造成她們在丈夫看電視之時，「喋喋不休地說話」——這是一種對於（無私）愉悅形式的「破壞」形式，這些婦女覺得自己無法脫離此種狀態，實在讓她們惱火。

收看電視的過程，確是涉及了權力與控制的問題（尤其是競相爭取掌控遙控器），另一個解讀或許會認為，或說這表徵了男性陽剛權力之程度（這是我當時的解讀），不如說它表徵了權力之本質，實乃非常脆弱與不安穩（亦即這樣的權力，並非安穩地取得，而總是必須抗爭才能獲致，這指出了當事人內存恐懼，老是害怕「失去控制權」，老是有小孩一般的全能幻想）。與此



近似，我們也可以說，按照計畫看電視的「男性」特徵，也可以看做是恐懼自發式的、沒有計畫的、「不理性的」事務——而再次地，自古以來，這些特性都被當做是女性陰柔的同意詞。

婦女對於科技所表達出來的不安與「欠缺安全感」，同樣也可以另行詮釋——此時我們或許可以說，婦女是在對「孤立無援」的狀態，進行心理投資——而這本身又是（間接）權力或操弄的一個形式，這是依附的一個形式，有其自己的複雜性與滿足之情。

筆者提出這些觀察所得，目的只在指出，除了我在前章所說的可能性以外，另有其他可能的解讀方式存在，這樣一來，未來就這些議題進行辯論時，也就可能廣開視野了。

## 「家庭」的問題

既然我的研究計畫，以“家庭電視”作題，那麼，就經驗事實來看，了解本研究進行的背景英國，其家庭景況如何，應該是件重要的事。基本以言，過去二十年來，家戶的平均人口數日漸減少，原因是單親家庭的數量增加了（目前已佔所有家庭數的26%，在高齡家庭中，這個數字尤其高），其次則是平均家戶人口數下降（至1990年只有2.46人）。整體局勢是家庭類型的日漸零碎與分裂，已婚的職業婦女大幅增加（約有六成家庭包括了已婚職業婦女），而離婚與重婚率亦高了許多（1960年的離婚人口是四萬，到了1984年已是十六萬；而1982年時，34%的所有已婚家庭，至少有一方是再婚者）。我們目睹了單親家庭的增加（至1990年，家中有小孩的家庭，有五分之一是單親），他們當中，有一羣人的經濟處境，極為困窘。到了「嬰兒潮」這一代到了成家立業的歲數時，英國的整體生育率可望再度上升到10%左右。不過，這些新生代倒不一定成長於類似古典核心

家庭的環境，而很有可能是在日愈複雜、變化繁多的家庭形態及結構中，長大成人。

儘管如此，每當「家庭」這個詞出現時，我們仍然會將它想成是傳統的核心家庭，兩個大人與子女住在一起，父親出外工作賺錢養家，母親則不外出工作，只負責家務及養兒育女。毫無疑問，這樣的印象著實是誤導的。究其實，只有 13.8 % 的英國家庭符合這個「古典的」刻板印象。但這樣的一個傳統家庭的印象，卻保留了相當大一部分的政治及意識形態上的力量。

問題的關鍵點是，如果傳統的核心家庭佔所有家庭戶數的比例，實際上已經下降（單是這個事實，我們將「家庭」〔family〕等同於「家戶」〔household〕的習慣，就已經必須大打折扣，這個說法內存著非常多的困難），但它在我們的文化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識形態作用。在相當大的程度裏，廣電從業人員（及政府）所認定的電視閱聽人，猶然出身於這種形象的家庭，因此，廣電人員在編排節目流程時，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時，這樣的家庭形象就發揮了影響。就此情況來說，既然“家庭電視”這項研究必須只研究一類家庭（這是因為可用的經費有限所致），則最符合我們效益者，似乎是只研究核心家庭——儘管經驗證據上並非如此，但就意識形態的意義來說，核心家庭等於是電視觀眾的代表。

除了這些簡單的人口學事實與趨勢以外，我們還須指出，最近幾年來英國出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形勢，它對我們研究家庭／家戶的休閒、文化與電視消費類型，影響具大。就最簡單的局面來看，我們似乎可以說英國的文化已然日漸以家做為中心。過去數年來，幾乎所有形式的家庭以外的休閒活動，參與率都顯著的降低了。這種情況見諸看電影的人數，最是明顯；過去三十年來，英國的看電影人數比

率，急遽下降。到了現在，先前一度是社會各階層的真正娛樂形式的電影，現在變成只有年輕人與受過高教育的「專家」才會去看。這並不是說大多數人不再喜歡電影：實情是現今的英國人，如果要看電影，則大多數是在家中觀賞——要不是在廣播電視看，就是租錄影帶來看（參見Docherty et al., 1987）。家用錄影帶市場的新生浪潮，在英國或許已經退隱中，但這樣的市場已經高高建立了起來——而這只是再次顯示，花用於休閒的時間，傾向於從家庭以外的場合，轉至在家庭中進行。目前，英國的錄放影機普及率，各方估計或有出入，但大多認為是所有家戶的六成左右。

社會公眾參與家庭以外休閒活動的頻次，整體來說一直往下降——只有在越為富裕的、高教育程度的少數人身上，我們才看得到違逆這股趨勢的情況——而相應來說，這也意味著，如果我們想要了解大多數英國人的休閒與生活類型，則研究電視的使用以及其他形式的休閒娛樂，時至今日已經愈發重要了。

## 家庭之內的脈絡，變化多端

有人會說，重新排列家庭之內的分析架構，然後以此了解媒介消費的重要性，只是一成串論點的第一步，對此，筆者俯首稱是。不過，如果這個重作安置的努力徒然讓我們目盲，沒有見到各文化之內與各文化之間的家庭空間之組織形式，實乃變化多端，則這項努力的本身，也就讓人頓覺非常之不滿意。歸根究柢，我們當然必須先行分析家庭環境及家戶形態的多重變異現象，循此掌握媒介消費活動的狀況，然後才能合宜地研究這些活動。

誠如稍前所述，學者曾經指出(Lindlof and Traudt, 1983)，若是要研

究收視的實際活動，則許多物質因素的重要性是十分明顯的，比如，家戶裏的物理空間是大是小？足不足夠？羅耳推展這個論點，他說，家人團聚一起的空間

具有文化意義，因地而異、隨著家庭而不同。如果家裏的空間夠大、電視機夠多，觀眾看電視的時候，也就不會干擾家中的其他成員，因為此時室內的其他流動可能性，大了許多。結果一來，由於各人可以移動到室內的其他部分，每個人想做的事、每個人的電視節目偏好，也就可以得到照顧。……空間小的家庭……必須拿同樣的一個房間做許多事……這些情況使得每個家庭成員必須經常商量協調，再三安排家具的擺設方式，每天的工作順序也須重作安排，而家庭成員的心裏定向，亦須調整。(Lull, 1989: 9-10)

這裏要再次指出的論點是，就這些變化各異的家戶類型而言，它們的電視收看過程與行為，彼此必定有相當大的不同，而除非我們注意家庭的室內空間，對於這些不同產生了哪些決定性影響，否則，我們也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會有不同。相關於此，羅耳察覺收看電視的一些空間組織方式，也隨文化而變異。他以印度為例，提及該國收視類型的特色，他說，「在印度家庭中看電視，座位的排列類型充滿了意義，富含社會階級與宗教種性制度的味道」(ibid: 10)。筆者企圖論證的是，這只是冰山最爲可見的一部分而已，因為事實上任何家庭之內看電視的座位排列，均與印度相似，在在「充滿了意義」，我們必須加以探索（參見 Gillespie, 1989, 該文討論了印裔的英國家庭收看印度影帶節目時，他們的座位排列類型與收看的例行儀式）。

這麼說來，這個論點以及其他的論點，只在說明，針對變化多端的具體物質情境進行社會學式分析，非常重要，因為不同家戶的人，是在這些情境消費電視及其他傳播科技的；其次，我們也須論稱，家戶結構本身，已經對於電視消費之不同模式，產生了獨立性的效果。庫馬（K.J. Kumar, 199: 28）就此做了個研究，他發現家戶類型似乎對於看電視的模式，產生了強烈的決定性影響。他的結論是，「家庭成員收看電視時的互動情況，取決於家庭結構……單親及沒有孩童的家庭，互動情形可能來得最為活絡與生動。」

梅迪瑞奇（E. Medrich, 1979）也這麼認為，他在分析美國不同家戶類型的收視形態之變異時，說得很好。他的根本論點是，認為觀眾收看的是特定節目的想法，整體地看，實在僅能適用於非常有限的某些家庭，它們的類型非常有限，是核心家庭、中產而高教育家庭；究其實，其他家庭根本只是將電視當做一個背景，附屬於社會生活。他論稱，這個事實等於是說，媒介研究的焦點，必須來個根本性轉移，不能再研究人們如何詮釋特定電視節目的內容：

研究重心或許應該這麼變，不再只強調電視內容，而是擴大研究視野，將電視當做是許多美國家庭中，無所不在的氣氛、環境。我們經常把電視內容的各種效果，當做是主要的問題，但電視的角色已變做日常生活的部分，揮之不去，或許在文化上具有更大的意義。（Medrich, 1979: 172）

他的要點是，就兒童收看電視引起的關懷而言，「由父母控制電視的世界，僅只存在於中產階級及中上階級的家庭」（ibid.: 176；參見 Paterson, 1987，他指出，勞工階級的孩童〔working-class children〕，收看電視

時「毫不受監督」)，但就中低收入的家庭而言，尤其是母親教育程度偏低的家庭(梅迪瑞奇認為這個類目的家庭，代表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美國內城家庭)，電視是「背景噪音」(backdrop)的一個形式，不管是不是有人在看，電視都開著，陪伴著幾乎所有的家庭活動。他提出的最重要論點是，「住在電視老是開著的家庭的小孩，不論他們在做什麼，在某種程度上，總是處於與電視競爭的狀態。這個事實可能多方面地影響了小孩的生活，如此一來，這些小孩看些『什麼』的問題，重要性也就退居其次了」(Medrich, 1979: 172)。

梅迪瑞奇的實徵研究，透露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此即「電視常開」之家庭，其孩童在學校的表現，沒有那麼好。雖說其間真正涉及的因果關係，可能遠比這個「發現」最初所隱含者，更加複雜(參見 Bernstein, 1971; Rosen, 1972)，但針對家庭文化、看電視的風格，以及教育的成功或失敗三者之關聯性的分析，卻至為重要。

就筆者目前的研究目的而言，梅迪瑞奇的分析之所以具有意義，原因在於他企圖確立，不同類型的家戶賦予看電視的意義，可能出現什麼樣的分化情況。因此，梅迪瑞奇的觀察是：

窮人與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物質與文化資源較欠缺的人，以及家庭空間擁擠、因此在欠缺隱私環境生活的人，他們正是家中電視常開之戶的大多數人。在這些環境裏，電視是特別有力的一股力量，因為這些家戶的孩童，在家中除了看電視以外，通常沒有什麼課後活動，也鮮少再有其他使用時間的方法。(Medrich, 1979: 175)

苦貝(T. Kubey, 1986)以近似於梅迪瑞奇的方式，分析了下列特定



團體看電視的意義：教育程度較低、較不富裕的離婚或分居的人——換句話說，也就是單親家戶的特殊類型。而就如同梅迪瑞奇的分析，顯示電視對於窮人（通常是單親）家庭的小孩生活，尤其是特別的重要，苦貝則論稱，教育程度較低、較不富裕的離婚或分居的受訪者，「遠比其他人來得容易使用電視做為規避心情不好的工具，他們以電視排解孤獨的感覺、消解不知何所適事的茫然。」（Kubey, 1986: 108）

苦貝的分析基點，來自於心理學研究強調個人與行為的流派，依照他的概念架構，根本不足以分析文化的或傳播的符碼過程。此外，他的研究方法論當然還得遭受公評，他的研究對美國流行媒介的衝擊，主要只是證實了一個常識性想法——亦即「電視對你有害」。雖然有這些缺失，但筆者還是要說，此處引述的苦貝之論文仍然值得注意。苦貝的分析模式，有助於我們了解特殊情境的傳播行為與過程，它企圖同時處理不同面向的（心理的、經濟的與社會的）決定性問題，而看電視的實際過程正是必須放在這個模式之內，才能理解，筆者對苦貝感到興趣，原因在此。苦貝認為：

在某些情況下（孤獨的感覺、不知何所適事的茫然），發生於某些類型的人身上（比如，社會階層較低、離婚或分居的人）的某些特定形態的經驗（情緒），可以解釋媒介的特種使用原因（電視看得很多）。每當社會階層較低、教育程度較低、較不富裕的離婚或分居的人……覺得心情很壞，而他們又處於孤獨、茫然不知所適的感覺時，然後，此時家中又擺著電視，則他們……遠比更為富裕、教育程度較高、社會階層較高而已婚的受訪者，更容易看電視。（ibid.: 119）

現在可好，身為心理學家的苦貝認為，最終這些「傾向」僅只是個人屬性的表現。然而，如果我們真要將苦貝的著作與羅迪傑(C. Lodziak, 1987)、高丁(P. Golding, 1989)與梅鐸(Murdock, 1989)做個比較，則不難發現若干有趣的對照。羅迪傑的堅持很正確，他說，看來似乎平凡無奇的常識，其實非常重要，此即做為一種休閒活動的看電視行為，相對於其他休閒方案，便宜了許多，他接著說，（而在我看來，說得很有說服力）許多勞工階級的人（以及老年人或因為其他原因而社會地位低落的人）花了很多時間看電視，原因無他，只在他們根本沒錢、沒有資源從事其他活動。高丁與梅鐸兩人也都認為，我們在探詢人們的電視收看行為時，必須同時了解在不同脈絡下，有機會及欠缺機會近用其他資源的潛在收視人，是不是有這些文化與財政資本，有沒有交通運輸工具等等形式的資源，從事看電視以外的休閒活動形式。這樣說來，我們所應論稱的是，就經驗性現象看來，相同層次的同一種活動的兩個例子——比如說，住在不同地理區的、階級地位不等的兩種人，他們在相同時段收看相同的節目——事實上必須再做分化，因為如果他們所能選擇的其他選擇方案，顯著而長足地不同，那麼，他們的選擇其實並非具有「相同的」意義。

### 家庭電視：遠離政治？

曾有一些評論者（比如，Acland, 1989; Peters, 1987）認為，由《全國觀眾》的研究方向，轉至“家庭電視”的重點，並不妥當，他們覺得後者相當讓人失望，因為它再沒有直接針對意識形態而發問。是有些人認為，從文本的分析轉至了解家庭之內的電視消費，使得整個研究

的政治銳利之處，爲之受挫。又有些人認爲（筆者在下文第十三章將再述及），針對家庭領域的媒介消費而做的研究，脫離了傳播與文化工業的適切（「公共」）角度，是「退回了客廳」之舉；但在我看來，這似乎是非常局限的一個「政治」觀，而它對於客廳的「政治」觀，也遠遠弱於我先前所知道的一些想法。

筆者堅持，透過對家庭生活的詳細解剖，才能理解收視行爲；筆者也堅持，節目的選擇與詮釋必然是電視收視行爲與「電視就是這麼用的」一個重要面向（參見 Ross, 1988），而後者本身就是家庭生活類型完整不可缺的一部分。作此堅持，筆者的論點是，先前的一些節目解讀研究（我的也在內），不論再怎麼繁複，忽略這樣的脈絡架構已有很久，而先前的節目「效果」研究，亦未曾對此置語。在此堅持過程，爲了力求辯明這些脈絡性議題，能夠幫助我們貼切地了解收視行爲，筆者也在若干程度內，採取了較爲正面的態度看待「使用與滿足」取向的視見，超出了我在此之前所給予的評價。

此外，筆者的焦點雖然是對準了似乎沒有那麼「政治性」的、更爲家庭之內的議題，雖然是回歸於研究標準的社會學變項（如家戶結構），但我在強調它的重要性之時，一點都沒有認爲我們就此放棄更大的分析架構（閱聽人的結構化），一點都沒有暗示《全國觀眾》那項研究所重視的階級、教育與意識形態，可以割捨。反之，我所建議的是，結合這些家戶結構的社會學面向，使之編入更大架構之內，有其必要。這樣看來，我們所關心的也許是類如階級或收入這樣的因素，以什麼方式（至少是負面地）決定了家庭空間大小，而後面這個因素在特定時刻則可能直接決定（這裏指的不是機械式的決定，而是指設定了運作的範圍）了收看電視的行爲與過程。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統合這些不同層

次的分析。性別問題也是如此——再回到筆者對安與赫曼（Ang and Hermes, 1991）的立場之評論——在我看來，要點也是在於如何找出一個視野，足以體認、觀照他們所指向的問題之複雜性。要能夠如此的第一步，必須體認社會結構的所有元件，必然處於不穩定狀態，我們不應該機械地搬出一個類目（比如，「性別認同」），然後逕自就想解釋特定的收視行為與過程，這樣只會不當地封閉了分析之路。正確的分析應該追蹤性別（或階級與種族）「如何」在特定的一些脈絡中運作——與此同時則又不陷入方法論的個人至上觀（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或即使重作行銷，將此說成是「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因為這也於事無補——並且終將使得我們在心懼被人指控是「化約論者」之餘，無法知道不同的經驗現象之間，存在著什麼關聯。我的論點在於主張，脈絡很是重要（就本書而言，看電視的家庭脈絡），但與此同時，我們又須避免自陷於絕境，避免掉入徹頭徹尾的脈絡至上論，因為如果照其邏輯推論，我們最終只能說，每件東西都各不相同，如此一來，我們也就不能從中得到任何助益，也就無法確認這個「多元性」的基本組織模式（參見 Giglioli, 1972）。

第四篇  
方法學的議題





## 第 8 章

# 力求以方誌學取向, 研究電視觀眾<sup>①</sup>

### 前言

本章主旨在於闡明, 傳統上源出於人類學科的參與觀察及方誌學等探究方法, 如果用於研究媒介閱聽人, 可能會有哪些潛在貢獻。這些取向的強調重點是全方位的, 但它們所關懷的原點, 正是行動的脈絡; 因此, 它的論點會認為, 看電視這樣的行動, 必須放在家庭領域之消費過程的動態關係及結構中, 才能理解, 畢竟看電視只是整體家庭消費的一部分。

以統計方法做為基礎的量化調查, 用來分析及探索「看電視」之局限, 其來有自, 學者已經多方指陳。多年以來, 學界一直有人呼籲應該利用「自然的情境」, 探索電視消費的問題, 他們指出, 看電視應該是一個具有脈絡、情境意義的活動; 當然, 也只有在最近這段期間, 才有人開始進入這個領域深入探究。就其本質而論, 統計方法是不求總合資料的 (disaggregating) 研究方式——它必然必須將行動單位從其

① 本章若干節次亦曾以下章名出版, 'Communication and context', 該文另一位作者是 R. Silverstone, 收於 N. Jankowski and K.B. Jensen (eds),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1991。

脈絡中割出，但這樣一來，也就喪失了彰顯行動意義的機會——而當代許多商業性的媒介閱聽人研究，似乎把這個問題弄得更為複雜了，因為它所找尋的是一種「技術上的吻合」(a 'technical fix'，人——測量機等等)，目的是要找出「認識」閱聽人的一個可靠形式。究其實，誠如西伐史東 (Silverstone, 1990) 所說，看電視事實上是個非常複雜的活動，它必然是犬牙交錯於一連串其他家庭行事之中，因此也唯有在此脈絡中，才能貼切理解之。筆者的論點是，我們首先必得要求以「厚實的」(thick) 描述，充分地掌握看電視的複雜性 (參見 Geertz, 1973)，此時，採用人類學及大抵說來是方誌學取向的研究方法，多少有助於達成這個目標。

筆者將以批判的態度簡單介紹從這個角度探討媒介研究的成果。我的論點是，諸如此類的人類學視野，足以讓我們重新調整研究電視的焦點，從消費的物質與形象過程來審度看電視的脈絡。這樣看來，質化研究的關注目標，也就是近身前去了解我們從傳播科技 (如電視) 獲取意義的過程，並求能夠掌握這些意義所附身的多種行事作為。

## 都是數字惹的禍？

長期以來，閱聽人研究的傳統一直為量化的經驗性探查所盤據。在實證主義支配下的研究者，總是企圖孤立傳播過程所涉及的因素，他們認為在不同情境下，這些因素對於不同團體是產生了一些效果，是生效的。多年以來，學者已經習慣性地說，數量龐大的這些研究成果，充其量只是就影響力的基本問題，提出了尚稱差強人意的解答。但將閱聽人如此建構，彷彿他們可以聽任某種臨床經驗的揉搓而成形，實際上十足顯示了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孤立及抽離過程，已然將媒介研

究引入了太多的死胡同。它向來就是食古不化，但卻自以為是。

最近這些年來，廣電業引進了自動轉台的器械與錄放影機，使得業者擔心觀眾是否對其節目視若無睹——因為閱聽人這邊可以「轉來扭去」，外加「按按按」。這份遲來的體認，總算認知了人們可能開著電視機，但卻不怎麼注意看節目的事實，促使業者警覺到，收視率調查或許誇大了觀眾的注意程度，而這樣一來，在廣告商的壓力下，更好、更「客觀的」資料蒐集技術也就開發了出來，而最近則已經開發出來了「被動的人測量機」(passive people-meter)——電腦化的攝影機設備，附加在家庭電視機上，它使用「影像辨識」系統，可以確認在什麼時候什麼人在哪台電視機前收看。這裏所顯示的是，想要利用技術性「方案」解決電視觀眾研究的難題。但就其原則而言，難道這種方案真能解決這個問題嗎？若干年前，沃伯 (M. Wober, 1981) 就曾正確地指出，大多數的閱聽人「研究」，根本只是「測量」——換句話說，以量化數字將多種不同的相關收視行為之類型，登錄存證而已。誠如他所說，問題是「『自動測量器』所提供的原始素材，是可以做為研究之用：但這些素材本身並不能算是研究成果，甚至連一半研究成果都算不上」(Wober, 1981: 410)。

誠如海牡斯利與阿金生 (M. Hammersley and P. Atkinson, 1983) 所說，如果量化研究只是專注在「建立不同變項之間的關係」，僅只是提供了預測的基礎，則其本身算不了一個理論：「若要建構理論，則必須揭示這些變項所產生之關係，是經由哪些機制或過程而完成。尤有進者，若要建構這樣的理論，不能僅只於揣測臆度，而必須精描是存在著一些『中介變項』，並且起著作用。」(ibid., p. 20)

安 (Ang, 1991) 說得很對，她說環繞收視率而打轉的一些言論，只

是透過了若干概括而標準化的收視行為變項，獨斷地描繪了種種不同類型的觀眾，以及他們之間的差異。所有其他的認同與差異卻就此被忽略了。如此一來，主觀之情也就減至最低，而「看電視」（不論觀眾怎麼看待這回事）也變成只是可供觀察的人，扭開電視的行為，並且所有觀眾彷彿只有一個簡單的開電視動作，而這些動作基本上對於每個人，都具有相同意義及顯要程度。很顯然，問題出在這個說法根本就是誤導，這些活動的實情遠非如此。我們所需要的並不只是改良測量觀眾的技術（對不住啊，那段「被動之人機測量」辯論時光），我們也需要改良觀眾研究的方法（沃伯稍前所做的區別），果然能夠如此，則我們不但能夠測量不同類型的觀眾，同時也能夠了解觀眾究竟在做些什麼、為什麼如此做。這整個做法最重要的認知，在於我們已經知道收看電視，是一個複雜而深富情境意義的家庭之內的行事。

誠如安（Ang, 1991）所說，量化研究向來只把觀眾當做數字看待——目的只在計算閱聽人數量之大小時，將他們一個個都當成具有等值的單位。因此，「看電視的人」也就變成了閱聽人測量的基本單位，並且，這些人當然也都只是個別以主觀之情生存於特定的一些情境——但如果真要將這些這些個別的單獨性涵括在內，則毫無疑問將使收視率調查無法進行——是以，收視率調查必然要壓抑個別的主觀差異，非如此沒有辦法創造可供計算的收視率類目，它所強調的是平均狀況、規律及可以概括化的類型，不是獨特的差異之處。

既已衡量了這些情況，接下來我們就要追溯我們的足跡，然後仔細檢驗電視閱聽人之研究的主流模式，究竟建立在哪些基礎之上。第一，事實上它也說不上真正測量了收看電視的情況：它往往只是測量了某些因素（開著的電視、有人在房間內），然就就逕自以為這就是收視情

況的可靠指標；第二，它假設扭開電視本身，代表了想要收看特定的節目（而不是，比如說，「回到家以後」的反射動作）。這樣的假設，其實背後隱藏著許多問題，包辛格（Bausinger, 1984）對此解釋甚為清楚（也許人們打開電視，為的只是將電視當做一種逃避，逃避在家中必須跟家人互動的要求，而究其實，是否注意開著的電視螢光幕，根本不重要）；第三，它就這麼把所有的收視行為當做是個人決策過程的結果，但其實我們都知道，許多看電視的情況，根本就是團體行為，此時的權力分佈並不均等，而必須歷經協商才能選擇——所以說，對於許多觀眾而言，看電視是「強制性的」：收看電視的這羣人，想要看某些節目，對於這等情況，他們抱持著容忍的態度，不是就此離開房間（即便是在擁有多機的家庭，通常仍然有「一具主機」，而這才是眾人競相爭取的電視機）。第四，它以為每個看電視的決定，都可以看做無關乎情境而具有同等意義——既有如此認定，則它也就忽略了「相同的」收視選擇，由於情境的差異而往往具有不同的意義，比如，近用資源的變動情況，實在應該考量在內；畢竟，物質及形象兩方面的資源之有無與多寡，對於看電視以外的休閒選擇，必然有其影響（比如，家戶空間的大小、收入與交通工具的變異等等）。

站在這些相同假設的基礎上，許多閱聽人研究也就逕自認為，「看電視」是一項單面向的活動，它對所有執行這個活動的人，具有同等意義。然而，就算從最粗淺的層次看，我們已經知道，比如說，「純粹」收看電視是相對少見的一個現象。因此，甘特與史威尼威（B. Gunter and M. Svennevig, 1987: 12-13）引述了若干調查資料，他們指出，據報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四的觀眾自稱在看電視的時候，同時做著其他的事。與此同理，開著電視，或是說有人在電視機前面，誠如陶樂（R. Towler, 1985）所說，可以代表「一百種不同的意思」。陶樂還在「獨立廣電管

理局」(IBA) ②研究部門擔任主管時，曾在「皇家電視協會」(Royal Television Society) 發表演講 (Cambridge, 1985)，他一開始就說，「我們現在已超越了數人頭的階段」，他認為從事另一個不同類型的「寫真」研究，更為直接地對準看電視真正涉及的行為過程，現在正是此其時也；他認為，我們理應檢視在一天的不同時段裏，不同觀眾對於特定類型的節目，「有些什麼不同種類的收視情況」。或許應該這麼說，充實補足他的想法之日子，就在此刻。

在檢討最近的閱聽人量化研究時，簡森 (K.B. Jensen) 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他強調我們必須將研究「發現」納進整個脈絡再做評斷。誠如他所說：

接收節目這一端的情境究竟如何？為求了解，我們應該經常將其納入社會及文化網路再做推敲，畢竟個別的觀眾是在這網路之內看電視的……(收視率)對於我們了解觀眾日常生活中，將電視定位為哪一點，沒有什麼幫助……閱聽人對特定媒體及其內容的經驗，不能與其使用狀況分離……如果我們想要了解收視率背後的活生生實體狀況，我們必須轉而研究使用的脈絡、接收當兒的物理情景，然後我們才能問，對於閱聽人而言，看電視的意義是什麼。(Jensen, 1987: 25)

出以類同的心緒，羅耳也認為，如果人際及大眾傳播可以當做是文本而閱讀，則環繞其四週的脈絡，必然是意義的基礎。因此，他說：

如果真要弄清楚「日常生活之骨架」有什麼重要性，則身為研究

---

②譯註：1993年起已改由「獨立電視委員會」、「收音機管理局」分別取代其職務。



的人, 必須(1)將足以顯示研究對象所有慣常行為的特色, 詳加觀察並作紀錄; (2)在這些行為發生的自然情境中觀察與紀錄, 並且要(3)在考量傳播行為之各種細節以後, 小心地引伸其意, 尤其是特別要注意通常很是細微、但相當具有啓發意涵的部分, 看看這些不同層面的情境, 如何互相知會。(Lull, 1987: 320)

在這節骨眼上, 安 (Ang, 1991) 的觀察相當正確。她說, 整個收視率調查業所仰仗的計算人頭行當, 植基於簡單的二分法, 認定人就分成看與不看電視兩種。然而, 經過以上引述的研究證據, 我們不再能夠認為開著電視就是看電視, 也不再能夠認為看電視就一定是很注意的看。誠如安所說, 時至今日, 愈來愈多的人已經日漸體認看電視是一個複雜而多變的行為模式, 其特色是與其他活動同時交織進行。議論至此, 當然囉, 所有收視率統計數字賴以成立的知識論基礎, 亦即簡單地將人分作簡單的「看與不看」電視兩種, 開始崩潰了。安說得是有幾分道理, 她認為我們或許可以如此作結:「閱聽人測量的整個做法, 可能已進入了不歸路: 它已然無法掌握自己的存在基礎, 換句話說, 它再也不能認為看電視是一種簡單的行為形態而可以客觀地測量」(ibid.)。

假使我們認真地推論, 那麼, 我們所要執行的研究類型, 應該要辨識並探查隱藏在「看電視」這個無所不包之類目後面, 另行存在著哪些差異。我們在不同時候都看些電視, 但我們看得認真而專注嗎? 對於不同類型的節目及情況, 我們又各有多少執著? 唯有先行找出這種形態的質化區分, 我們才能從大型調查研究的總體統計數字, 尋覓井然有序的各個構成要件。這樣看來, 我們似乎應該精研看電視是以

何等的複雜方式，被嵌入整個日常生活過程的形形色色行事——而看電視本身也局部地建構了這些行事(Scannell, 1988)。我們自有必要就脈絡情境展開探查——特定的一些傳播科技取得哪些特定意義的過程，而歷經這個程序以後，住在不同類型家戶的人，又各有哪些不同的目標、哪些不同的方式使用這些科技？我們必須在其「自然的」情境探查看電視的行為（以及影響「完成」看電視之規則）。

## 經驗主義的問題

安 (Ang, 1989) 提出了一個基本問題，此即出諸經驗性手法所做的閱聽人研究，能夠製造出哪一種知識。簡單地說，閱聽人之方誌學研究的政治，是些什麼？她很正確地堅持道，做研究本身就是曲曲折折的一種論述實踐 (a discursive practice)，它只能期望製造出具有特定歷史及文化意義的知識，而這些知識則是研究者與告知者之間，同等曲曲折折之論述遭遇戰的結果。這麼說來，就她的觀點來看，研究必然是從特定立場出發，然後詮釋（或說，甚至是建構）實體的這麼一回事；做研究根本不是像實證主義者所說地那般，不是先有一個「正確的」科學視野，而我們只要跟著這個視野往外看，就能圓個烏托邦的夢，至於其間的事實我們已全知全能，眾人再無爭議之可能。

費斯克更是認為，若說指的是經驗上可以接近的客體，則壓根沒有「電視閱聽人」這回事 (Fiske, 1989: 56)。費斯克的觀點景隨哈特利而來，哈氏將「建構主義者」的論點往前又推進了一步，他說，「壓根沒有『真正的』閱聽人，閱聽人也者，都是被建構出來的類目——閱聽人是機構制度的產物，在它們之前，閱聽人不存在，若是沒有了它們，閱聽人也不存在」(Hartley, 1987: 125)。

哈特利接著又論稱, 無論是出以經驗上的、理論上的或政治上的, 閱聽人都是可以「想像出來的」, 但無論怎麼想像出來, 閱聽人這個產品都是虛構之物, 徒然滿足了具有想像力之機構的需求。這裏的緊要論點是我們必須體認研究過程所具有的「建構」色彩, 我們應該放棄「如同其面」地「補捉」電視觀眾的想法, 因為觀眾並非整體不可分。依此觀點論事, 電視閱聽人並未能夠以經驗性存在的事實而現身, 它只展示了一個想像的地位, 在這麼樣的一個界域, 各種的焦慮與期望、鼓舞振奮與幻夢耗損人心之事, 以及「現代社會」之困境均已被壓縮。因此, 哈特利論稱, 「再怎麼說, 閱聽人都不是『真正的』, 也不可能外在於其曲折論述之建構。只有其自身被生產成爲一個類目以後, 才有『事實』存在的閱聽人可言……閱聽人向來都被當做代表來看待。」

(Hartley, 1987: 125) 經由此等已然制度化的曲折論述行事及過程, 方才能夠建構出來電視觀眾(比如, 哈特利論稱, 電視觀眾是廣電人員透過每天的論述而建構出來的); 這是非常具有價值的一個論點, 當我們需要矯正研究過程那些頭腦簡單的「幼稚實存主義論者」(naive realism) 之時, 如此強調相當管用。然而, 即便不聲稱閱聽人只「存在於」論述之中, 我們還是可以體認到任何研究過程, 必然涉及建構的這個層面。若是另有議論, 則是弄不清楚知識論問題與目的論問題之區別。很自然的是, 我們必須透過特定的一些曲折論述, 才能取得關於電視閱聽人的經驗性知識, 而這些論述包括了哪些類目或欠缺哪些類目, 問哪些問題及沒有問哪些問題, 也將決定我們所取得之知識的本質。但是, 筆者的論點與哈特利相同者, 也僅止於此, 因為, 雖說透過論述是我們認識閱聽人的唯一方法, 但在這些論述語彙之外, 閱聽人事實上仍然存在, 並不因為論述是否提及而對其存在有所影響。

如果沒有掌握這個差別，則顯然是誤解了葛雷西多年前所說的一段話：

總是有人戮力堅持意義實乃只是符號的生產，如果堅執此說，則社會的、經濟的與政治的實踐作為，恐怕就要瀕臨毫無作用之境地了。現實社會的結構與其表意，分別是兩回事，但在此堅持下，兩者亦有混同之危殆了，但究其實，我們只能說社會過程與關係必然必須透過語言而中介，而事實上語言的中介力量亦對社會過程迭起作用。但是，語言以具有決定性之效果，影響社會，固然是事實，但這並不同於說社會除開語言及其表意過程、行事以外，別無社會實體之存在。(Gledhill 1978; 轉引自 Morley 1981: 170)

任何種類的經驗性研究，必然是、總是一種再現與表徵(representation)，不是直接而無阻礙地反映先已存在的實體，這個說法很是確實，因此，我們在說明人們是怎麼使用電視時，一定涉及了我們的詮釋。誠如安所說，「經驗性資料毫無能力提供解答，但實證主義者的信徒卻樂此不疲，深信如此。」(Ang, 1989: 106)不過，說了這許多，絲毫不能減損經驗性研究的必要性，它們也不能撼動根據經驗性證據而做的推斷、評估。或許，卡爾(E.H. Carr)對於歷史之本質所提出的論點，足可與此相互輝映。誠如卡爾所說：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我們不能說由於從不同角度看山，山的外觀不同，因此客觀地說，山不成其形或山的形狀有無限的多。我們不能說由於詮釋必然是建構歷史事實的一部分，而詮釋無法完全的客觀，因此詮釋並無好壞高下之別。(Carr, 1967: 27)

安的批評別有所指, 她關切的是閱聽人的經驗研究當中, 方誌學這個特別的方法所必然有的限制, 而佛爾 (Feuer, 1986) 則直指更為基本的問題, 她根本就質疑閱聽人的經驗研究之適當性。誠如她所說, 若從接收理論的觀點看, 則構成文本的是什麼, 實在極端複雜。若從這個觀點論事, 則文本及包裝文本的種種媒介外殼(流行雜誌、廣告、產品摘要、書與公關文章等等), 也就越來越難畫分; 而究其實, 單只是想要有此畫分之企圖, 也是很有問題的。佛爾的論點是說, 這個取向渺無止期地延擱了意義的定位。論及班內特 (T. Bennett) 所說之「除非放在其活動脈絡中, 否則文本實在無可分析」, 佛爾是這麼說的:

接收理論之闡揚者要求我們解讀那些活動, 解讀(譯按: 閱聽人)之解讀成形(譯按: 過程的)文本。這樣一來, 閱聽人反應之批評變成了另一種形式的詮釋, 而它所詮釋的文本現在則重新定了位。如果我們將文本……「開放性」這個概念推至極端, 則我們只是錯置了整個詮釋問題, 因為閱聽人的反應也構成了一種再現, 就此而言則是一種語言論述。由於將文本錯置於閱聽人身上, 接收理論的闡揚者經常也在冒險, 陷入了主體經驗至上論的窘境, 此時他們認定了閱聽人的詮釋具有更為優越的地位, 遠比批評者的詮釋, 來得更為真實可信。(Feuer, 1986: 7)

在佛爾看來, 意欲以經驗性研究印證這個視野時, 必然出現的問題是:

身為作家的人眼見理論已然認定文本對於閱聽人, 擁有完全的決斷力、影響力, 因此他們也就開始起而反擊理論。然後, 他們企

圖自行解讀他們自己的閱聽人資料。就每個情況來說，評論家都得另讀一個文本，亦即閱聽人之論述這個文本。對於從事經驗性研究的人來說，賦予閱聽人之反應較為優越的地位，並無任何疑問可言。但對於接收理論的闡揚者而言，這可是一個問題，因為他們認為閱聽人之反應，僅只具有文本的地位而已。於是，他們必須在沒有任何治療情境的輔助下，解讀閱聽人無意識的部分，要不然則他們必須放棄心理分析的主體概念——在此情形下，他們選擇的分析對象，經常也就僅止於意識這個部分，或是只分析容易清楚敘述的反應。(ibid.)

佛爾的結論是，這個形態的(譯按：經驗性)研究並不必然更為優越。就襄助我們「了解觀看者對於文本之無意識反應」而言，相較於「電影理論家更只是出諸冥想、臆測，致而想像被文本定位的觀看者之各種可能的意義。」(譯按：前述的經驗性研究，不見得更好。)(ibid.)

無庸置疑，這裏所討論的許多閱聽人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無可避免地必然會遭遇佛爾所提的躬身自省(reflexivity)的問題。就我的研究來說，筆者所提供給讀者的是我的受訪者對於這些文本的「解讀」——亦即受訪者說明他們自己收視行為的那些文本。然而，歷經這個「解讀中的解讀」(readings of readings)過程所產生的知識，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地位，仍然大有爭論的餘地，筆者還是認為訪問這個方法，依舊是個更為根本而妥當的方法(其他諸如參與觀察等方法就不用說了；譯按：它們是更為妥當了)，相較於分析家只是坐在家中，想像著其他人看電視所可能有的種種隱意為何，(譯按：訪問等經驗性方法)比佛爾所說的那種冥想方式，還是更為妥當的。



以筆者的研究為例, 我會認為, 如果沒有著重參與觀察這個步驟, 而只是就訪談所得之資料研判受訪者的真實行為, 則我將只能取得受訪者願意告訴我的部分故事。然而, 這些故事本身其實受到了限制, 並且反映了受訪者所擁有的文化及語言參考架構, 正是透過這些架構, 受訪者才得以說明他們的反應為何, 而誠如佛爾很正確地指出, 這些反應著實僅止於他們所能意識到的層次。

不過, 另有其他要點, 必須在此一併提出。第一, 所謂受訪者對本身行為的說明, 是否比真實行為之觀察, 來得沒有那麼有效的問題。這裏所涉及的問題是, 觀察行為總是沒有能夠解決詮釋的疑難。在他人眼中, 我可能就只是坐在那裏、兩眼睜著看電視螢光幕, 但這個外顯的物理現象, 可能表示我對電視的著迷、投入, 也同等可能表示我對節目煩透了——而這兩種情況的區別, 並不必然可能從他人所觀察到的行為線索中得知。尤有進者, 如果你真想要了解我在做什麼, 逕自問我本人很有可能會好些。當然, 我也有可能因為亂七八糟的原因說謊, 或是因為其他理由而錯誤陳述我的思緒與感覺, 但至少經由我的口語反應, 你就開始了解我用以建構我(意識中的)世界, 到底是些什麼語言、區分的種種標準及畫分類目的依據。若是欠缺這些線索, 我看電視(或其他的)行為, 必然更是曖昧不清。

依筆者之見, 我們之所以要為訪談法說幾句話, 還不只是因為它讓研究人員得以接近受訪者意識中的意見及陳述, 而且也是因為訪談法讓我們知道了受訪者使用的語言術詞及類目(套句維根斯坦〔Wittgenstein, 譯按: 英國語言分析哲學家, 1889-1951, 出生於奧國〕的話, 就是「邏輯的鷹架」〔logical scaffolding〕), 畢竟, 受訪者援用這些術詞及類目, 才能建構他們的遣詞用字, 建構他們對本身行動之理解。

佛爾主張的「冥想式」(speculative)取向，存在著若干危險，此際的理論家只想透過想像的推敲，鋪陳觀看者與文本之定位關係；這個方式的缺失，在塞特等人 (Seiter et al., 1989b) 針對莫蕾斯基之著作的批評，已經清楚展現。塞特等人認為，莫蕾斯基所做之分析，顯示婦女肥皂劇的觀眾，硬是給文本鎖定了位（一位「理想的媽媽」，她了解劇中各色人物之所有林林種種的動機及慾望），其實只是根據一種特定的白人、中產階級之社會立場而做的推論，但這樣的推論卻未經檢視，也沒有什麼根據。究其實，塞特等人訪問了許多勞工階級的婦女，她們的回答等於是提供了經驗性證據，否認了莫蕾斯基「想像出來的」「主體一定位」關係，透過對這些階級地位不同的婦女之訪問，已經顯示莫蕾斯基提出的說法，無法涵蓋所有婦女對肥皂劇文本的觀感。簡而言之，單只是這個例子，應該可以讓我們看出，「冥想式取向」經常產生誤導，不當地只是從一些關於觀眾之社會定位過程的特定假設，就要將其分析「普同化」地一體適用於所有的情況。這正是經驗性研究可貴的地方：誠如安所說，經驗性研究可以「讓我們的詮釋保持對於具體特殊情事的敏感度，對於前所未曾預料者、對於歷史，保持敏銳之觸覺」；以魏理士的話來說，則經驗性研究讓我們得有「驚奇」的可能、讓我們可能「雖然從典範出發，但另有曲徑通幽，得出典範所未見之知識」(Willis, 1981: 90)。

## 說故事

身為主張進行質化媒介研究的人，我們面臨了一個困難：在蒐集了受訪者告訴我們的這些故事之後，最終我們又將如何說這些故事？這些問題實在無可化減，而我們亦知之甚稔。誠如多年以前，吉爾士

所做的評論：

當我們宣稱這些是我們的資料時，其實我們是在建構別人對他們及他們的同胞之建構，……在這整個研究大業之底層，如果還暗藏著事實基礎這個堅硬的石床，則我們已然是是在進行解釋說明的工作：更糟糕的是，我們是根據別人的解釋而再做解釋（Geertz, 1973: 9）

然而，誠如吉爾士所誌，了然於此並不是要我們就此放棄，打道回府，而是說方誌學家的另一個選擇方案，其實是深入積累成堆的推論及隱喻之結構，然後從這些構成日常生活交換過程所用的論述，找出他或她自己的出路。在吉爾士眼中，重要的是分析這些表意之種種結構，然後從中搜索這些表意結構的社會基礎與意義——最後再發展出他得自賴爾（Gilbert Ryle, 1949）那句知名的說法，以「厚實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手法，處理這些天生就相當可疑的「資料」。在這篇廣為人知的論文尾端（Geertz, 1973: 6-7），吉爾士引用三筆經驗性材料作為引證，表示善事區分這三者，根本不可能（「使眼色」〔wink〕、「眼睛抽動了一下」〔a twitch of the eye〕，以及「假裝／模仿性的使個眼色」〔fake／parody wink〕），吉爾士說：

必須掌握的重點是，方誌學的研究目標在於善事開發兩極之間的地帶：一端是賴爾所說的「輕描淡寫」（thin description），比如，有個人（模仿者、使眼色的人、抽動眼睛的人）在做某樣動作（「快速地收縮他的右眼瞼」）；另一端則是「厚實深入的描寫」他真正的意圖（「做一個嘲弄的動作，模仿友人假裝閃爍眼神，以此讓不知情的人以為有件陰謀正在進行」）。如此則可以找出階層井然有序的衆多意

義結構，探究在其底下，抽動眼角、使眼色、假裝的使使眼色、模仿，以及模仿之練習等等，如何製造出來、如何為人看待與理解。(ibid: 7)

## 邁向方誌學之路

電視既是一種「文本」，也是一種科技，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行事過程中，無分公領域與私領域，由於我們不時地展示了我們擁有的文化財貨及文化素養，我們也就等於建構了電視這兩種色彩，並且把它們重新放置在一個新的理解脈絡中，使二者合而為一。如果我們真想要理解這些活動的意義(事實上這些活動是值得我們理解的，因為若要知曉當代文化的滲透普及度與其力量之動態過程，關於電視的這些活動正是主要的部分)，那麼，我們就應該認真探究這些活動的詳細變化方式。若要將方誌學當做一個經驗性方法來運用，這是必有的一個基本認識。

其間可能涉及哪些東西呢？我們現在看到了漸次出現的文獻，得知在觀眾之自然情境所進行的研究，已告增多。其次，亦有消費(consumption)之方誌學的研究。任何諸如此類的研究，其起始點都是家庭或家戶，因為涉及電視的活動都是在這裏創造出來的，而說明或接合看電視之意義，大抵也於此完成。家戶與家庭都是外在更大社會與文化環境之產物，透過了它的日常互動類型、透過了它自身的內部關係體系，以及它自己的合法性與認同形構之文化，在在提供了探究自然情境下，意義之生產與消費的最佳實驗室。

西伐史東(Silverstone, 1990b)曾就此作了個類比。費耳與昆特(M. Feher and S. Kwinter, 1987)在其關於現代都市之近作的導論中，以中國

人畫鯉魚的方式為例，如此寫道：

中國畫師的訓誡是，真要畫這條鯉魚，那麼，單是知道鯉魚的形態、研究其解剖之細部，或是了解鯉魚體質上的功能，並不足夠。他們告訴我們，畫鯉魚還得摸清楚蘆葦叢，因為每天早晨鯉魚都在叢中穿梭找尋養料；還得看看那些長長的圓石，因為魚兒隱藏其後；還有水波，魚兒翻動的時候，挑起了這一陣一陣的波紋。這些元件並不只是鯉魚的環境，並不只是魚兒成長的空間，也不是天然的背景而僅供作畫取景之用。它們屬於鯉魚本身……我們必須做此理解，亦即鯉魚具有某種力量，影響了世界也被世界影響。（引自 Silverstone, 1990b: 3-4）

順此而做聯結，西伐史東據此而說(ibid.)，「傳播有若鯉魚」(communication is a carp)，而我們對鯉魚的理解，前提應該是我們必須整合魚的環境與行動，以及我們想到魚、研究魚之時的種種方式。

既有此雄心企圖，則相應必然要有一個特定的方法論，才足以匹配。因此，我們必須詳細考察傳播過程，而且要在情況許可的前提下，在真實的空間與時間裏，採取一個廣泛的方誌學立場，然後檢視日常活動的局限及行動交相更替的過程，與此同時，我們尚得研究個人與團體之行事過程與作風，因為他們參與了社會性意義之生產與消費。

這麼樣的一個方誌學及跨科際之取向，正是研究傳播所需具備的特殊之雄心企圖。這個企圖是否能夠達成，取決於兩方面的能力。第一，了解社會行動者如何界定並了解其自身之傳播過程的能力：行動者對其傳播所做的決定、他們的選擇，以及這些決定與選擇對他們之日常生活及其後之行動所產生的影響；第二，研究者本身的分析，是

否能夠含納更多結構性考量之優點（關於這些論點，進一步的探討請參見 Silverstone, 1990b；關於人類學之研究，必然涉及躬身自省這個部分，請參見 Marcus and Fischer, 1986）。這個企圖是否能夠達成，也取決於研究者運用一種以上之學科視野的能力，是否足夠。日常生活這樣的世界，並非透過一副眼鏡就可以看穿，若是從單一的角度觀察，也很難讓人滿意。透視日常生活，若要讓人滿意，必須遠近高低、左右上下取角，而我們亦須從主體之裏裏外外的辯證過程，加以逼近理解：傳記、人格、意義、行動、空間、時間、時機與物質限制。據此而做類比，西伐史東（Silverstone, *ibid.*）因此說，方誌學者與中國錦鯉畫師，所見相同也。

### 電視與日常生活：看電視的脈絡

晚近閱聽人研究之著作，相當重要的一點是研究者日漸體認收看電視的脈絡，其實無比重要。以電視為例，則這裏指的是家庭脈絡。不妨再以安開始，我們應該知道：

所謂觀眾，並不只是收看同一特定節目的所有人之集合體，我們亦須清楚掌握一個事實，此即觀眾是指收看電視的行事及其過程……因此，解碼也就必然是看電視這個一般性的行事及過程之一部分。（Ang, 1991）

當然，這樣的活動必然有規則可循。身為方誌學者，他／她的主要職責正是說明、解釋這些規則，畢竟這個活動是由這些規則掌控與佐助的。因此，誠如安德森所說，我們必須體認：



看電視這個日常行為……並不是一個未受結構限制的消遣活動……就在層層錯落而交織的行為網絡及行事之中……我們的社會實體建構了出來並維持了下去，媒介之使用是在這個網絡中完成的。舉個例子，看電視與家庭晚餐，都不是隨意而發的。這些行事之完成，有賴於行動者之素養必須足夠，而他／她們又有相當的即興學習能力。(Anderson, 1987: 164)

我們從己身之日常生活可以得知，這些看來司空見慣的程序與活動，深究起來，其實複雜十分，足以瞞天過海，而有些時候，其複雜程度還真容易使人身陷於危險之中——這些活動與程序之「曖昧不清」還真是惹出麻煩的原因(源出日常生活中，彼此已經熟知的人在進行傳播、溝通時，並沒有任何解說的程序)。因此，誠如林德洛夫與梅爾(T. Meyer)所言：

許多我們的日常傳播行為……必須具有某種程度的曖昧不清，這樣一來，(研究者)評估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發生的能力跟著也弱了一節。諷刺的是，曖昧不清正是實證科學的窮兇惡首，雖說詮釋的簡明而客觀是實證科學向來擁抱的理想。但又說回來，曖昧不清倒也是日常社會互動的本質。若是不再曖昧不清，或說，更糟的是，若是真要追求科學式的清晰，則我們習以為常、我們所認知的社會互動方式，幾乎就再也不可能了。(Lindlof and Meyer, 1987: 25)

如此看來，真心想要進入這個「自然世界」的研究者，勢必發現傳播過程其實很是曖昧不清，並且意義都是隱然若現的，她或他也就

無可避免地有若如履薄冰了。話雖如此，緣此而得到的受訪者之說法，還是可以透過「資料效度」（暫用這個相當具有科學味道的術語）這樣的觀念來傳達，究其實，效度仍然算是滿高的。林德洛夫與梅爾認為閱聽人研究，應當放在「自然的」家庭背景環境中進行，他們就此提出了強有力的說明。首先，他們認為，「透過媒介中介的傳播」本質上是一個家庭之內的活動：「人們通常在私人而熟悉的環境裏接收訊息，這是個事實，而這樣的事實顯示這些訊息的使用及選擇，將受到當下而立即的週遭氣氛、環境之塑造」（Lindlöf and Meyer, 1987: 2）。尤有進者，他們論稱，晚近的科技變遷，已經改變了媒介的傳遞體系，這也等於是說「人們可以編輯、塗銷、重新編排或跳過訊息，而這些訊息原本的形式為何，完全可以棄之於不顧。大眾傳播閱聽人這樣的既成觀念，對於飽經媒介中介的傳播現實而言，根本鮮少相關」（ibid.）。

順此思考，我們就回到了日常傳播行事及過程之研究所引以為重的焦點——為了支持這樣的回歸，反顧舒茲（A. Schutz, 1963: 59）所說的這段話，或許有些助益：「社會科學之方法論的首要職掌……在於探討日常生活中，人們組織其經驗的一般性原則是什麼。」

不消說，這段話的宗旨在於論稱現象學的方法，非常重要——若是要以系統性方法探究閱聽人在其自然背景環境下的活動，使用質化方法做為蒐集自然情境資料的工具，並且要從受訪者自己的概念架構衍展出優先分析的類目（譯按：那麼，現象學方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於此我們要再次提出簡森所說，「日常生活的材料是由意義組合而成的，除非先放在閱聽人的生活世界之總體脈絡來看，否則個人的傳播活動沒有什麼意義。」

從這個視野論事，最為重要的題旨是，情境錯落有致的日常行為，

其運作邏輯為何——目的則是要了解在其自然背景下，傳播過程如何能夠完成，而在這個脈絡裏，多種不同的公共媒介又怎麼被整編、被動員而進入了這些日常的私人世界中。

誠如安德森所說，假設我們能夠由此視野論事，探討媒介中介之傳播以及大眾媒介與家庭傳播過程的相互影響，那麼：

我們的目的也就是要解釋在家庭的結構、功能、體系與互動之內，媒介內容與科技的存在意義、功能及影響。一旦從自然的情境研究事理，則我們的企圖是記錄處於特定位置之家庭的社會活動，因為唯有如此，我們才能了解家庭的結構、功能、體系與互動，究竟在何等情況下，建構了本身的意義。我們的研究界域是處於特定位置的家庭，我們的研究資料就在社會行動之中，而我們的解釋則揭示了家庭成員所建構的社會意義。(Anderson, 1987: 163)

挨家挨戶接近私人領域，當然，總是一個程度的問題——總是有些家庭會讓陌生人吃閉門羹，而家庭某些領域也是禁止外人接近的(參見 Bourdieu, 1972a)，並且，誠如安德森所說，外人在場的時候，必然有些社會行動絕對不會在家庭出現。方誌學取向的研究人員應該心知肚明，了解本身方法的局部性、不完整與結構性的落差。

信手捻來，筆者可以在此列舉若干警語。先就任何分析都無法避免的局部與片面性來說，我們不僅必須有些自覺意識(或說「躬身自省的能力」)；並且，就如羅耳(Lull, 1988)所論稱，嚴格而系統性的蒐集並詮釋資料，任何研究都需要，質化與量化的要求並無二致。誠如羅耳的觀察，最近幾年來，「方誌學」這樣的字眼在閱聽人研究這個領域內，已經變成了圖騰(儀式性的卑躬曲膝，方誌學宛若變成了新近設立的部落神

祇)。霎那之間，人人都是方誌學研究家（方誌學者成了流行的犧牲者？）；但情況正如羅耳明確指出者，「大多數人類學與社會學之方誌學研究，一般都會就資料蒐集與報告的程序，提出若干基本要求，但文化研究輕率地自許為方誌學的研究，卻沒有能夠符合這些要求。『方誌學』在我們這個領域已經變成被人濫用的惱人字眼」（Lull, 1988: 242）。

### 方誌學與知識學的問題

就最簡單的定義來說，傳統上對方誌學者的印象認為，他或她的職責在於「走入田野」，然後透過觀察與訪問的方法，根據他或她逐日的第一手活動觀察資料，企圖描述（因此也就無可避免地涉及了詮釋）該文化脈絡的主體之行事作風與過程。

類如方誌學這種質化的研究方法，主要的目的是要讓研究者得以接近「自然化的領域」，以便知道他們的活動獨有的特色。這些質化取向的長處是它提供了較大的可能性，它提供了相關脈絡的訊息，我們因而能夠知道被研究之現象的不同面向，其關連性若何。非常明顯，這個形態的分析必須借助多種「三角」技術，如此才能協調觀察中的著作之不同面向。誠如海牡斯利與阿金生（Hammersley and Atkinson, 1983: 198）所說，這個情況可能涉及了，

在不同階段執行田野調查所取得的資料，雖說現象相同，但資料有別，因此可以比對；這也可能涉及時間循環圈的不同點之資料蒐集；或者，這也有可能是相同情境之不同參與者所做的說明、報告。（Hammersley and Atkinson 1983: 198）

基於以上理解，海牡斯利與阿金生認為方誌學就只是：

一種社會研究方法，雖說它非比尋常，這個方法截取多種來源的影響。方誌學家以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參與研究對象的生活，他們眼觀發生了什麼事，耳聽說了什麼，也問些問題，事實上，他們什麼資料都蒐集，只要這些資料有助於釐清他或她所關心的議題。(ibid.: 2)

這麼說當然已經提出了相當多的問題——比如，田野研究的界限如何畫定——我們在決定(就其潛在意義而言，實乃無限的)哪些田野調查的「脈絡」成分，應該包括在內時，怎麼知道哪些部分與手中的特定研究有關呢？議論至此，我們已經碰到了眾所熟知的辯論：到底「開放式」與「封閉式」研究策略，各有些什麼優缺點？葛瑞(Gray, 1987)曾以婦女與錄影帶的關係為題進行了一項方誌學研究，她說，在訪談的開頭，她的受訪者都想要數說她們的故事，而這樣一來，起初她很擔心訪談失了控，恐怕受訪者「偏離了」她的研究計畫(婦女使用錄影帶的情形)，因為她們所說的故事，涉及了複雜的家庭歷史及隨之而來的各種敘事。然而，誠如葛瑞所說，這個開放式的取向，優點正在這裏，它讓受訪者「述說她們的故事」，並把來自訪談者的指示壓至最低；於是，受訪者在提供了本身對自己社會位置的了解之脈絡以後，復又提供了她們使用或不使用錄影帶的資料——如果沒有這些直言不諱，那麼，不論她們如何回應這個研究題材所提出的直接問題，回答的資料相形之下，都沒有那麼具有意義了，因為重要的是她們如何看待本身的生活，以此，我們才能知道他們使用(或說，不使用)錄影帶的程度，究竟原因何在。

然而，問題還不只是實用性的高低有無——亦即並不只是脈絡的

多少(以及哪些要件)，才足以讓我們了解當事人的行事；它同時也涉及了理論上的與知識論上的問題，它涉及了特殊與概括(一般)的關係，涉及了單一例子與類目的關係。就此立論，安說，在媒介閱聽人研究這個領域，先前的許許多多著作，都是由概括化／類目化的傳統所支配，而這些佔據支配地位的取向，其知識論及其「觀眾類型」的類目化的限制，已廣為人知，在此背景底下，現在強調方誌學的研究，很是時候，至少讓主流取向由對立的一個重點加以補充——亦即關心特殊性(particularization)的問題(參見 Billig, 1987)。誠如她所說：

「收視行為」的某種展示，也許毋庸化約為一個概括化類目的一個例子，我們或許可以考慮收視行為的特殊性，將它放在具體而特定的情境再做觀察，使它與概括化之類型的其他例子，有些區別……唯有這麼做，我們才能超越統計常規，才不用再說些什麼「顯著但没有非常大的顯著意義」之類的話。(Ang, 1991: 160)

安的論點，目的是要支持諾-史提納(K. Knorr-Cetina, 1989)的「方法論之情境至上觀」(methodological situationalism)(而不是方法論之個人至上觀)——根據這個論點，則分析的優先性應該給予看電視的具體情境，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無視於情境狀況就著手於看電視的分析。因此，她認為，「看電視的微觀情境之分析，應該優先於個別式的『看電視行為』，也應該優先於總體化而有如分類學之集體名詞的『電視閱聽人』」(Ang, 1991: 162)。

多年以前，吉爾士曾經論稱，文化分析所追尋的是意義的詮釋，不應該是一種實驗性的科學而追尋律則——外觀看來謎一般的行為形式(或甚至平淡無奇)，經過文化分析之後，會得到什麼樣的解釋？因此，



在吉爾士看來，放在這個脈絡之下，理論的職掌不應該是：

企圖將抽象的規則，變做典範律令……不應該是得出通則而後冀望足以貫穿各種事例，而應該從這些事例當中找尋適用於自身的規則……我們的起點不應該是想要找出一個通則，然後將其他各個觀察納入其下，諸如此類的推論，應該起自一套（先行設定的）符號具（signifier），然後再想辦法找出一個他人能夠理解的架構，將這些符號具放置其中考量。（Geertz, 1973: 26）

吉爾士認為，方誌學的特色在於它企圖「以厚實的手法描述」活動與事件——這些活動與事件的形式如下：「一個多重的複雜概念結構……各個結構彼此犬牙交錯、簇擁成堆」（Geertz, 1973: 14），在此等情形下，大多數我們想要知道的東西，從來就沒有明言（參見 Pêcheux, 1982，該文論及傳播、溝通的交換行為，其實都相當倚重未經言宣的若干前提）。

（譯按：研究者的）職責就是解讀這些未經言宣的意義，讓它們更能為人察知，解消它們晦澀不明之處，方法則是「將這些意義放入它們自身那些平凡無奇的架構之內，再求理解」（ibid.）。

吉爾士宣稱，方誌學家無須變成、也不必模仿「本地人／他者」。誠如他所說，「只有生性浪漫的人或性喜窺探的人，才似乎會以為這麼做有其意義。」（p.13）吉爾士認為，研究程序必然是「我們先行詮釋通風報信的的人，他們的意思為何，或是他們想些什麼，然後再將這些詮釋理出個頭緒、弄出系統來。」（p. 15）分析家的說明必然也是詮釋（針對這點，吉爾士又說，這經常已是二手或三手詮釋了）。這必然是某種形式的編造（a fiction）——吉爾士指出，這個意思是說，它是「做出來的東西……〔或〕……形塑出來的——『小說』（fiction）原本的意思就是如

此——而不是指「它是」錯誤的。」(p. 15)

當然囉，吉爾士跟著又指出，我們所能描述者，已經不是「原始的社會論述」，因為我們根本不可能完整接觸它，「我們接觸的部分很小，僅限於通風報信的人引領我們前往了解者。」(p. 20)不過，實情倒也不像表面上所說的「那麼要命……因為，了解其部分的前提，並不是一定要責全我們窺其全豹。」(ibid.) 不消說，方誌學的解說「本質上就是有待辯解的」，就其本然面目而言，文化分析必然是未竟之事，因為意義總是隨人猜測，文化分析在於評估各種可能的猜測，然後從中抽取猜得較好的部分，提出解釋性的結論。但是，吉爾士旋又論道，完全的客觀固然不可能，我們卻不能以此做為藉口，我們不能放任自己的意興奔馳，我們不能騁遊於無可扼抑的主觀情緒之原野。

事實俱在，我們從來就沒有辦法「只是」描寫一個社會背景、環境——我們必然從自身的角度詮釋之，我們也必須在報告中，說明、解釋受訪者的言詞與行動。晚近關於後現代(或後結構主義者的)人類學(anthropology)之辯論，尤其在美國，正是環繞此而進行。其間，重點議題扣緊觀察者與被觀察者的關係而推演——「來自帝國的方誌學觀察家下凡而來，這位白人闖進了叢林，勝利自得地帶著土人生活的『意義』回到了白人的世界，而這些土人則根本不知道他們的生活，原來還有這些意義的存在。」(Fiske, 1990: 90)——與此相關的議題是，方誌學者究竟有何「權威」可以傳達他人的文化經驗<sup>③</sup>。許多人曾就此評

③關於這些議題的進一步討論，參見 Trinh T. Minh-ha 的 *Woman Native, Oth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尤其是有關 S. Adoltevi 的論點：「時至今日……唯一尚可能存在的人種學，乃是研究白種人吃人肉的行為。」(Adoltevi, *Negritude and Negrologues*,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Etudes, 1972; 引自 Minh-ha 前引書, p.73)。Minh-ha 探討人類學多種隱喻的態度，是將它當做是「有關開

論, 其中, 馬庫色與費雪 (G. Marcus and M. Fischer, 1986) 就此提出了「再現、代表的危機」(a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而薩伊 (E. Said, 1978) 則強有力論稱, (譯按: 西方人) 需要有一個更具反省能力的分析, 解剖「東方化」(Orientalization)——一種想像出來的地理空間過程, 它編造了「他者」, 使得他者變做是具有異國風味的知識客體。<sup>④</sup>

出以類同的心情, 雷比諾 (P. Rabinow, 1977) 強調的是, 方誌學研究的骨子裏, 正是濃得無法化約的「形象暴力」, 他堅持在諸如「他們—彩繪」故事之時, 重新嵌入「我做為見證人」之作者身分的主觀性 (Geertz, 1988)。正是在這樣的主張裏, 克李福 (J. Clifford, 1986) 與其他學者重申了 (更為精確的說, 或許應該說是進而強化了) 吉爾士的原始主張, 亦即方誌學的寫作最終必須當作是「層層編造之物」來理解, 涉及了繁複的詮釋與再現的過程。當然囉, 所有這些衍生之詞, 批評的標的都指向了幼稚型的經驗主義或是「方誌學的唯一論調」(ethnographic realism), 此二者對於躬身自省的相關問題均甚遲鈍而無有感應, 二者也都認為再現是清楚了當的透明對應關係, 是「經驗」這個引人質疑之類目的立即實現 (參見 Althusser, 1972)。

類如克李福之流的論者認為, 不可能「有個掣高點 (山頂) 來讓我們勾勒人類生活方式的圖譜, 我們不可能得有阿基米德原點來再現世界。山脈轉動無止息……我們現在是在移動的地表上開挖礦物」(Clifford, 1986: 22, 亦請參見 Carr, 1967: 27, 前已引述) 所以, 這麼一來我們也

---

言瑣談的閒言瑣談」, 當做是一種詮釋, 要之, 將它當做是「掌握原始生命之神髓」的企圖——當其本身是一種食人儀式。

④就有關「東方主義」(及其逆轉) 相關文獻的探討, 請見 D. Morley and K. Robins, 'Techno-orientalism: futures, foreigners and phobias', *New Formations*, 16 (Spring, 1992)。

就必須說清是誰在寫，寫誰，站在什麼樣的知識與權力立場而寫。這也讓我們更進而承認，媒介研究人員所提供、製造的「真實」，比如說，必然僅具相對而局部的意義——它們總是從一個特定立場建構出來的詮釋觀。誠如克李福所說，

文化的畫像絕非靜止不動。想要定著文化畫像的企圖，必然意味著簡化、排除某些東西、選擇時間上的焦點、建構自己與他者的關係，是權力關係的一種強制或協商。(ibid., p.10)

就像葛瑞所說的，既知有這些困難，則我們必須承認的事實有許多，其中之一就是體認「研究人員的主觀性，然後嚴加自律這個方法的使用。」(Gray, 1987b: 10)；或者，就像麥羅比(A. McRobbie, 1982: 52)所說，「就在我們想要提出的問題裏……我們找到了我們的自傳」。不過，這樣的認知也就等於是說，我們不應永無止境地耽溺於本身之主觀性的反省，我們應該努力經營自身的主觀性，而不是被它癱瘓了。吉爾士早已指出，要點在於，如果傳統人類學對這些議題的態度（「什麼是方誌學？別想啦，做就是了。」）引發了爭論，那麼，癱瘓暈眩於知識論之目光如豆、只見肚臍的境地（「得啦，做什麼方誌學研究，想想就是了」），則根本也解決不了問題。

克李福及其他《書寫文化》(*Writing Culture*, Clifford and Marcus, 1986)這本論文集的撰稿者，心有共鳴，他們都不認為再現可以完全透明而百分之百對應 (transparency of representation)，他們也拒絕接受經驗可以立即體現 (immediacy of experience) 的說法。他們承認，「即便是最好的方誌學文本——認真而寫實的編造——都是真實面的系統化與省約」；而方誌學家再也沒有權利、不受質疑地掠奪（「雄心萬丈的社會科學

家偷走了部落的知識, 但卻什麼回報都沒有」), 他們必然身陷權力關係之中, 因為他們企圖替研究對象的「他人」發言。話雖已至此, 但克李福仍然說出了他的期待, 他希望「政治上的與知識上的自覺, 不要變成方誌學家的耽溺, 不要讓方誌學家就此得到結論, 以為確定地知道他人, 已不再可能」(Clifford, 1976: 7)。

至於技術面(或操作層次上)的疑問, 當然還是不時有人提出, 我們究竟有多大能力能夠知道「他者」——當類目 A 的成員觀察／研究類目 B 的人, 就有人就其研究程序指東道西的批評。如果就因為「這樣的事實」, 遂使得研究失去了效力, 那麼, 做此指控的基礎, 最終看來, 一定是一種唯我知識論, 據此理論的邏輯推演, 則將產生無止境的回歸說法——到頭來我們則須論稱, 最終只有源出相同類目的一個人(而就其邏輯立言, 這個類目之成員只能有一人)可以執行研究: 研究他們自己

⑤。反對某社會類目的成員, 針對另一類目的成員進行研究, 也可以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 但這已經是性質相當不同的一個問題(雖說呈現之後, 政治上的反對理由經常變成了彷彿是知識論上的理由); 但即便是這些政治上加上知識論上的理由, 最後, 做此反對仍然是難以自圓其說的, 因為它預先排除了共同利益的存在可能性, 而按其邏輯回歸地推演, 則出現了霍布斯式的一人對抗全體的戰爭, 此時, (譯按: 人羣之)差異先已被設定是引發爭議的, 不但如此, 差異也變成必然是衝突的、是剝削性的。果真遵照這樣的標準, 舉個例子, 無論是就政治或知識論的理由, 馬克思針對勞工階級之立場所做的研究, 根本純屬無效, 因

⑤「種族符號學」(ethno-semiotics)究竟存在著哪些可能性, 這方面的探討, 請參見 J. Fiske, 'Ethnosemiotics: some person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Cultural Studies*, 4(1), January, 1990.

爲事實很簡單：馬克思本人不是勞工階級的成員。

## 後現代方誌學與「道德憂鬱症」

再晚近一些，吉爾士(Geertz, 1988)另行立意，回應了他稱之爲「遍存四靄的神經質」與「道德憂鬱症」的現象，而造成此等現象的原因是由「書寫的文化」引起的，是其他後結構主義者及「後現代的」寫作針對方誌學的寫作引起的。他這麼寫著，這些「未來的詭辯家」，或是他在另一個地方所寫的，這些「滿心懷疑而信仰詮釋論的死硬派」

(1988: 86)，確實從一個相當妥當的方位出發論事，他們懷疑馬凌諾斯基式的理想（我們要以「浸淫其中的身分從事方誌學的研究」）是否合宜，他們也質疑方誌學的說明之立論權威，是不是真要幼稚地召喚出方誌學家的「真誠」、「正統」或「在場」才能算數。誠如吉爾士所說，時至今日，「馬凌諾斯基在首度遇見新幾內亞的愁不里安達島人(Trobrianders)而做歡呼的樣子——『那種擁有這一切的感覺：描寫他們的是我……[我會]創造他們』的聲影，讓人頓時覺得這不但是僭越而冒昧，而且讓人覺得滑稽好笑。」(p.133)。

在吉爾士看來，情形已經很清楚，這種方法論上的淺見，最終根本就逾越了界限——其光景或許可以舉吉爾士對於下列情景的印象作結：「這位田野工作者自反而不縮、誠實坦白的程度，幾乎讓人難以忍受（爲什麼我這麼問呢？……他對於我對他的看法，做何感想呢？……），這位仁兄肩頭負擔如此之重，有若將要被良心折煞了，熱情如焚的使命感盤據了他整個的胸臆。」誠如他所說，「當然，循此而產生的問題是，對於真正如此信仰的人，他又怎麼能夠提筆作記爲文？遑論更進而出版之？」(pp. 96-97)。



馬西 (D. Massey, 1991b) 就這個論點所提出的意見, 如下。他提及馬喜耳-李斯等人 (F.E. Mascia-Lees et al., 1989: 15) 的觀察, 「一旦西方白人——傳統上控制知識生產的這批人——不再能夠界定什麼是真實……他們的反應就轉了向, 他們結論道『已無真實可供發現』。」若是套用哈朔克 (Hartsock, 1987) 的話, 這個問題可以這麼陳述:

在歷史洪流的這個時刻, 許許多多團體捲入了「國族主義」(nationalism) 之建構, 想要重新界定邊緣化他者的身分, 為什麼在這樣的一個時刻, 學術界反倒疑雲四起, 質問是否可能有一個概括化的理論, 可以讓我們描述這個世界, 為什麼在這樣的一個時刻, 學術界反倒懷疑, 歷史之「進步」的可能性? 這整個情況, 似乎高度讓人狐疑。為什麼竟是如此? 就在我們許多許多人, 從沉默中覺醒而開始要求自我命名的權利時, 就在我們要求作為歷史的主人而不是客體的呼聲響徹雲霄時, 為什麼竟在這樣的時刻, 主體性這樣的概念反倒成為質疑的對象? ……為什麼竟在我們正要鑄造我們自己的理論以勾勒世界時, 猶豫不確定的說法油然而升, 說是世界無法充分地理論化? (引自 Massey, 1991b: 33)

馬西又進一步指出, 山格林 (E. Sangren, 1988) 論及方誌學時, 曾表示「不論文本之中創造了什麼樣的『權威』, 它最直接的社會效果, 不是影響了政治上與經濟上, 久為殖民與新殖民強權支配的第三世界, 直接受到波及的是諸如此類之(權威)作家大顯身手之學術機構。」(引自 Massey, 1991b: 34)或許, 更讓人頓生犬儒想法的是, 誠如馬喜耳-李斯等人所論稱者, 「克李福、馬庫色與費雪等等類型的後現代人類學家, 也許自以為他們正在轉變全球的權力關係, 也在轉變人類學這個學科

本身(譯按:但實際情況又是如何?),他們也許是初試啼聲,營建了新的學術疆域,未來的十年,知識界爭搶知識上的優越性及工作機會,將要在這裏展開。」(引自 Massey, 1991b: 34)。

除此之外,許多後結構主義者關於方誌學的文字寫作,另也提出了一些立場,談及「他者」被化約為一種論述的效果;對此,我們亦有實質的反對意見——而這就是葛羅斯堡對克李福與馬庫色的批評。誠如葛羅斯堡所說,最終一來,後結構主義者的想法,「解構了他者,他者變做了方誌學家主觀之情的生產物,而此一主觀之情,反過來卻又可以被解構成論述的生產物。在這個解構的動作中,他者這個事實俱在的存在,已被解消而化做方誌學家的符號建構物。」(Grossberg, 1988: 381-382) 誠如基維士與艾林頓 (D. Gewertz and E. Errington, 1991) 論稱,即此再跨一小步就是立場的宣示了,就像他們所說的,「我們想,所以他們存在。」反諷的是,就如史琵伐克 (G. Spivak) 所說,「談及批判主體之人,正是那些尚且雍容自若而有主體位置的人。批判至大獨立的主體,久已為人所知,但它卻經此轉換,反倒真正宣示了主體的誕生。」(Spivak, 1988: 272)。

葛羅斯堡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若要充分地重新賦予方誌學一些內涵,則必須體認「確實是有一個『實體』的存在,他者並不只是我們表意體系之內一個差異的標誌」,因此不可化約成為這些體系的一部分。是以,葛羅斯堡很正確地景隨普羅賓 (Probyn, 未出版) 而論稱,我們必須「對目的論者的假設,以為他者之所以成為他者(換句話說,在我們的論述之外),是從我們論述『之內』產生的,展開知識論上的與(政治上的)批判。」(Grossberg, 1988: 382) 誠如他所一再附誌,我們切莫不要將具體存在的、物質身的他者,化約為符號學上的差異(參見 Gledhill,

見前引文)。

與此類同, 在吉爾士看來, 他願意對後結構主義者論點讓步的部分, 亦屬有限。承認方誌學的主觀成分, 其實也不過是常識而已, 這就如同承認方誌學家本身也是某種「編造」產物一般。但是, 誠如吉爾士所說, 「如果先已混同了……想像的主體與想像的客體、將編造 (the fictional) 比作錯誤 (false)、以發現為捏造」, 那麼, 「認為方誌學的書寫只是說故事……的說法」, 恐怕只會顯得益發引人爭議了。

吉爾士這裏所說的「方法論上的靈魂搜索」(methodological soul searching), 當然, 誠如他所說, 是因為學界「對於粗暴的事實、成套的程序與無涉乎情境的知識」, 已經廣泛出現了信心低落的情況, 至於學界喪失了信心, 不再認為描述可以不受限制, 那更是不用說了。放在這個脈絡底下來看, 如實照說 (telling it as it is) 的說法, 「根本就是方誌學的一個口號, 正如同這也可以當做是維根斯坦以降之哲學的一個口號, 兩者均不足取」, 而且, 「聲稱你走訪了他們的原始居住棲息地, 因此可以詮釋這些謎一般的他者」, 總是會引發爭辯的。儘管有了這些認知 (對不住啊 Tyler, 1986), 對於我們這些「鍾愛事實、描述、歸納與真實的人來說」, 這些仍然是我們必須追求並使之實現的目標 (Geertz, 1988: 131-137)。

無須贅語的是, 以人類學科這個領域的情況來說 (或至少就其中流行而炙手可熱的後現代這個部分而論), 如果放在這樣的脈絡論事, 則以方誌學從事書寫似乎相當地冒險——而這樣的情況是可以理解的。方誌學家急欲脫離他們進行研究時經常必須仰仗的權力, 反倒造成學者對於方誌學態度, 至少變成了曖昧模糊。尤有進者, 正是因為知識論上已有危機產生, 造成人們對代表、再現的本質不再有信心, 因此, 人類

學家現在更是不時提示自己「『這是一個聽得入耳的疑問嗎?』(我們怎麼描述他們呢?)，『這可能嗎?』(衣索匹亞的情歌可以用法語唱嗎?)」(Geertz, 1988: 135)。

至於我們對於己身的角色，我們也有必要理解，畢竟我們是以作者的權威身分來書寫方誌學——有此體認的原因也很簡單，這是因為所有方誌學之描述都是自家做的，都是描述者的描述(*ibid.*, p.145)。當然，重點是這樣的，「一旦人們不再只是看方誌學所生產出來的文本，而且也加以評估；一旦人們認為方誌學不僅是做出來的，而且是做出來要說服人的，那麼，做出這些方誌學文本的人，可就有更多的事要回答囉」(*ibid.*, p.138)，到了這個時候，「作家的權威身分之負擔就無法規避了，不論再怎麼重都無法規避了，此時，再想用『方法』、『語言』來取代也就不可能了，而重新將『人們他們自己』描述成……合作者，也是事有不能了。」(*ibid.*, p. 140)

方誌學「就像量子力學或是像義大利歌劇……是想像之作，沒有前者那麼精細，沒有後者那麼系統化」，如果就誠如吉爾士所說，而我們也因此體認了任何方誌學之作，其本質無可避免都是建構的，但方誌學的主要職掌，還是吉爾士說得好，還是要傳達「有些特別的地方是什麼……不管再怎麼說……[方誌學] 最重要的是要將真實呈現出來……方誌學想要達成的其他目標……最後全是根據這個前提而來」(pp. 140-143)。依吉爾士的論斷，方誌學最後是否能夠取得其地位，端視它是否有能力澄清特定的一個地方，「發生了什麼事」——吉爾士認為這就是好的與壞的說明之分別。誠如他引述稍前的一個例子所說，「假使方誌學是厚實的描寫……那麼，我們必須回答的一個決定性問題是……它能否區辨使眼色與眼睛抽動的差別、它能否區辨真正的使

眼色與模仿式的使眼色」(p.16) ⑥。

## 研究的客體

議論至此，情況應該已經相當明顯，我們在研擬質化閱聽人研究之時，面臨了極為嚴格的方法論之多重考量。如果我們無意甘冒風險，無意早熟地封閉了分析之路，無意爲了求取精確而把行動從賦予行動意義的脈絡中割離，那麼，我們所必須研擬的資料蒐集、詮釋與分析之形式與技術，均須再做細膩地展示。

然而，問題還真是無止無境，另一個尙待解決（而至爲根本）的問題是，研究客體應該如何確定才算充分。西伐史東與筆者曾在另一篇論文（Morley and Silverstone, 1990）提出，媒介研究這個領域理應重新界定，它必須包括更大範圍的科技產品在內，因爲「傳統上」只把電視孤立做爲研究對象，通常並未設定（不容許）其他新科技亦應納入合併考察。基於這樣的理由，不魯耐大學（Brunel University）的「資訊與傳播科技的家庭使用」（Household Use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研究計畫也就從這樣的基本假設開始論事，它認定時下的電視不能再只是當做孤立看待，而是必須當它是眾多資訊與傳播科技的一種，它與錄放影機、電腦、隨身聽、電話、答錄機、立體音響及收音機，共同佔據了家庭時間與空間。就此而言，我們的目標其實在

⑥ 吉爾士再次地指涉了賴爾所提的著名例子。就概念上說，賴爾問道，人眼臉移動這麼一個似乎很是簡單的動作，究竟如何詮釋，其實有許多困難（比如，到底是無意的移動，還是向朋友傳達深有意涵的一個訊號？）。吉爾士原先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參見吉氏著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Y: Basic Books, 1973, pp. 6-7。另亦參見 Carr 前引書。最後，Rorty (1978) 發表了那篇知名並且影響甚巨的評論，猛批德希達以後，文化研究這個領域所受到的影響，以及執著刻意地捍衛批判性實存主義者立場的情況，參見 Norris, 1991。

於將電視的研究，重新放入更大的脈絡架構中，在做考察<sup>⑦</sup>。以我們的「資訊與傳播科技的家庭使用」研究計畫為例，我們已在更多的社會技術及文化架構層面，重新思考電視消費之研究問題，超出了至今為止支配傳統的那個做法甚多。我們的第二個關注點是，如何透過相同的社會技術架構，研究其他的家庭使用之科技產品(尤其是那些與資訊及傳播之提供有關的科技)。我們認為，就概念這個層次來說，我們已經挑戰了時下媒介及文化研究的許多常規(及若干的礎石)，因為我們這些研究有助於我們了解現代世界中，電視及其他傳播與資訊科技佔有什麼地位，有些什麼重要性。但無須諱言的是，概念上重做定向本身，遠非足夠。接下來要做的是努力將這些概念與觀點，帶入實際生活之中，而這個步驟又要求我們對實質的經驗性(並對廣義之方誌學)研究，抱持承諾，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夠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才能以此了解各方議題的複雜性。若是透過這等眼界論事，則我們應該知道，此時電視的意義(換句話說，文本及科技二者的意義)等於是閱聽人在脈絡有致的情境中，漸次浮現的行事及其過程的屬性。(譯按：其次)我們應該了解，這些行事及其過程，是在家庭互動的微觀社會環境中進行的，既受到這等環境的輔助也受其限制。(譯按：最後，)這樣的家庭環境、行事又是錯落於(但不必然為其決定)鄰里街坊、經濟與文化的大脈絡之內，在這眾多層面與脈絡當中(文本與科技二者的)，消費貫穿全境，提供了接合的膠著劑。

切中題旨的問題是，這些活動(比如，任何一種電視節目或節目類型的觀眾之收視活動)是不是已經放入充分的脈絡中研究？誠如羅薇對自己

---

⑦「資訊與傳播科技的家庭使用研究」的方法論程序，R. Silverstone, E. Hirsch and D. Morley, 1991, 已有詳細討論。



這方面的研究所做的批評：

不論再怎麼努力，再怎麼想要消除文本的目標或閱聽人之界限，最近的接收面之研究（包括我自己的）都是以一個特定之文本的「事實上之」存在做為分析的起點，研究者總認為這個文本一定有某些類型人會加以接收。諸如此類的研究等於是讓（作者按：傳播）循環圈這樣的觀念永久地存在了，在此概念下，此一循環圈的界限分明，因此容易辨識，可以確立所在而易於觀察。（Radway, 1988: 363）

羅薇的論點（而這正是我所支持的）是說，我們必須探查貫穿日常生活中，生產流行文化及意識的所有大大小小之媒介——如果我們真要辨識傳播的交叉論述之類型（參見Pêcheux, 1982），這是相當根本而重要的一點體認。誠如羅薇所說：

按照慣例，我們專只就單一「文本—閱聽人」的循環圈而做界限分明、區域化的探查；偶爾，也只在有限情況下，我們才就理論上及策略上均很重要的論述及實踐之關連，做些探查。（ibid., p. 366）

正是因為這樣的理由，所以我們的「資訊與傳播科技的家庭使用」研究焦點，才選擇了許多不同但又彼此相關的問題，比如：家庭結構與家庭關係的關係，以及傳播及資訊科技的使用；家庭及科技體系的關係；在這些科技產品中介下，家庭與公共領域的關係；使用這些科技產品及其使用能力的社會化過程，有何不同，尤其是就性別關係來看；科技的文化屬性，這些家庭科技被建構成不止是物質的，而且是

形象財貨的過程；消費的動態過程，尤其是科技產品本身的使用，以及它們所傳播的內容之消費。我們所關心的是，對於在家中的所有家人而言，文本（節目及軟體）與傳播／資訊科技的動態關係為何？科技上的創新、社會關係與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緊密而須與相關，而家庭通常是這些元件解決彼此牽連的重要場域。就在大多數人的家庭生活，步驟已經建制難移、體系化而類型了之過程，時間的經營使用、家庭的分工狀態、社會關係及個人認同之創造與維持，均與傳播及資訊科技及其文本，有著莫大的關係。由於使用了電話、電腦、錄放影機與電視（微波爐或洗衣機就算暫時不管好啦），家庭之內的各個成員之親疏遠近、家庭與外在世界的構連，才得以在社會空間產生分合與組織化的關係。

在一篇自我批判的論文裏，羅薇（Radway, 1988）指出媒介研究在移植借用之時，將方誌學的內涵，急遽矮化縮小了。誠如她所說，就人類學用法來看，「方誌學」指的是學者與文化在一個相當長的社會互動過程的紀錄、解釋。雖說在分析時，焦點經常必須對準社會生活的某些特定特徵（如氏族、創始儀式等等），但該類紀錄、說明的用意，卻是想要以一通全，企圖了解整個社會生活的全貌。對比之下，她說：

我們這些轉向方誌學方法的人，雖說想要了解特定的一些社會主體如何與文化形式互動，但由於醉心於單一的媒介或類型之下，我們仍然還只是從一個非常有限的場域出發，我們所研究的領域硬是給畫出了一道界限；先前我們對閱聽人使用某種單一媒介或（譯按：節目）類型的畫分，至今仍然界定了我們所要研究的特定領域，身陷其中，我們猶然無法走脫。結果一來，除了一個特地

指明的因素以外, 我們也就經常物化了, 或完全忽略了其他文化方面的決定性力量……媒介的方誌學研究者……習慣於排除、不理會(舉個例子)單一的休閒活動如何與其他類似活動發生聯屬或產生矛盾, 他們習慣性地說, 這些不是他們的研究題旨。(Radway, 1988: 367)

順此議論的軌跡, 那麼, 我們應該續而論稱, 如果我們真要認真以電視做為研究目標, 則在我們研議其他取向時, 應該同等認真地探究當代社會中, 電視滲透進入日常生活的複雜性。這等於是論稱, 閱聽人被嵌入(譯按: 衆多媒介當中), 必須理所當然地被視為媒介研究的一個優先觀念。

話已至此, 不妨再回到先前已提及的論點, 筆者這理想要應和安的觀點, 她說看電視這個行為很難孤立看待, 事實上, 「就日常生活來說, 看與不看電視的分野已經急遽模糊了。就每日的實際生活過程而言, 做為閱聽人的身分已經愈來愈不具有主體位置的色彩; 人們進進出出『電視閱聽人』這樣的身分, 因為他們隨興而發, 將他們的收視行為與其他許多興趣及活動整編掛勾。」(Ang, 1989: 163)

照此看來, 誠如安所說, 慣見的用法「看電視」其實是一個定義有欠清楚的用語, 它真正代表的是多重情境錯落有致的行事過程與經驗, 看電視只不過是嵌入其中的一種活動而已。出以類同的心緒, 西伐史東在另一篇論文引用了柴頭(de Certeau, 1984)的著作, 他論稱,

電視是每天在側的生活伴侶。研究生活的這一項, 就不能不同時研究另一項。在西方世界, 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電視機……這些電視的文本、它們的影像、它們的故事, 以及它們的明星, 提供了

我們日常生活每天的談話素材。研究電視的人口衆多。但正是這個部分逃出了學界探究網的掌握，學界並沒有將這部分納入其研究範圍。(Silverstone, 1989: 77)

以此論事，羅薇也就建議，我們應該不要再「分隔」個別的社會形構，不要再將它當做一組「分立的」觀眾在收看特定的媒介或某些型態的產品；反之，更好更爲有用的做法，也許應該是採取大視野，開始探究日常生活的習慣與實踐、行事，然後當它們是「歷史主體的產物，是他們本身游牧式的轉動，歷經許多分立的結合與關係之後，歷經日常生活的經驗以後，積極活躍地、時斷時續地，甚至是相互矛盾地串連起來的產物」。有此認知，也就是要走向「一個新的分析目標……篩選永無止息、每日生活的萬花筒的不停輪轉，而媒介也就如此這般捲入了、被整編進入了媒介生態之中。」(Radway, 1988: 366) ⑧。

秉持這樣的精神，筆者不得不這麼說，若是就電視觀眾的研究而言，橫梗在我們面前的挑戰，其實在於我們兩方面的能力：第一，我們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從一個社會的及符號的（文化）現象，將觀眾的屬性建構出來？第二，我們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善事體認在日常生活的各個決定性變因之影響下，才有所謂觀眾與電視的關係可言？我們是否有能力，善事體認在觀眾每天使用其他科技，從中形成每天的傳播過程以後，才有所謂觀眾與電視的關係可言？日後的質化研究，理當有此體認之後，重新界定這個領域的研究。

⑧但另請參見筆者在本書導論的評語，筆者支持 Corner (1991) 的觀察，他說，過分強調脈絡的主張，相應有其危險。

第五篇

電視、科技與消費





## 第 9 章

# 家庭內的傳播：科技與意義<sup>①</sup>

行文至此，我們應該已經知道，電視不可孤立看待，而是應該視為許多傳播與資訊科技產品之一種，它與錄放影機、電腦、電話、隨身聽、答錄機、立體音響以及收音機，共同佔據了家庭內的時間與空間。下文所要提及的許多經驗性與理論性作品，均與電視研究這個領域有關。雖說這樣的焦點有其必要，然而，鑑於晚近關於電視的研究並未脫離傳播的整體研究範圍，我們的總體目標將設定在更寬廣的一個架構，並透過這個架構來重新將電視的研究擺在正確的脈絡中。

當然，我們亦須敏捷地注意到，有些情況下，新媒介並不只是取代舊媒介，而是與其融為一體。新的形式（如流行影帶）與傳統的傳播模式（如青少年的口語文化、閒聊網路）<sup>②</sup>。新科技可能只是將現存的家庭衝突置換到了新的脈絡<sup>③</sup>。同等重要的是，我們也須知道硬體分佈的

①本章前身是筆者與西伐史東合寫的論文，發表於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2(1), 現已做編修。再者，這篇論文則取材自「資訊與傳播科技的家庭使用」研究，詳見 R. Silverstone, E. Hirsch and D. Morley, 199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household', in Silverstone and Hirsch, 1992。

②參見 B. Gunter and M. Svennevig, 1987, *Behind and In Front of the Screen*, London: John Libbey, p. 79.

③參見前引書, p.84, 該處論及節目選擇之衝突，如何因為錄影技術及電腦科技的影響，轉化成為電視機之另一些使用方式的衝突。

變化，具有潛在的重要性：一戶多（電視）機（甚至多架錄放影機）的家庭已經出現。對於家庭生活的潛在發展方向，這些技術上的變化具有深刻意涵<sup>④</sup>。

在這個已經變化的脈絡，先前關於電視及其觀眾的許多常見假設，必須重新考量<sup>⑤</sup>。由於這個媒介的本質產生了這些技術上的變化，再要將電視孤立看待，似乎已經越來有誤導之嫌了。電視嵌入了一個技術及消費的文化之中，既是一家之文化，也是全國性（及國際性）的文化，同時是私人的也是公共的文化。

若是從傳播科技的變遷角度論事，以上提及的數點意見，已可指出我們的研究架構是個什麼模樣。但是，架構一個研究計畫是一回事，將它再做界定並加以防衛，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至於探究做為一種傳播媒介的電視，其社會及文化意義是否將因為這個架構的提出與適用，至而得到其他意涵，則又是另一檔子事。確實，關於前舉意義的探究，前人已經規避了許多問題。為什麼以家戶(household)做為研究焦點呢？為什麼把電視當做是一種科技呢？依此框架論事以後，我們對於電視觀眾及其做為消費者的行為之了解，是不是會有差異？這對未來的家庭及未來的電視，會有些什麼影響？換句話說，為什麼非要堅持電視一定要放在這樣寬廣的脈絡中看待？

電視在當代社會之位置正在轉變中，本章企圖針對這些問題提出

④前引書，p. 86。

⑤業界一位人士說，「一九八〇年的電視扮演了家庭機能，如今電視卻為家戶各個不同成員，提供了更為切合個人需要的服務。這麼一來，現今各個特定的時段與節目，刻正被視為能夠吸引屬性各不相同的觀眾之唯一領域」，*Marketing Review*, June, 1987, p.15；引自 R. Paterson, 'Family perspectives on broadcasting policy', paper to BFI Summer School, 1987。

若干解答，期望提升我們對這個現象的了解。筆者將論稱，我們應堅持進行經驗性研究，尤其是以方誌學做為方法的經驗性研究。我們極力想要研擬出來的取向，將認定電視的本質是家庭媒介，並且，一方面我們要從家庭與家戶的脈絡來了解電視，另一方面卻同時也應該從更寬廣的社會、政治與經濟之現實脈絡來了解電視。

## 電視與家庭

依此方式理解電視的「意義」，亦即文本與及科技的意義，則我們必須知道，這是在特定脈絡下，觀眾的實際收視過程所漸次浮現的一些質性。其次，我們亦須知道，這些收視行為與過程是在家庭及家戶互動之微觀社會環境中進行的，既受其輔助，也受到限制。最後，我們當然還得知道，以上提及的這些現象，是在鄰里街坊、經濟與文化情境中生發的，雖說不必然為其決定，但正是在這樣的情景中，（文本及科技）的消費行為才提供了各個接合的面向。

為什麼是家戶呢？就某個意義來說，答案很簡單。我們都在家中看電視。家庭及家戶是我們的原級環境。電視是我們社會化的部分工具，而我們在起居室、客廳與廚房裏給電視社會化了<sup>⑥</sup>。我們從電視習得一些東西：電視提供家人談話的題材，出現在電視中的形形色色，成了鄰里街坊的談話頭。我們在電視看到了別人的家庭與家戶組成狀態。我們視電視為理所當然。但電視及電視所激生的原級文化，或我們環繞電視而激生的文化，卻很少有人研究。西方及其他社會的家庭緊閉其前門，在客廳之內，人們以既普通而又獨具意義的方式，消費

---

⑥P. Palmer, *The Lively Audienc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7.

了、使用了電視及其他的資訊與傳播科技。就技術上來說，所有的螢光幕都是相同的，而同時收看相同節目的觀眾，數以百萬計，但他們收看的物理位置、他們在家庭日常儀式行為的地位，以及他們整編進入私人的、家庭的生活，卻變化多端，其變異的程度就如同看電視的個人及家庭之不同，就社會意義上來說，他們是不是有固定的收視類型及是否持續收看，具有重大意涵。人們是在一個原本已經複雜而強力的脈絡中，收看電視。住在同一家戶的人與家庭這樣的組織，其實是相互限制、衝突四起而矛盾的。他們各自有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神話，以及自己的祕密。多多少少，他們及組成他們的個人，對於來自外界的影響，採取了封閉或開放的態度；對於廣告客戶及娛樂演藝人員的表現與兜售，他們多少會有感應，或是無所感應；他們從電視中學習或得到娛樂。這個性質的快樂是家庭式的，而它的主體，不論年齡不分性別，家庭的主體。電視觀眾的身分是多重的，它嵌鑲進入了其他身分之中，家庭及起居室<sup>⑦</sup>既是觀眾的產物，也是觀眾存在的前提條件。

當然，過去若干年來，愈來愈多人體認到我們必須重新調整分析廣電的架構，目標之一則是從一開始，就將廣電放回日常生活的例行公事之中觀察、放回家庭及公共論述交織而成的網路中觀察。我們目前關心的是，傳播科技與廣電的關係如何顯現於家庭社會關係，而廣電關係又如何透過家庭社會關係之脈絡而衍展。就最簡單的一層來說，林德洛夫與梅爾講得最明白，他們說，由於人們通常是在家庭環境中收受訊息，因此，「選擇與使用那些訊息的過程，必然受制於此等環境

⑦參見 Moores, 1988 以及 Frith, 1983。

所發生的各種狀況」<sup>⑧</sup>。體認到了有這麼樣的需要，則我們必須研擬一個與時俱進的研究策略，其結果是：「研究科技與社會行為的起點……必須先行分析互動的體系，然後再檢視這個體系如何整編這個科技」<sup>⑨</sup>。

緊接著前面前述引句，作者布萊斯 (J. Bryce, 1987) 又說，「收看電視這樣的標籤，可以形容許多不同的家庭態度」<sup>⑩</sup>。我們所關注的正是這樣：有沒有可能研擬得出家庭傳播模式，足以讓我們納進不同的傳播（及其他的）活動，而這些不等的現象，則又可以共存於同一個情境，無以名之，就只簡單地說它們都是「收看電視」<sup>⑪</sup>？

所以，我們主張研究收看電視（以及使用其他傳播科技）之時，應重新調整其脈絡，將其措置於整個家庭行事過程的寬廣情境裏。然而，雖說我們承認觀眾可以透過許多方式而積極活躍，足以整合他們所見所聽於家庭生活中，但我們倒也不應該浪漫化或誇大觀眾的創造自由

⑧Lindlof and Meyer, 前引書, p. 2。

⑨J. Bryce, 'Family time and TV use', in T. Lindlof, (ed.), *Natural Audiences*, Norwood, NJ: Ablex, 1987, p.137。

⑩同前註。

⑪我的論點是，既然就大多數西方家戶來說，收看電視（及其他家庭內部傳播科技之使用）的活動都是「在」主客廳進行，那麼，若要得到最佳研究收益，則將電視及其多種相關的家電用品，合併考量，是最好的做法。現成已有許多例子可以支持這個論點：兒童整合電視收看活動與娛樂嬉戲活動的文獻，可以參見Palmer前引書，以及 Leoncio Barrios（他的論文收於 J. Lull, *World Families Watch Television*, London: Sage, 1988。與此道理類同，羅耳指出，對於許多青少年來說，收看電視（或收聽音樂）、作家庭作業都是混在一起的；而許多家庭不但同時進行收看電視與用餐的活動，他們甚至以特定節目「時段」配合特定餐食（參見, Lull, 前引書, pp. 4; 14-15）。類同地，Traudt and Lont 的分析，對我們的啓發甚大，他說雙親監理兒童收看電視的活動，應當視為兒童社會化的一個關鍵性模式（參見 P. Traudt and C. Lont, 'Media logic in use', 收於 Lindlof (ed), *Natural Audiences*, pp. 170ff; 亦請參見 P. Simpson, ed., *Parents Talking Television*, London: Comedia, 1987）。

度。有權處理文本與有權設定議程，兩不相同。認定電視是一個家庭之內的科技，則我們必須研究其家庭脈絡，觀眾的多種活動與看電視的關係，是在這個脈絡中接合而受到限制的。同時，若要做此研究，我們亦須注意家庭及其戶口組成的近似性與差異性，我們也須了解，若是放在更大的文化與社會之中，則這些家庭及家戶所據有的位置為何？畢竟每日生活世界的多種具體現象、事務，是在社會及文化的階級、氏族 (ethnicity)、意識形態與權力等議題下界定的。

但一家之內 (the domestic) 這個類目，既不單純也並不是都無爭議。家戶 (household) 並不是家庭 (family)。家庭超出了家戶的範圍。我們的興趣並非由上而下的分類，而是這樣的分類，必須來自經驗性研究，我們感到興趣的分類，必須能夠接合公共的論述，我們尤其感到興趣的是，這樣的分類事實上要能顯示它有利於家庭科技的行銷，以及電視節目與流程的建構。家戶已經變成了一個消費的主要單位，也是一個主要的行銷焦點，但消費過程或行銷及節目編排的動態進展，對於一家之內的時間、空間及行動，產生了什麼影響，我們卻沒有什麼特別的了解。因此，我們的興趣有兩方面。第一，就家戶的內部動力而言，年齡與性別差異的類型如何？因為它們對電視及其他資訊與傳播科技之使用，均有影響；第二，就家戶的外部動力而言，他們消費與使用這些財貨、服務及意義，也就界定了他們與外在世界的關係。

至此，我們的建言是，我們必須將媒介消費的研究，重新安置在其家庭脈絡之內。不過，終局以觀，文化之內與各文化之間的一家之內的空間，其組織的各種形式之分析，才是安放這樣的研究之適宜格局。筆者想要論稱的是，這些多有變化的物質環境及家戶結構，對於電視及其他傳播科技的消費模式，具有獨立的影響效果。比如，家室



(home) 的物理結構具有決定性效果，對此我們不應忽視（參見 Lindlof and Traudt, 1983）。

與此類同，最近在一項看電視的跨文化研究之結論，羅耳指出，家戶之內是否存在「特殊化」空間（specialized space）之類型，決定了不同收視模式的存在與否<sup>⑫</sup>。

## 科技再思考

湊近觀察科技的發展，立刻發現科技具有雙重面貌，一方面，科技符合了原初設計者的意圖也滿足了權勢單位的利益；另一方面，科技卻出人意表——行進於其原初建構者的背後，造成了未曾預見的後果，也產生了無法預測的可能性<sup>⑬</sup>。

爲什麼談到科技呢？我們先已提及，使用電視無法與電視周遭的其他器物分開觀察。尤其是，電視的使用與其他科技產品的使用，不能分開探討。家戶中使用的媒介科技，是有一段替換史，但媒介產品並沒有百分之百的替換情況，也沒有那麼簡單。至今收音機還是存在。錄放影機與電腦與有線電視，均與電視發生了關係，使得電視機座變成了一個「視訊展示產品」（Visual Display Unit, VDU），或是變成了窄播或互動傳播的一個工具。我們可以明顯得知，過去四十年來，家戶中的科技產品之消費，總體來看，其多樣性是增加了，而近來的研究也顯示，社會及文化方面的差異，影響它們整編進入一家之環境的速度。確實，我們可以論稱，家戶與家庭以不同方式建構了科技，他們在定

<sup>⑫</sup>參見羅耳在 Lull (1988) 的結論：E. Medrich, 1979; Kubey, 1986; Lodziak, 1987。

<sup>⑬</sup>D. Noble; 引自 B. Keen, 'Play it again Sony', *Science as Culture*, 1(9), 1988。

位之時、在使用及展示科技的類型之時(透過對公共意義的重新界定)，創造了私人領域的意義。同樣地，由於它的潛在用途愈來愈多，並且可以連結於其他科技產品的使用，因此行銷電視的人，也只把它當做另一種機器而已。無論是就其媒介或訊息性質來看，電視已然成為銷售其他科技的利器，也是一整個範圍之家用財貨與勞務的焦點(與電訊傳播競爭) ①。

我們的論點是，若要了解電視在社會及在家戶中的角色，則萬萬不能忘了電視是在市場、科技或文化所設下的脈絡中現身的。不過，這並不是說電視與其他任何一種科技，都僅只是一種科技而已，這也不是說從科技的眼光探討電視，將會使得電視的重要性消失無形。如果相互比擬，電視與其他科技既有相近的地方，也有差異之處。相近的地方是這些科技在做為消費目標而使用時，具有相對地無法為外人所見之特性，在做為私人展示的形式，它們重新建構的能力亦較接近。就其差異之處來說，主要是它們接合能力之分野，以及它們在這些接合之內，展示了改變文化與社會的高低能力：將使用者當做觀眾或消費者。

無論市場狀況再怎麼變化，我們的研究目標，仍然具體存在(materiality)，我們不能否認②。電視是一種科技(對我們來說，雖然這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實)，而電視這個科技(如同其他傳播及資訊科技)經由兩組意義

①比如，據報導，最為成功的電視企業家之一葛林(Michael Green)曾經這麼說：「推動我前進的哲學是，電視猶然是尚未被充分利用的力量。現代的影帶，有一半並非影劇也不是娛樂性的，這個事實真管用：教人動手做的影帶、小孩子的影帶。你是否知道英國的影帶店比書店還多？今日的形式正是如此。在我看來，電視是一個製造過程。電視節目與這個打火機，有什麼不同？」(The Independent, 30 March, 1988)。

②Miller, 1988。

而接合。第一組意義是由生產者與消費者共同建構的，他們買賣了這些物品之後，接著就在使用它們時，展現了各自的風格，顯示了他們是某個社區或次文化之成員。第二組意義是透過那些科技所傳達中介而產生的，而這些意義同樣也是可以再做協商或轉換的。這些科技器物被當做商品而設計與行銷，其軟體設計及節目流程與節目敘事之創作，兩者均已結構化，這樣的結構化則勢必影響（譯按：觀眾）與電視消費關係的「形態」（modalities），也勢必影響電視節目之一般與特殊修辭對日常生活的衝擊<sup>⑩</sup>。

筆者希望以本章剩餘的篇幅，簡單闡明我的論點，這個論點不但要能夠執守這些原初觀點，它還要能夠加以發揚；而它也必須明指在推動這些觀點時，在概念上與經驗上，可能會涉及些什麼。

## 解讀的問題與文本的問題

由於我們企圖重新將閱聽人納入應有的脈絡中，既將閱聽人放在一家之中的領域，也將閱聽人放在許多傳播（與其他）科技產品所構成的環境中，這就浮現了一個問題。這也就是說（譯按：眾多科技產品中），我們究竟怎麼凸顯閱聽人與電視（當然囉，與其他媒介亦然）的關係。

迄今，學界已積累了若干文字，討論「使用與滿足」取向與「文

⑩誠如西伐史東在另一篇文所說(Silverstone, 1990a)：「對於公私『文本』關係，我們應當感到興趣，對於相對有力者與相對無力者的對比與競爭中的修辭（與神話），我們應當感到興趣，對於日常生活的文化階層，我們應當感到興趣。在這階層井然的世界，我們必須弄清楚，在流形轉變成風格、商品轉變為客體，而廣播轉變為行動與瑣談的過程裏，誰在做些什麼事，留有多少空間？正是經由對於這些轉換事項的了解，我們這才能夠多少得知當代文化及其不對等發展的強弱之分。導引我們研究方向的律令，應該是這樣的問題意識，而不再是因襲的古典『誰經由什麼頻道對誰說些什麼，產生了什麼效果』」。

化研究」之軌跡，是否可能聚合<sup>①⑦</sup>。筆者在此要清楚指出，這樣的呼聲其實離了譜，究其實，研究電視觀眾必須從這兩個各有失敗之取向，汲取經驗，放棄所謂研究軌聚合之說，轉而致力於充分地處理觀眾交合於電視之際，顯露出來的繁複社會、心理、儀式上的、意識形態上的、積極活躍而主動的，以及被動消極的諸般層面。

言談至此，立刻浮現了「解讀」(reading)這個模式，是否可以適用於電視的消費。埃利思與安兩人都加入了關於電視的主流發言、議論(多個)模式的論戰<sup>①⑧</sup>，這場論戰也涉及以下事項的認定：究竟看電視是不是意有所向的觀眾，有意識而持續貫注地「解讀」著「單一的文本」？或是電視對於觀眾來說，根本只是影像不停的再現而反覆不已地流動，並且觀眾根本鮮少或未曾特地注意之？

當然，重要的要點或許應該這麼說，電視並不是單調相同的節目組合——發言、議論模式隨著不同的節目類型而變異，而呈現的模式也是如此變化，因此，單一的文本／解讀者模式，(可以想見的，)或許適用於劇情片，但並不必然適用於午休時間的雜誌型節目。如此看來，則問題或許並不是「解讀」模式是不是可以適用於電視，而是說，什麼時候、哪些類型的收看、在什麼的情景下，以及收看哪些種類的節目，可以適用這個模式而得到助益。

提出問題，反省解讀模式是否適用於電視，也就無法不再跟著提出問題，反省文本在媒介及傳播研究之地位究竟如何。在這方面，晚近最具意義的論作包括了班內特與伍考特(Bennett and J. Woollacott)、葛羅斯堡與布朗尼(N. Browne)<sup>①⑨</sup>，他們各以不同角度，質疑一個獨立

<sup>①⑦</sup>參見，比如，Schroder, 1987; Jensen, 1987; Jensen and Rosengren, 1990。

<sup>①⑧</sup>參見 Ellis, 1982; Ang, 1987。

文本這樣的概念，是否尚可適用<sup>⑩</sup>。

再近一些，布蘭敦<sup>⑪</sup>就此提出了回應，她論稱文本的地位仍屬重要。她認為，討論任何文本時，我們必須將脈絡與收看的模式說清楚，而諸如脈絡及收看模式等等因素雖然可能比文本之特色，還要來得能夠決定（譯按：閱聽人的）文本經驗，但這並不是說這樣的認知使得文本不再是一個具有意義的分析類目，也不是說所有的文本在此認知下，變成「大同小異」<sup>⑫</sup>。唯有而也總是在特定的歷史及脈絡情境中，才有「理解」文本的可能，這是事實，但這個事實並沒有要我們就此將所有這些類目打作稀泥，和成一堆<sup>⑬</sup>。

我們善事體認一家之內收視情境的複雜本質，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必然不再關注電視所傳播的文本（譯按：節目）。反之，重點倒應該是檢視不同類型的觀眾，在每天的不同時段，各以哪些模式的收視與注意力，觀看什麼種類的節目。雖說我們是要沿著片面、分裂而分神的收視基線，檢視電視觀看行為的變異，但我們倒也不是就此而認為看電視再也沒有密集、專注的情況（事實上，我們將論稱，這等密集而專注的情形是存在的，此時文本／解讀者模式是最能分析這個形態的電視收看行為）。

但有了這番認識以後，文本／解讀者這個模式是必須再做調整了。筆者認為，電視及其觀眾之關係，至少有四個面向必須考慮。第一，觀眾面對電視所激生的意義，並非僅只產生於收視當下的情境，而是在日常生活各個活動中，無時無地不在產生與持續。<sup>⑭</sup>

<sup>⑩</sup>Bennett and Woolacott, 1987; Grossberg, 1987; Browne, 1984。

<sup>⑪</sup>亦請參見 Silverstone, 前引書。

<sup>⑫</sup>Brunsdon, 1989。

<sup>⑬</sup>前引書。

<sup>⑭</sup>前引書。

第二，各種媒介互有差異。若就電視本身而論，顯然，這並不是一個問題。但是，誠如我們已經指出者，電視觀眾同時也是收音機的聽眾、電腦與電話用戶，以及書報雜誌的讀者<sup>②⑤</sup>。從一家之中的傳播與資訊環境俯視，定位電視的脈絡，則我們應該更為謹慎地確認每個關係的特殊性。

先前提及不同媒介之互異效果的論者，從麥克魯漢（M. McLuhan）<sup>②⑥</sup>以迄格林菲爾德（Greenfield）<sup>②⑦</sup>，均曾指出，使用印刷媒介、收音機、電視、錄放影機與媒介，所需要的技巧與注意模式，均有不同。這並不是說科技本身決定了人們以何種方式使用它們，而只是說它們創造了不同使用方式的可能性。

假使我們忽略了這些差異，則可能出現的危殆情況是，我們將會使得「解讀」這個隱喻僵化（譯按：而失去了準頭）。我們回應或使用這些不等媒介的方式，並不相同，但我們卻經常抱持單一的「解讀」概念，當它是一個普遍適用的術語。在提及我們與各個科技之關係的特色時，我們應該謹記，這些科技自有其多元性，而每個科技亦各自具備了許多不同的創造性用途。我們的這番體認，無須犧牲我們對特定節目或軟體的興趣，亦無須抹煞收音機與電視的差異，也無須抹煞不同文化及社會的分別。同時，我們也應該自覺，切忌過度重視較為「明顯可

②⑤安德森（James Anderson, 'Commentary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收於 Lull 前引書, p. 167）的說法很正確，他指出，「意義建構的詮釋過程並不終止於接收的過程……意義建構是……持續不已的過程，遠遠超脫接收這個瞬間……日後在我們重加使用的時候，我們還是在（重新）詮釋媒介內容。詮釋當然是始於接收這端的實踐……但接續而來的詮釋則有待另一個時機的到來，亦即人們必須認定媒介內容有些實際用途。」

②⑥這個觀點的理論背景，俱見費朗詩的「交叉論述的空間」（interdiscursive space）（參見 M. Pêcheux, *Language, Semantics and Ideology*, London: Macmillan, 1982）。

②⑦M.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London: RKP, 1964 .

②⑧P. Greenfield, *Mind and Media*,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4 .



見的」媒介，致而忽略了其他（譯按：較為隱而不顯的）媒介。

電視與觀眾之關係的第三個面向，自從柯類特與連八（P. Collett and R. Lamb）<sup>②⑧</sup>及羅耳<sup>②⑨</sup>的著作發表以來，已經為人熟知。既然我們收看電視的時候，不但注意程度不等，而且也經常同時進行著其他活動；既然我們知道電視是一家之中的媒介，而我們與電視的關係受制於我們日常生活的事件，那麼，我們應該知道我們所謂的「模態」（modalities，由於欠缺一個更好的字詞，權且用之）是個什麼意思。如果我們要重新思考「解讀」與電視或其他媒介的關係，究竟有些什麼問題，那麼，我們理當注意我們接觸這些媒介的機制，各有不同：在我們注意或不注意之間，觀眾已經整合了電視所提供的意義，而在此整合過程，觀眾又建構了電視的意義。

在筆者看來，這也就是重新檢視解讀這個概念時，必須考量的第四個面向。此時，值得爭議的問題是，各種媒介之發言、議論模式，它們與社會及文化環境的變異情況，如何產生互動關係。這裏所關心的問題是「文本」與「解讀者」關係的「如何」這個面向。西伐史東建議我們在研究這個問題時，引進修辭分析模式的若干洞見<sup>③⑩</sup>。真要這麼做，則我們應該將電視節目看成具有動機而想要贏取（譯按：觀眾之）注意與行動，因此，這些節目也就多少會遭遇到抵抗或協商的狀況。這個做法敦促我們探索看電視過程所涉及的一般及特有的機制，同時又敦促我們澄清，所謂針對電視而有的「社會解讀行為」，其內涵為何。

②⑧P. Collett and R. Lamb, 'Watching people watching television', 提供給Independent Broadcasting Authority, 1986 的報告。

②⑨參見 J. Lull, 'The social uses of televis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6(3), 1980。

③⑩參見 Silverstone, 前引書。

這樣的視野與修辭也就隱含一個意思，認定我們合當堅守具有下述色彩的傳播過程之模式：堅持探究生產、文本性與回應的動態關係，但卻無須在任何特殊意義下，賦予以上任何一個面向決定性的地位。既然電視節目生產於社會關係，復又在社會關係中為觀眾接收，我們或許可以探討在看電視的中介過程，涉及了哪些語言及符號化的技術。就現階段的目標而言，我們只需指出其間所涉及的概括化修辭過程。我們不但必須考量電視的文本性，有其修辭原則，並且要論及文本與閱聽人的關係，此時閱聽人不但是文本性的，而且也是修辭性的<sup>③①</sup>。因此，以下論及的部分，必然只能提示綱要，非常粗糙<sup>③②</sup>。

我們所關切的第一個修辭面向，與同族對應(homology)關係有關，它包括了文本及經驗時間性(temporalities)之對應<sup>③③</sup>。誠如我們先前所說，收音機<sup>③④</sup>及電視史是一部傳播廣電媒介之創造史，這部生發史之進展，恰又對應於、吻合於其潛在閱聽人在家中的生活步調。一方面是節目的編排<sup>③⑤</sup>，另一方面，比如說，連續劇的敘事性<sup>③⑥</sup>，兩者都是很好的例子，足以說明(譯按：廣電機構的)修辭，均努力地想要大規模地使文本能夠適應解讀者的韻律，而在調適兩者的過程，使雙方關係得以調整，然後固定下來。

電視修辭的第二個面向是認同(identification)。在這方面，現存的

③①參見 R. H. Brown, *Society as Text: Essays on Rhetoric, Reason, and Re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③②關於相關議題的深入觀點，參見 Silverstone, 前引書。

③③P.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 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③④Boddy, 1986 及 Scannell, 1988。

③⑤Paterson, 1987。

③⑥參見 C. Geraghty, 'The continuous serial', 收於 R. Dyer *et al.* (eds.), *Coronation Street*, London: BFI, 1980; 以及 D. Hobson, *Crossroads*, London: Methuen, 1982。

文獻非常之多，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電視的社會心理學。其中，早期的一篇重要文獻是荷頓與侯爾（D. Horton and R. Wohl）寫的電視論文，從超社會互動的觀點談論電視<sup>③7</sup>。晚近談及這些議題的研究，包括了霍布森研究“十字路口”觀眾之作<sup>③8</sup>，以及安研究“朱門恩怨”之作<sup>③9</sup>。

認同也者，並不只是觀眾及他／她所偏愛的人物之間，一對一的對應關係，它所指涉的是更為一般性的認同，亦即在許多不同層次上，顯現在螢光幕上的東西，以及觀看這些東西的人之生活、理智情感之間的對應關係。這種情形並不只是適用於寫實主義而已。若是電視文本沒有這種認同作用，還能有任何效果嗎？真讓人無法想像。當然，誠如筆者（Morley, 1980）所說，諸如“全國觀眾”這樣的文本，其修辭用意是要將觀眾當做是家庭成員而為其創造空間，而該節目本身之論述所建構的家庭形像，則是該節目之修辭想要觀眾認同的對象；然而，沒有人能夠保證這樣的企圖一定成功<sup>④0</sup>。當然，它的失敗理由，特別具有啓發意味。因此，如何透過文本而建構認同，以及人們在日常跨文本的生活當中，如何回應這個問題，都是值得進行經驗性探討的課題。

然而，電視修辭研究的另一個面向，除了廣告（advertising）領域以外，卻少見研究，此即隱喻的重要性。人們經常說，電視廣告提供幼童一整套吸引人的話語，而這些話語經常入侵兒童的遊戲世界，或

③7 D. Hobson and R. Wohl, 1956,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s', *Psychiatry*, 19 (3: 215-29)。

③8 Hobson, 1982。

③9 Ang, 1985。

④0 Morley, 1980。

是對兒童如何理解外在世界，大起作用。我們生活中所引用的隱喻，無論是成年或兒童時，都構成了日常思想及行動的主要元件（Lakoff and Johnson, 1980）<sup>⑪</sup>。

電視動員、延伸、強化或轉化每日生活之隱喻的能力，以及日常生活之隱喻——遠自勞資衝突新聞的結構、再到戰場的概念，然後是科學家或氏族少數團體的刻板印象——每天為觀眾引用，用在日常談話的諸種方式為何，在在值得仔細而認真的研究。路易士（C.A. Lewis, 1985）論稱，若要將其訊息讓人理解、掌握，電視新聞的敘事結構十分重要<sup>⑫</sup>。就兩個例子而言（隱喻及敘事），二者之所以能夠聲稱他人能夠知曉它們的意思，主要還是取決於我們的日常電視文本之形式與內容，均可為人熟知，均極為常見。

最後，（至少就本章而言）尚有附加與壓制的修辭用法。此處值得爭議的問題是，閱聽人有其自由度，可以操弄並轉化電視的文本。蘇珊·史密斯（Susan Smith）<sup>⑬</sup>就伯明翰報紙的犯罪新聞及謠言所做之研究，在這方面相當具有啟發意味。這裏我們所熟知的議題是一個社羣以本身之需要建構了新聞，但其議程卻是由大眾媒介設定的。任何社羣的日常生活經驗皆有其社會與時間上的結構，而媒介則提供了一個架構，使謠言與耳語在這個結構中，能夠持續運行不已。這裏所涉及的是附加及／或壓制動作的持續，是由作為告知者的報界，再現了互有連屬

⑪G. Lakoff and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⑫J. Lewis, 1985, 'Decoding television news', 收於 P. Drummond and R. Patterson (eds), *Television in Transition*, London: BFI.

⑬S. J. Smith, 'News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fear', 收於 J. Burgess and J. R. Gold (eds) *Geography, the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Croom Helm, 1985.

但日漸減弱之敘事，然後又以急遽方式，重新置放於「日常生活之先行修辭」的架構中<sup>①</sup>。

因此，漸次浮現的模式，亦即可能提出以修辭這個概念，修正解讀這個概念，傳達了觀眾看電視之時，擁有的是「結構化自由」(structured freedoms)。總地看來，筆者所要論稱的是，媒介的這些面向、看電視的形態，以及修辭對應之多種機制，才更能充分解釋電視與觀眾的關係，這些項目總加起來，尤其是能夠闡明在當代文化中，電視所生產及消費之意義的動態進程。

## 電視、科技與消費

以上關於「解讀」問題之所有敘述與論點，以及當代社會中，愈來愈多環繞消費而作的分析，兩者一間存在著許多對比的關係。我們將在這一小節將電視當做一個消費客體而論事，電視具有雙重的接合意義，本身具備了意義之外(電視的行銷及佈署功能)，電視也是意義的負載者。電視是繁複之意義經濟學(economy of meaning)的焦點，我們的目標在於了解這個現象。電視、錄放影機、有線(cable television)與衛星設備，先是購買，後是使用，然後這些器物也就併入了其使用者的日常生活之中(這些器物是被當做科技產品、被當做意義的負載者而使用的)，如此一來，這些器物的地位也就從商品而變為消費目標。人們購進之財貨，其意義為人取用並做了轉換，化做上下高低各有區別之社會網線，每件財貨都各自找尋認同及地位。假使我們有意了解電視為人使用或可能為人使用的方式，究竟具備了什麼意義，那麼，我們就必須

---

①M.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了解，日復一日，公共性及私人消費行動所做的選擇，其本質與後果為何。

這裏值得提及的要點有二。第一，所有的消費均涉及了意義的消費；究其實，所有的消費均涉及了消費者製造意義的過程：

在可用時間及空間之內，個人透過消費來表明他自己的質性，同時也交代了他的家庭、他的在地性（無論是在鄉村或是在城鎮，是休假中或在家）……消費是一個積極而活躍的過程……於此，所有的社會類目再三得到精煉的機會<sup>⑮</sup>。

雖說來自於不同的學科之視野<sup>⑯</sup>，但這段話的論據之企圖，在於確認大眾消費的變化質性，尤其是與消費財之消費有關者。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整體社會消費趨勢，明顯可以看出是從財貨與勞務之公共性消費，轉移至科技產品的私人消費以及在家中自行提供家庭勞務<sup>⑰</sup>。以上說法，幾乎完全由功利主義之架構來理解消費，儘管如此，消費的主要面貌，其實是漸次浮現之自我服務之經濟體的元件，而隨著資訊與傳播科技新浪潮的推波助瀾，自我服務之經濟體可望擴大。就此立論，消費也就是生產，而我們理解中的生產，則必然日趨進入家庭。廣電資源之提供，晚近（而可以預測的是，未來亦復如此）的變化趨勢是財力決定了選擇之有無，此時，挑選節目（比如，以付費〔譯按：按片或按頻道〕形式出現的電視）開始愈來愈像挑選財貨一般。依此論事，我們倒也可以說，電視做為媒介與電視做為訊息的消費，已然聚合<sup>⑱</sup>。

<sup>⑮</sup>M. Douglas and B. Isherwood, *The World of Good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0.

<sup>⑯</sup>J. Gershuny, 'The leisure principle', *New Society*, 13 February 1987; J. Gershuny and I. Miles, *The New Service Economy*,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3.

<sup>⑰</sup>參見 R. Pahl, *Division of Labour*, Oxford: Blackwell, 1984.



然後，客體的消費與「文本」的消費之對比也相當明確。舉個例子，不妨試著比較霍爾分析解碼過程之經典論文，以及晚近若干論消費之一般屬性的文字：

衆多具有內涵意義的符碼，彼此並不相當。任何社會／文化均以不等的封閉性，強制將其社會、文化與政治世界的諸般分類（譯按：加諸其成員）。這些類目則構成了一個優勢的文化秩序，當然，這個秩序並非單調同音，也不是沒有異議<sup>④⑧</sup>。

所有的……客體……均是商業利益及工業過程的直接產物。總合說來，這些客體似乎隱含著一個意義，此即在某些情況下，某部分人能夠取用諸如此類的工業產品之客體，並利用它們做為創造己身形象的利器。在另一些時候，卻另有佔據主流優勢地位的一羣人，他們創造了與其不同的另一些人之形象，並且這些人被迫只能在根據這些形象所創造之客體中生活，或是透過這樣的客體而生活。而重新調整前述脈絡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對於任何一個既定客體而言，這可能必須取決於它所擁有的歷史權力而定，若是就一個特定的個人而言，則取決於他或她的社會環境之變化<sup>④⑩</sup>。

誠如米樂 (Daniel Miller) 所說，消費的基礎之一是其效用 (utility)，而其根基則是人類之需要 (need)，但無論是效用或是需要，均沒有能

<sup>④⑧</sup>參見 N. Garnham, 'Contribution to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 收於 R. Collins et al., (ed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Sage. 亦請參見 Hartley 前引書及 J. Fiske, *Television Culture*, London: Methuen.

<sup>④⑨</sup>S. Hall, 'Encoding/decoding television discourse', 重印於 S. Hall et al.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1981.

<sup>④⑩</sup>Miller, 1987, p. 175.

夠窮盡消費。又誠如道格拉斯與伊雪巫 (M. Douglas and B. Isherwood)<sup>①</sup>及薩林 (M. Sahlins)<sup>②</sup>所說，消費是建構意義的一般過程。若是套用米樂的話，則我們可以說消費與「日常生活文化的內化」有關<sup>③</sup>，而內化則是將日常生活所可能造成的疏離可能性，「重做正面之脈絡化」。

米樂的關注焦點，在於透過寶笛與道格拉斯及伊雪巫的相關理論，找出一個位置可以讓他將消費當做是文化活動的一種。米樂認為，寶笛的立場並不一致，他並沒有能夠查知消費的本質是分裂的；他認為寶笛只是將消費化約為社會階級之分化判準，但對文化工作的創造及轉換，敏感度尚嫌不足<sup>④</sup>。

米樂注意到了道格拉斯與伊雪巫的著作，也有類似的重點強調，他們強調消費另有非功利性色彩，因此從財貨在社會生活中所發揮的表意、符號及定向功能，檢視財貨。但他進而論稱，強調財貨之認知重要性的後果，往往也就低估了它們的物質性，尤其重要的是，這很可能就忽略掉了界定及限制這些財貨之使用時，權力、利益與意識形態所扮演的角色<sup>⑤</sup>。

穿插併舉了這兩個消費觀以後，米樂其實是想將他的分析置放在一個既主觀而又客觀的架構中，他也想要從形象及物質雙管齊下，凸顯兩者的特色及相關之處。若是真要了解消費，關鍵在於我們必須體認，(譯按：形象與物質之)互動的可能性，隨時存在。透過消費而凸顯

①參見 Douglas and Isherwood, 前引書。

②M. Sahlins, *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③Miller, 1987, p. 212。

④同前註, p.154。

⑤同前註, p.145-6。

的客體之社會等差，並不必然是社會分化的表達（究其實，一個大眾消費的世界，並不致於此），也不必然表示生產者就有權力決定產品的使用方式；並且，客體本身的內在質性也不必然能夠界定或決定產品的使用方式。米樂提醒我們，消費涉及了轉化（譯按：形象與物質關係的）可能性，但同等重要的是，在特定的一些環境下，這個轉化是有些限制的。

我們已在米樂的論點駐足良久，因為我們認為他的論點提供了一條重要的線索，在這一片廣大而又欠缺理論關照的領域，不但引領我們了解消費的本質，而且也讓我們了解電視觀眾的本質。觀眾具備能力，有辦法以具有創意的方式接觸、詮釋電視的內容，我們對此知之甚稔。我們也知道，維持團體動力以及維持個人對團體的認同，有賴於那些意義的傳播、擴散。米樂的論點讓我們也能同時了解，所有消費行動都涉及相同的過程，而它也似乎讓我們看清楚了消費文化以其多方面貌，將閱聽人嵌入其中，在這樣的消費文化裏，多種科技與多種訊息並排錯置，兩者均內含了意義的創造過程，內含了日常生活的多種創造可能性。若是從此觀點論事，則消費也是一種修辭活動。

本章旨在提供架構，俾便我們得以重新定義與分析電視，在此架構之內，電視的地位乃是一種家電科技。重新做此建構，實乃有兩大雄心企圖。第一是重新調整電視的問題叢結之焦點，使其能夠進入更大的脈絡之中，而我們將論稱，這個大脈絡才是更為充分的社會／技術及文化架構。第二是將其他家用科技產品——尤其是與提供資訊及傳播資源有關的產品——納入這個相同的社會／技術架構。就概念這個層次而言，我們自認為提出了必要的挑戰，直指時下許多媒介與文化研究的常規（有些甚至是它們的基石），（譯按：做此挑戰是必要的，）因為這些研究的成果，對於我們了解現代世界中，電視及其他傳播與資訊科

技的地位、意義及重要性，均極相關。

## 第 10 章

# 電視消費是一種商品關係

---

電視的消費過程本身，已經進入商品化階段——就是說，節目之挑選（這裏指的形式是按片付費或另須花訂費的影視節目）已經越來越接近於消費財的購買——在這樣的階段，本章的分析焦點，在於探討我們應當如何理解做為消費者的觀眾，以及電視的消費過程。

### 電視的「商品化」

在《萬事萬物之社會生活》（*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這本書中，阿帕杜賴（A. Appadurai, 1986）分析了商品如何與人相同，亦有其享受社會生活的多種模態（modalities）。他所關心的是，在空間及時間流傳的萬事萬物，究竟以什麼方式，受到不同「價值機制」（regimes of value）的中介影響。依此觀點，則所謂的商品就是「用來交換的任何東西」；此時一件東西是不是商品，並不取決於其內部質性，而是決定於交換過程的本質。因此，所謂商品並不是某種型態的東西；反之，阿帕杜賴認為，我們應該將萬事萬物均視為「潛在的商品」，並將這些萬事萬物（擬人化，終其一生）進進出出於「商品的狀態」。所以，「商品」也者，並不是萬事萬物的某種分類（由其內部特性所定），而是某些事務一生歷程的某個切面。與此道理類同，阿帕杜賴說「奢侈品」並不是這些事

務之特殊類目，反之，「奢侈品」所是某種消費的「特定標誌」，所以任何特定商品都可與時遞變，進出這個「標誌」(Appadurai, 1986:〈導論〉)。我們大可論稱，現今關於電視營運經費的取得方式，(譯按：英國)逐漸由一視同仁而平等的執照費，轉而依附於愈來愈多的廣告、訂戶收入(或按片付費)，則其間涉及的不再只是電視收看過程的商品化現象，而同時也改變了交換過程的「價值機制」之動態關係。它也涉及了不同團體(廣告客戶與觀眾的對立)決定生產機制的權力，此長彼消的演變，(譯按：廣告客戶)得到更大的特權，(譯按：而觀眾則)失去若干權力，其次，個別觀眾與電視收看過程的關係，無論是其模態或能力，均已改變(比如，觀眾變成只是消費者，不再是公民)。

筆者將在本章末尾就這些議題再做闡述。此刻我們還得就電視的定位問題，再做點說明。就其做為一個消費客體而言，電視已然十分繁複，但我們仍然必須同時沿著各種不同面向，考察電視現象。第一，電視機(以及家戶中的其他科技產品)已經是家庭裝潢中，一個具有形象意味的品項；電視機也是一種(設計及品味的)選擇，它反映了電視機擁有者(或承租電視機者)❶的某些訊息，而電視機在家戶所佔之地位則傳播了設計及品味選擇的含意(參見Borudieu, 1984; Leal, 1990)。

或許，蓋爾(A. Gell, 1986)所述斯里蘭卡的牧瑞亞(Muria)漁民，最能夠戲劇性地說明此一過程。當地富有的村民買進了電視機以後，通常將電視當做是他們「富有之符號具」(wealth signifiers)，是他們個人蒐藏品之中，最為重要的一種，儘管該村由於缺少電力供應，因此再怎麼說，電視機根本無法操作使用。但再怎麼說，電視機這樣的客

---

❶譯註：英國家庭租用而不是購買電視的情況，遠比台灣普遍。



體還是具有十足的象徵意義，這就如同我買了一部日製的新型平面螢幕電視機<sup>②</sup>，但卻不管是否扭開來看一樣。確實，晚近促銷平面螢幕解像電視機的廣告，設定的目標是市場上階層的「選擇性收視戶」，而它選定的訴求主題正是說，「看得越少，則在看的時候應該要求更高的標準」。客體的形象功能，並不僅限於異邦人士的生活方式而已。所有這些現象應該都已經提醒我們，這些林林總總的消費形式，根本上均有它們的象徵面向，消費不只是／不總是僅限於其「理性的／功能性」的使用（參見 Douglas and Isherwood, 1980）。

就舉個眾所周知的現象罷。許多英國家庭都把家用電腦擺回了原先的紙箱裏，堆在樓梯間。我們怎麼理解這樣的現象？筆者認為，就這個例子而言，第一，電腦之所以吸引人，原因在於它讓人有個印象，以為「知識機器」就在身旁（一套最新／最現代化的百科全書），而化做商品形式以後，它促使文化資本讓更多人擁有；第二，對於許多電腦消費者來說，購買這個客體的動機根本就是非理性的；這也與獲取電腦已成為一個圖騰有關（「我家擁有未來的符號；我的小孩有福了」）。第三，當然，另有一項事實必須承認，此即有錢買電腦並不足夠。要讓電腦「工作」之前，總得先要擁有若干形式的文化／技術上的知識：缺此，則電腦也就很可能縮回箱子裏，躲在樓梯間。

究其實，我們應該說電視具有「雙重接合」的質性，因為電視的訊息本身為人消費（其意義則在設計及行銷時，已先被設定，而稍後才有意義之協商），但這些訊息又催生人的消費動力。電視提供的各種訊息，提供了進一步的消費商情；而另有一些情況是，透過電視的購物頻道或節

---

<sup>②</sup>譯按：開發這種新電視的主要動機之一，在於因應高畫質電視時代的資本需求，尚少見人使用，因此是地位的象徵。

目，觀眾在決定消費意向之後，可以逕自對外傳遞並訂購財貨等等。

依此來看，難怪羅賓斯與韋伯斯特(F. Webster)要說電視其實不妨視為「廣告的第四面向」，其效果僅只次於推銷員現場親自拜訪，不管家庭之門窗如何緊閉，電視是商業界登堂入室、向全國民眾傳送其訊息的管道。與此說法類似，康拉德(P. Conrad)認為：

電視機本身就是消費至上主義的勝利品……它也是消費財生蹦活跳的一個劇場，出現在電視遊戲或廣告裏。單是看電視這一回事，就讓我們成為雙重的消費者，一是這個媒介的觀眾、湊熱鬧之人(spectators)，再就是做為電視展示之財貨的潛在客戶。螢光幕有若櫥窗，機身則是倉庫。(引自 Robins and Webster, 1986: 34)

不過，再怎麼說，電視機的存在脈絡都是家庭，而這個脈絡決非僅只是「背景」。真實的情況是，家戶的物質屬性(有暖氣設備的房間等)，以及分配房舍之空間的文化規則(參見 Bourdieu, 1972a)，經常也就決定了誰為了什麼目的而以什麼方式使用了電視機。這正是大多數消費理論(電視或其他東西的消費)的「黑箱」；我們似乎不怎麼知道在其原級脈絡(譯按：指家庭)下，在家庭「緊閉之門戶」背後，人們進行消費活動時，是幅什麼光景(參見 Silverstone, Morley et al., 1989)。

側身這個領域的論者五花八門，他們都說，時下已見到了趨勢，家戶中的媒介傳送體系日益走向個人化，而這樣的趨勢有其潛在意義、後果，不過，這個觀察尚待進一步澄清。家中也許有許多架電視機，但它們在誰的房間呢？而誰又分到最舊的那部黑白電視機呢？如果主要的電視機還是放在最舒服的房間，則「看什麼節目」都還依然是個充滿衝突的問題，家中的不同成員猶然必須使出渾身的協商技巧(譯

按：彼此協調要看什麼節目)，所以，消費單位還是家戶(household)，不是個人（參照「購買商品的協商情況」等等），因此，消費的物質基礎與具體脈絡還是在此過程中，產生了決定性作用（參見 Spigel, 1986 及 1992）。

不消說，在電子互動器材有了長足發展以後，所有這些情勢在類如美國哥倫比亞公司的“家庭購物俱樂部”（Home Shopping Club）這樣的節目，達到了頂點。戴斯蒙（J. Desmond, 1989）曾就此做了研究，他提供了一個很有趣、引人入神的報告，說明收看“家庭購物俱樂部”這個節目的情形：

我第一次轉到“家庭購物俱樂部”時，登時被黏住了，連續看了三小時。我在那裏坐得目瞪口呆，雙眼望著項鏈、耳飾、陶瓷鳥、微波爐……排隊川流而過，讓人著迷……要讓自己不抓起電話就打，還真要克制很久……唉呀，珍(Jane)，我說，想起銀行帳號，真讓人擔心。但我的天啊，兩個柚木餐盤才十元，這是我第一次購買，又有五元的減價，這不等於五元而已嘛！我並不真正需要柚木餐盤……但這可是個大減價呵……最後，我買了，公共電視系統的口號貫穿了我的心，「電視有看頭」。(Desmond, 1989: 340)

當然，這並不只是一個「美國現象」：英國的「藍天衛星電視」(Sky Television)現在也有這種節目，取名“家庭購物電視網”(Home Shopping TV network)，口號是「回家逛百貨公司」。

## 消費是個一般的過程

晚近一些年來，人類學家針對消費的問題，提出了許多議論；筆者這裏將簡短勾勒不同的架構，分別是道格拉斯及伊雪巫(Douglas and

Isherwood, 1980)、米樂 (Miller, 1987) 所做有關消費的分析，以及社會學家，如寶笛 (Bourdieu, 1984) 與柴頭 (de Certeau, 1984) 之作。兩極化的對比是簡單可見的：以消費為物質過程，以消費為符號過程；以消費為積極活躍而具有創造性，與／或以消費為消極被動而命定的過程 (參見柴頭的隱喻，「生消」[prosumption] 或「生產性的消費」[productive consumption])。道格拉斯與伊雪巫所提供的是消費符號面向的分析。他們所採取的是鮮明的觀念論立場 (與布西亞 [J. Baudrillard, 1988] 並沒有什麼不同)，在這個立場界定下，財貨就是「資訊」，財貨「是個很好的思考線索」，此時消費被視為是非常積極活躍的過程，個人透過這樣的過程「說了」一些他或她自己的事。在此程度內，他們的論事立場與次文化理論家，如黑迪吉 (Hebdige, 1988a)，並沒有什麼不同，他們所關切的是如何凸顯消費之非效用的、形象的及傳播的 (或「表意的」) 面向。但是，誠如米樂 (Miller, 1987) 所論稱，道格拉斯與伊雪巫強調財貨的認知層面之重要性時，卻同時導致他們低估了財貨的物質屬性，並且導致他們忽略了權力、利益與意識形態的角色，忽略了它們界定與限制財貨之「使用」的事實。

高丁 (Golding, 1990: 91) 倒也提醒我們，對於一九六〇年代的「人人都是中產階級」(embourgeoisement, 譯按：亦即主張隨著物質條件之豐裕，貧窮者已日漸減少) 理論家，洛克烏 (D. Lockwood) 的反應值得我們再記一筆：「若就社會學意義論事，假設人們想要這種(消費財)，則他們(只)想拿這些財貨當做地位符號，那可真是發瘋。一架洗衣機就是洗衣機。」

米樂 (Miller, 1987) 極為關注的是，我們如何將消費視為一個物質的「工作」轉化了商品之過程，而在此轉化以後，這些商品等於是歷經了儀式而展編成為「在地」(local) 文化的一部分。不過，不同於道

格拉斯與伊雪巫，米樂對於權力的問題極為敏感（比方說，米樂相當注意廣告及五花八門之行銷技巧，在建構種種客體之「優勢」影像，以及這些客體應當如何使用才稱允當之「優勢」影像時，均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此限度之內，我們可以說米樂的論事角度，與柴頭略有相近之處，因為柴頭關注的是日常生活行事的「逡巡戰術」（perambulatory tactics），每一個人在此生活過程，無論是就其生產或其消費能耐，均具有若干可以自行操縱的「創造」能力，在自己可以支用的資源之內，滿足本身的目標。此外，柴頭所致力分析者，並不是「邊緣的」過程，不是少數／旁觀湊熱鬧式的（minority／spectacular）次文化之偶發活動，而是大眾文化的日常行事過程。但是，我們應謹記在心，弱者、窮者或被人支配的團體，擁有的是「戰術」，而強有力之機構制度則擁有「戰略」，柴頭心目中對此二者之畫分，向來極為清楚而明確：若是從這樣的分野論理，則終極以觀消費的「創造性」面向，終歸只能偷偷摸摸地在轉瞬間「偷來的陣地」，略事發揮。所以說，若說傳播科技的創造性使用（戰術）尚有運動之空間，則它所能夠運行的場地，已經先由強有力之設計、包裝、行銷與廣告之機構，以其多量的論述（戰略）所呈現之優勢影像所盤據。議論至此我們就走向了寶笛，他再三提醒我們，消費者用來「創造意義」的（形象及物質）資源，其本身之分配原本就是在深刻結構化之歷史過程中進行的，而這樣的分配當然是不平均而不公平的，不同類目的人所得資源也就互有差異。如此看來，假使我們還要將消費視做是一種積極活躍的過程，則它也總是在前述結構性限制、壓力之內，四處遊動（或與其對抗）。換句話說，這是一個辯證的過程。我們所應該關注的是，身處不同社會／文化位置的人，在其「闖出」（worked out）那些至為根本之過程的變異實況時，其變異為何。真

正必須正視的問題是，消費賴以進行、完成（或「表演」）的物質及形象等等形式的「資本」，其社會分佈狀態為何。

## 電視與公民

許多評論者已經指出，一旦電視節目之是否可以觀看，日趨取決於人們付款看電視的能力，則我們已經不再能夠認為空中電波是眾所分享的公共資源。資訊、教育與娛樂之供應情況，日益進入了現鈔紐帶的「價值機制」而為其決定，此種色彩越濃，則電視對公共文化的作用，也就日益分殊，決裂於「資訊富者」（information-rich）與「資訊貧者」（information-poor）之間。經常聽人提及的「更多更好的選擇」，於是只能由尚有 ability 給付新科技產品的人享有。就此而言，既然近用公共資訊及文化資源的多寡與良窳，已然越發取決於公民（citizenship）付款購買的能力，那麼，社會公民有效參與公共領域事務之能力，自然也就相應的分殊了。

高丁（Golding, 1989）與梅鐸（Murdock, 1990）均持此論點而撰文，他們專研近用資訊過程的不平等，取決於經濟因素的情況（參見 Schiller, 1981，作者從國際面向論列了這個觀點）。是否持有媒介硬體設備（如電話、錄放影機與電腦）以及所得高低之間，存在著簡單的關聯性，誠如高丁所說，

對於手頭寬裕的富有家庭來說，進入新媒介這個遊戲場，相對而言，可以說是便宜的（依其佔總收入之百分比來看），只是小小（而輕易地）調整支出類型罷了。反之，對於左支右絀的窮酸家庭而言（這種情況在英國當然更是加據了，因為晚近的趨勢是所得差距拉得



更大)，他們所要支付的代價實在是機會成本的精打細算，近用傳播財貨的考量，縮擠在食衣住與燃料等日常家用的斤斤計較聲中。

(Golding, 1989: 90)

近用傳播資源的機制，一旦取決於金錢，必然造成不同社會及經濟團體近用機會的不平等。根據高丁，在我們眼前浮動的是，由於「資訊貧窮」使然，「公民色彩之減弱」(attenuated citizenship)的種種形式，已然戲劇性顯現，其中最有關係的是電視，因為電視在文化生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若是套用梅鐸的話，則是「一九七九年以來最高與最低所得者的差距，持續拉大加劇，(按片付費、訂戶費等等的)結果是，社會當中最窮的這批人再也沒有機會近用完整範圍的資源，而他們完整參與政治生活、發揮有效之公民身分的機會，也就全部淪空」(Murdock, 1990: 87)。在梅鐸看來，「英國廣播協會(BBC)重新定位，將其閱聽人當做是消費者，當做是名分上的股東，認定這些股東要的只是『物超所值』(value for money)，再無他想」，正是這種情況的證據之一。

「資訊差距」(information gap)這個概念容或失之於簡單，但經濟上的貧窮阻卻了獲取文化資源的能力，後者則又進一步造成貧窮之人的不利境遇，這幅景象倒真是實情的寫照，如假包換。

潛藏在後面的問題只有一個，或許，這個模式過度強調物質面：如果資訊差距真的只是財經能力之限制(而與文化方面的局限不相關)，那麼，寶笛(Bourdieu, 1972b)舉參觀「免費的」博物館之次數，做為階級構成要件的一部分，也就沒有必要，另外，(譯按：如果財經收入真的是唯一的限制，那麼，)使用類同的「免費」或補貼的服務(比如，游泳池、圖

書館、醫療服務等)也就不致於有利於中產階級,但究其實,(譯按:實徵資料是顯示這些公共服務更為有利於中產階級)在重新界定「資訊差距」這個模式時,我們或許應該加入更多一些的文化因素,畢竟文化方面的眾多障礙,也有非常具體的效果。

## 電視及流行品味

經常有人論稱,廣電「解禁」而日愈依賴廣告收入的資源,將逼使電視往下層市場移動,而其結果將使得觀眾的真正選擇空間為之減少,而且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譯按:英國)「高品質電視」亦將為之而終結。當然,與此同時,越來越清楚的趨勢是,由於廣告客戶對整個人口羣之上層市場亦深感興趣,前述所說之選擇空間減少而高品質節目之末日,並非新電視情勢的全部故事,因為多種不同形式的「高品質」或創新節目還是有客戶會贊助,這是為了吸引他們所企圖吸引之「目標」觀眾所致。但持此論調的人又說,也只有富有的少數人能夠得到這樣的服務。以上所轉述的意見,當然並無錯誤,但這個意見所隱設的另一個(alternative)公共廣電模式,卻另有其問題,因為傳統上創設於英國的廣電「公共領域」,其本身同樣一直是重重地受制於階級(及地域)因素。這點正是康乃爾(Connell, 1983)的主要論點,他指出創立於一九五〇年代的「獨立電視公司」(ITV),無論是在其本身節目之拍攝或流程安排,或是英國廣電協會(BBC)為了因應而做的調整幅度,均可以說是具有相當的「進步」意味,就其內在機制而言,ITV 原本內含了驅力,促使本身「與流行品味的結構,產生某種程度的結合」,但(譯按:我們習知的、當時的)公共廣電機構(譯按:指 BBC),則不必一定有此結合。③

這個論點也是我所理解的葛蘭西式的霸權觀，從事文化研究的人，總企圖援用這個概念而不是「主流、主控、優勢意識形態」(dominant ideology) 這個說法，他們想藉此捕捉串連「流行」與「商業」這兩種現象的多種文化力量。

再換到另一個脈絡論事，我們亦可認為，過去數年來，許多更具有進步意義的公共福利機構，得以產生並提供相當廣泛之服務，原因正是因為它們開始運用市場行銷的若干基本考量，根據市民真正感受到的分化之需要而提供服務，這已經不是傳統上「一視同仁」之形式所可以概括。

與此議題相關的自然是「國際化」的問題：套用米蘭 (Milne) 那句不朽的術語，很多人恐懼廣電解除管制以後，「家家戶戶都看“朱門恩怨”」(wall-to-wall Dallas) 的情況將因為這類型節目的源源不絕，致使我們的國族文化及認同橫遭破壞。針對這個問題，筆者提出的質疑是，「誰的國族認同？」華波爾 (K. Worpole, 1983) 及黑迪吉 (Hebdige, 1988b) 等等學者所做的研究，正是說「國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 這個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實乃嚴重受到都會及階級偏差之結構限制，他們因此論稱，看在勞工階級的眼裏，這些「外來的」文化客體、產品（從美國的犯罪小說到義大利的速克達機車），經常搖身蛻變為具有正面意義的文化偶像，這些外來節目晉身為勞工階級的文化資源，正是由於它們的「粗鄙庸俗」，他們才能據以衝破國族品味的階級結構之限制，須知，這些品味是由既定品味類型（譯按：根據其利益而）界定的。

因此，柯林斯 (Richard Collins) 曾引用一九三〇年代所做之「世界

---

③譯註：關於英國左翼學者對該國廣電制度的辯論，請參見Richard Collins (1993) 的 'Public service V. the market ten years on', *Screen*, 34 (3: 243-259).

電影新聞」調查，據其資料，蘇格蘭地區的勞工階級之電影發行業者，

大體說來，對於生猛活潑之美國電影，表示滿意……但幾乎是一致地認為英國電影不適合放給他們的觀眾看。有位蘇格蘭映演業者說，所謂英國電影，其實應該稱作英格蘭的電影，一種特別貶狹的意味，對於蘇格蘭觀眾而言，這些英格蘭片比六千哩之遙的好萊塢影片，還要來得陌生。（引自 Collins, 1988: 7）

循此視野論事，則我們比較能夠理解本地這些文化，如何分別以專殊之形式，與全球文化的哪些形式產生連結，或是藉著消費哪些形式的全球文化而生產。與此道理相同，商品化本身的過程對於消費效果的效應，亦有其矛盾之處，我們必須將它放在一家之脈絡中，詳加研究，而不是未作研究即先行扣上帽子。

## 第 11 章

# 私人世界與性別化科技<sup>①</sup>

大約是過去十多年來，工業高度發達的西方社會，出現了許多公開辯論，述及新資訊與傳播科技之角色及衝擊，評估這些科技對於社會整體，尤其是對於家庭而言，到底具有什麼樣的轉化作用。這些形形色色的公共論述，從政府官方的報告、商業性預測，以迄於流行在新聞媒體的報導，四處充滿了喧嘩的聲音，說是家庭已經日趨隱私化，脫離了公共生活，內轉而只求諸己，而我們已身處於一個「動手自己作」(do-it-yourself, DIY)的文化之中，家庭的器物擺設已見改進，休閒也日趨隱私化（譯按：而這隱藏一切的城堡）與外界的唯一溝通管道，也就只剩下了衛星／有線電視及電子購物這些電子通路而已；對於這樣的一副情景，有人舉之為烏托邦的來到，另有些人則舉之為美景之幻滅。尤有進者，愈來愈多的人認為，家庭本身已經從內分化起<sup>②</sup>，日

①西伐史東曾對本章草稿提出批評意見，筆者受益良多，深表謝忱。本章部分內容取材於稍早已發表的一篇論文（Brunel University 研討論文），‘Families, technologies and consumption’，該文作者包括筆者、西伐史東、Andrea Dahlberg與Sonia Livingstone；本章其他內容則取材於‘Families and their technologies’，由筆者與西伐史東合作，刊登於T. Putnam and C. Newton (eds), *Household Choices*, London: Futures Publications, 1990。

②為什麼專以核心家庭做為研究對象，致而放棄其他類型的家戶？參見Morley and Silverstone, 1990。

趨零碎——生活其間的人，生活風格互有差異，家也者，已經變成他們的「多重目標之活動中心」，家庭也就是「多重活動的蜂巢家庭」（參見 Tomlinson, 1989）。許多諸如此類的辯論，（或多或少）都將科技視為獨立變項，而科技也就因此被認為對家庭及對社會產生了效果。如此一來，瀰漫在社會的一種常見的想法，也就認為科技是一種預警訊號，它既轉換了家庭之內的關係，亦復轉換了社會公私兩個領域的全盤關係。

當然囉，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日子裏，沒有人願意被當做是科技決定論者。不幸的是，理論上這種誓不為科技命定論的立場，並沒有從實踐之過程反映出來，人們在這個領域進行研究時，並沒有放棄科技命定論的前提，「究竟科技怎麼改變了社會」這樣的研究議程，仍然持續存在。對此現象深感興趣的人，或許可以從晚近十多年來的另一股發展情勢，做個對比：亦即，狹義的媒介研究領域，在此期間已經逐漸放棄了媒介效果等方面之問題，這個領域的人，慢慢轉向了更為複雜的一些問題——閱聽人在家庭及結構位置的多重限制底下，以及在社會位置之移動過程中，由於掌握之文化資源相當有限，因此，他們到底是怎麼樣在積極而活躍的使用、詮釋大眾媒介所提供給他們的形象、符號產品？我們必須要求自己處理這些中介形式的問題，不只是研究這些形式運用在大眾媒介的消費之情況，而且要研究它們運用在更大之形象（及物質）消費過程，因為正是透過這些不等的程序，一整個科技產品才能納入了家用。曾有人熱心滿滿，宣稱新傳播及資訊科技將對未來的家庭及社會生活，產生根本性變格。來自不同方位的觀察家均已指出，家庭做為娛樂活動的場地（錄影帶、有線電視等）、居家工作人數（電腦結合電信服務），以及互動服務（電子購物及電子預約等）等



等現象，均已看到可觀的成長。但這些科技產品的真正使用狀況是什麼，我們所知又有多少呢？這些科技產品對於它們的家庭使用者，具有些什麼意義？而不同的家戶文化又如何整編這些科技產品呢？再者，尤有進者，在多大程度內，人們使用它們的方式與目標，暗合於原先設計者的意圖呢？

資訊與傳播科技是很顯然扮演了一個非常根本的角色，連結了公與私兩個世界；在做此連結時，它們同時也超越了家戶單位的邊界。這樣一來，我們的問題在於探察文化與價值觀各不相同的家戶，它們各以什麼方式規約資訊與傳播科技的使用。另外，還有其他問題尚待提出，比如，哪些特定的資訊與傳播科技（不要忘了，它們同時具備了整合及孤立家戶的能力）在使用之時，可以跨越或強或弱的家戶邊界，而不同形態之家庭在使用這些不等的科技成品時，對其不等之社會關係又產生了哪些中介作用。當然，若是長期觀察，所有這些科技均將有其特定的意義及重要性，端視它們在一家之生活，扮演何等角色。至此，則問題已經是這些科技對於其使用者而言，究竟有什麼意義？而家戶的不同成員（比如，各年齡層及性別之分）又怎麼理解、認識不同的資訊及傳播科技成品？尤有進者，我們亦須知道這些個人持有的意義，在決定人們如何使用這些科技產品時，扮演了什麼角色？我們也須知道，每個人如何在其社會化過程，獲取並擴充科技能力，尤其是與建構及維持不同性別主體形式有關的科技能力。

## 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

我們以下將分析傳播與資訊科技在家庭之內的功能，由於寶笛（Bourdieu, 1972a）的伯伯屋（Berber house）分析相當管用，我們將以它

做為起點。寶笛在此提供了一個範例，闡述了性別關係之內，公私空間如何與家庭科技產品產生接合。雖說寶笛分析的對象是工業化之前的鄉村社會，有其特殊文化，但筆者想要論稱，寶笛的許多洞見，放在工業化及都會化的社會，仍然相當適用，還是可以用來分析相關問題。

寶笛的案例，主要談及了家庭領域及公共領域的差別，實乃「女性空間及男性空間之對立，另一方面，所有的親密者均屬隱私，而所有的社會關係則屬開放空間」，寶笛論稱，家庭之定向根本是由外而內所界定、是由陽剛與公共領域所界定——房舍也者，是「男人走出來的地方」，房舍是「帝國之內的帝國，但卻總是落人一等的帝國」(Bourdieu, 1972a: 101)。

筆者的論點是，儘管社會及經濟已見長足發展，當代工業社會的公私領域之分，根本上仍然與性別關係相連結而尚未分離。所以，葛馬尼可與普維士 (E. Garmanikow and J. Purvis, 1983b) 指出，私人領域不僅是持續自外於社會疆界，它其實被等同於陰柔、女性，被等同於大自然。與此類同，方甜 (J.S. Fontaine) 也有近似的觀察，他說，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組織模式，仍然將公與私做了根本上的對立，而「一般人對前者的理解，是將它等同於法律領域，包括了國家各個機構及國家經濟；後者則是個人感情及道德責任的一種狀態」，並且，「女人須與家庭生活相關，而男人則與公共世界的競爭及權力須與相關」(Fontaine, 1988: 268)。

察瑞斯基 (E. Zaretsky) 則採取歷史分析手法，他說，資本主義使得家庭從生產單位變成消費單位，這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發展，催生了家庭乃是分離於經濟領域的想法，如是一來，資本主義也就創造

了『分離的』個人生活領域，狀似與生產模式分了家」。因為有了這樣一個發展軌跡，察瑞斯基認為，「社會主要領域當中，個人尚可能佔據最重要位置的地方，也就只有家庭——家庭之內，一種社會活動之新領域也就開始成形了：個人生活」（Zaretsky, 1976: 61）。

在這個連結點上，另有一個相關的論點值得我們注意。哈塔度(A. Hurtado)與另外一些人均曾指出，公／私對立與種族(race)與氏族(ethnicity)問題，二者之間存在著特定的接合關係。因此，哈塔度說，「公私之分僅與白人的中上階層有關，因為就歷史的發展沿革來說，(美國的)國家機器均不斷地介入勞工階級之私人生活及其家庭步調的安排。有色人種的婦女，壓根沒有經濟條件，她們因此不可能得有公／私之分……對於有色人種而言，根本沒有私人領域這回事，除非他們自行設法在一個對他們採取敵視的環境中，打造並保護這樣的一個圈圈」(Hurtado, 1989: 849)。現今的美國及其他許多地方的城市，流蕩著許多居無定所的遊民，這副景象、危機，不啻是以戲劇化方式，呈現了她的論點。

湯林森(A. Tomlinson, 1989)在分析當代的消費類型時，直指文化及意識形態諸面向而議論，他認為在當代的英國社會，家庭(home)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進入了核心，而這又與住家的持有率及住家設備之改善有關。他特別提到了一個時人熟知的發現，此即英國人有百分之八十的休閒時間，花費在家庭之中(參見 Glyptis, 1987)，他也注意到了另一個事實，此即花費在家庭之中或用於改善家庭的支出，日益成長。

在湯林森眼中，重點是家庭的成長，至今已經變為自主或(日愈)自給自足的消費單位。他認為，我們現在所眼見者，其實是私有化的持續進行，以家庭做為一個消費單位，代表了從公眾社區、領域撤退

的事實，而私人也就此躲進了他或她的家庭及花園之中（參見 Docherty et al., 1987），退出電影院，轉進而投入電視，以電視做為主要的影片消費模式。

湯林森論稱，這個轉變不但代表了消費類型的移轉，它更是表徵了家庭的意義，已然產生巨大變化，是意識形態的重要位移。家庭這個空間，日復一日，漸漸取得了地位，「史無前例地具備了隱私化、原子化的休閒與消費成風的生活風格」（Tomlinson, 1989: 10）。在他看來，最具關鍵性的轉變，在於「家庭這個空間，既然充斥了設備，足以滿足家中成員的廣泛需求，那麼，家庭也就轉向新功能之滿足。清教徒心目中的家庭，無異於『小王朝』（a Little Kingdom）；維多利亞時代則將家庭比做『天堂』（Haven）：晚近的伊莉莎白之現代概念則將家庭建構成爲一個『個人化的市場』（Personalised Marketplace）。我們大多數人表達我們身爲消費者之力量、我們文化品味的地方，正是在這裏」（P. 10）。

無消說，筆者是同意湯林森的說法，一家之內的消費過程是具有核心的地位。不過，家庭在當代文化扮演了核心角色，固然是事實，但湯林森在分析之時，卻將其重要性做了單面偏倚的詮釋，他其實誇大了消費隱私化的文化重要性。就此而言，他似乎重蹈覆轍，等於是提出了「人人都是中產階級」這個說法的當代版本，須知，當年學者（Goldthorpe and Lockwood, 1968）提出這個論點時，已有多人指出其許多謬失之處。

議題的核心其實是，許多具有對比、對立關係的概念——不但涉及公／私關係的接合，而且牽涉到陽剛男性／陰柔女性的接合關係；非但只是生產／消費之爭，兼且涉及了工作／休閒的分別。我們在分

析傳播與資訊科技之使用時，必須同時分析這些術詞的變化關係——確實，我們還應該探討這些科技本身之功能，是否就創造了這些轉變的可能性。如果我們真要避免「宜家宜室」(‘naturalization’ of the domestic) 這種啓人爭疑的說法（及其隱設的說法，以爲家庭必然與女性、消費與休閒掛聯），那麼，我們就必須分析在歷史過程中，家庭是如何建構出來的。金（A. King, 1980b）在這方面有些貢獻，他借助於湯普森（E. P. Thompson, 1967）的研究成果，延伸湯氏所做關於工業資本主義之發展過程，時間如何被規劃這個例子，轉而注意休閒時間（「週末」）與休閒地方（家庭這個空間、假日旅店——「消費剩餘自由時間的水平容器」）究竟如何從歷史洪流中浮現，金氏提出了不少洞見。

金氏本人的主要著眼點在於階級，他想分析不同階級的成員各有多少的自由時間，其發展之分化過程爲何。筆者想要延展這個分析，導入性別問題，審視男性與女性與休閒的不等關係，不但將它視爲一個時間現象（「工作之後」），而且也將它視爲一個空間現象（休閒的地點按慣例是家中的空間或其他地方）。

筆者與布蘭敦（Brunsdon and Morley, 1978）在《每日電視：“全國觀眾”》這本書中論稱，一家之內的領域雖然也是家庭勞動的領域（勞動力的再生產），但越來越多的情況顯示，人們已狃於將家庭視爲個性（individuality）得以表達的社會空間——外在世界那些物質、具體的壓力與限制之下的避難所，除此場所以外，所有人類價值已在現代生活壓力下破滅。整本書的核心論點（ibid., p. 78）是，這個私人領域之種種運作實況，如果沒有審視女性之特殊角色、如果沒有審視女性在家庭之內的核心地位，那麼，我們其實是沒有辦法充分了解的。誠如我們在那本書中所說，婦女與家庭事實上似乎已經互爲表裏，就如羅斯金

(J. Ruskin)所印證者：「主婦味十足的太太進了家門以後，這整個家總都是環繞著她在打轉了」（引自 Brunsdon and Morley, 1978: 78）。

不過，這裏所說的並不是一件歷史陳跡——不是的，我們認為以社會領域及性別關係為對象的意識形態建構，並且仍然具有強烈的當代意涵——因為時至今日，家戶本身及婦女的家庭勞動仍然被視為歷久不變的天然背景，前場公共領域的活動，才是「真實」世界。當然，更進一步的重點是，在一家之中的領域，男人與女人所處的實際位置，根本極為不同。如果對男人而言，家根本只是休閒 (leisure) 及從工作中獲得將息調養的場所，那麼，無論女性是否外出工作，家庭這個空間卻同時是工作及責任的場所。然而，整體說來，「休閒」的社會場域已日趨移向家庭，於是婦女在這塊空間所感受到的矛盾現象，也就相應尖銳、提高（參見 Cowan, 1989）。

與此同時，筆者想要論稱，我們亦應探討家庭生活這塊私人領域究竟如何受到外在社會力量之建構，而它又與政治生活如何產生接合關係。察瑞斯基指出，就歷史沿革而言，「早期的資產階級知道家庭是社會秩序的基本單位——『一家小教堂、一個小邦國』，並且是社會權威位階的最低層」（Zaretsky, 1976: 42）。與此類同，方甜也說，就當代的工業社會來說，「家庭同時也是社會之政治及經濟組織的單位；因此家庭也就是公共領域的一部分。身為公民總得符合一些法律上的要求」（Fontaine, 1988: 284）。這樣看來，雖說每個家庭均享有其隱私（亦即排除他人入內〔除非警方領有搜索狀〕）及自主行動的權利，但「這個隱私與厚厚的牆圍所能具有的效果，均極相同，都是社會定義所造成」（ibid., p. 280）。

尤有進者，誠如東茶洛（J. Donzelot, 1979）所論，家庭的地位，並



非獨一無二，也不是毫無曖昧之處。就某些（比如，司法上的）理由，家庭有其隱私性，但就另一些情況而言，則家庭又具有公共性質。家庭是許多國家福利機構介入的場所，比如，這些機構企圖規範家庭扶育幼童的方式，理由是國家必須確保舉國之未來勞動人口，得到適當的養育（參見 Hodges and Hussain, 1979）。在東茶洛看來，家庭不只是一個私人的地方，家庭其實也是一整個醫療、司法、教育與心理等等實際力量交互切商的場域——家庭絕對不是完全私人的領域，不是某種位處社會之外的東西（更不是設定了社會之界限的單位）。依此意義論事，則家庭絕非完全自外於國家，也並不是與國家對立；反之，私人之領域本身其實是一個（法律上、司法上）建構出來的空間，這是一塊國家及其他機構均能介入使力的地方，而它所能擁有的隱私本身，終究必須透過這些機構才能建構出來與得到保障，這並不是說家庭空間的種種自由多少僅只是幻覺，也不是說到頭來它們一定就是在規範及權力史之內，化約到了它們現在的位置（有時候，東茶洛自己倒是似乎這麼說的）。反之，這裏說的只是後面這個視野，相當有用，（必然）具有匡正之功，因此至今仍然無視於家庭空間之歷史及社會建構的分析者，勢必要調整其視野。

在此脈絡裏，我們必須仔細分析，現存社會諸多領域，如何整編這些傳播科技，尤其是不同的性別領域如何整編它們，反過來說，我們亦應注意在建構及重新建構這些領域之際，傳播科技的角色若何。哈羅拉薇區（M. Haralovich）在一份引人入勝的研究報告中，以一九五〇年代美國電視的郊區情境劇為例，說明這等節目在「建構及散佈婦女地位與社會知識」的過程，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Haralovich, 1988: 39）。她關注的是，下列眾多因素之間的關連性究竟如何：諸多生活風

格再現於電視的情況、政府的經濟及住宅政策，以及製造消費財的廠商與工業。她要知道，以上這些因素如何界定什麼才是「健康」的生活風格(單親家庭、在一個安定而非都會區環境的郊區獨棟房舍)，以及做為持家者的，到底在這個風格內，佔據什麼地位。

她的主要論點是電視的各種再現訊息，正巧貼近而實質又具體地強化了住宅政策——這些政策的主要著眼點在於透過特定的辦法，組織一家之內的室內空間，以此做為強化家庭特有的性別分殊化功能。依此認定，她也就注意到，一九五〇年代美國的「戰後兩大全國性優先政策——將婦女趕出薪資就業市場，興建更多住宅——兩者就這樣合併了，依此而產生的房舍及鄰里關係的排列，也就推崇、恢復了十九世紀中期的理想空間，男人與女人的領域就此而做分離設計」(ibid., 43)。

走筆至此，不難發現先前筆者討論寶笛時，意欲傳達的旨意，已再此局部重現。當然，若說所有的電視當代情境劇都可以得出哈蘿拉薇區式的分析，那又未免離譜(我們現在有的情境劇，又增加「離婚」與「單親」等等)，雖說迄今在各種電視論述當中，核心家庭仍然位居要津——而這些情況將繼續建構並流通社會知識，告訴觀眾什麼才是合宜的性別關係，告訴觀眾應有的家庭與公共領域接合方式。

## 科技與性別

我的論點是，我們亟需從脈絡入手，了解科技之使用與功能，這是因為科技被分別整編於兩個不同的環節，一是公私兩界關係的社會組織，再就是家庭領域本身。這也意味著在初期著手探究時，我們應

該提出的是與家庭科技有關的「如何」的問題，不是「為什麼」的問題。我們應該顛倒林德洛夫與勞德（Lindlof and Traudt, 1983）的論點，亦即我們應先行提出並探查，各家庭成員如何使用這些新科技並取得意義，然後，我們才能釐訂一個架構，合宜地評估（但還不是解答）這些科技之重要性等核心理論及政策問題。有了這樣認識以後，我們的第一步也許是回歸狀似相當基本的一些考量——比如，不同家庭所能夠擁有的家庭空間之結構及大小，（譯按：對其使用新科技所產生的）決定性效果——迄今在此領域從事研究的人，都不當地忽略了這個重點。依此考量，我們可以舉個例子，家庭空間局促而人數又比較多的人，他們可以利用種種不同的傳播媒介（上自電視下至隨身聽），造就聽覺屏障並創造了個人「空間」，這樣一來，家中物理空間的狹小致使個人欠缺隱私空間的問題，也就得到解決。

但我們終需注意，家庭並非只是一個物理空間——它還是一個社會組織化的空間。誠如我先前所說，景隨寶笛的分析，筆者已經論稱公／私之分，須與與性別關係扣連，現在筆者要再次援用寶笛的說法，討論在私人領域之內，透過性別關係而組織之家庭空間，其重要性若何——這很可能是最根本因素，決定了家庭成員如何使用不同科技產品。就如同寶笛說的，「外在世界與家庭（house）的對立關係，若說要產生完整的意義……那麼，這個關係所涉及的術語之一，家庭，其本身亦須被視為是分化的，並且，其分化原則又與分化家庭及外在世界的原則，是相同的。（Bourdieu, 1972a: 104）

無庸贅言，現在是有一大堆文獻討論性別之功能，其實正是社會與文化組織賴以成形的根本原則，不過，本章篇幅有限，無法全面檢討這些文獻。此處只能引述兩個主要論點。第一，這些文獻的焦點之

一是，婦女及其活動在傳統社會學當中，似乎消失了。第二，（傳統社會學原本集中於分析生活的公共領域，而女性在此領域）「消失」，其原因又是因為婦女在家庭之內的特定位置使然，有其結構上的限制。因此，他們論稱，

若說婦女……在工作文化所據有的位置，地處邊緣……這是因為她們在次一等的領域，位居樞紐與要津，這個事實其實是透過了互補而次等的方式，反映了男性陽剛之氣，佔據了優勢與支配的地位。她們之所以位居邊緣，全是「因為」她們站在家庭這個次等的、補助型的領域之中心。（McRobbie and Garber, 1976: 211, 強調部分為本書作者所加）

筆者將論稱，男性與女性使用家庭傳播科技的等差關係與這個中心地位，具有莫大關係。我們將以電視為例，作為推演這個論點的第一步，我們將簡短闡示，在組織這個特定科技產品於家庭的使用情況時，性別關係發揮了什麼作用；以此做為舉證，主要是因為這些論點在這方面已有長足的發展。霍布森針對家庭主婦收看電視的習慣做了研究，她發現，由於她們覺得家庭這個空間，是她們持續家務及責任的場所，這就使得她們以相當獨特的形式，消費電視——亦即看電視主要是一種根本相當分神而不時要被打斷的活動。簡單的說，這等於意味著家庭領域之內的男女等差位置（對於男人而言，根本上家庭是休閒的地方，但對女人來說，家庭卻是相當矛盾的場所，休閒與工作兼而有之），決定了男女與電視之關係。

筆者在“家庭電視”這項研究計畫的報告中，曾經指出，使用家電科技的性別分野，表現在錄放影機的使用上，最為明顯，因為總體

地看，控制家中錄放影機(如同其他自動控制器材)的人，主要是父與子，偶爾女兒亦有控制權，最沒有控制權的是母親。與此類同，羅基與簡森(J.U. Rogge and Jensen, 1988)亦提及「新媒介」的世界，主要是陽剛之境域。誠如羅耳所說，錄放影機的「陽剛化」(masculinization)，

是相當符合邏輯的一個發展，基本上，這是男性裝置及操作家用器備之角色的延伸。家庭成員當中，只有男人養成了使用家電的能力。許多新科技是男人的「玩具」(關於收音機這個部分，參見Moore, 1988)，而這些男人玩這些科技產品，玩得也很快樂。所以呢，責任也者，變成了男人的一種愉悅。操作這個器材……變成家庭成員期望於男主人的一個功能。隨著這些科技器材而來的責任、快樂與功能，讓男人在若干程度內，控制了這些器材，並且同時控制了其他家庭成員。(Lull, 1988: 28-29) ③

另一篇分析家用錄放影機之使用的論文顯示，一家之內男女文化位置的等差，相對來說，並不因為真正的經濟情況之轉變(比如，男性失了業或女性外出工作)而產生位移(Gray, 1987a)。儘管出現了諸如此類的發展，家事仍然大抵被視為「婦女的工作」，葛瑞論稱，這樣的一個認知，強烈地影響了具有明顯性別差異的新科技(如錄放影機)之使用。在此論證之背後，我們顯見葛瑞景隨了兩個學者的足跡，一是考科芃(C. Cockburn, 1985)，再就是齊莫漫(J. Zimmerman, 1983)，前者讓葛瑞說，這些新的科技複製了傳統的性別工作類型，後者讓葛瑞說，舊有

③譯註：關於衛星電視的使用，參見Moore, S. 1993 'Satellite TV as cultural sign: consumption, embedding and articulatio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5: 621-639, 亦收於Moore, S. (1993) *Interpreting Audiences: the ethnography of media consumption*, Sage.

的一些觀念，大抵化作了符碼而鑄鑄於這些新科技之中。若是依照葛瑞的視野論事，那麼，所有家庭科技產品之使用，都必須納進性別領域之社會組織，方始能夠得到理解。她論稱主要的結構化原則，其實是這樣的，亦即「養家活口之職業工作以後所使用的科技器物，其終端產品如果輕易可見(如電鑽、鋸子與磨沙機)，那麼，人們就當它是陽性的；至於那些用來執行日常瑣事，而其終端產品經常立即就被消費掉的(如電鍋、洗衣機與熨斗)，則經常是被當做是陰性的(Gray, 1987a: 5)。

誠如她所說，使用或不使用這些科技，並非簡單的科技之複雜與否的問題。葛瑞說得好，她的研究對象(家庭主婦)儘管依賴她們的男性伴或小孩來操作家用錄放影機，而不是自己使用(或不使用某些特定功能，如時間控制)，(譯按：並不是因為其複雜性，因為)她們每天都在使用其他極端複雜的家電科技產品，如洗衣機或縫紉機。這些家庭主婦疏離於錄放影機的決定性原因，似乎與錄放影機的技術上之複雜性，較少相關；其實，真正原因出在錄放影機以及電視，主要都被納入了男性陽剛之家庭休閒的領域之中，每當思念及此，她們就覺得佔不了一席之地。

### 合適的科技——對誰合適呢？

或許，我們在此合當再次說明，所謂科技使用之「性別化」(gendering)究竟根據什麼樣的理論立場而來。首先，筆者並非主張「本質主義者」的論調，這樣的論調認為，男女使用、涉入科技之類型不同，是生物特徵使然，亦即男女看電視之差別，雖是經驗性事實，但出於生物原因而無法避免(參見第六章就此所做的評論)。簡短地說，我所主張的是性別(gender)乃是一個文化類目，我無意從生物類目的角度討論性(sex)的問題。筆者切身關注的是，陽剛與陰柔立場、主體性與多



重領域是透過什麼樣的文化過程而建構，而科技產品又與這些文化建構出來的領域，產生了什麼樣的接合（或剝筭）關係。生物構造上是男或是女的不同經驗個體，當然可能以不同方式據有了陽剛與陰柔的文化屬性；然而，科技使用類型已被這些文化定義所整編，這才是核心問題。

誠如論者所說（Kramarae, 1988），這裏牽涉的整組問題是，哪些機器足以稱得上是科技：不僅是稱為機器的科技，而且也是展現了多重社會關係及傳播體系的科技；而這些多重社會關係本身也是在這些科技體系之下，產生結構化而又重被結構化；此外，這些科技產品納入性別領域之時，扮演了什麼角色，其間涉及了這些科技之多重意義如何被界定，而誰使用這些才是合宜的，又是由誰界定的。這裏扯出了一個問題，亦即如何超出現存類型的簡單描述。因此，曾有學者指出（Rothschild, 1983），家用電腦的功能在於強化現存的性別分工，「做母親的人，拿電腦儲存食譜與家庭帳戶，孩童（男童又多於女童）則拿電腦來玩遊戲……老爸則兼取兩者，拿電腦做為『成人玩具』，也可能拿電腦做為專業工作之用」（引自 Baines, 1989）。

本節結束之前，筆者將對性別決定了電腦之使用一事，再做討論。不過，目前更重要的或許是找出理論立足點，並以此探討諸如此類的等差使用類型，應當如何解釋。白尼思（S. Baines, 1989）就此有些看法，他認為布許（C.G. Bush, 1983）提出的科技「原子價」（valences）這個概念相當管用，它關注的是文化所界定之科技的屬性（而不是機械式的所謂本質屬性之界定）。布許（1985：155）論稱，我們理當知道科技之中，絕對已經包括了性別在內的多種社會價值；而這是一個決定科技之社會用途的一個因素：

工具與科技，自有……其(多個)原子價……一個特定的科技體系，即便是個別的工具，均以界定清楚而特定的方式，在類同的情境……與某些社會(本書作者莫里按：尤其是性別)規範契合而產生互動……並對其他規範產生干擾作用。(引自 Baines, 1989)

羅口(L. Rakow)論稱，我們不能假設科技均將產生同質化效果。反之，她認為，「我們應當假設不同的人……可能使用相同的科技，但卻產生不同的效果」(Rakow, 1988a: 59)。依其陳述，我們可以發現，她的論證兼具大眾媒介研究之「使用與滿足」取向的優缺點(參見哈洛蘭那句知名的訓令，「時候已到，我們應走出門檻，不要再問媒介對人做了什麼，而是要開始反問，想想人們拿媒介來做些什麼」)。這個視野的優點，在於它承認媒介內容及科技具有潛在的開放與多義性；但相應而來的則是缺失，亦即它流於高估了開放的程度，它也忽略了媒介內容透過設計、結構化與行銷包裝以後，已然內刻了強有力的主流優勢意義。

羅口認為我們應該提出的問題是，這些科技在建構並繼續性別關係時，扮演了什麼角色，此時我們認定的科技是「多種社會行事作為的著床地方……[科技]……表達並延伸了兩種不對等之性別建構」(ibid, p.57)，另外，很重要的是，我們應當檢視「湧動在科技發展之背後者，是哪些價值與意義，尤其是陽剛及陰柔界定的性別價值與意義」(p.60)。

葛馬尼可與普維士(Garmanikow and Purvis, 1983b: 5)認為，公私之分是個隱喻，是性別的社會類型化。羅口的核心論點是說，這樣的接合同時也隱設了科技。她論稱：

事關科技的行事作為，已建構於性別關係之內，亦透過性別關係而建構。什麼樣的人拿科技產品做些什麼，至少部分因果關係源自性別。這樣一來，科技不再只是一種科技，而是有關科技之社會行事作為，亦與性別有關。比起女人，男人更有機會擁有並使用相機來拍攝女人。女人被照了相，女人更可能有責任透過這些照片維繫家庭的連結及歷史……在商務、政治及思想等等公共世界，男人更有發言、寫作與出版的機會……但女人則寫些家書、打電話給親友。(Rakow, 1988a: 67)

羅口另外又寫了一篇論文(Rakow, 1988b)，她特別以電話為例，衍展她認為科技與性別實乃互為表裏的分析。她論稱，為什麼會有電話這樣的科技出現呢？原因出在公共領域的活動，全由男性宰制，(女性的)活動無從參與，不但家被孤立了，婦女在家庭空間的地位亦被分隔，由於女性在物理形體上的阻絕造成了問題，為了因應這個局面，電話應運而出。究其實，她宣稱，一部電話史「將不成其史，如果……(電話)……得以發展問世的性別關係沒有得到合宜的解釋」(Rakow, 1988b: 224)。就經驗層次來說，這個論點相當直接了當。誠如梅爾(M. Mayer, 1977: 23)所做的報告，「(決定一家會打)多少電話的單一最重要因素是女人是否在家」。當然，這個事實並不是只有經驗意義，它還有文化意義：這涉及了電話在婦女生活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人們常將電話與婦女的談話(「閒聊」或「扯淡」)連想在一起，這點實情可以說已濃縮在廣為人知的一個刻板印象，說是女人在電話中都「說得太多了」。誠如羅口所誌，不但人們有這個印象，而且電話公司本身的行銷文件也充滿了女性使用者「特別地黏住」電話的影像(不過，這裏倒是要補記

一筆，此即電話公司最初似乎並不贊成、也不鼓勵以這等方式使用這個工具)。

但再怎麼說，我總歸想要提出一個解釋性架構，既可納入經驗性事實，又足以涵概文化上的刻板印象。馬多士(B. Maddox, 1977)論稱，婦女特別鍾情於電話這種符號傳播模式(這多少取代了形體在物理空間移動的需求，參見Cowan, 1989)，原因很簡單，這與婦女在交通運輸、房舍及公共空間等方面的真實處境，均有相關。馬多士列舉了三個原因，解釋許多婦女為什麼頻繁使用電話：由於需要照顧小孩，因此只能待在家中；她們恐懼罪犯，不敢到公共空間；她們在物理空間上與親友隔絕，而主婦們認為，透過電話維持與這些親友的關係，是其「職業描述」的整體工作之一部分。羅口與馬多士均已注意到，家務之外，主婦接觸電話的主要機會，其實是做為接線生及總機小姐，扮演了中介傳播的功能，大抵是做為男人之間的商務中介。

這整個論據的核心要點是，許多婦女使用這個特定科技產品的經驗，其實反映了她們對性別角色的理解，同時這也反映了空間的社會組織，以及電話在經營形體上已見分散之社會關係時，究竟發揮了什麼功能。大多數婦女使用電話的主要用途，是為了履行家務責任、維繫社會關係，以及聯絡與家務有關的事務(打電話叫水管電線的維修工人、找牙醫與照顧嬰兒的人等等)。不過，除了這類多少有些利他的用途以外，羅口(Rakow, 1988b: 207)也提及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原來，主婦使用電話也經常是為了舒緩她們孤獨與寂寞的感覺。與此論點類同的是，筆者所參與的英國家庭使用資訊與傳播科技之研究，發現許多受訪主婦都說，電話是她們最不願意失去的科技產品——因為她們認為，在她們孤單地獨處於家中而備覺寂寞的情況下(套句她們常用的一句話)，電話是「讓她們保持神智清明」(save their sanity)的唯一辦法。

## 電子影像遊戲與電腦：陽剛化的科技？

性別與科技另有什麼樣的接合關係呢？史吉蘿 (G. Skirrow) 以電子影像遊戲為例，提供了下列的分析。她的分析起點很簡單：整體來看，玩這些遊戲的人，既不是小女生也不是女人。她說，這是因為這些遊戲提供的快感，在相當大程度內，均與性別有特定的關係。這樣說來，真正需要研究的是，為什麼這些遊戲不能撩撥起女性的文化敏感度(或者應該說，在女性積極解讀下，這些遊戲何以觸怒了她們?)。我們再次發現相同的理由，關鍵出在這些特定的科技產品與性別領域接合之時，必須遷就性別的特定社會及文化組織。基於這樣的認知，史吉蘿的焦點對準了「科技化的性感知 (sexuality) 與性感知化的科技之關係」(Skirrow, 1986: 142)。就此特定的例子而言，史吉蘿論稱，「電子影像遊戲(對於女生)特別地沒有吸引力，因為它們是……認同於男性權力之科技的一部分，而這些科技產品提供者無他，就是以特殊的男性方式，襄助男性掌控男性特有的焦慮而已」。(p.38)

史吉蘿的分析，主要著眼於分析這個特定的科技，何以變成等同於男性的陽剛領域。在她看來，它並不是機械設計與硬體的問題——非也，這是軟體及其行銷手段（電子影像遊戲本身、廣告與雜誌等），透過一整套的男性陽剛化的影像，接生了科技之文化意義，這整個過程才是問題所在。她說，由於流行文化明顯沿著性別界線而畫分，而這些電子遊戲則順水推舟，按照流行文化本身既有的特定形式推進行銷工作，「展現」了眾所熟稔的流行文化要素，在此情況下，這就難怪「大多數這些移花接木的要件，均是能夠打動小男生的一些流行形式——大抵不出行動、冒險與恐怖情境這些類型 (genre) ——而就此形式而言，

基本的模式是單一的(男性)英雄,「發動個人式的戰爭,對抗惡劣的局勢」(ibid., p.120)。誠如她所說,大多數這些冒險遊戲均涉及了遠征之類的情節,而其敘事很多均取材自異邦情調的恐怖片、旅行故事或是科幻小說的各種版本——這些特別能夠引起男生共鳴的類型,它非常強調科技及技巧方面的發明(與〇〇七情報員詹姆士·龐德的模式很像)足以解決問題。

筆者想要延伸的論點是,史吉蘿的模式同樣可以用來理解,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以及為什麼)電腦變成主要是一種陽性的科技而被看待(使用),而又為什麼行銷家用電腦的手段,最後仍然是以家庭這個女性領域之內的男性為訴求對象。就像莫莉斯(S. Moores, 1988)所論,最早的時候,收音機這個科技的出現,主要是要迎合心向科技的男性玩家(另外,葛瑞亦曾論稱,錄放影機最早當然是被當做是一種「男性玩具」),而哈登(L. Haddon)也指出,最早對家用電腦產生興趣的英國人,主要是「成年男人而對電子器材情有獨鍾者,他們日常的讀物包括了《無線電世界》(*Wireless World*)、《電子週刊》(*Electronics Weekly*)等等……(他們)想要探索科技的奧秘,想要了解科技到底如何發揮功能。」(Haddon, 1988: 16)他也注意到一種現象,此即當別人說他們是「繞著玩具在玩耍」,當別人說「科瑞」(Curry)與「迪克森」(Dixon)之類的大型消費電子器材連鎖店是「大男人的玩具店」時,這些玩家都露出一副不以為然的態度。有趣的是,哈登還說明了英國後來行銷家用電腦的手法(借用「使用者導向」[user-friendliness]等概念,不再強調電腦之科技地位,轉而提供為非專家設計的說明書及文件),其實可以說是一種(大抵並不成功的)企圖,想要將家用電腦「包裝得沒有陽剛男性之氣」,期望能夠因此而打開這個淺小的電腦市場。然而,又誠如哈登所說,新行銷策略的訴



求對象，亦即這些非專家，主要仍然是一般「男人」，不是女人——並且女人大抵並不是直接的角色，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與電腦產生關係的女性，主要是執行她們根據性別而來的責任，亦即盡其養育及社會化小孩的職掌，她們購買家用電腦的主要考量，是要幫小孩取得某些「教育」優勢。

電腦科技陽剛化的情況，說來並不是英國文化特有的奇癖。近似的類型同樣出現於法國，許多研究人員均有此發現(Jouet and Toussaint, 1987; Jouet, 1988)，他們注意到一件事實，此即使用家用電腦的人與使用（譯按：電傳視訊）「迷你多」（Minitel）系統的人，大多數是男性（依他們的發現，比率大約是三比一）。當然，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會這樣？土克（S. Turkle）就此問題提出了非常引人入勝的分析，她發現麻省理工學院及哈佛大學許多能力高強的女學生，拒絕使用電腦。土克用來描述這種現象的術語並不是「憎惡電腦」這樣的字眼，而是「電腦靠邊站」（computer reticence）——她說這個詞說明的是，「當事人想要離得遠遠的，因為電腦已然成為個人化的與文化的符號，它透露了使用電腦的女生欠缺女人味」（Turkle, 1988: 41）。

史吉羅致力於分析「性別原子價」的方法，她想要找出電子影像遊戲所提供的特定愉快類型，從中了解使用那種科技的社會定型化過程；土克則企圖分析電腦（尤其是電腦「郎中」（hacker））文化為什麼會讓人感到愉快。土克論稱，置身其中與電腦產生關係，等於也就是與抽象的形式系統產生了關聯（這種情形與人際關係之曖昧，恰是對立），它通常可以讓人覺得撤回到了安全而有保障的世界——「從人與人的關係，免脫至人與機器的關係」（Turkle, 1988: 45），她接著又論稱，做此選擇（密切涉入物與形式的體系），對於青少年來說，尤其具有吸引力。不過，除此

之外，土克另有一個論點，她說郎中文化具有一些特徵，此即它最爲著重的價值是「贏」與冒險，或者，這些郎中都是一種想法，雖然危險，但他們都「一頭栽入再說，待會再做理解」（p. 49）——土克論稱，單是這個特徵已經清楚告訴我們，這些郎中具有濃厚的陽剛文化色彩。

但土克其實又將這個論點推進了一步；他提供了極具價值的洞見，讓我們增加了一份了解，知道性別這個類目化做爲濾鏡片，究竟透過哪些文化過程，致使特定的一些科技，或多或少都能「適合」佔據不同主體性別模式的個人。麥羅比與佳伯（McRobbie and J. Garber, 1976）、渥克汀（V. Walkerdine, 1988），還有其他學者均曾做過研究，他們的分析指出，（尤其是）青少年覺得，經常有股驅力逼使她們拒斥她們視爲內含性別符碼的主體（及客體），因爲這些內含性別符碼的主客體，已造成她們非調整或妥協其女性質素不可（參見 Walkerdine, 1988，文中主談科學、數學與女生的辯論）。土克論稱，正是因爲這個同樣的理由，女生也就排斥電腦——因爲這些女生認定電腦已在文化意義上，烙記了男性陽剛之氣。認同，當然總是差異的另一面（參見 Saussure, 1974）。

土克所關切的是，到底是經由什麼樣的社會程序，致使電腦被建構爲一個陽剛男性的領域，致使「女性逐漸以電腦是或不是什麼，做爲判斷自身之屬性，哪些不重要而哪些重要的依據。」（Turkle, 1988: 41）誠如土克的觀察，女生眼觀電腦而不止於將電腦看做機器——在她們眼中，十之八九，那些機器均與她們視之爲濃厚的陽剛男性文化有關——這樣一來，她們也就很希望自己與這樣的文化保持距離：因爲如果不保持距離，這將威脅她們的自我形像，會讓她們以爲自己是「一個電腦科學模型」，但她們「並不希望自己成爲那個世界的一部分」。簡而言之，土克論稱，「女生刻意拒斥使用……電腦……她們以此聲張

她們是女生。所謂女生，按其定義，正是對立於此，女生不會與物 (a thing) [電腦] 發展出那種非要人將其他人摒除在外的關係不可」(p. 50)。

在筆者看來，以上分析關注的是文化而不是生物上的類目，但與此同時，我還要附記值得警戒的另一點。雖說性別是重要的因素，使得科技之意義及使用，呈現特定的結構，但性別之運作絕非孤立爲之。終局以觀，我們必須研擬一個分析模式，使性別類目的功能整合於(或說，在許多情況下，彼此交互穿梭)其他結構性類目的分析：比如，年齡、階級與氏族身分（參見筆者對 Ang and Hermes [1991]、Hermes [1991] 的評論）。

## 家庭領域之中的傳播科技

筆者將以本節篇幅，集中分析傳播科技（尤其是廣電科技），因為這些科技產品扮演了要角，接合了公私領域之空間及時間關係。筆者的主要論點是，我們必須以歷史長河之動態過程爲經，以當代文化之公私領域的變動關係爲緯，能夠如此，方才能夠將傳播科技的發展納入適切的脈絡而求得理解；唯有先做此定位，我們才能將現時當做理所當然的現象，將不請自來而進入家庭空間的多種傳播科技，「不再認爲合當如此而自然而然」(denaturalize)。

莫莉斯 (Moore, 1988) 以收音機爲例，介紹了這個科技產品引進家庭的曲折史。她論稱，雖說收音機逐漸攻進客廳——這個原本是做爲家人團聚的空間——但這樣的調整並非順暢而沒有異議的(參見 Boddy, 1986, 電視機引進客廳時，人們曾爲客廳是否爲擺設電視機的合適場所而有些焦

慮，該文即就此討論)。誠如莫莉斯所說，收音機進入客廳，「好一陣子，曾經騷擾日常生活及家庭關係」(Moores, 1988: 26)，究其實，最初對此產品感到興趣的人，大抵是年輕而有些技術概念的男性——他們深深著迷於這個科技機器——但女性則通常排斥之，因為早期收音機的機械外形很不吸引人(並且其電池酸性物質經常走漏到家具上)，加上她們的丈夫支配了使用的權力，因此，對於許多主婦來說，收音機實在是無法吸引人的媒介：「我們當中只有一人能夠聽收音機，誰用呢？我的丈夫(帶著耳機——作者莫里附誌)。我們其他的人就坐在那裏跟木乃伊一樣。」(引自莫莉斯的訪談資料〔Moores, 1988: 29〕)。

誠如莫莉斯所說，收音機對於男人與女人的意義，極不相同。在男人眼中，這個「無線的東西」，實在「讓人著迷」，是個「奇妙的玩具」(參見 Gray, 1987a, 該文說錄放影機是「女人的工作，男人的玩具」)；但在女人眼裏，莫莉斯說，收音機卻是「狀極醜陋的盒子，強迫人鴉雀無聲」(Moores, 1988: 30-31)，因為彼時收音機的接收狀況不良，只要有人在房中發聲說話，正在收聽(通常是男性)的人，就會很難跟上廣播節目。一直要到揚聲器取代了個人用的耳機，新款式收音機開始行銷上市，變成家內裝潢的流行擺設之後，收音機在家庭地理空間中，這才理所當然地取得一席之地，但這已經是收音機初次問世許久之後的事了——當然囉，時至今日，收音機在客廳中的地位，大抵已經被電視機取代了，收音機現在退至了廚房或臥房，就大多數家庭來說，收音機也是個人之用，不是集體的使用——這件科技產品所歷經的社會「生涯」，正如同阿帕杜賴(Appadurai, 1986)所說的一樣。

順此延伸，筆者意欲論稱，類似的過程亦重演於當前的新傳播科技(比如，錄放影機與電腦)——並且，它們被整編而進入家庭的不等型

態，亦很可能與家庭男性與女性活動之領域，若合符節。博帝(W. Boddy, 1986)、史琵葛(L. Spigel, 1986)與哈蘿拉薇區(Haralovich, 1988)等人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模式，襄助我們分析當代新科技的發展及行銷。極為接近於莫莉斯的分析，史琵葛揭示了一九五〇年代早期的美國，在引進電視之時，其本質究竟為何。她致力於發現女性雜誌在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這些雜誌怎麼描寫電視，怎麼(向它們的女性讀者)描述電視在家中應有的地位。」(Spigel, 1986: 3)不要忘了，就其經濟上的能力而言，這些女讀者正是潛在的電視廣告商的目標，其次，就其社會(性別建構之)角色而言，廣告商也認為她們職司家庭領域、空間之組織責任，而電視機畢竟是要擺進家庭領域的。

史琵葛論稱，一九五〇年代早期，美國人覺得電視實在打亂了一家之內的室內擺設(這就如同在更早一些年代，收音機亦被如此看待)——打亂了養兒育女的類型，打亂了婚姻關係，打亂了家庭主婦好好整理家園的秩序，並且造成整個家庭道德經濟關係必須徹底重做安排。確實如此，若是從電視業界的角度論事，他們早就預見了問題，可能會出在兼具影像與聲音的電視，是否真能配合家庭日常生活類型的步調(他們已有預設之想法，認為電視機將襲奪主婦部分的注意力，因此不能與主婦之家務責任相容)。電視進入家庭而成為家庭的一部分，亦即新科技鑲入現有社會文化架構之內，其過程並非風平浪靜、輕而易舉，(譯按：其原因是多重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以為)婦女應付不了轉台這麼複雜的科技技巧(試比較一下晚近的一些辯論，不也環繞著女人是不是能夠「應付」錄放影機與電腦科技嗎?)。業界對此問題的回應方式是提供其他產品，企圖以此解決他們認為電視已經製造出來的難題：因此，他們行銷許許多多家電用品的手法，就將它們說成是「解決」電視造成之難題的「方案」。(就

廣告商的眼界論事，) 關鍵問題是怎麼把家庭主婦弄進家庭的電視空間，使其融成一體。誠如史琵葛所誌，商人行銷電子自動洗碗機的手法，正是說它是科技方案，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廣告說電動洗碗機可以「讓廚房中的家庭主婦走進客廳，與家人一起收看電視」(Spigel, 1986: 8)

筆者認為，針對傳播與資訊科技的分析，必須考慮一家之內的空間組織（尤其是與性別領域有關者）之內部動態關係，如何涵納、接合了這些科技，除此之外，我們亦須注意，東茶洛 (Donzelot, 1979) 所說的「撤退至室內空間」，其實提供了一個相當廣闊的情境，我們對這些科技所做的分析，也應該引用。傳播科技在促使人們撤退至室內空間的過程，扮演了重要角色，因為它們變做家庭室內擺設的一部分以後，增加了家庭做為休閒場所的吸引力（參見 Frith, 1983）。

筆者一邊分析這些過程，一邊要堅持現存的家庭組織之社會模式，對於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將以多大程度整編傳播與資訊科技（或將其收做家用），其實具有決定性的效果；雖說這些過程另有其他面向。與此同時，許多不等模式的規範性言詞、論述，紛紛然也進入了家庭領域，並且影響了這些科技的發展情況，我們對此現象亦應保持敏感（試想一想現今有關廣電節目編排之政策與審查〔censorship〕之辯論、英國電信公司之新式電訊服務在道德層面所引發的一些道德焦慮，以及家用錄放影機與錄音帶的「盜用」問題等等）。凡此種種領域，我們均須同時密切注意，（核心）家庭仍然是最具優勢地位的一種家庭形象，而家電產品的生產商及行銷商，均認定這樣的家庭形態尚在「健康地」運作著——在此情況下，我們自須密切分析，諸如此類的形象，對於那些強有力的決策製定機構，可能產生多大程度的決定性效果。



## 科技、疆界與室內化

以上論據的主旨，均在說明傳播科技接合了公私兩個領域，並扮演要角——所以說，廣播電視的角色，在於接合了家庭與國家，因此形成了「全國家庭」(national family)。當代西方社會均以家室 (home) 及家庭為私人畛域，使生活其中的人得到屏障，免除外界的公共壓力，但電視及其他傳播科技 (如電話) 卻引發了問題，因為它們泯除了公私兩領域之分離狀態。所以，誠如普爾 (Pool, 1987: 4) 所論，電話具有兩股相剋相生的矛盾力量，因為電話「鈴聲響起的時候，它一方面干擾了我們的隱私權……另一方面卻 (同時) 保障了我們的隱私權，因為它讓我們坐鎮家中，即可隔空交辦公務。」同理，類如錄放影技術與電話答錄機等等科技方面的進展，也可以看做是具有雙重性質，它們增加了家庭 (或個人) 的技術能力，更為有效地規範了他們家中疆界，不受外力入侵。以錄放影機為例，這個機器讓消費者得有能力操縱廣播電視的節目流程 (透過移時錄影的方式)，使之更能方便地配合一家的作息；就電話答錄機的情形而言，使用者可以藉此進行篩選，使不速之客無法打電話干擾其家庭生活空間。傳播科技另外引發了一些問題：由於它們力能衝破家庭的疆界，這也就意味著人們總認為我們必須仔細地規範傳播科技——所以，長期以來，廣電從業人員一直心存關切，唯恐最具爭議性的家庭之內的領域，遭受違反「品味」及「合宜」標準之節目的侵擾。此外，新科技本身帶來了新的焦慮，等於也就是要人再予規範。誠如佩特森 (R. Paterson, 1987) 論稱，家用錄放影機這項科技產品推出以後，很快就引發人們密集的議論。由於影帶提供了更多的自由空間，家中個別的成員 (尤其是兒童——想想英國人對「醜陋的影帶」

之恐慌罷)因此能夠觀看未經核可的節目,這就提供英國當道政府很好的理由,讓英國國家機器大舉介入,制定法規規範這個領域的活動。

當然,電子傳播頻道及線纜與衛星容量均以極快速度增加,我們已可預見傳統廣電體系所創造的全國性觀眾(及政治關係),必定趨向片面而零碎;我們同時還可以預見,手提而迷你化的「遞送系統」,以及一家之內更進一步的個人化消費形態(此則造成了雙重的隱私化)之前景。林德洛夫與梅爾(Lindlof and Meyer, 1987)論稱,晚近科技的進展已具備了互動能力,徹底改變了消費者的位置。但是,諸如此類的論斷將有誤導的危險,因為它抽離了科技的內在潛能,使之脫離了使用科技的社會脈絡情境(參見Hymes, 1972; 該文對於瓊士基〔Noam Chomsky〕的批評,足可與此呼應)。爲了要了解這類科技進展的意義,包辛格審視了家庭生活之結構與例行步調(包辛格稱之爲「日常生活的特殊語意學」〔the specific semantics of the everyday〕),如何整編了這些科技產品。他的基本論調是這樣的:日復一日,日常生活添加了愈來愈濃郁的科技色彩(「每個人現在都有許多部機器,並且必須直接操作這些技術產品」),因此,每天的例行事務本身也就等於是環繞著科技而建構,(譯按:但也正因為如此,由於無所不在,所以它們)在家庭之中,反倒顯得隱沒而爲人不察。他論稱,這整個過程的終局結果是「科技產品瀰漫天地之間,無聲無嗅,致使其存在變成不那麼明顯。」(Bausinger, 1984: 346)既然如此,整個問題的關鍵是,我們必須了解傳播與資訊科技透過什麼樣的過程而「被馴服、成爲構成家庭的一部分」(domesticated),以致於這些科技產品在家中,臻至不明顯的地步(如果不是不爲人知的話)。因此,必須更進一步探究的課題是,這些科技產品既然經由消費過程而得有意義,那麼,人們針對這些科技產品所建構的文化意義爲何?

## 方誌學的描繪：科技的家庭內之使用

筆者下文將以布蘭奈大學(Brunel University)的「資訊與傳播科技」使用計畫之研究成果為例，取其中第一批家庭的情況，說明資訊與傳播科技之家庭使用類型。這段說明的主旨有二，第一，我們想藉此提供若干識見，求能有助於了解這個家戶之家庭文化，內含了哪些動力與過程？第二，由此開始展示這些科技究竟如何獲取特定的一些意義，因而得以被不同的人用做不同的目標。筆者期望這些例子至少能夠闡明前述議題的若干部分<sup>④</sup>。

這個家庭的丈夫年齡四十八歲，他的妻子四十六；他們有兩個小孩——男孩十五歲，女孩十二歲。丈夫自己是行銷研究顧問，自由業者；他的妻子在當地學校的餐廳兼差，做些三明治並做清潔工。他們在倫敦西南區擁有一間略近市區的小住房。夫妻兩人十五歲以後就沒有再上學；均投票支持保守黨。他們有三架電視，一架在客廳，有遙控器；另兩架在小孩房間；兩部電腦：男孩房中有部（譯按：英國最早推出個人電腦的品牌）辛克萊（Sinclair）電腦，爸爸則有安史措（Amstrad，譯按：新近品牌，公司規模較大，產品範圍較廣）電腦，並配備了印表機，他的工作用品，放在前廳，現在則轉做為父親的辦公室。另外，客廳有部錄放影機；廚房中則有一個電鍋、一個電冰箱、一個電壺、一個烤麵包機、一架收音機及一個微波爐（以及媽媽的時鐘）；另一個房間則有洗衣機與脫水機各一部。媽媽另有一具電熨斗與捲髮器。電話有兩具：

<sup>④</sup>以這個類型的方誌學作為研究方法，必然涉及了若干方法論的爭議，參見Silverstone, Hirsch and Morley, 1991。

一具在客廳，另一具在辦公室。男孩有一部立體音響與隨身聽；女兒也有一部立體音響、一個收音機，以及一架較少使用的隨身聽。

過去若干年來，男主人在汽車業界從事研究工作，相對說來，薪水非常高，但後來由於行政及科技上的因素，致使他的技術似乎難以發揮，他因此感受到了離職的壓力。他目前的工作狀況非常不穩定，因此，這個家庭從勞工階級上升至中產階級之下半，也就暫告中止。究其實，他們目下的經濟位置相當地朝不保夕：對於未來的前景，他們多少心存恐懼，因此這位主婦增加了她兼差的工作時數，以提高家庭的收入。所有家庭活動的組織也從此改變了，因為事實上男主人現在已待在家中工作（前廳改成了他的辦公室），因此，他對於家庭／工作疆界之分的想法，也就與這個研究所訪問的其他家庭之男主人不同，因為他們都出外工作。

這位男主人自認為他目前遭遇的就業困難情境，是短期「經濟理性」強加於其公司的新形式，他現在透過許多新科技（尤其是電腦資料庫）的中介，為這家公司做些「計帳」工作，在他眼中，這些科技產品取代了（邊緣化了）他的個人研究技術（經由在相關的多種產業之「親身接觸」網路而建立）。這件活生生的事實對於家庭的影響，相當複雜。從最簡單的這個層次來說，由於他賺錢能力的低降，這也意味著整個家庭沒有那麼寬裕，因此欠缺金錢資源從事許多消費形式。舉個例子，這樣一來，他們就鼓勵小孩盡量要朋友打電話進來，自己則不打電話，女主人則在牆上列了一張表，記載他們最常打電話聯絡的人，平均每分鐘花了他們多少錢。不過，這還不只是金錢的問題，因為（a）他們，尤其是男主人，同時也表示，站在道德立場上，他們並不贊成太多形式的消費；（b）控制電話做為傳播工具的做法，其實也與家庭的某些規則

有關，它界定了家戶的疆界與隱私。

男主人喪失外在地位之後，備感焦慮，致使家庭成員同樣受到影響。從某方面說，由於他欠缺外界的認可，他更是需要樹立一家之長的權威地位，途徑則是他在家庭成員中，最能掌控科技產品的使用（參見下文）。不過，與此同時，雖說他比妻子更常在家，他卻似乎不肯調整他在家庭勞動領域應當扮演的社會角色，他不願承認事實，不肯多盡一些家務責任，如到門口拿進鮮奶瓶（譯按：至今，英國仍有許多家庭每天訂用玻璃瓶裝的牛奶）、付水電費、煮煮飯，以及洗衣服；他仍然認為這些是妻子的責任。

## 疆界：外在與內在

筆者研究的這個家庭，非常強調疆界與控制的重要性。或許，爲了補償已然失去的對外控制權，這家的男主人極爲關切如何規範傳播科技的功能，畢竟這些科技產品具有泯除公私領域之疆界的能力。雖說這個家庭（的兩位家長）似乎不怎麼能夠與鄰里街坊融爲一體，家中成員彼此倒是很能和睦相處（這從兩方面可以看出，他們言談之間很是親近，其次是雙親的社會角色並沒有很明顯的性別等差）。這個家庭展示了一個共通的類型，其間，有效的家庭單位（爲了休閒目標而有的聚集，如看電視）是母親、父親與女兒，活動地點則是客廳；十多歲的男孩則與他們分開——他獨自把時間花在臥房中把玩他自己的資訊與傳播科技產品。

前面數段曾經提及，這個家庭很在意電話費用的規範。然而，雖說雙親的部分焦慮起因於經濟考量，但他們如此的作爲，似乎也是意識到控制及監督其子女的問題。他們的女兒大抵只接朋友的電話，但不打電話給朋友，或打電話前一定徵求同意，對此，這對夫妻頗表驕

傲。不過，他們也知道許多青年人都在使用英國電信公司的「交友熱線」(party lines)，並且積累了巨額開銷要父母支付，對此，他們倒是深表擔心。因此，就爲了這個理由，他們很不願意將孩子單獨留在家中，對於電視購物設施的引進，他們也頗表憂慮，因爲恐怕此舉將會加速地引誘小孩花錢。與此類同，他們也掛心衛星電視解禁以後，色情或暴力節目將更輕易地爲子女接觸：「(他們)的房間都有電視機，(我們)無法在任何時刻都知道他們在看些什麼節目。」如此一來，解禁與否，不再是跨國廣電業者能否衝破國家疆界的問題：至少對這個家庭來說，這也事關家庭疆界恐怕要因此被突破、侵入的問題。

雙親急於想要規範孩子們使用資訊與傳播科技的方式，最強有力的象徵是所謂的房舍之內，電力供應的「中央臍帶」原則：唯一的電力供應點位於父母的臥房，孩子們房間的電線均由此接出——因此，父母也就可以直接控制孩子的電力供應。不消說，這個做法必然也是造成若干緊張關係的根源，因爲小孩在自己房間享受看電視的部分原因，也是爲了這是相對不受訓斥／不受監督的活動。

身爲人父人母，如前所述，是可以解釋爲什麼父母覺得有必要「監督」女兒使用電話，但這或許不止是基於經濟考量。這也事關父母的不滿，他們不願打來找女兒的電話，干擾他們家裏的隱私——諸如此類的事件對於其實相當脆弱的疆界，構成了潛在的威脅，因此他們覺得必須做些強化工作。爲人女兒者解釋道，爲什麼她的爸爸這麼不喜歡她的朋友打電話來，「因爲許多人說得過了頭……我有些朋友打些奇奇怪怪的電話……他們……撥進了妳的號碼，在妳答話的時候，他們卻開始笑了起來……她們就在電話中搬弄口舌，我老爸可不喜歡。」

布蘭奈大學研究計畫的大多數家庭，都是妻子使用電話的情形最



多，電話是一個精神生活線，可以減輕她的孤獨感，但前文介紹的這個家庭並非如此。這是因為她自己也外出工作，因此較不覺得以這個方法使用電話有什麼需要。事實上，她主要是用電話做為媒介，履行她認為是她應該負責的家庭義務，亦即使用電話與她及她先生的親友保持接觸。很有趣的是，這竟然也是造成某些緊張局勢的原因：有一回，她先生覺得她在電話中與他的姐姐講「太久了」，掛在牆上的電話開銷線因而往上直升。

在這個家庭，丈夫才是最常使用電話的人（公務的緣故），因為他在家工作。不過，他堅持電話的用途必須嚴格限制——電話必須只是「工具」，只進行「往返傳遞資訊」的必要接觸。但是，即便如此，他還是很不信任電話，「因為在電話上說謊，比面對面說謊容易」。除了這些用途以外，他認為電話根本就是一種「干擾、打斷人的行事……電話總在你不要它響的時候響起來」。對這位男士來說，內部疆界的維持亦屬重要。因此，他解釋說，「除非有人生病……否則，我不會在臥房打電話。」

## 科技與控制

這位男主人對科技的態度既複雜又矛盾，但整體來說，他懷抱了失敗主義者的心情，或說是一種犬儒式的笑罵由人，原因全出在他的職業生涯遭逢了大逆轉——這件事實讓他對「未來」的悲觀之情，油然而起，這也使他對時下的新科技之社會用途，抱持著負面的態度。

就某個程度而言，他對家用科技的態度，可以說是源自他的工作經驗，而這樣的態度又影響他的家人甚深。他將目前遭遇到的困境，歸疚於「科技」，因為他親眼目睹他的專業知識，已被他所服務的公司

之電腦化資訊系統所貶值、取代。是以，他目前並不怎麼安全的自由工作者身分，對家人產生了兩大方面的影響。不僅他們全家的整體生活水平為之下降；這個家庭所建構的空想世界，已經認定「科技」本質上就帶有引發爭議及矛盾的力量。對於科技所具有的潛在正面與反面的用途，他分辨得一清二楚。究其實，他對傳播科技本身具有莫大興趣。因此，他非但純熟地使用他的家用電腦（他必須使用電腦才能工作），他實際上也試著使用家裏的微波爐（將不同食品放入長短不等的時間，「瞧瞧會變作怎麼樣」）。不過，對他來說，電腦其實還真是相當曖昧的東西：在他工作所需使用的限度內，他確實能夠純熟掌握，但他卻無法與這個領域的其他專業人士交換這個技巧。他所掌握的電腦知識純屬單面偏倚，他並沒有學習適合的專業語彙，因此也就不能將他的知識與技能往外傳遞，這樣一來，他也就無法讓外界認可他的能力。

或許是要合理化他這方面的無能，他也嘲弄這個行業的整個傳播／行銷工作。對於這種「包裝行當」、對於「只想裝門面」的人，他深表不恥，因為在他眼中，諸如此類的東西，與整套的「詐欺手法」沒有兩樣，為了達到目的，從事這個行當的人也就必須以特定的工作職銜「稱呼自己」，或是以特定方式「簽下自己的名字」。簡而言之，他覺得目前所從事的這個行業，不當地以「浮誇亮麗的美名形容」他認為只是「普通平凡的東西」。他聲稱「根本不需要那些系統告訴他怎麼做」、「根本不需要那些分析技術」，因為他自有更為豐富而卓越的資源——多年的親身經驗。很不幸的是，這樣的資源在他工作的市場中，並未受到廣泛重視，因為如今「他們已使這樣的資源，失去了人性」。那些「會計與電腦專家無法了解長期以來……這些接觸的價值」——一個人的通訊網路，建立在互信的基礎上；問題出在這些人與這位男主人

相同，他們不必然擁有「現代觀念」等等「形式資格」，因此他們也被貶值了，他們的人際網路也被打破了。

事實上，從這位男主人的言談中，可以嗅出一股強烈的想法，此即他體認資訊一旦脫離了個人掌握以後，也就意味著控制權的淪喪，甚至財務／道德上的毀滅。他非常在意科技「接管一切」的種種問題，科技致使許多不同種類的技術「失去了人味」，由於它「只講機械／只求邏輯」的方法，手工藝也因而被摧毀了，「手工技藝剝離了人身而轉依附於機器」。在他看來，這個情況或許以電話答錄機最能具體代表。他絕對不在這些機器留話，因為他總覺得對著「這個愚蠢的機器」說話，實在很不自然、很不妥當，「我很不喜歡這種像是機器人的東西……太沒有人味了」。

這位男主人不時顯露出一種獨特的恐懼，總是害怕大機構很可能以某些方法，利用了科技而折損了個人權益。概括地說，他深深擔心資訊與傳播科技具有潛能，會將資訊抽離人的脈絡，使資訊飄渺而無可掌握——唯恐失去控制能力，讓他深表焦慮。所以，他拒絕使用電腦化的信用卡，因為害怕有人盜用他的密碼，他卻還要落得付帳的後果。他也擔心英國電信公司的新電腦化會計系統，是不是會出差錯，致而他一家拿錯帳單，給付他們並沒有打的電話。對於警政等單位可能誤用個人資料，他也頗為焦慮，「嗯，電腦既然存有這些資料，早晚總會被人誤用」——這樣的心態，其實混雜著他對大多數機構，存有一個想法，認定它們根本就是無能、腐化。他的基本切入點是，「有了電子器物以後，沒有人真正是安全的」，他也很怕電腦郎中，因為「總有人會想辦法鑽進這個系統」，這樣一來，就他所能想到的最壞情況下，「最終一來，他們可能知道你腦袋到底在想些什麼」。

在一些關鍵時候，他對科技之不表信任，其實反映了更為普遍的恐懼感，此即他認為「現代」世界基本上確實是人味盡失的：「就在你站在一個現代的大型購物中心時……你就頓覺渺小……暴露而無所遁形……你永遠搞不懂外界對你有什麼期望」。

### 各種家事領域的組織：空間、性別、世代

家事組織的另一個面向，是要借由性別來維持疆界。尤其是女性，她們在一家之內有許多清楚分明的責任要履行。所以呢，爲了應對家中這種朝不保夕的財務情況，她就得做一份帳目，詳細記載財務支出。只有她記得住她與她先生之親友的名字、年齡與生日，也只有她能夠負責應對親友關係——主要是透過電話的聯繫。確實，對她來說，電話之所以重要，原因全在此——電話是一個很方便的方法，有了它，她就可以傳達／接收「家庭消息」，她還可以藉此看守小孩的活動（她要求子女，如果晚出夜歸，或是做些與日常活動不相關的活動，他們應該隨時讓她知道他們在幹些什麼）。

整體來看，對於家中的資訊與傳播科技，她顯示了相當被動而消極的調適態度。比方說，假使孩子在房中大聲地聽音樂，她的反應是「真想一頭消失，耳不聽爲淨」。即便她享受著看電視的樂趣時，她都表達了些罪惡感，不但如此，她還相當地被動（「所有的連續劇我都愛看，當然，骨子裏我知道看這些節目實在是浪費時間」）。所以，她喜歡電視的原因是爲了電視「讓我坐在那裏而能放鬆……我不必想要做些什麼，不必想下一步要做些什麼」。當然，她還是有她自己的天地，廚房，她在廚房將收音機扭到當地流行音樂頻道——這是她喜歡的頻道。在她自己的這片天地，她還是有自己組織時間的方式。她在廚房中有自己的「私

人時鐘」，她總調快了十五至二十分鐘，目的是讓自己「隨時提前做完該做的事……這樣一來也就可以留點時間給我自己」。

筆者稍前已經論及，在建構內部與外部疆界與認同之際，資訊與傳播科技扮演的角色至為重要。假使我們留意一家之內男孩與女兒的舉止，不難發現兩人與科技及空間的關係有些差異，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理解這個論點的部分。前已提及，相對於花在客廳中與父母一同看電視的時間，這位女兒待在房間的時間很少。與此相反，男孩花在房間獨處的時間卻很長，把玩著自己買來的傳播器材（錢則是自週六打工賺來的），並且安裝在那裏（本研究發現，這樣的情況也重見於其他許多家庭）。

男孩的母親說他的房間簡直就是「他的子宮」，而無庸置疑的是，這間斗室似乎也就是他很重要的一個避難所。他可以在那裏開著電視看到很晚（很可能試看些他喜歡、但父母不贊成的「動作片」）。他的房間另有電腦一部、立體音響與電視各一，此外，他還存錢想買部錄放影機。他與朋友都對科技產品深表興趣。學校午餐時分，他就跑到朋友家中玩電視遊樂器。他們經常一起逛消費電子器材店，看看「有些什麼新的東西」；他們讀些消費電子器材產品目錄，也走逛 W. H. Smith（譯按：英國最大的雜誌、文具連鎖店）翻一翻電腦雜誌。他依靠科技的成分很大，總是要有科技產品在身旁，而最好是音樂形式（或者，就像他母親所說，「噪音」），他才能夠感覺到「有些東西在動」。他的說法是，「沒有它就做不了事……我愛音樂，我可不喜歡呆坐在那裏，悶死人。如果待在自己的臥房，那實在太靜了，就讓人覺得像是在學校，實在叫人備感壓抑」。

走出家門，他就帶起隨身聽，一路聽到學校。他提到，同學「戲

稱我的隨身聽是我的生命支持系統」。他又說，「沒有了它……確實讓人覺得失落……我就宛如失魂落魄……電池一用完，我就立刻衝到店舖買個新的，即便我只剩下一個子兒。」另一個他非常仰仗的科技產品是手錶：「如果我的手錶壞了，那可真不知道要怎辦……我的其他手錶也完蛋了，真讓人絕望——我必須（在學校）找個戴手錶的人，然後和他一起走路」。

儘管他們對科技抱有矛盾情結，這兩位父母還是鼓勵孩子們獲取資訊與傳播科技——鼓勵的原因則並不很明確，不外乎教育目標，以及訓練孩子節制預算及儲蓄的能力。這個做法很能得到男孩的合作，但對女兒就失效了。哥哥願意免費提供他的老舊傳播器材給妹妹，就當這是更新機種時送人的「勝利品」，但是，父親卻堅持女孩必須自己節省零用金向哥哥買這部器材。不過，女兒與許多其他十多歲的同齡學生一樣，她們寧願花錢買些衣飾與其他同等「無益之物」。究其實，她越是投入在增強社會定義之下的女性色彩，則越是無法相容於認真學習傳播科技所應有的態度（參見 McRobbie and Garber, 1976; Turkle, 1988）。事實上，女兒仰仗科技的地方，是遠比她的哥哥少得多（「我比哥哥用電腦的次數少」），她也沒有哥哥那麼急於想要與父母劃清界線，並沒有那麼急於在家中畫出一塊私人的空間。

### 性別化的科技與科技能力／信心

這個家庭中，母親與男孩對不同科技的態度，對比最為強烈，告訴了我們許多訊息。男孩斬釘截鐵地輕蔑電腦——他就把電腦當做他相當能夠掌控的工具而已：「電腦很是呆頭呆腦的……不是嗎？……你一直要告訴它怎麼做……在你鍵入指令以前，電腦什麼也不會做。就



舉個例子罷，如果你設定要它洗碗，然後將電腦放在一部汽車之前，電腦可還會真地清洗一個盤子的面積……或者它乾脆就說，這不是程式告訴我要做的東西。」這位男孩壓根不怕「技術上的毛病」——「我就照著一般方式做事，如果出了差錯，那就錯嘛」——這根本操煩不了他，既然他信心飽滿，自認為有能力「找出解答」。另一方面，男孩卻不懂得如何操作洗衣機，他也怕死了碰「那部讓人害怕的電鍋」，雖然他現在已經能夠使用微波爐，因為「它是個封閉系統……安全多了」。

相反地，他的母親雖然是全家唯一能夠操作洗衣機的人，但卻不知道怎麼操作錄放影機，並且，她私底下非常怕電腦。她對失控的科技所造成的混亂狀況，從心底怕起：「每樣東西都弄擰了，搞壞了。我可怎麼辦呀？我可怎麼辦呀？」她的解釋是，她對電腦「不表信任」，電腦「讓他覺得很不自在，我很怕按了一個不該按的紐，然後一切失去了控制。」她對電腦冷感得很：「它對我根本沒有什麼用。除非（我的）先生要我做些什麼，否則我碰都不碰電腦。」然而，對她感到信心飽滿的科技，或是對她深感興趣的科技之使用，她倒是會做些試驗：「就拿洗衣機為例罷……如果我可以發現一個更好的洗衣方法，我就會一直把玩直到找出訣竅，就像微波爐……我就會一直東摸摸西摸摸，直到（我得到）我想要得到的。」

當然，諸如此類的態度，其性別差異並不只是顯現在資訊傳播科技或電子科技產品。如果我們考量這位女主人及她兒子的態度，不難發現，雙方對交通模式的對比，最為清楚。就如同電腦那個例子，這位女主人惟恐失去了控制能力，惟恐它隨後造成的混亂，她也同樣沒有想過要開車，她說，「開車對我一點都沒有吸引力，我怕它怕得要死……我怕這個鬼魂就在我手中。」但他兒子的夢想卻是「騎輛摩托車

……享受速度的快感……涼風切割臉頰。」

## 科技的承繼

在家庭之內，當然，以性別做為基礎的學習形式，尚有許多。就以上述例子來說，男孩想要騎摩托車，體會一下「真正的快感」，或許與他父親說猛力的使用刮鬍刀才是「刮鬍子的唯一方法」，不無關係。然而，透過這等形式學習性別認同之合宜形式與符號，實在相當平凡而可以預測（但當然還是非常強有力），在這層次以外，我們另外可以發現，在這家庭之內，父子代間的科技態度與能力之承繼，還有一些相當有趣的過程。

筆者稍前已經指出，若是科技產品出了問題，男孩自信自己能夠「找出解答」。更值得記上一筆的是，他比父親還要具有「冒險的」態度。其實，他還相當（幽默地）嘲弄父親的邏輯取向——父親問他，若是碰到前所未有的機器或問題，那該怎麼辦？父親的答案是「你該拿出手冊查一下」，但他覺得自己「找出答案」才了不起，根本不要去查什麼「手冊」（參見Turkle, 1988，文中提及電腦郎中冒險以後的快感）。他的態度是，「你必須四處碰撞……就此試著找出答案……做中學、找答案……我從來沒有讀過使用手冊……我還寧可自己找出解答哩。」

就某種意義而言，我們可以說這位年輕人比他的父親，來得對科技有信心。但承繼這回事其實非常之複雜，表面上他相當勇敢，但如果我們注意到他「痛恨閱讀」，並且「拼音拼得不好」，我們其實可以發現另一重意義——事實上，參考使用手冊（或甚至字典），對他來說，可不是輕鬆之舉。我們從這個實際現象，回想到了男孩的父親，豈不也是這樣？他實際的／操作的技巧很好，但他的傳播／語言技巧卻不

能匹配。或許，這位年輕人所承繼者，不只是對科技的某種興趣、一種操作科技的能力，而更精確地說，他其實承繼了一個相當狹隘而有限的科技能力之操作形式，或許，他還同時承繼了一種特定的陽剛主體性，而那種科技能力根本就是這個主體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結論

我們從理論上認識的當代社會——日常生活的行事過程與文化——較少涉及活生生人物每日作息的詳細作為與過程，我們大多只是套用一個抽象理論，而這樣的理論，幾乎與日常生活的我們，均先已認定每日存在之實體，其力量、結構、衝突與矛盾，都是理所當然。

以上提及的圖象，本身儘管還不足夠，但至少提供了一個具體的起點，我們據此已可探究家戶之間或一家之內的關係：透過消費與使用，然後是資訊與傳播科技產品之軟硬體之設計與行銷。如果我們想要更進一步，了解科技與社會變遷之關係，如何在家庭生活之內形成，那麼，我們必須知道（描述與說明）更多細節，弄清楚到底這些科技產品如何為人使用，而在其被設定於既成情境中使用時，它們的意義又是些什麼。

這麼說來，整個重點也就是鎖定科技對人生活之意義而鑽研，尤其是要研究資訊與傳播科技對於家戶及家庭，具有何種特殊的內外關係。我們所關心的是，資訊與傳播科技透過哪些方式而中介了一家之空間與時間、不同性別立場又怎麼隱設之，除此之外，我們還關心個人與家庭認同之建構，以及公私世界之關係，又究竟以哪些方式，隱設了科技產品（及其訊息）的消費。



第六篇  
公與私之間





## 第12章

# 建構日常生活：政治傳播與家庭媒介

### 前言

如果我們研究政治傳播，必須探討媒介兩方面的角色，第一，媒介究竟如何接合社會的公領域與私領域？第二，各種認知能力與了解素養（以及社會各個部門所獲得的能力與素養之高低等差），實乃社會建構之物，其間媒介又發揮了什麼作用？筆者想透過下面這個例子的舉證，說明這裏所涉及的問題是些什麼。筆者研究家庭收視情況時，曾經訪談一位婦女（Morley, 1986），她極力想要解釋，何以她偏好地方新聞的程度，遠甚於全國性新聞，她也描述了她對後者毫無興趣的理由（在我看來，這些理由非常強而有力）：

有些時候，如果發生些什麼事時，我還滿喜歡看電視新聞——比如，哪位小朋友走丟了，他又發生了什麼事等等。除此之外，我什麼也不看，除非有些地方上的事情發生了……全國性新聞叫我不安不愉快……我根本受不了“世界動態”（World in Action）與“全景”之類的節目。要知道，這種節目叫人難受得要死……我

從報上讀到的、從收音機上聽到的，對我來說，已經足夠。那個德國什麼總理來著，我根本不想知道這些東西。若是看過了一次，我就再也不要看。我恨死了再看的經驗——哎呀，你知道，早餐、午餐，還有午茶時間，都是這個畫面，整天都是同樣的新聞。真讓人厭煩。這個世界到底怎麼搞的？我無法了解，因此，我也就不聞不問。我看的都是吸引我的東西——比如，小孩被綁架之類的新聞，我很想知道呀。或者，比方本地若是發生了犯罪事件，像是強姦及類似的事，我也很想多知道一些；看看他們是否會被繩之以法，關進鐵窗。至於那些播報員說些什麼「英鎊上揚」或「英鎊下挫」之類的話，我可是一點都不想知道，因為我不懂嘛。這真是完完全全的無知。如果我了解這些東西，說不定我會深感興趣哩。（Morley, 1986: 169）

## 公民身分與閱聽人身分

墨頓與拉查斯斐（Merton and P. Lazarsfeld, 1948）曾經分析一種他們稱之為「麻醉負功能」（narcotising dysfunction）的媒介現象。他們關心的是，由於暴露於潮水般湧來的資訊，媒介或許可能會「麻醉」閱聽人，使他們無意行動，不是「鼓動」閱聽人採取行動：

每一個人都在閱讀各種議題的新聞報導，甚至可能討論有哪些行動方案。但這總歸只是一個相當智識化的過程，讀者與組織化社會行動的連繫，還是相當遙遠，他們並不能因此就起而行。對這些問題深表關心、並且訊息靈通的公民，可能洋洋自得，認為自己擁有資訊並且關懷社會，但卻忘了他並沒有下決心採取行動。

簡言之，他與政治現實世界的接觸是第二手的，他的閱讀與傾聽與思索，至此都只是一種替代式的表演。他混淆了，錯把認知當今存在的問題，當做是採取解決問題的行動。他衷心關懷。他資訊靈通。他滿腦子都是應該這麼做那麼做的點子。但是，吃完了晚餐，聽完了他喜歡的收音機節目，讀完了當天第二份報紙，嗯，已經到了上床的時間。就這個非常特殊的意義來說，大眾傳播媒介確實足以晉身最可敬重而有效的社會麻醉劑之列。（引自 Groombridge, 1972: 72-73）

認為媒介在閱聽人的經驗世界裏，徒然只是「麻醉劑／儀式」的觀點，晚近也得到一些研究者（如 Nordenstreng, 1972）的支持，他引用了一九七〇年代早期在芬蘭所做的媒介調查報告。一方面，這些作者發現，電視新聞是最受歡迎的節目之一，芬蘭十五歲以上的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每天都至少看一則電視新聞。另一方面，研究者在這些新聞播放以後，立刻進行訪談，期望能夠藉此知道觀眾如何「理解」新聞，他們發現，「一般說來，新聞內容是些什麼，很少人記得住」，受訪者甚至說，他們得之於「新聞的最主要印象就是，沒有什麼特殊的事發生。」（Nordenstreng, 1972: 390）以此發現做為論證基礎，這些研究人員說：

大多數芬蘭人都只是將看、讀、聽新聞當做儀式，日常韻律的斷點，顯示了疏離的狀態……許多人接觸新聞的原因，全在於這樣可以讓他們就產生了與外界接觸的感覺——生活中的定點——而新聞的內容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所以）新聞節目並沒有提供資訊的任何功能；但這些新聞倒是另有功能，閱聽人隨著新聞

的川流不息，從中得到了一股安全的感覺，成了一種儀式。（同前註，p. 391）

不過，同樣也是在一九七〇年代早期做研究的古倫橋（B. Groombridge）認為，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原因應該是閱聽人自覺相對的無力，並且身陷一種疏離的情境：

所有那些研究均有此發現，都展示了民衆對政治毫不以爲意，其政治原因何在呢？正是因爲人們欠缺權力，也欠缺文化參與感，……資訊不能鼓動人們（行動）……如果人們並不覺得有個參與管道可以發揮影響力。根本上，正是因爲這樣的落差，所以造成資訊固然可以得到，但人們卻並不認爲可以據此資訊而採取行動，正是這樣的落差，所以電視只能是一個折射窗，而不會是一面反射外界事務之窗牖，這也是爲什麼狀似矛盾，但人們卻真是無知之故。（Groombridge, 1972: 125）

誠如古倫橋所說，「對於大多數人大多數時間而言，到底得到這些資訊以後，能夠做些什麼，他們根本不清不楚，所以，如果資訊真的爲人們吸納的話，那也是很沒有效用的吸納。」（前引註，p. 175）尤有進者，古倫橋繼續申論，他說，電視的新聞與時事節目如此對待觀眾的原因，出在閱聽人根本欠缺權力。正是因爲新聞實質上，很少能夠鬆動政治控制，也很難影響經濟決策，所以對於大多數收看新聞的人而言，新聞根本就是目的本身，變成是「一個行銷商品」，如此而已。

馬汀（G. Martin）在另一場關於流行文化的辯論中，這麼認爲，他說大眾化的報紙❶，

林林總總的事件（政治性的、天然災禍的、趣聞瑣談的、犯罪等等，在排出的印刷字海裏，都混在一起了）均以定型的模式呈現，情緒上迎合了讀者慣有的某些態度。這個風格的報導也就影響了讀者，左右了讀者本人對這個被報導之世界的觀感；這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報紙如此多采多姿的介入，這些經過報紙所戲劇化呈現的事件與讀者之間，也就沒有什麼關係。就此而言，報導的風格也就等於是隱藏了某些內容。報紙認定讀者在政治上並沒有什麼公民權，因此採取特定態度向讀者發言，而在讀者看來，政治新聞所呈現的世界，他們無法積極而有意義的參與。（Martin, 1973: 89-90）

在論及報紙的一篇文章，已（譯按：在一九八八年元月）辭世的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曾指出前述情況，有其社會學上的背景因素。威廉士借助「麻思公眾」（mass public）與政治領域的關係說明之：

拿出全國性的大眾化報紙與普通晚報或地方報，做個比較。地方報紙的「硬性新聞」量幾乎總是較多。地方報呈現硬性新聞的手法，與少數報（譯註：即質報）比較接近，但遠離了多數報（譯註：即量報）；無論是就句子長度、段落、整篇文章、語彙、標題、角度或是人物的寫作，均極相像。但地方報紙的讀者，大致說來，根本就與全國多數（量）報的讀者是同一批人。（譯按：為什麼如此呢？這是因為）地方報紙的讀者，彼此相處在一個較能了解對方，

①譯註：英國報紙的階級成分濃厚，大眾報亦稱量報，發行份數廣大，如《太陽報》（*The Sun*）銷數四至五百萬份。報幅與本地《立報》相同，內容則與本地《時報周刊》或《大成報》等較接近。相對於量報則是質報、少數報、菁英報，銷數較低但讀者多為中上階級，如《泰晤士報》（*Times*）只有四、五十萬份發行量。詳見下文。

並且可以直接以（譯按：報紙以外的）其他方法回應彼此的社會情境，報紙所呈現的風格也就不同，而讀者期望於報紙者，也就不同。少數報是寫給特定人看的，這些人相對地能夠經常感受到他們與較大社會的這種關係。整體地看，大眾化報紙所做的綜合，正是為這些無法很有信心地有此感受的人而存在，這些報紙以替代性的方法，提供這些人某些版本的全國及國際性事務見聞，其間的橋樑則是「人物之性格」（personalities），它們透過類比方式而產生功能，等於是代理了某些真正為人所知或察知的人物。

（Williams, 1970: 508-9）

## 新聞媒介：新關係？

當然，新傳播科技對這個情勢的影響亦須列入考量。寫於一九七〇年代末期的一位評論者說：「在其(五十)年來的歷史，電視的角色一點都沒有變。它的唯一功能，就在從中央那一點，對外傳送節目，供作大眾消費，本質上，BBC 首次從亞歷山大皇宮開始對外廣播以後，電視就是這個樣子了。」（引自 Webster and Robins, 1979: 301）

不過，又誠如韋伯斯特與羅賓斯所說，「電傳視訊、錄放影機設備、新線纜電視等服務，已經逐漸要終結電視歷史的這個階段。」(ibid: 301) 但（譯按：我們不能就此放心）我們應該注意觀察新媒介如何為舊媒介整編。這些科技方面的變遷，其重要性當然另得仔細分析。甘特與史威尼威注意到了一件事實，此即多架電視機與多架錄放影機的家戶，數量上已見增加。誠如他們所說，現在的問題是：

在每個人日愈仰仗電視，從中取得多種不同種類之娛樂以後，他



們是否會在相同來源的娛樂之牽引下，彼此更為接近？……或者，是不是另有一股趨勢，驅使這些家庭購買越來越多的電視機及附屬設備（如錄放影機、家用電腦等），致使每個家庭都在使用個人化的「家庭娛樂系統」，而既然人們都在私底下使用，是不是每位家庭成員將因而更加彼此孤立？（Gunter and Svennevig, 1987: 36）

在這已然改變的脈絡，先前我們對電視及其觀眾所做的假設，均須重新考量。不過，筆者希望不至於遭人誤會，我並不是說媒介遞送系統的技術變化了以後，我們才需要考量這些議題。筆者亦想論稱，如果我們真要了解在政治傳播這個領域裏，媒介之隱意為何，則我們必須重新框架這個問題，將它擺放在較大的脈絡中考量，分析在接合「一家之內／私人的」與「政治的／公共的」兩個不同領域之時，媒介扮演了什麼角色。家庭的內部脈絡，勢必影響人們收受媒介的過程，但若就此論述，則往往招來誤解，讓人以為提出這個議題的人，不再關心權力、意識形態與再現等等社會層面的問題，對於此等誤解，筆者亦知之甚稔。但是，我極力想要撇開這樣的詮釋。究其實，筆者與布蘭敦在《每日電視》（*Everyday Television*, Brunsdon and Morley, 1978）正是致力於分析家室之內與外界政治現象的關係，二者之連結最明顯地表現在“全國觀眾”這個節目的企圖，它想要建構全國團結一致的形象，方式則是認定我們都是家庭成員，共享著若干經驗。基本上認定家庭（「私人領域」）確確實實是超出／外在於／建構了「政治」之限制的想法，已是由來既久的傳統。筆者這裏企圖達成的是，勾勒若干可能性，使我們能夠從中發現，原來，做為跨越這個公／私兩域之分的電視，實乃一個特殊的論述，可以說是連結了一家與國家之生活。從

某個層面來說，這是一個如何由空間之社會組織的觀點，了解傳播組織的問題。誠如史坎納（P. Scannell）所說：

廣電機構在特定社會空間產製並編排節目，而這些節目其實也是為這些社會空間而做……那麼，究竟這些節目由何種空間發言，人們究竟在何種空間看與聽這些節目，對於我們分析傳播脈絡而言，均是相關而必須考量之事；須知，諸如此類的傳播脈絡，實乃廣電所建立之現代生活的社會結構之一部分。（Scannell, 1988: 15）

同時，無可走避的是，空間的社會組織之問題，益發涉及了權力與意識形態之多種問題。在其分析英國廣電發展沿革的歷史性分析論文，史坎納又說：

雷思（Reith，當時 BBC 的執行長）辛苦遊說多年以後，總算說服英國國王從其住家，以家長的身分，向頃正（於聖誕夜），在各自家中收聽節目的國族及帝國之家庭說話……這並非純屬偶然意外之舉……這個行動為廣播角色戴上了至高無上的王冠，使其力大而能夠凝聚整個國族……家庭內的聽眾、皇家成員，整個國族有如一個家庭。（前引書，p. 19）

現代的大眾民主政治，其論壇迥異從前，是由廣電建構而成的新形態公共領域。在另一篇歷史分析之作，以英國廣電之發展為例，卡迪夫與史坎納（D. Cardiff and Scannell, 1987）對準了廣電的兩個重要角色而闡述：(1)一方是四散而不相連屬的聽眾，另一方是國族生活的形象心腹之地，廣播在二者之間形構了橋樑；(2)無論是地區性或全國性這

個層次，廣播都在聽眾的心裏內，營造了、提振了社區共同體的認同感。誠如他們所論，就其歷史意義而言，BBC 可以說是極具中央意識，它極力想要提供孤立四散的聽眾一種他們已然失落的社羣感，想要將聽眾的地方意識轉化為全國、甚至全球性的意識。我們在這裏看到的正是公與私領域的接合問題：左銜家庭，右接國家。誠如卡迪夫與史坎納所誌，廣電機構眼中的閱聽人一直是由無數家庭單位組成，亦即大量家庭的羣集，廣電機構從來沒有從社會階級或品味政治的觀點看待閱聽人。雷思爵士本人最為關心的是，廣播讓「整個國家如同一體、一人」的可能性，是高是低。這個願望的最粗糙之實現，可以舉一九三五年“帝國日”（Empire Day）收音機節目（卡迪夫與史坎納曾議論及此）為例，節目中有位母親向女兒如此解釋道：「大英帝國，瑪莉呀，是一個大家庭。」瑪莉聽了以後問到：「妳是說像我們這樣的家庭嗎？媽咪？」母親接著答道：「是啊，親愛的，但大得多了。」統一的符號無所不在，打從頭開始，這個符號就是家庭，包括了「英國這位媽媽」，這些帝國小孩，加上皇家及每位聽眾的小小家庭（Cardiff and Scannell, 1987: 163）。

這並不只是歷史上的巧合或奇聞趣譚。我們在當代節目中，同樣可以發現非常近似的主題，布蘭敦與筆者（Brunsdon and Morley, 1978）指出，許多當代時事新聞及雜誌型節目的著墨焦點，正是在於強調家庭，並強調國家乃是由這些家庭所組合而成。許多這個類型的廣播節目，雖然沒有明講，但它們設定的家庭，卻正是核心家庭：這類節目並不單只是向「家庭閱聽人」發言，而且它專注家庭的發言方式，造成了其主流內容是人情趣味故事，並且其呈現模式亦落入主流，強調公共議題能夠即刻與日常生活產生關係的部分（比如，「究竟這個新法律對一般消費者的意義為何？」）。廣電機構逕自認定，統一閱聽人（亦即「衆多家

庭所構成的國家」)者，是閱聽人的居家生活經驗。

## 規範——家之內的愉悅

筆者將利用這一小節，說明廣電機構與政策決定者認定其觀眾是核心家庭以後，將以什麼方式規範廣電事業，筆者亦將試圖了解這些規範性論述，如何打進一家之內的領域。誠如史坎納(Scannell, 1988)與費利思(S. Frith, 1983)所論，在相當重要的程度裏，廣電史其實就是動員家庭閱聽人的一種特定意識形態，建構廣電實務(practices)的歷史。

當然，他們不只是認定閱聽人均由家庭成員組成，更特殊的是，他們還認定閱聽人均由傳統的核心家庭單位組合而成，雖然大量的經驗性證據顯示，實情並非如此。迄今為止，相關單位仍然以核心家庭做為擬定廣電政策之依據。尤有進者，正是因為廣電接榫了公與私兩個領域，它才同時顯現了潛在「危險性」，因而必須規範：廣電衝破了或說踰越了家庭戶室的疆界及其「私人的宇宙」。就這個關鍵性議題，也就是廣電的檢查問題，安南委員會(Annan Committee on Broadcasting)②亦認定人們實乃在家庭中收看電視，因此如此界定電視檢查的問題：

人們在家中看電視、聽收音機……因此，存在於每個社會的違犯語言及行為禁忌的情況，所有家庭成員都在其他人在場之時，親眼目睹……與此相較，若是這種違反禁忌的情況發生在閱讀書本時，或是在俱樂部、電影院或劇場時，則引發令人難為情及沮喪

②譯註：英國每十至十二年左右，在廣電環境大變動前，大致上都先以立場相對超然的委員會，進行研究、調查。詳見筆者《資訊·錢·權》，1992年，時報出版公司，頁81。

的程度，應該低得多了。(Annan Committee, 1977: 246)

佩特森 (Paterson, 1987) 認為，分析當代情境的廣電與其閱聽人關係，必須將它置放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公私領域之重新畫分這個大架構中。他特別提及福利國家的專業人士，紛紛然日益關注家庭生活——但究其實，這意味著國家介入私人／一家之內領域的「正常化」形式。

誠如佩特森所論，國家關注的廣電議題，主要是研擬「家庭收視政策」，其焦點則著眼於兩件事項的交集，一是新科技已然降臨家中，二是確保這個科技將在某些特定時刻，播放某類不致於不適合兒童的特定節目。我們從東茶洛 (Donzelot, 1979) 就家庭所做的分析之脈絡中，可以清楚了解這些議題。誠如霍吉與胡山 (J. Hodges and A. Hussain, 1979: 89) 所論：

東茶洛……關切的是……與健康、兒童教育及養育有關的政策之維持……社會介入的重點目標，正是這些事關兒童的家庭生活及家庭之內的關係，而諸如此類的介入最後則轉變了家庭。

誠如霍吉與胡山所論，若從東茶洛的視野衡情度理，那麼，

國家以這些方式介入家庭的原因，是因為（政府認為），就整個體系來看，（某些）家庭無法……執行（再生產現存社會秩序的）相關功能。（前引書，p. 90）

佩特森認為 (Paterson, 1987: 4)，以廣電這個特定例子來說，晚近這段期間，國家關切的焦點是勞工階級家庭的「衰敗」、離婚引發的衝

擊，以及兒童的重要性。國家最關切的是，兒童在家庭之內的福利（亦即國家無法直接控制者），竟是如何。

誠如佩特森所指出，「全英國觀眾及聽眾協會」（the National Viewers' and Listners' Association）的遊說，焦點亦正是要求針對電影／影帶材料，做些更為詳盡的規範／分類，因為兒童在家中這塊可能未受監管的空間收看這些節目，著實「有害」。尤有進者，這種情況之所以引起關切，更是因為在若干類型的「問題」家庭，收視過程並沒有父母監督。佩特森因此注意到，是有人這麼論斷：「勞工階級的父母外出工作時，外出到小公共酒館時，或外出玩賓果時，他們都把小孩放在家中，讓他們自己看錄影帶，至於中產階級的父母，則日漸容許他們的小孩要看什麼就看什麼，對於小孩子收看的節目，他們幾乎沒有什麼限制」。（Paterson, 1987: 6）

面對這種情況，佩特森論稱，傳播新科技（如錄影帶）的成長也就被視為個人自由的增加，每個家庭成員如今都越發地可以計畫收看電視的流程（包括小孩，想想我們這個社會曾為了他們在家中收看「骯髒的影帶」，引發了恐慌），在這樣一個「鬆綁的」情境，國家機器也就更加振振有詞，重新申明「保護小孩」的必要性，其次，既然出現了小孩收看而未受監管的情形，那麼，實施禁令，阻止成人收看以求保障孩童，亦有其必要。

將一家之內的活動納入國家機器的監督範圍，這還是相當晚近的事情。在評論勞工階級的家庭之社會組織時，傅柯曾指出：

一直到十八世紀，整個家室的空間，都還沒有分化……房室中有數個房間——用來睡覺、吃飯、待客，都在裏邊，哪間用來做什



麼，根本無關緊要。然後，逐漸地空間開始專殊而有了各種功能……勞工階級的家庭固定了下來，起居空間做為廚房與飯廳之用，父母也有了用做燕好育兒的房間，另有一間則歸做小孩使用……家庭應該遵循的道德也就如此規範了出來……這是棲息地的小策略。（引自 Moores, 1988: 26）

在這整個轉換過程，廣播可以說是位居要津。是以，誠如莫莉斯所說，一旦進入了家庭，「……收音機在（白天時分）也就逐漸拿婦女做為其發言的『核心對象』。當然，這整個趨勢，由收音機廣播對準母親為其發言對象，試圖透過影響母親而影響家庭，可以從東茶洛的分析得到有用的啓示，東茶洛指出，政府試圖透過影響家庭而影響整個社會（Moores, 1988: 35），誠如莫莉斯指出，此時母親被認定為監理一家領域的人選，她取得了獨特的地位，成為改革家庭的主要支持力量。她已化身為國家機器的代理人，負責照管家庭成員的道德及生理保健福利，每當醫生或教育界人士必須針對孩童健保與福利找人談話時，母親就成了當然人選。

但我們從這個例子已經看出，這不止是規範體系的一個簡單延伸而已（若套用傅柯的話，則是規範體系的增殖）：其間也涉及了社會空間的深刻再結構化，廣電從業人員則肩負建構「客廳爐火之樂趣」（參見 Frith, 1983: 110），這些樂趣的建構，則以家庭及母親的形象、室內空間、家庭樂趣及家室生活為中心。

費利思論稱，廣播收音機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組織了家庭生活：聽眾在哪裏收聽收音機，就等於在哪裏產生了共同的感覺。」

（Frith, 1983: 110）他引用了馬可尼（Marconi, 1923）之言，認為廣播召回

了「古風，讓家庭夜間生活重回舊調」，他也注意到了茉莉(Morley，有錯照引)收音機公司的一段講詞：「致英國婦女」，內中以贊同的語調提及，「毫無疑問，收音機幫你留住丈夫與小孩，他們因而待在家裏而沒有去逛小酒廊，他們因此在家中體會到了你的溫柔與影響力。」(前引書，p. 110)

此外，與前段類同，費利思引述 BBC 的路易士(C. A. Lewis)在一九四二年所說的話而論稱：

所謂廣播，亦即家庭的重新發現也。家室之溫馨，晚近大抵已被冷卻，人們轉而迎合一大串許許多多的戶外活動，其結果是家庭紐帶與情感的式微，現在可好，出現了這個新的說服媒介以後，家長地位重回舊觀的可能性，在若干程度上，似乎已經恢復，所有的人應該都會承認這樣的情況，確實是或應該是對吾人生活，最具有影響力而且也是最好的影響力之一。(引自Frith, 1983: 110)

在費利思看來，收音機將公共事務帶進了家庭，不單只是將它使更多人知道而已。更重要的是，這等於是讓人們涉入社區事務。誠如他所說，「過去(及現在)讓人感到高興的是，就在扭開收音機時，你頓覺自己重要了起來」，這樣一來，雖說在家中收聽是「非常特殊的一種公共參與形式」，它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人們參與國家社羣的感覺，已油然而起(前引書)。但當然囉，這樣的國家社羣已經過家庭的改造，它所提供的是特定種類的快樂，尤其是熟稔的快樂感覺，而誠如費利思所說，這種感覺部分來自於時間之韻律已經由收音機而跳動，於是「廣播提供了足資預測的韻律，告訴聽眾什麼時候休閒，而部分原因是為了重複使用之後，收音機聽眾變成了社羣這個標語……人們的期

望再三得到認可，而到頭來，這就成為收聽廣播的愉快泉源了。」（前引書；亦請參見Rath, 1986）

無庸置疑，這些快樂另有深厚的時間面向。時間不僅只是社會賴以存在的媒介；尤有進者，我們可以說，時間組織的特殊模式，實際上等於是以前相當重要的一個面向，展現了不等形式的社會差別。

### 一家之內的時間之社會建構<sup>③</sup>

史坎納（Scannell, 1988）論稱，當代傳播研究必須從多重方向，重新研定。第一，他說，時下過度重視電視而致於忽略了其他傳播媒介，實在是錯誤的：

媒介研究凡事以電視優先，致而犧牲了收音機，這完完全全是莫須有的人為區分，這等於是使研究者忘卻了一件事實，此即日常生活中，電視與收音機同樣都為人使用，不同者只在不同時段與不同用途而已……（換言之，透過）人們在其日常生活中，慣常地使用這兩種媒介……而電視與收音機的節目流程……（以）未生干擾的方式，穿插進入了、貼進了，並結構化了這些日常生活的運作。（Scannell, 1988: 27）

第二，史坎納說，無論是分析電視或分析其他媒介，我們的焦點必須調整，不能再專注於再現（representation）等等事項，而是要注意廣電媒介（broadcasting）與時間之社會組織的關係，在他看來，後者實在遠較前者來得重要，因為：

③到底時間是怎麼被社會建構的？關於這方面的討論文集，引人入勝之作是 John Harsard (ed), *The Sociology of Time*, London: Macmillan, 1990。

廣播這樣的媒介，其廣播時間已經深厚地蘊涵於現代社會的時間韻律之中了……

全國性的廣電體系，其意義遠遠超出了它們在意識形態或再現面等等問題所扮演的角色。廣電的主要職掌在於中介了現代性、正規化 (normalisation) 了公共領域，並將私人領域社會化。它們完成這個職掌的方式，乃是透過了不斷生產與再生產公共生活與個人之日常生活……不是將二者當做不相連屬的領域，而是將它們視為彼此相連相吸……按例即可認出……亦極為熟悉。現代的大眾民主政治，其論壇正必須在這個急速不同之新公共領域開展，而這正是廣電機構所建構出來的。與此同時，收音機與電視在個體層次、人際層次與制度層次，維繫了我們平日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事蹟，我們生活中鎮日為之的所有事蹟。( Scannell, 1988: 27-28)

史坎納引用的是季定思 (Giddens, 1979) 對三種時序 (「鐘錶時間」 [clock time]、「生活時間」 [life time] 與「日曆時間」 [calendrical time]) 犬牙交錯之分析，他亦說這三種時間散漫於廣電節目及其流程的每一個面向；然後他進而論稱，廣電媒介以日曆時間這個層次為準，綜合了這三個時間，提供所有子民相同的節目，因此，廣電在統合全國性生活的過程，扮演了非凡的重要性。比方說，誠如他所說，「無論是全英國足球聯盟 (FA, Football Association) 的決賽、年度越野賽馬 (the Grand National, 譯按：於利物浦附近舉行) 先前都只能到現場才能觀看，現在可好，收音機問世以後，這整個情況改變了，任何擁有收音機的人，都可以同步收聽」 (Scannell, 1988: 5) 如此一來，就像史坎納所說，類如年度越野賽馬之類的事件也就「不再只是運動比賽了，並且如此持續

著。它們已然成為……傳統、儀式，以及全英國人生活的一部分。」這個形式的廣播，史坎納論稱，「已把先前……分立的諸多事件針織在一起……已把公私領域針織在一起……它們現在都變成了統合全國生活的習俗慣例，（而）BBC 或許也就這樣躍居英國文化的主要代理人。」

（ibid: 6）既然扮演了這麼一個「日曆」角色，廣播也就「年復一年，提供了井然有序的時令，節慶、儀式與民俗活動依序規則地進行……標誌了廣播年的開展。」（ibid: 7）

史坎納念茲在茲的是，「日升日落，年來年去，在所有人都沒有意識到的流轉裏，廣播維繫了人們的生活與作息。」（前引文）事實上，這就是注意到了媒介在賦予時間特定結構之時，究竟擔當了何種角色。依前所述，史坎納的分析焦點，在於將廣播定位為核心，認定廣播位居全國文化之中樞，是促成人們按照日曆而組織其生活的要素。與此類同，他亦分析了廣播媒介何以能夠建構一種千百萬人共享的文化資源，以及，比如，長期流行的連續劇何以能夠成為全國人「過去共通的經驗」。究其實，羅迪傑（Lodziak, 1987）最近亦曾語調鏗鏘有力地指出，研究電視的批判之作，應該致力於發現、探討的是這個層次的問題，亦即分析廣電對家庭時間的組織，產生了什麼「效果」，而不是撲向找尋電視內容的「意識形態效果」。羅迪傑關心的是，如何才能發展出一套「時間的政治經濟學」，而這套學問所要分析的焦點則是，在接合公私領域的時間關係時，媒介扮演了什麼角色（Lodziak, 1987: 135）。

## 時間中的文化變異

以下，筆者提出的分析線索，部分借光於史坎納的關懷（但對他稍後之企圖心，筆者實不以爲然，史坎納〔Scannell, 1989〕後來完全以目的論之問

題，取代了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不過，提出這個線索之前，有個警語還得在此先行附記。若是全然採用史坎納的分析邏輯，則我們很可能認為「廣播時間」根本只是自行強加於閱聽人身上。但整個事情可沒有這麼簡單。這是因為無論是就宏觀層次(國族或地域的文化變異)，或是就微觀層次(一個家庭文化的差別，而它本身又部分起因於階級之等差)來說，這也涉及了閱聽人先前的時間感知的文化形構，將以何種方式，決定閱聽人如何與廣播節目之流程，產生關係。提出這一點，用意只在說明，凡此種種，無論就其宏觀或微觀層次的分析，均有其文化上的變異。就前者而言，羅耳(Lull, 1988)的研究成果，已就跨文化情況提供了比較，相當管用。羅耳注意到，各個文化分別有她們的「時間感」，而這個感覺則影響了人們看電視的情況。有了這層考量，他也就注意到一件事實，「丹麥人對於時間的感知，自有定向，具備了系統化的、可資預測的類型，這個定向也包括了丹麥人對於電視節目的收看情況，它是一個非常井然有序的文化之延伸。」(Lull, 1988: 10)羅耳又以巴基斯坦為例，對比丹麥的情況，在巴國，「電視節目的播出時間……經常與預先出版的節目表不同，甚至根本沒有播出，(但)該國觀眾根本不以為忤，也絲毫沒有因為這些不規則的情況而驚訝。」(p.11)

不過，誠如羅耳所說，先前的既存時間文化之定向，固然造成了一個獨立的效果，但長期以觀，電視本身同樣也影響了人們對於時間的觀感與使用。所以，他說：「用餐時間、就寢時間、共處時間，作家事的時間……以及言談互動的類型，都在電視節目的編排方式之影響下(譯按：產生了變化)。」(p.11)尤其是，根據他所引用的研究(Behl, 1988)，在印度這個地方，電視「刻正轉變某些鄉村印度家庭的生活，以前，他們的生活步調隨著大自然的運轉而起伏，現在則轉由時鐘及電視制



約……週日成了『電視節』，而先前用來從事交易的時刻，已被晚間『電視時間』取代……這一整天的許多部分，也就在電視節目的流程編排下，重做界定與結構。」(Behl, 1988: 244)

再就微觀分析來看，布萊斯(Bryce, 1987)的研究極具啟發性，他的重點在於探究「家庭時間及電視使用」的文化變動狀況。布萊斯如此論稱：「家庭如何運用時間、如何使用電視，二者的關係若何，其實隱藏著許多議題，但一直沒有人處理。收看電視的順序，它在林林種種家庭活動中所佔據的位置，反映了一種選擇……一種我們所知無多的協商過程」。(Bryce, 1987: 123)

就布萊斯所關心的題旨來說，我們理當處理的問題是，家庭生活這個框架之內，電視所據有的時間位置。布萊斯論稱，如果我們真要了解家庭如何使用電視，則須先對家庭對於時間的定向有所了解。根據他的論點，這是因為我們必須認清，家庭的電視收看行爲，實乃深刻反映了家庭組織及定向回應其社會情境的方式。就這段斷言的最簡單層次而言，誠如安德森評論布萊斯(Bryce, 1987)的研究時所說，我們所須注意的是，「諸多家庭如何商計而得出不同的時間概念，而這些時間概念又如何整編收看电视的行爲。」(Anderson, 1987: 167)尤有進者，布萊斯亦論稱，我們必須先行探究家庭之時間整體結構化情況，究竟與坎特與李爾(D. Kantor and W. Lehr, 1975 轉引自Bryce, 1987: 122)所說的家庭成員活動之同步化模式、家庭成員設定優先行事順序的程序，以及家庭成員組織其時間求能滿足家庭目標的方式，有些什麼關係；布萊斯論稱，了解這些問題之後，我們才真正能夠研究家庭的電視收看情境。

過去的許多日記法研究，事實上已然探索了家庭時間使用之等差

問題，布萊斯對此相當熟稔。但在她看來，這些研究卻只注意到了等差問題的結果，而沒有注意其時間分配本身的過程。因此，她論稱

諸如此類的傳統研究，均只指出時間分配於多種不同的目標，但卻鮮少分析這些家庭建構其一天生活的動態過程……時間使用的研究……記載了……每個家庭花用在看電視的時間量，但卻殊少談及收視行為的本質，對於這等收視行為究竟如何產生，亦甚少置語。(Bryce, 1987: 123)

就她自身的研究而言，布萊斯主要是致力於區辨她所舉證的多種家庭行為，途徑則是借用霍爾 (T. Hall, 1976) 對下列二個概念的劃分：其一是「時間的單時定向」(monochronic orientation)，它指涉的是活動的線形及序列組織、對於計畫及編定收視流程的倚重、強調時鐘及日曆所律定的時序，幾乎是斷絕了即興收視的可能；其二是「時間的多時定向」(polychronic orientation)，它指涉的是多重活動的共時發生、不怎麼強調計畫及編定收視流程、鮮少在意時鐘或日曆的時序，因此也就很難遵守先前設定的收視時間表。布萊斯的主要論點是，由於這兩種時間定向截然不同，具備不同定向的家庭，相繼也就、相應也就展示了不等的電視收視行為之模式。

據此立論，布萊斯推斷，具有時間的單時定向之家庭，他們在收看電視之時，將會展示下列特徵：

- (a)收看電視時，將有高度的計畫及收看時間表；
- (b)在其他不同活動之間，收看電視；
- (c)將收看電視當做是單一的活動；

(d)密切注意螢光幕的視訊。

反之，具有時間的多時定向之家庭，他們在收看電視之時，將會展示下列特徵：

(a)收看電視時，很少或沒有計畫及收看時間表；

(b)電視變成了其他活動的「時鐘」；

(c)收看電視時，同時從事許多其他活動；

(d)對於螢光幕的視訊，僅時斷時續或零星的注意。

無庸置疑，布萊斯這裏已經確認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此即對於時間的不同定向，將決定各個家庭與電視的不同關係。不過，這個對比強烈的面向，究竟具有什麼地位，或許還值得我們進一步深究。若是依照布萊斯的解釋，那麼，這個不同只是不同家庭之規則體系 (rule-systems) 與內部文化的一種屬性。但是，筆者在這裏要指出，這樣的不同，何嘗不能從另一個方向詮釋？我們其實可以說，時間多元／單元的區別，反映了家庭文化之差異以外，同等反映了性別的差別。莫蕾斯基 (Modleski, 1984) 就曾嘗試指出，電視連續劇這個類型 (genre) (特徵是多重的敘事手法) 廣受家庭主婦歡迎的原因，是因為它「適合」(fit) 家庭工作的多時韻律 (不同活動的持續進行、時斷時續等等)。與此類同，筆者 (Morley, 1986) 先前的研究亦顯示，單時的收視模式似乎彰顯了「陽剛」收視風格的特色 (有計畫的收看、全神貫注、收看是單一的活動)，與此相反，多時收視模式則是相應的「陰性」模式 (沒有計畫的收看、許多活動同時進行、收看時注意力零星而不集中)。

布萊斯論稱，具有時間的單時定向的家庭，必然是以其他家庭活

動所設定的框架為優先，然後將使用電視當做這個框架內，特定的一個「過濾器」(filler)活動。反之，具有時間的多時定向的家庭，「其他活動並不是形成框架的主體，而看電視也不是其間的一個過濾器，其實，電視本身就是框(筆者莫里按：因為電視一直都是開著)，其他活動則環繞著電視而運行。」(Bryce, 1987: 126)舉個例子，在這樣的一個家庭，洗澡的時間也就排在「節目結束之後」；小孩子的就寢時間，則說是「“草原小屋”(the Little House of the Prairie)這個節目播完之後的事」(前引書, p. 126)。確實，在這樣的家庭，媒介節目的編排時間已經取代了時鐘時間，成為測量時間的標準。其他活動均依此作為依歸。既然如此，布萊斯也就引用這類家庭中的一段話，說明這種情況；有位母親告誡她的小孩，要他們趕緊上學，此時，她是這麼說的：「都已播出了第二支廣告片，該上學了，你們都知道的嘛。」(同前註)

布萊斯察覺一項事實，此即在「時間的單時定向的」家庭，看電視就是看電視，是一種排他的活動，包括了相對高層次的注意力，若有任何人想要同時在收看電視時，進行其他活動，必然不被認可(前引書, p. 127)，看電視時任何談話，只能述及與節目有關的題材，除此之外，一概不准說話。反之，在「時間的多時定向的」家庭，「邊看電視邊做其他事，根本就是常態……(而)看電視通常是家庭生活之背景脈絡的一部分，看電視並非獨自進行的活動，也不是目的本身，所以家庭成員對電視節目的注意層次也就比較低」。(同前註)

為什麼會造成這種差異呢？布萊斯認為，部分原因出在不同家庭對於成就與時間的有效使用，抱持相對不同的價值觀。比如說，她注意到，在「時間的單時定向」的家庭，「父母清楚地告訴他們的小孩，他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做完之後才再做另一件事；此外，父親總是

擔心他的小孩『浪費了太多時間』。」（前引書，p. 130-1）

尤有進者，布萊斯同時察覺，周遭文化也支持了／酬報了時間的單時定向家庭的行事方式。是以，就配合及有效參與外在更大之社會與社區（community）活動而言，時間的單時定向家庭是比較「成功的」，因為他們能夠遵守時間表；然而，時間的多時定向家庭，其成員「經常上學遲到，也不能準時參加事先已約定好的集會。」（前引書，p.132）與此類同，布萊斯還指出，是有證據顯示，來自時間的單時定向家庭的小孩，比較容易在進入幼稚園時，成功地適應團體生活，而小學老師也認為他們比較容易得到好成績，因為學校對他們的要求，以及他們在家庭生活所已經培育出來的時間定向，「配合」得比較好。

走筆至此，我們可以清楚發現，布萊斯所區分的時間的單時與多時定向家庭，在某些方面與伯恩斯坦（Bernstein, 1971）的說法，足以相互輝映。伯恩斯坦區分了兩種家庭，分別透過其社會化過程，讓其小孩得有精緻（elaborated）與多所限制（restriced）的語言符碼。而家庭既有這等不同，則其所造成的社會效應，當然亦有其對應之處（比如，前已述及的就學之表現）。筆者無意就此分析繼續往前推展。筆者花用如此大量的篇幅，不厭其煩地詳細引述布萊斯的分析，用意只在提供一個備忘準則，希望我們在剖析媒介在時間之社會結構化過程所扮演的角色之時，不要只注意到這個宏觀層次的問題，而是要對前已述及之微觀層次的分別與差異狀況，亦保持敏銳的知覺。或者，針對這個難題所做的若干歷史性回顧，最能幫助我們釐清這些事涉根本的問題。

## 時間的廣播與想像社羣的建構

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上，勞工活動的過程得以同步化的部分原因，

是因為時間的標準化之故，湯普森(Thompson, 1967)對其重要性，已有分析。爲了證明這個論點，湯普森引用一七〇〇年的「克羅利鐵工廠律書」(Law Book of the Crowley Iron Works)時，以辛辣有力地意有所指，論及了時間的符號意義，以及爲了控制與界定勞動過程之時間而產生的政治抗爭：「本法因此律令，時間之估算必須以督導的時鐘爲準，除非鐘匠調整，任何人不得更動這個時鐘，任何人不准另以其他時鐘、鐘或錶做爲計時標準」(引自 Thompson, 1967: 82 n. 84) ④。

季定思景隨孟福(Lewis Mumford) ⑤兩人都論稱，「機械生產時代的來臨，應該以時鐘的問世做爲標誌，不是蒸氣引擎。」(Giddens, 1979: 210) 涉及時間的諸般問題，無可避免地必定涉及了權力問題，到底誰有權力界定時間，這是誰有權力將一個標準的或國家的時間，強加於他人身上的問題，這是時間與傳播模式之關係的問題。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金在分析十九世紀的英國社會時，也就論稱「隨著時鐘與手錶的漸次普及，以及都會化及鐵路的發展，時間的組織完全改觀了，社會上出現了嶄新的時間定向，『本地時間』被壓抑，取而代之的是『倫敦時間』」。(King, 1980b: 198)

就其本質而言，無論是其物理或符號意義，時間必然與傳播有關。類似於金的分析，卡瑞(J. Carey, 1989)也追蹤了美國全國性標準時間的出現軌跡(根據卡瑞的說法，官方於1883年11月18日採用之)，他說這是因

④譯註：湯普森於1993年8月辭世，關於他的政治觀與知識觀，請參見王振寰，1993，《資本、勞工與國家機器》頁163-188；趙剛，1994，《小心國家族》，頁168-192；劉爲，1994，〈爲了理性：紀念湯普森〉，《自立早報》，9月19日；以及舒詩偉譯，1994，〈湯普森：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與激進民主人士〉，《立報》，12月26-31日。

⑤譯註：美國知名公共型知識分子，1895—1990，參見夏鑄九，1993，〈進步年代的公共性建構：路易士·孟福與「歷史中的城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6期：167-185。



為全美國鐵路網開通以後，各地時間必須同步化的緣故。羅倫斯（C. Rawlence, 1985）也以格林威治標準時間（以及為了維持這個時間而發展出來的計時器）為例，說明它對英國海軍的船鑑具有重大意義，是組織大英帝國的一個關鍵因素。與此類同，另有學者亦指出，歐洲殖民亞洲的過程中，時鐘的應用是一個重大的特徵。

分析傳播現象，確實必須將它置放在社會之時空組織的脈絡中，方始能夠理解。但不僅如此，無論是物理上的（如鐵路的問世，如前所述）或是符號上的（比如，廣播的降臨）傳播模式，它們本身也轉變了這些社會組織的模式。在這樣的節骨眼裏，謹記傳播媒介的這個角色是很重要的，正就是傳播媒體將此新的時間向度，引進了家庭領域。這個論點已經貼近於史坎納（Scannell, 1988）與羅迪傑（Lodziak, 1987）的觀察，他們說，媒介研究不單只是要探討廣電媒介的再現或意識形態角色，它應該相應地研究廣電在將時間納入社會組織時，扮演了什麼角色。

誠如塞特等人（Seiter et. al., 1989）所論，湯普森（Thompson, 1967）分析的過人之處與重要性在於他展示了一件事實，此即他所探知的工業生產領域時間之「理性化」，其實也伸展到了家庭領域，結果一來，家庭領域的複製與再生產，也就愈來愈受制於工業生產的區隔類型。

羅迪傑說（前引書），廣電之興起，對於「鬆弛身心的時間組織」，起了作用，我們在就此研究時，必須注意到相關的因果關係，（至少）可以從兩個方向探討。這就是說，一方面我們必須注意，現存的文化對於時間之定向，從微觀到宏觀層次，都在影響廣電組織，無論是在社會整體、社會之內的一個特定次文化或家庭，莫不如此；但另一方面，廣電節目的編排本身，對於時間的組織，也反過來產生了作用。廣電及其他傳播科技，必然是進入了已然建構完成的、歷史上的特定時空

之分隔，與此同時，它們又轉變了那些先前已經存在的分隔狀態。

我們先前已經提及，莫莉斯就收音機發展過程所做的歷史性分析，相當明確地指出了廣電之出現，著實將精確測量時間的方式，引進了家庭，莫莉斯稱呼其間的機制是「全國標準時間的馴化、家庭化。」

(Moore, 1988: 67) 我們在這裏可以察覺，在其最爲基本的層次裏（或許也是最具有本體論意義的層次），廣電將公私兩個領域的距離拉近了，此際，「全國性的」時間可以直接轉載進入私人領域，如此一來也就提供所有收聽的人，同等而正宗的時間感，讓他們每個人都變做同步「時間區」或全國社區的一分子。楊格（Filson Young）對此「廣電時間」的重要性之評論是，這不僅是「每日節目最爲平凡而規律的特徵」，它還是廣電所發明的「眾多新事務當中，最奇怪的一種。」（引自 Moore, 1988: 38）

我們不妨以下光景：許多收音機電台在整點、半點或一刻鐘時，均會例行的播報時間，而許多收音機聽眾也習慣於整天把收音機開著，電台則整點一到，就會播報「整點新聞」。諸如此類的儀式所構聯出來的脈絡，不禁讓人想到，對於許多聽眾來說，收音機的一個主要功能，正就是它充當了全國性（以及／或地方上的）「說話」時鐘，它將這些聽眾的私人活動，與外界更大的（地方、全國性與國際性）社區，接在了一起。與此類同，哈特利也說，「特定國族建構其成員的主要場域之一，正是……電視。」（Hartley, 1987: 124）哈特利引用的是安德森的概念，安德森說國族也者，只是一個「想像出來的社區」而已（Anderson, 1983），這樣的社區是由特定的一些論述聯合建構營造的；另外，哈特利也援用了埃利思的觀察，他說，廣播電視可以延伸進入「民族國家的私人生活陣中……在廣電範圍之外的人，則對此無法了解」（Ellis, 1982: 5）。

值此影視節目的跨國合作與衛星電視的時代，埃利思的論點或許稍嫌誇張，不過，如果我們將他的論點與史坎納的議論，合併考量，倒也可以另行發現一個堪稱有趣的論事視野，已然成形：史坎納不是說廣電的角色，在於提供其閱聽人「一種過去的共同點」嗎？既然如此，這個視野也就給予我們啓發，揭示了「國族社區」的合格成員應該具有哪些條件，其實部分是由廣電機構建構的。

馬汀-巴貝羅 (Martin-Barbero, 1988) 指出，在「麻思大眾 (mass) 脫胎換骨，搖身變為一般民眾 (people)，而一般民眾再蛻變成一個族國 (nation) 的過程」，傳播媒介位居要津。他注意到了一件事實，此即全國性廣電體系發展的國家，提供了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中，原先散居各地各省的住民，第一次的族國之經驗。誠如他所論，族國認同的浮現與建構，如果沒有善加評估傳播科技居中扮演的角色，也就無法適切地了解。這些科技成品容許人們得有「空間的認同感」，不止是召喚出來共通的記憶而已，而且也召喚了「近身遭遇及團結之情」。是以，所謂族國，也就不再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體驗，而欠缺了廣電科技，則這樣的體驗也就不存在，廣電之為用，正是將「族國的政治意念，變質為活生生的經驗，變質為沉澱在人心中的想法、每天念茲在茲的平凡語句。」(Martin-Barbero, 1988: 455-6)

把話再說得白一些，就誠如安德森所說，「一般的美國人，終其一生，恐怕也遇不見多少位同樣是美國籍的人，甚至也不知道他們的名姓」。他壓根不知道在某一個時刻，他們在做些什麼。但對於他們日復一日、不知名姓而同時進行的活動，他卻知之甚稔。」(Anderson, 1983: 16)

這種「同時進行」的屬性，來自何方？在其他眾多來源中，我們

或許可以舉電視廣播時間表所約制的共時經驗。其次，這樣的「知之甚稔」又來自何方？與前文具有對比之意味，安德森（Anderson, 1983）指出，報紙是連繫國族眾多成員的工具，提供了想像機制。誠如哈特利所說，報紙「是最終的虛構之物，因為它們建構了想像出來的社區，同時報紙也是大眾儀式或典禮的基礎，每天都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競相從事。」（Hartley, 1987: 123-4）羅斯（C. D. Rath）論稱，透過廣播電視而建構的不再只是國族這個社區而已：對於跨越國界而進行的廣播現象，我們同樣應予注意，此時，「一個族國、一個地域或一個文化的界域，不再是訴求的依歸；更為重要的是傳散領土的疆域，於此，傳散的空間已然超越了……權力的力理界限、超越了社會生活與知識的疆域，而這些已被超越的東西，先前正是界定族國文化性之空間要素。」（Rath, 1986: 202-3）

包辛格提出了一個相當有趣的說明，他指出，報紙位居三者之交，提供了連繫的機能：家庭儀式、日常生活的作息組織，以及國族這個「想像社區」的建構。如果某天早上，日報突然沒有出現，情況會是怎麼樣呢？他對這個「打斷」，提出了評論。他所關心的是，人們悵然若有所失的是什麼呢？誠如他所說，「是悵然若有所失於報紙的內容……這樣的問題嗎？或是，人們根本就只是想念報紙『本身』？因為現今報紙已經是生活的一部分（對於許多人來說，是早餐這個每天進行、很像儀式的行為之組成部分），早餐時看報，證明了早餐的世界仍然沒有改變。」

（Bausinger, 1984: 334）當然，反之亦然。我們另可做個類比——其實，我們可以說廣播電視的收看，更是具有同時性的效應——我們可以論稱，單是數以百萬計的人，同時都在收看電視這樣的聯合儀式行為，其重要性至少與廣播的資訊內容，同等重要（參見 Nordenstreng, 1972）。

持此論點繼續往前推敲，我們必然會問，值此廣電結構大肆變遷的時刻，以上這些論點的意義何在。廣電頻道、線纜與衛星電視的增加，很可能將我們推向一個更為片面而分裂的社會世界，傳統以國為邊界的廣播電視，至此面臨一大變局。究其實，這些新的傳播形式，在解構族國文化的過程，可能擔當了重要的角色，而錄放影機與其他新傳播科技亦具備了「重新編組的」潛能，先前我們認為廣播經驗「必然同時共性」，還得再做商榷。在競相角逐立基（niche）市場及窄播的世界，我們當中有許多人的廣電經驗，愈來愈少會與其他人相同。就此而言，我們身屬的眾多社區，可能也就沿著這些片面的切割線，一路想像、建構。

然而，如果我們景隨威廉士（Williams, 1976），認定「社區」（community）與「傳播」（communication）必然糾葛成串，是彼此無法分離觀察的概念，那麼，我們理應察覺，共鳴作響的吸引力俱在，仍然陣陣向我們招手，要我們歡迎並「加入」持續撲向我們的廣播。

西伐史東（Silverstone, 1988）論稱，看電視就像是把我們捲進了通道的儀式，遠離而後復返塵世，我們就這樣以想當然爾的姿態，沉浸在螢光幕的「異世界」裏，此事自有其重要意義：

我們每天晚上收看新聞，其實都是儀式，我們沉浸在它的機械反覆……而更重要的是，沉浸在它將我們所熟悉的、感到陌生的，均作呈現，呈現了重新安撫我們的景物，呈現了使我們感受到威脅的景物。在英國，每一個主要新聞時段，在播報之前，必定有一串高超凌越的開場白（地球中心倫敦：倫敦中心大鵬鐘〔譯按：國會所在地〕〔筆者莫里按〕），這些新聞在收尾時，總也不忘來個「甜

點」——來個「人情趣味新聞」，將觀眾導回日常生活的合宜步調裏。確實，新聞收播前一刻，幾乎總是……這些播新聞的人，整理桌上的講稿，然後翻身或就近與身旁的同事，無聲地開口交談，如此也就宣佈了一切重回正常。(Silverstone, 1988: 26)

本章起首，筆者曾引用一位觀眾的話，說明她為什麼不看全國性新聞節目，現在，筆者則引用她的另一段說法，說明這些廣播在結構她的家庭日常作息之過程，有些什麼重要性：

若是我在寫東西，我就趕緊快煮一餐簡便的中餐，然後工作到五點。然後，雷士李 (Leslie) 也匆匆做完了事，到了六點，我們總是總是坐下來喝杯琴酒什麼的，等於是與可愛的羅利 (Sue Lawley) 與威契爾 (Nicholas Witchell) 一起看新聞。我們總像是與他們有約，儘管他們根本不認識我們。她讓你覺得什麼都好，管它是什麼新聞哩。(引自〈佛瑞明的一天〉[A Life in the day of Celia Fremlin], 《週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 1988年7月3日)



## 第13章

# 全球共本土於客廳

---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所謂世界，只有二處——他們的住家以及他們的電視機。（DeLillo, 1985: 66）

索架（E. Soja, 1989）論稱，直至現在，批判理論賦予時間及歷史，相當優先的分析位置，但誠如傅柯所說，批判理論「卻將空間視做固定不動、死滅、不具辯證關係，並且動彈不得。與此相反，時間卻內涵飽滿、蘊育多廣、活生生而具備了辯證關係。」（引自 Soja, 1989: 4）是以，批判理論只將資本主義本身視做歷史性產物，僅在偶爾之間將它視為地理位移的過程，而即便在這驚鴻一瞥察覺了地理空間的問題，這個空間也只被視做外在的一股限制，或說這個空間只被當做幾乎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結果。對於馬克思本人來說，地理（geography）也差不多只是「能省則省的一些困擾」。與此同時，索架也注意到了一個現象，此即現代地理學本身「亦被化約，主要只是用於指涉事實素材的積累、分類，以及理論上無懈可擊對於事實素材的再現，說這是地表的『區域分化』——地理學已自行化約為專只研究各種結果，這是其他人最能理解的動態過程之終端產品。」（Soja 1989: 36-7）

索架自己的宏圖，涉及了兩種空間之根本差異的體認，一種是空

間「本質」——此時，空間是一個既定的、自然而然的背景，任何人類之事務均需有此；再一種則是社會組織與生產之空間，是人為創造的——「第二個本質」，這個空間性才是物質論者所需詮釋的正確對象。

誠如哈維（D. Harvey）所說：

馬克思……韋伯與涂爾幹，他們……都優先處理時間與歷史，遠重於空間與地理，即便他們真的處理了後者，他們也流於不加質疑地接受，認定它們只是恆定的背景或歷史行動的場域……但究竟空間關係與地理形構是怎麼產生出來的？這個問題打從一開始就……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被忽略了。（Harvey, 1985: 141-2）

尤有進者，就像他的宏論所說，

值此資本主義在全球找到了它的發揮空間，一日大似一日之際，……再要將地方、社區、城市、地域或甚至是族國等等概念，當做是「本來合當如此」，則實在令人難以苟同……但反過來說，懷抱全球性眼界的抗拒與轉變策略，卻又非得從地方與社區的實體開始，無以起始。（引自 Robins, 1989: 145）

索架宣稱的目標，在於賦予（尋常的）歷史性敘述特定的空間意義，他企圖彰顯「紀律與權力的關係，其實亦雋刻於狀似沒有絲毫紀律與本權色彩的社會生活之空間」，因此，這個說法也就超越了「笛卡爾式的……固定不移之空間地圖學」（Soja, 1989: 6-7），這樣的看法只看到了「自然的形式」，除了只供測量及現象的描述以外，再無可說。

傅柯察覺到，「如我們所知，十九世紀的大執迷是歷史……（但）當前這個時代，或許可能是最具有空間意義的時代。」（Foucault, 1986:

22) 詹明信 (F. Jameson, 1984) 論稱, (後現代) 文化邏輯的空間特殊性正是「晚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如同索架所誌, 若干年前, 柏格 (John Berger) ①即曾論稱: 「今之所謂預言, 指涉了地理上的, 而不是歷史上的投射; 藏匿事理之後果, 不讓我們眼見其真相者, 是空間, 不是時間。」(引自 Soja, 1989: 22) 正是在這樣的脈絡裏, 我們才應正視傅柯的律令, 他說, 「『林林總總之空間』的一整個歷史, 尚待書寫——這同時也是『諸般權勢』的歷史……大自地緣政治的策略, 小至棲息地的戰術, 莫不如此。」(Foucault, 1980b: 149)

筆者與羅賓斯已在其他論文 (參見 Morley and Robins, 1989, 1990, 1992) 展開探索, 想要找出, 一旦我們設定了後現代地理學的種種概念, 然後在其間思索傳播過程, 並且思索社會空間及社會關係的持續建構及重構, 那麼, 我們面前將浮現哪些議題。放在一個後設層次來看, 羅賓斯 (Robins, 1989) 論稱, 以現狀說來, 我們已然捲入政治與經濟重構及轉換的根本過程, 其間, 已然預見了 (若不是已然反映了的話) 一個轉向, 超出了福特式資本積累與社會規範的體系 ②。羅賓斯的主要論點是, 在這些歷史性進展的核心, 涉及了空間重新結構與重新形模的過程, 這種情形「同時涉及了兩種現象, 其一是積累的空間組合產生了變化, 再則是人對於空間及空間性的主體經驗與定性亦已改變。若要分析這等現象……則需有富含地理空間想像力的社會理論, 方能竟

①譯註: 英國左翼知名文化社會評論家, 生於1926年, 曾為英國廣播協會 (BBC) 製作傳世的“看的方法”電視節目, 該節目脚本亦由BBC出版, 風行多國並有戴行錢、陳志梧及林鎮國三種中譯本。

②譯註: 所謂福特體系, 意指透過大量生產與大量消費而運轉的經濟秩序, 進一步說明, 參見馮建三, 1992, 《資訊、錢、權》, 台北: 時報, 頁105-114; 以及 *Post-Fordist and Social Form*, 1992, Werner Bonefeld and John Hollway (eds.), London: Macmillan.

其功。」(Robins, 1989: 145)

就筆者眼前的目地而言，要緊的事實是，如同羅賓斯所論，影像工業亦已深深捲入了這些社會空間過程中，並且捲得相當深入而獨特。是以，誠如羅賓斯所論，「傳播現象的政治學，已然聚合於空間及地域的政治學：傳播現象之問題，亦即社區之本質與範圍的問題。」(前引書，p. 146)就本章目的而言，尤須指明的是，已然提及這些問題的若干理論性著作(比如，在談及衛星電視及文化認同之辯論之時)，都只在相當抽象的層次論事，主要只從國際地緣政治的脈絡論事。然而，稍前我們曾經引述，傅柯提及而尚未發揮的論點，正是提醒了我們，「地理上的想像力」，誠如所說，在在需要應用於「小至棲息地的戰術」，一如我們必須將其適用於「大自地緣政治的策略」。如果說傳播體系的核心功能之一，正是在於接合不同空間(公私之交融、一國與國際之間)及穿透疆界(無論是家室之界域或國境之邊界)，那麼，我們的分析架構必須同時能夠應用於微觀及宏觀兩個層次。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這才可以看出本章的真意：筆者在這裏所想要處理的問題，涉及了透過方誌學方法，研究當代文化中，媒介消費之全球化與在地化同步發生的動態過程。此處的關鍵議題是，分析這些宏觀議題時，微觀過程的小規模研究，其地位若何。本章主要論旨是，正因為諸如此類的詳細之「家庭內部的」或「在地的」研究，已然率先針對「客廳之政治學」進行探討，因此我們才能夠以最具效率的方式，掌握全球化與在地化(或說同質化與零碎片面化)之過程的意義，這種兩股對立並陳的現象，已經被廣為認定是當代(或甚至是「後現代」)文化的核心特徵③。

不言而喻，如果「只是」分析這家或那家的消費微觀過程，但卻

沒有直指與其相關的文化(政治與意識形態)問題,那麼,經此分析而得到的理解,最終的價值,將會非常有限。真要只能這麼分析,則橫梗在前者,正是「那又怎麼樣?」的問題——如果我們只是竟日累積成套成堆的消費過程之描述,哪怕這些分析再怎麼精緻細膩,那又怎麼樣呢?與此相反,若果只是那些宏觀過程的分析,但卻沒有充分以理解(主要是家庭內部的)消費過程之複雜性做為基礎,那麼,這同樣是相當危險的,一種反向的危險,亦即這樣的分析將因為流於過度的系統化,以至於泯除了所有可能事關緊要的差異。換另外一個方式說,這是一個必須避其兩端之危險而導航前進的問題,一端是出以不當的浪漫之情,夸言「消費者自由萬萬歲」的危險,另一端卻是執迷而狂亂地滿腦子「全球控制」之幻想。誠如梅鐸(Murdock, 1989b)所說,這裏涉及的問題是,究竟我們如何找到一個合宜的各種途徑,既結合人們「多種生活世界」之詮釋性研究,又能將包裹並組織這些生活世界的外在那些更大的形構,盡數勾勒出來?

筆者不敏,但將試圖處理這些議題,首先,回顧晚近的一些辯論,弄清楚電視消費與電視觀眾之「主動性」的爭議,究竟是些什麼名堂,

③本章取向的理論背景,可以說部分脫胎於Fernand Braudel(尤其是他的*Civilisation and Capitalis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London: William Collins, 1988)。尤具意義的是,筆者企圖超越徒然無益的二分法,這個二分法可以舉 Immanuel Wallerstein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的畫分作為代表。一方面存在著敘事史學及古典人類學的「表意」(idiographic)、經驗性的、「具體的」視野之局限,再一方面卻是「規律性」(nomothetic)取向,長期以來這個取向一直想要超越社會生活的律則,支配了社會科學界的發展,荒謬至極。此處企圖調理架構,重新審視「宏觀」與「微觀」的分析層次(若是套用 Braudel 的術語,則是重新連結「事件」[event]、「環節」[conjuncture]與「結構」的關係),就許多方面來說,可以與下列文集所蒐集的論文之分析,比擬參照: K. Knorr-Cetina and A. V. Cicourel (eds),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Micro-and Macro-Sociologies*, London: RKP, 1981。

有其必要。

## 解讀的浪漫化？

如果說一九七〇年代的許多媒介理論研究者，大抵忽略了閱聽人，避之而不談，若說他們偏重文本及經濟結構的分析，致而預設了文本及經濟結構強加本身之效力於閱聽人，那麼，一九八〇年代可以說是翻轉其事，我們目睹的是「閱聽人」（或「接收」）研究的突然如泉水般湧現。不過，更為晚近一些，我們也親眼看到了一股雖小、但急促而強有力的若干論文，質疑這個類型的「閱聽人研究」，是不是有任何一個，或是其總加起來，究竟能不能有任何新意<sup>④</sup>？

就其一端而言，許多學者紛紛指陳，從方法論觀點來看，晚近的經驗性閱聽人研究，其效度與存續的能力，究竟如何，他們提出了許多質疑（Feuer, 1986; Hartley, 1987; Clifford and Marcus, 1986）。我們可以發現，一整羣的學者已然論稱，就在當代閱聽人研究者急於走避「皮下注射」效果模式（譯按：亦即認為訊息本身就是傳播效果的達成，如同打針一般）的殷切心意下，他們陷入了毫不批判地張揚，慶賀閱聽人所謂的「創造力」。但終局以觀，情形是怎麼樣呢？他們卻等於是為最糟最壞的商業產品背書，因為如果這些產品真要這麼受到歡迎，那麼，它們豈不

---

④最近針對「積極而活躍之閱聽人理論」的批評，參見 Seaman (1992)，該文完全無法掌握關於流行文化及媒介閱聽人的原創論點。批判文化研究之「民粹主義」(populism) 的聲音初響，知識流行的鐘擺似乎擺盪的十分快速。Seaman 的旁側，已然集結了許多聲響，吹出號角，疾呼回返政治經濟學陰謀理論的「古老確定不移之信念」、回返「主流支配意識形態」的重新適用，但筆者要說，這些復古之說，根本對於霸權、意識領導 (hegemony) 這樣的概念，顯得相當無知而不能掌握其間的繁複性（譯按：作者 Morley 這裏所說的「政治經濟學」、「古老確定不移之信念」、「陰謀理論」，不知何所指？既未明言，難免給人樹立稻草人而攻之的嫌疑）。



是如其表現那般地好嗎（參見 Ericson, 1989; Schudson, 1987; Gripsrud, 1989; Brundson, 1989）？筆者無意就這些批評一個個處理，我只打算就梅鐸（Murdock, 1989b）、莫里斯（M. Morris, 1988）與魏樂門（Willemen, 1990）等人所提出的批評。梅鐸的論點是：

就在他們急於重新主張閱聽人的技巧，多方而有序的心情下……大多數……這種「新方誌學」的擁抱者流於輕輕繞過權力的問題而不談。結果一來，媒介體系之內的控制與閱聽人關係的問題，居然就此消失……同樣地，由於物質及形象資源分配的不平均，致而使這些關係的結構定著了下來，這些涉及層面更廣的問題，也不見了。（Murdock, 1989b: 228-9）

與此類同，莫里斯（Morris, 1988）心存不悅，總結了她所看到的閱聽人與喋喋不休（老式、古風的）正統「文化研究」之關係，她也總結了「解讀」的問題。誠如她所說，我們現在所能得知的這個「理論」，其下的許多版本，從費斯克（Fiske, 1987a）的「讀者解放運動」（reader's liberation movement）概念、那娃（M. Nava, 1987）針對「消費主義之矛盾」所做的分析，一直到千伯（I. Chambers, 1986）所說流行文化自有其對抗霸權的力量，均有一個共同點，此即它們都對流行文化當中，惡意有加之消費者的創造精力，揄揚有加。在莫里斯看來，這等文化研究的「哦論說」（Ur-thesis），實在危險，貼近了她所說的陳腔濫調的觀察，說是，「現代機械化社會的人，都很複雜而矛盾；大眾文化的各種文本都很複雜而矛盾；因此，人們就以這些文本，生產得出了複雜而矛盾的文化。」（Morris, 1988: 24-5）

筆者同意莫里斯所說，因為我也確實察覺這類型作品是出了問題，

但我的理由卻與她所引伸得到者，並不相同。在我看來，毛病出在費斯克或千伯的著作，率皆欠缺一個充分的社會學式的關懷。如果只是像莫里斯所說，到頭來我們只能說「事情總是複雜而矛盾」，那麼，這確實是一個陳腔濫調的觀察。然而，在我看來，其間涉及的問題其實純屬「經驗上的」：真正切題的旨要是（就此而言，筆者仍然再次要指出，寶笛可以提供的助益相當大），到底複雜而矛盾的情況「有多大」，對於「哪些類型的」消費者是如此呢？在「哪些樣的」社會位置會這樣呢？碰見「哪些」類型的文本或對象會如此呢？莫里斯似乎甚至都沒有了解到，我們真正要努力發掘的正是這些方面的「等差」（distinctions），如果費斯克與千伯值得我們批評，那也是因為他們無能襄助我們進一步澄清這些問題。從某個抽象層次論事，每件東西都有可能像是「複雜而矛盾的」，但在我看來，這個觀察之所以顯得像是陳腔濫調，原因還在於莫里斯本人論據的（過度）抽象所致，而這也顯示了她自己的分析，明顯欠缺社會學式的視野。就此而言，奈斯（R. Nice）論及寶笛著作對於文化社會學之意義時，仍然相宜。誠如奈斯所論，

一心一意想要將社會學排除在外的人……僅只是想要從螢光幕上所發生的影像，進行其內部分析，或是分析收視主體如何接合的人，充其量也只是根據隱設的一個社會學做其基礎而分析，但這樣的社會學卻是錯誤的社會學，因為它忽略了種種文化素養與價值觀的等差分佈，必然有其社會關係，這種情形，在不經意之間，也就愈是沒有人察覺了。（Nice, 1978: 24）

魏樂門論稱，許多「左翼文化評論者」居然「甘冒悲劇性錯誤」，以資本主義為師，「共謀」文化之「跨國商品化」的資本主義邏輯。魏

樂門特別提出的批評是，舉個例子，筆者那本《家庭電視》，由於「沒有能夠注意到資本主義泛層決定的文化生產之邏輯」，因此筆墨之力遜色減弱了（Willemen, 1990: 109），因為在他看來，筆者「建構的多音場域、抗拒空間，僅只是『內在於』家庭或同儕團體情境之下，據其權力關係所營構的」，但這卻忽略了，在此之前，資本主義文化生產的強有力動因，早就先行發揮了結構性力量，設定了所有重要的疆界，限定了人們在這些結構之內，究竟還能做些什麼。魏樂門論稱，筆者那本書的焦點弄錯了，它「將電視當做一件兼具聲音與影像的傢具，它研究的是電視在人際關係方面，如何被使用，亦即僅只研究使用電視之際的商品意義」（前引書，p. 109），既然如此，筆者的研究也就未能處理那些更為重要的大問題了。根據魏樂門的說法，這樣一來，後果也就是「只把電視當做傢具使用」的分析，這種做法，不當地取代了另一種應當值得從事的分析：「究竟人們面對這些電視論述，能夠做些什麼，以及更重要的是，無法做些什麼」。魏樂門說，如此一來，筆者的分析，完全棄置文化權力所涉及的所有重要議題於不顧（前引書，p. 109）。

筆者對以上諸家批評的回應是，梅鐸提出的警語完全可以讓人接受，恰如其分。比如，筆者、西伐史東與賀許（Silverstone, Hirsch and Morley）所做的「資訊與傳播科技之家戶使用」，已然不僅只是分析消費者「創造性」使用的能力，實際上，我們還分析了這些不等的「能力」是在下列情境中運作的：（1）消費這些多重文化產品形式所需的形象及物質資源，其本身的分佈並不平均；以及（2）諸如此類的消費實況，並非於真空中運轉，其實，強有力的設計、行銷、廣告及教育等等論述已然設下了它們的運轉環境，這些消費實況是在、是經由它們而運轉的（有些時候則反其道而行），這些論述在在建構了這些科技的主流

優勢定義，告訴我們應當如何使用才「正確無誤」。在我的理解裏，這就是柴頭所做的區分，亦即強者之「策略」與弱者的「戰術」之別。弱者並非完全癱瘓無力，但他們既然欠缺掌控機構與資源的能力，他們自然必須在邊緣打轉，那些掌控此類機構與資源的人所留下來（界定）的（時間與空間之）邊緣。

## 微觀與宏觀議題

魏樂門的批評，那可就爭議大了。原因出在他自己的誤解——筆者真的說唯一與消費過程有關的權力關係，僅「『內在於』家庭或同儕團體情境」嗎？很顯然，絕無此事。比如，就以《家庭電視》這本書以及它的焦點性別關係做為例子（Morley, 1986），這些因素就不只是家庭生活的「內部」因素。反之，筆者的論點是，家庭內部的性別角色，雖說充當了收視行為及過程的當下決定性因素，但其本身卻又已被主流的性別論述結構化了，研究者所研究之特定文化之內，已然以其公開之論述，將性別關係理當如何，納進其結構了（參見 Althusser, 1972, 關於「泛層決定」的論點）。

究其實，魏樂門的論點可以說是運轉於結構主義者的視線之內（確實，泛層決定論者的視野），這個視野之下，微觀全然已被化約成為宏觀的效果（人也者，也被化約為他們結構位置的「悲劇者」之功能），魏樂門無意以為結構本身，其實也是透過行動者而得以複製再生產的（參見 Giddens, 1979 關於「結構化」〔structuration〕的觀點）。至於說《家庭電視》（以及，言下之意，稍後關於家戶資訊與傳播科技的研究）這本書，關心的「只是」人際關係中，「把電視當作家具使用」，則這樣的指責似乎言之鑿鑿了？但很可惜，這整個研究的重點並非僅只於此。其實，筆者這些研究的

整個要點，無非是企圖整合而已，亦即這個層次的分析（及隨其而來對於家庭內部消費之立即過程之複雜性的分析），應該與魏樂門所說的「更為重要的大問題」，合併分析。筆者的論點正是如此，如果我們真要貼近而研究這些「更為重要的大問題」，則無法不假道「這個必要的路徑」，循此才能解析家庭內部消費的細節，也唯其如此，我們才真正能夠知道這些大問題，是否相干。

如果沒有這麼進行研究，那麼，到頭來，電視消費在家庭內部的脈絡，也就再次徒然僅具備了背景的地位而已——我們大可以說，「知道了」，然後即刻拋諸腦後，彷彿這個脈絡沒有任何可以發揮效用的地方。誠如史蕾克(J. D. Stack)所說，「『脈絡』也者，經常只被當作一種有若神跡的術語使用，彷彿只消援用這麼一個詞，說是必須將脈絡納進考量，則我們已可將脈絡的特殊性置諸罔聞。」(Slack, 1989: 329)大哉斯言，問題正是如此，關鍵就在於如何接合脈絡的特殊性，審視它與更大的結構性因素之關聯。事實上，我們或許還可以振振有詞地論稱(對不住啊，魏樂門先生)，至少就當代的西歐情境而言，嚴正注意電視的「商品化」(參見 Appadurai, 1986)及其轉換，以及密切觀察電視進一步被整編進入這個特定的「商品化」價值機制，究其實，根本就是非常具有時宜性的問題，根本就與魏樂門作勢說要提問的政治議題，大有相關。

若是依此觀點論事，那麼，目標不應該是以彼層次的(微觀)分析，替代此(宏觀)層次的分析，而應該是如何整合的問題，如何將「更大的問題」，如意識形態、權力與政治並連(此即霍爾〔Hall, 1988a〕謂之為傳播的「垂直」面向)，然後與日常生活中，電視的消費、使用及功能(此即霍爾謂之為傳播的「水平」面向)，合併分析。因此，終局以觀，問題並

不只是了解電視的意識形態（或再現的）角色，或是電視的儀式性（或社會性組織）功能，也不只是僅止於了解電視的家庭內部（以及，更大一些的社會）消費過程。這裏必須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處理這些議題（或面向）的彼此關聯性。

順此視野論事，真正嚴峻的挑戰是，如何而能建構一個電視的消費模式，既對權力與意識形態的「垂直」面向保有敏銳彈性，又對電視如何嵌入及接合於日常生活的脈絡與行事過程之「水平」面向，維繫關注而不墜。西伐史東與筆者在另一篇論文指出（Morley and Silverstone, 1990），我們必須力求以「雙重焦點」研究電視的收看行為，這樣一來，比如說，我們也就力求「一石二鳥」，一方面了解看電視是一種儀式功能，足以賦予家庭內部生活某種結構、足以提供某種參與全國社羣的形象模式，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將看電視當作是一種消費與生產的積極主動之模式，「並」將看電視的過程，當作是運轉於意識形態的陣腳中。若是就此或就彼而辯論，說是我們應當將看電視當作是前者或後者，那可真正是錯失了核心題旨。就舉個例子罷，收看電視新聞不應該「只是」一種「儀式行為」（參見 Nordenstreng, 1972），也不應該「只是」意識形態（或文化）類目的傳送過程（參見 Morley, 1980），我們應當說，看電視也者，同時兼具兩個面向。確實，「僅只是儀式」這樣的概念，本身就有問題，因為誠如西伐史東（Silverstone, 1981）與其他人均曾指出的，了解看電視的儀式行為，對於我們了解電視在日常生活所佔據的地位，是主要而無可或缺的一個要件，因此，看電視的儀式行為也就深具意識形態的意味。因此，我們必須設法追尋的目標，應該是先行釐定寬廣的媒介消費及家庭內部儀式行為之分析的架構，然後在其間配對，找尋特定類型的一些媒介內容，究竟與特定的一些



閱聽人，具有哪些特定的關係，我們理當就此提出分析。不消說，這些分析還必須對經驗情境的變動，保持敏銳適應力。

## 傳播科技：未來的可能情景

筆者將利用本章這個節次，就以下三點提出看法：(a)傳播科技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的「效果」問題；(b)人們曾以哪些方式，認為、描述這些科技必須既為當代文化的「片面零碎」而負責，又為當代之「同質化」而負責；以及(c)何以而又怎麼樣諸如此類的這種未來學式的抽象（及科技命定論者的）預言，必須另以科技衝擊與使用之經濟、社會及文化決定的眼光，加以分析。

兒尼 (J. Erni) 率直地論稱，「值此電視科技的變遷排山倒海之際」（比如，錄影科技的漸增使用，以及「電視／電腦／電話」並連使用的長足發展），再要針對廣播電視而進行的閱聽人研究，「多少已經過時矣」（Erni, 1989: 39）。與此論調並無不同，林德洛夫與梅爾 (Lindlof and Meyer, 1987) 亦論稱，晚近科技進展而開發出來的「互動」能力，已然從根改變了消費者的位置。他們是這麼說的：

以這基本媒介傳送系統做為藍本，添加了愈來愈多的科技附加品，於是，（譯按：使用者）可以任意編輯、刪除、改寫或整個跳過，那管它原來的形式是些什麼。我們相因成襲的觀念，以為還存在著大眾傳播閱聽人這回事，根本就與飽經如此這般中介的傳播實體，鮮有任何關係。（Lindlof and Meyer, 1987: 2）

經常有人認為，科技進展的結果，將對電視觀眾造成莫大的轉變（如果不是烏托邦式的話）效應。有此想法，義大利的 RAI<sup>⑤</sup> 公關部門這

麼宣稱：

新的電訊服務、錄放影機與影碟……在在使得我們更可能以符合個人目的之方式，使用媒介。想看的時候，使用者可以自行決定他要看些什麼。這樣一來，我們也就可能超越習以為常的大眾觀眾之時代，過去數十年來的電視歷史，正是以此為特徵，但現在每個人將可以編排他自己想要收看的節目。（引自 Connell and Curti, 1985: 99）

狀極明顯，諸如此類的許多言詞、論點，都跳不出它們的盲點，亦即均甘冒單表這些科技之內在「能力」之大不諱，卻將真正使用這些科技產品所涉及的社會脈絡，棄而不顧。若是真要了解科技諸如此類的發展沿革，包辛格的論文倒可以提供我們若干啟示，他關心的是這些科技歷經了何等程序而被整編進入日常生活的「結構與例行公事」之中——他稱之為「日常生活的特殊語意學」。他的基本論旨是，由於各種科技日漸「消融」（absorbed）於日常生活（「每個人都有一些機器產品，因此也就必須直接操作這些器物」），這樣一來，每天每日的例行公事也就必須環繞著這些科技產品而運轉，造成這些器物在家庭內部，反倒有讓人「視而不見」的效果。最終一來，他論稱，也就變成了「奇技淫巧之流，無所不在，但又毫不起眼」（Bausinger, 1984: 346）。真正的關鍵在於了解傳播科技，究竟透過何等程序，致而變成「家庭內部的一分子」，而若非到了「視而不見」（invisible）的地步，至少已是「毫不起眼」

⑤ 譯註：Radio Audironi Italiane，後為Radiotelevisione Italiane，義國歷史最悠久的國營廣播系統。以一九八九年為例，職工一萬四千人，年度預算十七億美元，但同年有赤字近一億九千萬美元。

(inconspicuous)。接下來我們必須探究，既然這些科技產品實乃透過消費的實在行事而「生產出其具體存在的身分」，那麼，它們的文化意義又是如何建構出來的？筆者將在本章稍後，再就這些疑點進行討論。不過，筆者在此先要指出，事實上是有兩股並行的論點，對峙共存，一方面是這些新傳播科技所造成的個別化之效果，另一方面卻浮現了「後現代」的景象，同時指向了這些科技所造成的同質化效果。

我們不妨就從後現代理論家麥克魯漢開始，這位廣為人知的理論家，當然，是這麼論稱的，他說，電視及傳播科技所造成的效果，將泯除時間／空間的等差，並將我們導向地球「村」(Gemeinschaft)這個新視聽時代。比如，麥克魯漢與費歐羅 (McLuhan and Q. Fiore, 1967) 如此論稱：

電子通路凌駕了「時間」與「空間」這兩個體制，它持續無有間斷，將所有其他人的關注之情，一股腦向我們傾倒而下……我們的世界新又奇，「天涯咫尺萬頃瞬間」。「時間」消失無蹤，「空間」變做幻影。我們現在生活在地球村。(引自 Ferguson, 1989: 163)

晚近幾年來，諸如卡瑞(Carey, 1989)等人，擷取了包括因尼斯(Innis, 1951)⑥等人的著作，相當合宜地敦促我們正視一件事實，此即我們應該深究物理形體及形象的傳播體系，在我們空間及時間感發生轉變的過程，扮演了什麼樣的歷史角色(參見 de la Haye, 1979)。依此論事，比如，卡瑞提及：

---

⑥譯註：因氏著作《帝國與傳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已由曹定人中譯，遠流出版。

經由識字率的普及、便宜書報、快速而價廉的運輸與文字的機械再生產之出現——簡短地說，運輸人及一整個複雜之文化與文明的能力，從彼地到此地……在地理與……氣候均急遽不同的地方，發揮了傳送效用……時間與空間慢慢褪色消失了。(Carey, 1989: 2-3)

卡瑞致力研究的對象共有許多，其中之一是帝國及行政權力在建構擴展時，傳播所扮演的角色究竟為何。是以，卡瑞提及了許多情況，不僅是鐵路的出現深具經濟影響力，更具有戲劇性意義的或許是電報的問世，它「首度有效地將傳播與運輸分了開來……容許訊息的傳送與物理形體的移動，分別進行」(Carey, 1989: 203)，既能如此，則傳播從此也就不再受制於地理空間的限制，於是在這個程度內也就使得「地理不再相干」(p. 217)，而「就做為區分人際事務的標準來說，空間的重要性亦日漸減色也。」(p. 222)

筆者有意讓下列的論述工作容易一些，因此，不擬繼續尾隨卡瑞之作，他終歸是以歷史眼光，相當細微地探討了傳播科技與社會發展的交互影響，筆者只打算援引更為晚近的著作<sup>⑦</sup>此即梅羅微茲 (J. Meyerowitz, 1985) 之作，對於電子媒介影響社會行為之分析、對於電子媒介轉變了「人類生活的地理情境之空間」，梅氏之著墨與描寫，可以說讓人著迷良久(雖然他又不免言過其實)。梅氏的關注情懷是，電子媒介究竟以何等方式衝垮了物理環境及社會情境的傳統關係，以至於我們「『身處』的地方，不再與從前相同」(Meyerowitz, 1989: 333)，這是因

<sup>⑦</sup>譯註：作者此處所引卡瑞之作，雖然係出版於1989年的論文集，但原文首見於1983年。

爲這些媒介「讓我們……變成其他地方所發生之情景的閱聽人，並且讓我們接近其實並不在場的閱聽人」(Meyerowitz, 1985: 7)。梅氏的核心論旨是，這些新媒介重新界定了社會位置與「地方」(place)的觀念，它使得經驗與物理形體，兩相牴離。

他論稱，電子媒介已然轉變人在現場及透過媒介而得知的相對重要性，「從四面八方帶來資訊與經驗」，「國殤、戰亂……太空飛航盡入劇碼，幾乎可以在每個家庭的客廳上演」(前引書, p.18)，這種情形若是套用荷頓與侯爾 (Horton and R. Wohl, 1956) 的術語，就是觀眾與他們所接觸到的媒介人物及「明星」之間，產生了多種「虛擬的社會互動」(para-social interaction)。就這樣，根據梅氏的說法，這些媒介也就在其符號傳佈所過之地，創造了新的「多種社區」，將原本分離不相連屬的許多團體，環繞著電視而得到了「共同的經驗」，這是「由此而至彼的」文化「同質化」過程。就這樣，梅氏認為，電視的地位，有若天氣，兩者都是人們茶餘飯後的聊天話題，是共通經驗的基礎，是一種「形而上的界域」(前引書, p. 146)，所以，「看電視也就是……共看 (共同) 經驗……看看別人在看些什麼」。基於這樣的想法，梅氏論稱，

數以百萬計的人，在一個不成爲地方的「地方」，看著甘迺迪被暗殺……每天晚上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看電視的「所在地」，並非由牆圍、街道或鄰里所界定，而是由隨時可以化做輕煙消逝的「經驗」界定的……與時俱進，人們宛若是生活在一個全國性(或國際性的)資訊體系，而不是生活[在]一個地方城鎮或都市。(Meyerowitz, 1985: 145-7)

## 後現代地理學與「概括化的異地」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之下，梅氏因此論稱，電子媒介刻正蝕毀我們的在地意識 (sense of locality)，「每個地方看來都如此相像……本地 (locality) 的獨特無法替代之意義……以及其重要性，也就降低了。」

(Kirby, 1989: 323) 類如這等論斷，誠如梅氏在答覆評論人時所說，或許是有言過其實的情況，但最低限度，這些電子媒介當然很可能已經造成我們對地理地方的感覺，為之「相對化了」，所以，「居住地不必然是生活劇碼的核心舞台了。」(Meyerowitz, 1989: 330) 根據梅氏的說法，現在的核心舞台已經為家中的全國性電視取代，電視已將其他地方、「非本地的」人及其同時產生的經驗等等「概括化的異地」，轉成新聞而讓我們知悉——這樣的情況也就使得「在地性」的原級意義，成為無稽之談，因為「每日均可見到的電視，其一統的修辭空間已然延伸進入了每個人的客廳。」(Berland, 1988: 47)

誠如梅氏所說，以上論據的部分要點，比如，在於指出現實生活裏，接觸(比如，透過電話)非本地人士，時常還比接觸近鄰來得容易一些。因此，「社區」也者，「就這麼樣從空間上的在地性，得到解放了」，許多親密的連結關係，透過電話維繫的程度，還要大過經由面對面互動的情況(不妨想想電話廣告的台詞：「如果不能親自造訪，長途電話最相宜」)。是以，情形似乎已然變樣，我們心目中的社區，不再是在地人羣之關係聚集，而是地理之親近遠疏不論，重點是社會關係型的種類——一種「心理上的近鄰關係」，或說是一種「個人的社區」，一種(通常不是在地)的連結網路(Wellman, 1979 引自 Meyerowitz, 1989)。歷經這個過程，



「社區」的意義也就轉變了：彼此雖是近鄰，但這再也不必然意味大家相互連結於彼此依附的傳播、溝通體系；反之，彼此雖然相去遙遠，但這倒也不必然意味大家的傳播、溝通路途，阻塞而隔絕。如此一來，情況似乎變成，在地性不單只是收納於全國性或全球性的領域之下；尤有進者，在地性所涉及的兩個方向，亦率皆繞過在地性之本身而不顧，其情況日甚一日——經驗的符應與統一，不再與在地性有何關聯，並且多種在地屬性之內，經驗亦已片面而零碎。

然而，這種片面而零碎，鮮少是偶然發生的局面；它也並不只是一種個別差異或個人「選擇」的結果（參見 Morley, 1980）。究其實，它所涉及的分界線，是由社會及文化因素決定，這才真正是片面而零碎的主因。當然，在這些分界線當中，佔據核心位置的是性別。無論是稍前提及的「資訊與傳播科技家戶」研究，或是這個領域的其他研究，愈來愈多的人均已體認類如電話等等科技產品，已然出現「性別化」的趨勢，推動這股趨勢的原因，在於貫穿公／私分別之人的性別類目，其定位是由社會性而組織化的效果所造成。當然，誠如葛馬尼可與普維士（Garmarnikow and Purvis, 1983b）所說，公／私的分別本身，可以說是性別定型化的一個根本隱喻。「地方、定性於一地」（place）與「無根、飄如陌上塵」（placelessness），當然，可以說是具有高度性別意義的經驗（以及其他饒富決定性的因素）。

為數頗眾的這些後現代理論家，他們筆下的（大肆慶賀的）「浮現中的無根、空間已不再重要」的觀點，值得我們從許多不同角度，加以批判。（譯按：我們至少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這樣的說法鮮少意識到權力的特定運作關係，但究其實，現時浮現的電子（「不再受限於空間」）跨國網路，根本就是馬特拉等人所說的，是「少數秀異之士、是一種

奇觀異景的時間，是國際工業娛樂文化的產品」(Mattelart et al., 1987: 97)——這是一種極度標準化的電視語言，它的趨勢是(譯按：這些少數人之外)所有其他人均不在其眷顧之列，並且其立足之地為其錯置(displace)。另一方面，誠如芙格森(M. Ferguson, 1989)所說，這種「正統科技主義者」的世界觀，衷心讚歎的是衛星及其他新資訊與傳播科技，認定它們力足以泯除時間／空間的差異，致使時空不再具有任何意義，實在是高度而過分的抽象論述。為什麼這麼說呢？主要是因為這個說法沒有什麼實質根據，它的抽象層次很高，很少留給我們餘地，我們實在無法從經驗面回答以下問題：到底這些媒介「如何」轉移我們每天每日對於時間與空間的理解？或說，究竟是「哪些」媒介形式，影響了「哪些」人，致使這些人對於持續度與距離感，產生了「哪些」變化(參見 Bryce, 1987)？依此論事，則我們需要的是「透過質化研究方法，弄清楚電子傳播媒介『如何』擴張強化了(作者莫里按：或說並未如此)時間／空間的律令，而『哪些』形式造成了『哪些』意定中與意料之外的後果。」(Ferguson, 1989: 171)

若說當代文化所顯現的空間與時間之同質化趨勢，尚未泯除所有的差異，那麼，我們仍然必須致力於建構一個合宜的後現代地理學，善事處理傳播及權力，以及公私領域在當代情境的轉化關係。誠如芙格森所說，儘管這些正統科技「同質化者」信誓旦旦而迭有盛言，但情況仍然是：「正因為他們近用新與舊傳播媒介的狀況各有不同，所以不同文化羣體、不同社會族羣及不同國族的權力資源，對於時間與空間邊界等問題，也就賦予不等的審視方式、不等的類型化以及不等的優先順序。」(前引書, p. 153)就舉一個「歐洲」例子罷，我們或許不應該抽象地設想，日後在跨歐洲媒介的衝擊下，是否終將親眼見到統一

之「歐洲文化」的出現？更具意義的提問方式，或許是在多大程度內，對於哪些類型的團體（比如，收看衛星電視音樂頻道的青少年觀眾、歐洲商人等等），這樣的一個「歐洲」視野已然出現（參見 Collins, 1990）。

我們理當放棄粗糙的科技命定論者之想法，不再以為新的資訊與傳播科技對全地球的所有人，率皆烙記了新的多種感知印痕，不再以為它們造成了單一的效果，反之，更為實際的做法、想法，合當是認為這些新科技，究竟以些什麼方式，以新制舊（參見 Rogge and Jensen, 引自 Lull, 1988）。就說類如家用電腦這種新科技罷，通常，它之所以「產生了意義」，主要還是因為它已整合於非常古老的「科技」（同儕團體的談天網路）。新媒介並未擴展「共通的媒介天地而泯除了疆界軫域」，或許，更為可能的局面是，「時間彈性與在地之不確定性」，存在著多種變形的感知，在這種情況下，「先前確定不移的絕對事務，批上了值得吾人注意的相對色彩……往昔至為明確者……（在若干程度裏，已被）新的曖昧不明之情勢（破壞殆盡）。」（Ferguson, 1989: 155）如果我們真要分析本地（譯按：對於外界事務之）種種看法與外地較大的傳播體系（譯按：對這些事務的再現）之動態關係，那麼，這樣的做法似乎更為實際（參見 Miller, 1992），也似乎更為具有啟發性。誠如米樂（前引書）所論，就他所分析的千里達島民消費美國連續劇之發現而言，「在地性」並非純正本土文化認同的來源，文化認同若要保持「純正」，則必須尚未被外在之全球體系污染。究其實，在地性本身也者，經常是外在之全球體系或「外國」資源與輸入「本土化」（indigenization）或「進入家庭」（domestication）之後的現象。

馬西（D. Massey）的議論氣勢，最為雄辯滔滔，對於時下廣見的趨勢，認為在地性（通常認為它是具體的）與全球性（通常認為它是抽象的）是

對立的想法，她鍼砭有加。誠如她所說，

……世界經濟的具體程度，並不亞於地方經濟，前者具有「概括性」(general)，因為它在地理上是一個大規模的現象，其內部則有多種變異情況。但與此同時，世界經濟，一點都不含糊，相對於抽象，也是具體的……那些混同在地性與具體性的人……其實是將地理規模與思想的抽象過程，混淆在一起了……而犯下這個錯誤的人……經常也就誤認在地性的研究，只等於描述，而描述則與理論研究相對立……諸如此類的論調，(混淆了)具體／抽象與在地／概括等等面向……「在地的事務」與大、廣泛與一般的事務(譯按：二者其實相同)，前者並不因為小而比後者更對理論化的建構沒有幫助，亦不因為小而比後者更易受制於理論。一般(概括)與在地的比對，抽象與具體的差別，這兩者之間相當不同。(Massey, 1991a: 270-1)

如果「地理空間事關緊要」，如果地方很是重要，這不只是因為一個特定地方之屬性，實乃它的位置與更大一些力量之關係的產品，而且也是因為這樣的屬性，事後倒過來也將其印記烙刻在那些更大、涉及更廣的過程。尤有進者，雖然出自海德格傳統的人，通常可能會如此認為，但所謂地方，並不是靜態或固定不變的，地方並不容易界定，也不是邊界井然的實體，致而外力是否入侵很快就能判定（至於這樣的入侵是否不恰當或另有爭議，是另外一個問題）。以上這個說法，若就理論而言，其實是與馬克思與佛羅史諾夫的觀察，均能呼應，前者說，人「在」(in)社會的情況，與箱子中存有物體的情況，並不相同，後者則有「社會性的個人」這個概念。誠如馬西所論，我們應將地方本身當做過程

看待；所有的地方，其內部都是經常充滿著衝突與分裂（它們的內部並不是同質的），或許，我們最好不要將它們當做「邊界井然的領域」，而是要以「互動的空間」視之，其間，建構在地認同意識所需的（物質與形象）資源，最初也許根本不是出身於本地。但或許我們倒也可以參考米樂（Miller, 前引書）的觀察，他說我們應該以「後勢結局」（posteriori），而不是以「先發之首」（priori）界定「正宗性」（authenticity），我們應該當它是附生於地方的後果，而不是認定它源出於本地。與此類同的道理，如果進口電視節目滲透了本地諸多的意義體系，但並未使得本地文化「同質化」多元的文化，那麼，這些進口節目的主要效果也許變異極大——如果它們引進的相對化視野是一種「不確定原則」，則它或有可能以不等方式，破壞建制的主流支配意義架構（參見 Hebdige, 1988b; Worpole, 1983；二氏著作均論及「外國」文化產品動搖了國族品味文化秩序森然的階層體系；但另請參考 Chen, 1990，陳光興指出相當重要的一項事實，此即「外國」經常也只是「美國」）。

## 由客廳而至國家與國際

晚近這些年來，有一股批評類如羅耳、西伐史東與筆者本人的聲音，說我們專只關注收看電視的家庭內部之脈絡，因此也就忙於執行一些考量有欠周全（或說，匆匆忙忙）的研究，退入了「客廳」這塊私人領域，但卻遠離了權力、政治與政策等等重要的「公共」議題，而後者才是傳播研究恰如其分的研究主體。筆者將論稱，諸如此類的批評，實有誤導之嫌，原因很多。這不僅只是因為（在我自己的經驗裏），客廳是若干非常重要之政治衝突的進行場域——這還是因為客廳與其他地方，都是性別與年齡政治力學的一個主要場域。並且，在我看來，如

果我們終極目標，在於要了解諸如「社區」或「國族」這類抽象實體的構成元件之動態，那麼，客廳正是我們必須起腳的地方。如果我們關心的是這些實體的持續形成、維持、再創造與轉變過程中，傳播所扮演的角色，那麼，我們尤其應當從客廳下手。整個議題的核心要旨正是如此，比如說，我們需要知道，就在連結「熟悉者」或家庭內部，以及國家與國際領域之際，電視扮演了何等角色，而在「全國家庭」的影像與實體之間、在各種跨國「社區」的影像與實體之間，電視又扮演了何等角色。

依此論事，廣播主要功能之一，正就是搭建橋樑，連繫兩端：公與私、神聖與世俗，超凡脫俗與命定人世。因此，西伐史東論稱，

若是套用涂爾幹式的術語，我們可以說，電視提供了一個論壇，一個動員集體精力與熱情的場所，就舉個例子罷，在呈現全國性的一些事件時，從加冕大典到盛大的運動比賽，莫不如此；此外，電視也在家庭內部與我們視為理所當然之世界，以及秀場、“朱門恩怨”與登陸月球等等若非電視之轉播則我們無法接近的世界之間，持續不斷界定作記，如此也等於為我們的(譯按：公私)文化，樹立了重要的疆界。(Silverstone, 1988: 25)

與此類同，查尼(Chaney, 1983)也分析了廣播的角色，他所關心的是廣播如何賦予公眾能力，讓他們參與了國家的集體生活。誠如查尼所說，「國族」實在是一個非常抽象的集合體，至少它實在是太大而難以為個人直接體驗。就此而言，社區的「我羣感覺」也就必須不斷以合適的認同機會才能引發，這就如同「國族」的感覺也是製造出來的。查尼特別致意的是大眾媒介轉播民間儀式的角色(加冕大典、皇家婚禮等



等)。誠如他所說，如果諸如此類的儀式，是國族做為形象社區的「戲劇化表現」，那麼，由於媒介具有無窮無盡的複製與再生能力，這些表現也才得以找到前所不敢想像的大量「閱聽人」(Chaney, 1983: 121)。查尼援用了西伐史東的說法，也認定電視具有構建「親密距離之空間」的能力(Silverstone, 1988: 23)，他指出，只要電視鏡頭在場，就能創造「親近使用所帶來的準民主」感覺(比較 Dayan and Katz, 1987: 88 的說法，「電視就是摧毀距離的東西」)，此時，電視等於是在最為親密的形象儀式之時刻，「代表了」公眾。但這過程的核心則極為個曖昧不清，因為公眾人物雖然因為他人之替代性觀察而更為人性化(筆者莫里按：鏡頭經常特寫公眾人物，這是家中觀眾親身在現場亦無法看到的)，但與此同時則又因為媒介呈現之戲劇性慣例，致而亦讓人覺得隔了一層(Chaney, 1986: 121)。

查尼傾注全力，關心多種儀式場合的驚人、招惹圍觀的性質，最終一來，他論稱，「湊熱鬧、招惹圍觀的大眾傳播形式，已是大眾文化的公共生活。」(Chaney, 1986: 132)這個看法恰是很詭異地逆轉了艾埃思(Ellis, 1992)的說法，埃氏說廣播電視是「民族國家的私人生活」。

以往，流傳於世的觀點是，在現今已世俗化的工業化社會，「儀式」的意義與重要性，已經比稍早的傳統時代，遜色許多，但查尼卻獨排眾議，持相反的觀點，他說，由於工業化社會的規模及本質之故(這些社會的所有公民，根本無法親身接觸而習得，因此就必須持續打造集體認同感)，而儀式也就變成戲劇化(確實，我們應該說「建構」)社區的一個模式。所以，查尼注意到了如下的事實：「很明顯，為數眾多的集體儀式並沒有消失，它猶然側身於制度性認同與再生產的日曆上；究其實，這些儀式反倒因為媒介的戲劇化表演而更為容易接近，也比較沒有那麼神祕」

(p.132) 這整個問題的部分解答，出在「近用」(access)——查尼舉了一九三七年喬治六世加冕典禮時，收音機轉播的意義，一經轉播，為數龐大的全國公眾也就「耗時竟日，收聽，因此也等於是參與了這些重要事件。」(Jennings and Madge, 1937; 引自 Chaney, 1986: 129) 不過，這又不僅只是「近用」的問題。所以，在稍前發表的一篇論文，查尼提及，終局以觀，媒介扮演了轉變這些事件的角色，致令「國族的節慶……變成……媒介事件，不光是媒介得以近身轉播的事件而已。」(前引書, p. 134)

再者，誠如史坦 (R. Stam, 1983) 所說，這也另外涉及了一個問題，此即電視提供給觀眾的愉悅，是否有些特殊的形式，尤其是最概括化定義之下的電視「新聞」，是否有些什麼特殊的愉悅形式？史坦想要解析的現象，他稱之為電視的「在場形上學」(metaphysics of presence)，以及電視新聞催化「想像、創造出來的『我們』作為一種社羣」(p.39) 之過程。史坦的論點是，「愛知」(知道事情的愉悅, epistemophilia, the pleasure of knowing) 只能解釋收看新聞的部分動機。史坦論稱，這個部分之外，我們必須正視人們從收看觀眾得到的愉悅之情，究竟是怎麼樣變做一種自戀的情結，我們也必須注意，這些愉悅「是怎麼被設計成為另一種目的，亦即提高了皇室這位眾所矚目者的自我形象。」(p.27) 史坦論稱，主要的重點是電視將我們轉成了「搖椅上的帝國主義者」(armchair imperialists)，我們變成了「影視世界的主宰」(p.25)。就此而言，史坦的看法是，雖說「現場轉播」的電視節目，僅只是全部廣播電視的一小部分，它卻等於是為整個電視所提供的東西，「譜下了基調」(sets the tone)。誠如他所說，電視——

讓我們與身在異地的人，共享相同時間。電視賦予我們……即時而無處不在的感覺。在遠方收看登陸電視轉播的人，化做了太空人的替身……事實上，有些情況，收看現場轉播的觀眾，看到的場景比身在現場的人，好得多了。(Stam,1983: 24)

我們在這裏所關心的正是公私「介面」(interfacing)。一方面，以這個方式參與全國性事件的閱聽人通常是原子化的，若不是個別的收看，就是在小團體(如家庭或同儕之間)中收看。另一方面，每一個這樣的團體都坐在電視機前面，接收相同的「核心」事件的對外再現。因此，「公共」的體驗在於私人的(家庭內部)領域：公共性被「家庭內部化了」(domesticated)。但與此同時，「私人」本身也給轉變了或「社會化」了。這樣看來，歷此程序所創造出來的空間(與經驗)，也就再也不具備傳統意義之下的「公」或私了。

戴安與凱茲(D. Dayan and Katz, 1987)研究一九八一年英國電視轉播皇家婚禮的著作，對於我們解開、揭示這些牽連，頗有助益。引用了奧斯汀(Austin, 1962)的「表演性質的」演說之理論，戴安與凱茲想要分析的是，電視在建構(或是用其字面用語「表演」)媒介事件時(如皇家婚禮)，角色若何。就此事例來說，他們論稱，我們不應該說電視「再現」了事件，而應該是說電視為大多數人「建構」了這個事件的經驗。電視不只是轉變了諸如此類的事件(或就這些事件發表評論)，電視其實是讓這些事件存在的原因。

戴高樂將軍(譯按：法國總統)說，所謂電視，政府派駐客廳的顏面也。雖然這個說法只能適用於特殊情況，尤其是廣電運作鮮少免脫政府之直接控制的情況，才會如此。不過，雖不中亦不遠，假使我們將

查尼與戴安／凱茲的說法，再往前推進一步，則我們所見到的景象，不但是電視在接合「政府」（參見 Foucault, 1980）或「公共」於家庭空間之際，扮演了緊要角色；此外，我們也必將提出更為根本的問題，此即在這種情形下，再要說廣電媒介「報導」政治發展之動態，是否尚有意義。這裏所涉及的難處在於，以此方式提出問題，則隱然以為電視之外，存在著分立的「政治」領域，而電視因此能夠就此領域進行報導。我們現在身處的時代，跨國性的運動體育比賽，為了適應電視時間表而做調整，已是司空見慣，而發動戰爭行動的時刻，追求公關效果遠重於軍事考量的例子，亦已不是新聞（譯按：前句所說的問題），似乎是相當明顯（譯按：地不足了）。但這個根本的問題，更早以前即已有人提出。早在一九七四年，佩特曼（T. Pateman）就電視與選舉政治的關係，提出了類似的論點。他的主要說法是，若我們要說電視「報導」（cover）選舉，那麼，總是要有獨立於電視之外的選戰（election campaign）在進行，才有可能，但時至今日，情況遠非如此，選戰根本不再能夠獨立於電視之外而存在，選戰也者，如今主要都是設計來抓住「鏡頭點」、「音效」等等——指的是選戰已電視化的情況。據此觀點，佩特曼論稱，「我們並沒有電視報導選舉這回事，我們有的是電視選舉。」（Pateman, 1974）佩特曼的論點可以再做推引適用，不再只是「選舉」這個特定領域的問題，而是涉及了界定面更為廣泛的「政治」：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政治」主要也就是一個「媒介事件」，而他們參與這個領域的過程，在相當重大程度內，均有媒體做為中介<sup>⑧</sup>。

⑧譯註：作者在強調媒介於當今政治過程的「本質」時，似乎有膨脹這個本質的危險，並且忘了他再三致意的社會學取向，若是放在這個脈絡，應該是要指出何種「社會制度」的設計下，將產生互異的「電視／政治」之「本質」。闡述電視與選舉過程的英文著作繁多，但請參考O'Shaughnessy, Nicholas J., 1990, *The Phenomenon of Political*

翻轉一圈，我們再次返回「在場」(being there)的政治學。這越來越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衛報》(*the Guardian*, 譯按：英國全國性報紙中，唯一不屬財團的報紙，立場中間稍微向左)南非特派員貝瑞斯福特(David Beresford)的一篇特寫，相當富有啓發性(*Guardian*, 17 April, 1990)。他提及企圖訪報導曼德拉(Nelson Mandela)⑨獲釋後在角城的演講，但他說，很不幸地，「在場」當時也等於實際上無法看到或聽到曼德拉的身影或講演。貝瑞斯福特說，這樣的經驗就是「在場但也不在場」的感覺，「身在現場的人」反倒面對了乖舛的結局，因為(譯按：電視鏡頭掃瞄所過而提供)地球村其他所有人觀看的影像，他與她居然看不到。懷抱與此類同的心情，戴安與凱茲提及讓人頓覺困擾(但又日漸常見的)情形，亦即許多身在公共事件發生之現場的人，在他們能力許多範圍之內，竟然帶著手提電視機，以便他們能夠目睹「發生了什麼事」。這麼看來，繼續待在現場，並不必然等同於有效地參與；當然，反之亦然。

順著這個角度往外望，則我們在考量起自一九八〇年代的一些辯論時，將得到不少助益，打從「流行樂團之贊助／現場表演之贊助」(Band Aid／Live Aid)均由電視轉播，至而聲名大噪引發成羣觀眾收看

---

*Marketing*, London: Macmillan的簡明之作。再者，作者引述的政治，乃至社會事件為媒體中介，至而這些事件已無獨立之存在性質，而媒介亦已不能說是「報導」事件，其實有此體認並執筆為文的人，當然還是早於佩特曼的，如 Daniel J. Boorstin, 1962, *The Image* (1963, Harmondsworth: Penguin) 這本書所說的「假事件」(pseudo-events)基本上就指此而言。

又，作者這裏說戰爭的發動，講求媒體效果而罔顧人命與軍事需要，應該是從1991年1月初所發生的「伊拉克侵略科威特，而美國侵略伊拉克」戰事，請參見成令方(編)，1992年，《戰爭·文化·國家機器》，台北：唐山。

⑨譯註：南非黑人民權運動分子，出身律師，壯年被補入獄二十餘年，1990年出獄後旋即擔任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lism Council)主席，並曾於1993年訪問台灣，1994年當選南非總統。

以來，類似的辯論甚多。對此，梅羅微茲的評語是：「『現場表演之贊助』這樣的事件，如果不是在電視出現，可以說無從發生。這是最鮮明而極端的實例，顯示人的傳播經驗可以不再『受到社會及形體通路的限制』。」為數頗眾的評論者，均已紛紛然，批評諸如此類的「跨國」轉播，傳達了一種國際（若還稱不上是普遍存在於環宇各角落的話）社區的「神話」。但話又說回來，這個現象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層面，並非「神話般的」成就可解。果真這樣的社區意義創造了出來，它可能是與下列事實有關：就在這世界裏，數以百萬計的人羣，（事實上）「同時」正在收看這些廣播——至少在這個限度內，我們可以舉戴安與凱茲的術語做為說明，這些人其實真正是在相當有效地參與著「四散的儀式」，而這並不是幻象。

戴安與凱茲提出的問題是，在我們不再親身參加這些公共性儀式，而是在家中從媒體得悉，那麼，這些典儀的性質產生了些什麼變化。誠如他們所誌，由於本身並沒有在現場參加，而且彼此孤立不在相同地方，除了僅具有抽象與統計的意義之外，電視觀眾並非（譯按：傳統定義下的）「大眾」或「羣眾」（參見 Ang, 1991）。他們暴露的問題其實是，就在人們是在家中禮慶典儀時，我們是否仍然能夠稱之為公共事件——而當集體的性質四分五散時，是否我們尚可以稱之為集體式的慶賀（參見 Siskind, 1992）。誠如他們所說，在這些情況之下：

電視觀眾數量龐大這回事，已然很弔詭地將慶典，置換為一個親密的聚會。典儀的空間已見重構，在家中重構。參與儀式的單位，是整個小團體，聚集在電視機前，專注在符號核心，心中明白還有許多其他團體，同樣在收看電視，方式近似，時間相同。（Dayan



and Katz, 1987: 194)

戴安與凱茲所做的類比，取自猶太人踰越節的「塞達」(Seder) 儀式——這是一個集體儀式，但又沒有一個中心的「膜拜殿堂」，如此一來，公共性質的慶賀，也就轉變成爲「爲數眾多、同時重複進行，以家庭爲基礎、諸事依序排定的微觀層次的事件。」(前引書, p. 195)是以，戴安與凱茲的言下之意是，作爲散居各處的群體，電視觀眾可以說正是經由這種「四散的儀式」，定期(在觀眾偶爾收看特殊事件，以及規律性地收看「新聞」或愛看的連續劇)地統合了起來。類如皇家婚禮的電視轉播，很顯然是特殊的「媒介事件」，得到了特別的耀眼地位，但我們何嘗不能說這個模式其實也是一種常態——亦即每晚規律地收看電視新聞或長期播放的連續劇，均可做如是觀——它透過兩種方式建構了集體性，其一是製造了一種「參與」的感覺，再者則是製造了一種共時經驗及「共享過去」的感覺(參見關於「大眾記憶」[popular memory]的辯論: Wright, 1985)。

## 製造文化認同

若是照此觀察論事，那麼，史萊辛格(P. Schlesinger, 1987)的論點相當正確。他說，詢問新資訊與傳播科技(衛星電視等)對文化(或「國族的」)認同將產生什麼效果，其實並不是好問題。他論稱，我們倒是應該將問題倒過來問：我們不應該從一種「先驗」(pre-given)的客體(「國族文化」)出發，因爲據此論說則我們會問這些傳播科技對它們「有些什麼效果」；反之，我們應該起步的地方，應該是提出認同本身的問題，然後探討形式不一而足的「傳播」，對此認同的建構，有些什麼重

要性。

與此同調，唐納(Donald, 1988)論稱，我們的分析應該集中在論述、科技及機構制度的器物(apparatuses)，因為它們才是製造文化的源頭。誠如他所說，依此論事，「國族」(nation)是這些文化科技所造成的效果，不是它們的起源。一個國族並非經由其文化而反映或得到表達的管道：反之，是這些文化器物（及其他東西）製造了國族。這個論點已然日愈為人接受，我們從魯樂福特(J. Rutherford, 1990)與巴巴(J. Bhabha, 1990)等人的論文集，可以知道這個發展趨勢，巴巴的論文集直接議處的問題，正是「國族」與「敘事」的關係，他的焦點是語言與論述如何以其「表演技巧」(performativity)，建構國族與文化認同的敘事。很顯然，這個論點適用於微觀與宏觀兩個層次——這就是說，我們理當關注在建構國族認同之際，傳播科技所扮演的角色，與此同時，我們亦當分析，在家庭內部這個層次，這些科技在建構認同時，又扮演了何等角色。

以上所涉及的重點議題之一，誠如稍前所述，事關社區與地理的關係；因為，誠如羅斯(Rath, 1986)所論，我們所存活的世界，愈來愈有「電視—地理」（譯按：空間）的味道，其間，電子訊號的傳送（與分佈）所界定的不可見網路，跨越了現存的地理疆界。若是要將這樣的論據往前推動一步，指出其間涉及了哪些議題，那麼，季樂斯皮(M. Gillespie, 1989)的研究成果，可以提供若干助益，對於英國亞裔人口如何使用錄放影機建構或協商其氏族認同，季氏的分析頗有見地（這些亞裔人士使用錄影機定期收看印度電影及類似的帶子，這些是英國廣播電視無法定期播放的——而這樣的過程在其他歐洲國家，也經常見於其他氏族團體〔土耳其人、摩洛哥人等〕）<sup>⑩</sup>就這麼樣，在（再）創造與維續傳統及氏族與文化認同

之際，新的傳播科技就此發揮了力量，因此，地理、生活地點 (place) 與文化之間，也就不能輕易畫下等號了，因為新傳播科技已然在散居各國的各個社區之間，創造了多種符號網路。值得一提的是，截至目前為止，諸如此類的團體通常只見於特定研究中，這些研究的架構，大多將他們安放在特別的位置，著重於研究他們的「移民」身分。走筆至此，霍爾的論點很值得我們參考，他提醒我們，就當代的文化情境而言，「移民」經驗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即便我們仍然試圖區分「志願」與「非志願」性的宇宙公民（參見Hannerz, 1990; Hebdige, 1990）。

傳統上，我們習慣將社區與地理疆界及物理上的地點，「混為一談」，自今而後，我們理當避免再將二者等同，非如此不足以了解當代文化與傳播現象，但這麼說，並「非」意味這些術語之間，再「無」具有意義的關聯性——不是這樣，我們只是說，若要將前者化約為後者，不免誤導。早在一九三三年，藝術史學家與心理學家安海姆(Rolf Arnheim)就預見了做為一種分配、流通媒介，電視的社會效應是：

電視讓在其上展示的客體，與其原初發源地，不再相關，觀看的人無需羣集在「原件」前觀賞……它取代了其他分配、流通工具……如此說來，電視可以說是與摩托車與飛機異曲同工——電視乃心靈的運輸工具也。（引自 Rath, 1985: 199）

筆者在本書導論已有明言，我的終極興趣在於扣連微觀與宏觀過程的分析，筆者想要盡力發掘的是，這兩個過程當中，當代文化的同質化與片面零碎化、全球化與本地化，同時並舉的現象，呈現了什麼

⑪譯註：英國人一般以亞裔 (Asian) 通稱英境內的印度移民，西德境內多土耳其人，法境則多摩洛哥人。

風貌。當然囉，就在我們進入窄播與閱聽人之區隔化的年代，情況可能是(對不住囉，史坎納)我們與他人共有的廣播「經驗」，愈來愈少——由於有了錄放影機，我們也就無須再受限於瞬間即逝的廣播材料，我們可以在適合「私人」時間表的時候，消費這些節目，我們也可以消費未經廣播的節目——如此判斷，我們不禁要說，所謂經由廣播提供的共享之社會經驗，「必然有其同時性」，實在頗堪質疑。不過，尚須注意的是，與此同時，廣電界的一些新發展(無論是偶爾出現的「現場贊助」等全球圖騰節慶，或是為了建構青年觀眾群而定期規律舉辦的歐洲音樂節目)，結合在我們眼前者，不單只是全國性，而且是國際性的認同，這種情況，在全國性電視頻道的節目，日愈為少數跨國公司支配之時，更見真切。但這麼說的時候，我們倒也應該想想可口可樂的廣告詞，「我們不是跨國而存在(multi-national)，而是許多本土地方，都可以看到我們的存在(mutliti-local)。」(參見 Webster, 1989; Robins, 1989)

更讓人備覺目眩而混淆的是，對於商業策略走向全球化的全部意涵，我們還沒有能夠掌握，至少就「避開中心」(decentred)或「多中心」(polycentric)的合作方式之出現，以「等距視野」的態度而運作(Kenichi Ohmae, 引自 Robins, 1991: 26)，其意若何，我們尚不能掌握；而這些跨國公司對待所有策略市場，均以同等用心對待之，當它們是「國內」市場，其意若何，我們也還沒有辦法完全掌握。本田公司在日本，在歐洲，在北美洲的運作方式，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對於本田來說，「『海外』這樣的字眼，根本不曾存在，因為這家跨國公司與各個主要顧客，均保持同等距離。」(前引書)放在這樣的脈絡論事，我們的分析必須同時滿足兩種要求，其一是要能實質地善事處理這些文化過程涉及的全球／本土之動態發展，再者則必須扣合微觀與宏觀的分

析層次，唯其如此，我們才能夠讓我們的理論生根，亦才能夠將我們的根基理論化；唯其如此，我們才能夠扣連傳播的家庭內部、本地、全國性與國際性的多種分析面向。





## 參考書目

- Abercrombie, N. and Turner, B. (1978)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9(2).
- Abercrombie, N. et al. (1984)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 London: Allen & Unwin.
- Acland, C. (1989) [Review of *Family Television*], *Journal of Film and Video* 41(3).
- Allen, R. (ed.) (1987) *Channels of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L.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London: New Left Books.
- (1972) *For Marx*,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 Anderson, J. (1987) 'Commentary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 Lindlof (ed.) *Natural Audiences*, Norwood, NJ: Ablex.
- Anderson, J. and Avery, R. (1988) 'The concept of effect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32.
- Ang, I. (1985) *Watching 'Dallas'*, London: Methuen.
- (1987) 'On the politics of empirical audience studies', paper presented to 'Rethinking the Audience' symposium,

- Blaubeuren, West Germany.
- (1989) 'Wanted: audiences', E. Seiter *et al.* (eds) *Remote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 (1990)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5(2-3).
- (1991) *Desperately Seeking the Audience*, London: Routledge.
- Ang, I. and Hermes, J. (1991) 'Gender and/in media consumption', in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 Ang, I. and Morley, D. (1989) 'Mayonnaise culture and other European follies', *Cultural Studies* 3(2).
- Annan Committee (1977)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Future of Broadcasting*, London: HMSO.
- Arnheim, R. (1933;reprinted 1958) *Film as Art*, London: Faber & Faber.
- Appadurai, A.(1986)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ustin, J.(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ines, S.(1989) 'Approaches to home automation', unpublished paper, Center for Urban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Newcastle upon Tyne.
- Bandura, B.(1961) 'Identification as a process of social learning',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 (2).
-

- 
- Barkin, S. and Gurevitch, M.(1987) 'Out of work and on the air',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4.
- Barrington-Moore, Jr(1967) *Th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Barthes, R.(1972) *Mythologies*, London: Paladin.
- (1977)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in R. Barthes, *Image : Music: Text*, London: Fontana.
- Bassett, G. and Wiebe, Z. (1991) 'Television viewing contexts and television genres', paper presented to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Studies Conference, London.
- Baudrillard, J.(1988) *Selected Writing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ausinger, H. (1984) 'Media, technology and everyday lif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6(4).
- Behl, N.(1988) 'Television and tradition in an Indian village', in  
 J. Lull(ed.) *World Families Watch Television*, Newbury Park and London, Sage.
- Bennett, T. and Woollacott, J.(1987) *Bond and Beyond: The Political Career of a Popular Hero*, London: Macmillan.
- Berelson, B.(1952)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Berkowitz, L. (1962) 'Violence and the mass media', Paris Stamford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Stamford, NY: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Berland, J.(1988) 'Placing television', *New Formations* 4.
-

Bernstein, B.(1971)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Vol. 1, London : Paladin.

Bernstein, R.(1978)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Beynon, H.(1973) *Working for Ford*, Harmondsworth: Penguin.

Beynon, H. and Nicholls, T.(1977) *Living with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Bhabha, K. H.(ed.) (1990)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Billig, M.(1987) *Arguing and Think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umler, G., Gurevitch, M. and Katz. E. (1985) 'Reaching out : a future for gratifications research', in K. Rosengren et al. (eds) *Media Gratifications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Bobo, J.(1988) '*The Color Purple*: Black women as cultural readers', in E. Pribram (ed.) *Female Spectators*, London: Verso.

Boddy, W.(1986) 'The shining centre of the home'in P. Drummond and R. Paterson (eds) *Television in Transition*,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Bourdieu, P.(1972a) 'The Berber house', in M. Douglas (ed.) *Rules and Mean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b)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 R. Brown (ed.)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London: Tavistock.
- (1984) *Distinction*, London: Routledge.
- Bourdieu, P. and Passeron, J. C.(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 Brecht, B. (1966) 'The anecdotes of Mr Keuner', in B. Brecht, *Tales from the Calendar*, London: Methuen.
- Brodie, J. and Stoneman, L.(1983) 'A contextualist framework for studying the influence of television viewing in family interactio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4(2).
- Browne, N.(1984)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television supertext', *Quarterly Review of Film Studies* 9.
- Brunsdon, C.(1981) 'Crossroads: notes on a soap opera', *Screen* 22: 4.
- (1986) 'Women watching television', *MediaKulture* 4.
- (1989) 'Text and audience' in E. Seiter *et al.* (eds) , *Remote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 (1990a) 'Television: aesthetics and audiences' in P. Mellen-camp (ed.) *The Logics of Televis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90b) 'Problems with quality', *Screen* 31(1).
- Brunsdon, C. and Morley, D.(1978) *Everyday Television: 'Nation-wid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Brunt, R.(1973) 'The spectacular world of Whicker',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3.

Brunt, R. and Jordin, M.(1986) 'Constituting the television audience: a problem of method', paper presented to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Studies Conference, London, July 1986.

Bryce, J.(1987) 'Family time and television use', in T. Lindlof (ed.) *Natural Audiences*, Norwood, New Jersey: Ablex.

Budd, B., Entman, R. and Steinman, C.(1990) 'The affirmative character of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7(2).

Bulmer, M.(ed)(1975) *Working Class Images of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Bush, C. G.(1983) 'Women and the assessment of technology', in J. Rothschild (ed.) *Machina ex Dea*,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Butler, J.(1990) *Gender Trouble*, London: Routledge.

Byars, J.(1991) *All that Hollywood Allows: Re-Reading Gender in 1950s Melodrama*, London: Routledge.

Cardiff, D. and Scannell, P.(1987) 'Broadcasting and national unity', in J. Curran *et al.* (eds) *Impacts and Influences*, London: Methuen.

Carey, J.(1989) *Culture as Communication*, London: Unwin Hyman.

Carr, E. H.(1967) *What is History?*, Harmondsworth: Penguin.

Carragee, K. (1990) 'Interpretive media study', *Critical Studies in*

---



- Mass Communication* 7(2).
- Castells, M.(1983) 'New 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pace and society', *Space and Society* 1(1).
- Chambers, I.(1974) 'Roland Barthes: structuralism/semiotics',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6.
- (1986) *Popular Culture: The Metropolitan Experience*, London: Methuen.
- Chaney, D.(1972) *Proces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London: Macmillan.
- (1983) 'A symbolic mirror of ourselves: civic ritual in mass societ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5(2).
- (1986) 'The symbolic form of ritual in mass communication', in P. Golding *et al.* (eds) *Communicating Politic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Chen, K. H. (1990) 'Postmarxism', Taiwa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 Cipolla, C.(1978) *Clocks and Culture*, New York, Norton.
- Clifford, J.(1986) 'Partial truths', in J. Clifford and G. Marcus, *Writing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lifford, J. and Marcus, G. (1986) *Writing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ckburn, C. (1985) *Machinery of Dominance: Women, Men and Technical Know-How*, London: Pluto Press.

Cohen, P. and Gardner, C. (eds) (1984) *It Ain't Half Racist Mum*, London: Comedia/Routledge.

Collet, P. and Lamb, R. (1986) 'Watching people watching television', report presented to the Independent Broadcasting Authority, London.

Collins, R.(1988) 'National culaur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 paper presented to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Studies Conference , London, July 1988.

——(1990) *Satellite Television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 John Libbey Books.

Condit, C.(1989) 'The rhetorical limits of polysem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6(2).

Connell, I.(1983) 'Commercial broadcasting and the British Left', *Screen* 24(6).

——(1985)'Blaming the Meeja', in L. Masterman(ed.) *Television Mythologies*, London: Comedia/Routledge.

Connell, I. and Curti, L.(1985) 'Popular broabcasting in Italy and Britain', in P. Drummond and R. Paterson (eds) *Television in Transition*,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Corner, J.(1991) 'Meaning, genre and context: the problematics of 'public knowledge' in the new audience studies', in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Corrigan, P.(1983) 'Film entertainment as ideology and plea-

- sure', in J. Curran and V. Porter (eds) *The British Film Industr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Counihan, M. (1973) 'Orthodoxy, revisionism and guerilla warfare in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mimeo,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Cowan, R. S. (1989) *More Work for Mother*,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Coward, R. (1977) 'Class, culture and the social formation', *Screen* 19(4).
- Critcher, C. (1978) 'Structures, cultures and biographies', in S. Hall and T.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London: Hutchinson.
- Cubitt, S. (1985) 'The politics of the living room', in L. Masterman (ed.) *Television Mythologies*, London: Comedia/Routledge.
- Curran, J. (1976) 'Content and structuralist analysis of mass communication', Open University Social Psychology Course, D305,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1990) 'The "new revisionism" in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5(2-3).
- Curran, J. and Gurevitch, M. (eds) (1991)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 Dayan, D. and Katz, E. (1987) 'Performing media events', in J. Curran et al. (eds) *Impacts and Influences*, London: Methuen.

de Certeau, M.(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e la Haye, Y.(1979) *Marx and Engels on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de Lauretis, T.(1987) *Technologies of Gender*,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de Sola Pool, I.(1977) (ed.)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Telephon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DeLillo, D.(1985) *White Noise*, London: Picador.

Desmond, J.(1989) 'How I met Miss Tootie: the home shopping club', *Cultural Studies* 3(3).

Deutscher, I.(1977) 'Asking questions', in M. Bulmer (ed.)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London: Macmillan.

Docherty, D. *et al.* (1987) *The Last Picture Show*,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Donald, J.(1988) 'How English is It?', *New Formations* 6.

——(1989) *Fantasy and the Cinema*,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Donzelot, J.(1979) *The Policing of Families*, London: Hutchinson.

Downing, J.(1974) 'Some aspects of the presentation of industrial and race relations in the British media', Ph.D. thesi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London.

Douglas, M. and Isherwood, B.(1980) *The World of Good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 Dreitzel, H.(1972) 'Introduction'to H. Dreitzel(ed.) *Recent Sociology* 2, London: Macmillan.
- Drummond, P. and Paterson, R. (eds) (1985) *Television in Transition*,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Drummond, P. and Paterson, R. (eds) (1988) *Television and its Audiences*,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Durkheim, E.(1938)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Dyer, R.(1977) 'Victim: hermeneutic project', *Film Form* 1(2).
- Eco, U.(1972) 'Towards a semiotic enquiry into the television mess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3,
- Elliott, P.(1972) *The Making of a Television Series*, London : Constable.
- (1973)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a critique and a sociological alternative', mimeo, 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 Ellis, J.(1977) 'The institution of the cinema', *Edinburgh 1977 Television Festival Magazine*.
- (1982) *Visible Fictions*, London: Routledge.
- Ericson, S.(1989) 'Theorising popular fiction', in M. Skovmand (ed.) *Media Fictions*,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 Erni, J.(1989) 'Where is the audi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Enquiry* 13(2).

- Evans, W.(1990) 'The interpretive turn in media research',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7(2).
- Feher, M. and Kwinter, S. (eds) (1987) *The Contemporary City*, Cambridge, Mass.:MIT Press.
- Ferguson, M.(1989) 'Electronic media and the redefining of time and space', in M. Ferguson (ed.) *Public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 Feuer, J.(1986) '*Dynasty*', paper presented to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Studies Conference, London.
- (1989) 'Narrative form in American network television', in C. McCabe (ed.) *High Theory/Low Cultur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Fiske, J.(1984) 'Television quiz shows and the purchase of cultural capital', *Australian Journal of Screen Theory* 13-14.
- (1986) 'Television: polysemy and popularit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3.
- (1987a) *Television Culture*, London: Methuen.
- (1987b)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d television', in R. Allen(ed.) *Channels of Discourse*, London: Methuen.
- (1989) 'Moments of television', in E. Seiter et al. (eds) *Remote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 (1990) 'Ethnosemiotics', *Cultural Studies* 4(1).
- Fontaine, J. S.(1988) 'Public or private? The consitution of the family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



- 
- nal of Moral and Social Studies* 3(3).
- Forgacs, D.(1985) [Review of 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 *Marxism Today*, May 1985.
- Foucault, M.(1980a) 'The eye of power', in C. Gordon (ed.) *M.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 (1980b) 'Questions on geography', in C. Gordon(ed.) *M.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 (1986)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16.
- Frith, S. (1983) 'The pleasures of the hearth', in J. Donald (ed.) *Formations of Pleasure*, London: Routledge.
- (1990) [Review article] , *Screen* 31(2).
- Frow, J.(1991) 'Michel de Certeau and the practice of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Studies* 5(1).
- Garmarnikow, E. and Purvis, J.(1983a)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 (1983b) 'Introduction' to E. Garmarnikow and J. Purvis (eds)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 Geertz, C.(1973) 'Thick description', in C.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88)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ell, A.(1986) 'Newcomers to the world of goods: consumption among the Muria Gonds', in A.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

- Life of Th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erbner, G.(1964)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news reporting', *Journalism Quarterly*, 41(4).
- Gewertz, D. and Errington, E.(1991) 'We think, therefore they are? On occidentalising the world',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64(2).
- Giddens, A.(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London: Hutchinson.
- Giglioli, P.(ed.) (1972) *Language and Social Context*, Harmondsworth: Penguin.
- Gillespie, M.(1989)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 *Cultural Studies* 3(2).
- Gilroy, P.(1989) 'Cruciality and the frog's perspective', *Third Text* 5.
- Glaser, B. and Strauss, A.(1968) *Grounded Theor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Glasgow Media Group(1976) *Bad News*, London: Routledge.
- Gledhill, C.(1978) 'Recent developments in film criticism', *Quarterly Review of Film Studies* 3(4).
- (1988) 'Pleasurable negotiations', in E. Pribram (ed.) *Female Spectators*, London: Verso.
- Glyptis, S. (ed.) (1987) *Leisure and the Home*, Loughborough : Leisure Studies Association.
- Golding, P.(1989)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 
- M. Ferguson(ed.) *Public Communications*, London: Sage.
- Goldthorpe, J. and Lockwood, D.(1968)*The Affluent Worker*, 3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odhart, G. J.(1975) *The Television Audience: Patterns of Viewing*, London: Saxon House.
- Goodman, I.(1983) 'Television's role in family interactio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June 1983.
- Gorrell-Barnes, G.(1985) 'Modern systems theory and family therapy', in M. Rutter and L. Herzov (eds) *Modern Child Psychiatry*, London: Tavistock Books.
- Gray, A.(1987a) 'Behind closed doors: women and video', in H. Baehr and G. Dyer(eds) *Boxed in: Women on and in Television*, London: Routledge.
- (1987b) 'Reading the audience', *Screen* 28(3).
- Gripsrud, J. (1989) 'High culture revisited', *Cultural Studies* 3(2).
- Groombridge, B. (1972) *Television and the Peopl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Grossberg, L. (1983) 'Cultural studies revisited', in M. Mander (ed.) *Communication in Transition*, New York: Praeger.
- (1987) 'The In-difference of television', *Screen* 28 (2).
- (1988) 'Wandering audiences, nomadic critics', *Cultural Studies* 2(3).
- Grossberg, L., Nelson, C., Treichler, P.(eds) (1992)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Gunter, B. and Svennevig, M.(1987) *Behind and in Front of the Screen: Television and Family Life*, London: John Libbey.
- Haddon, L.(1988) 'The home computer: the making of a consumer electronic', *Science and Culture* 2.
- Hall, S.(1973a) 'Encoding/decoding in television discourse', reprinted in S. Hall *et al.*, (eds) (1981)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 (1973b) 'The determinations of news photographs',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3.
- (1974) 'Deviancy, politics and the media', in P. Rock and M. McIntosh(eds) *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London: Tavistock.
- (1977) *Notes on 'The Spectacle'*, mimeo,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1978) 'Some problems with the ideology/subject couplet',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3.
- (1980) 'Cultural studies and Centre', in S. Hall *et al.*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 (1982)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in M. Gurevitch *et al.*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Methuen.
- (1986)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0(2).
- (1988a) [Introductory Address,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Studies Conferenc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London, July 198

- 8] .
- (1988b) 'New ethnicities', in K. Mercer(ed.) *Black Film, British Cinema*, London: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
- (1990) 'Cultural studies, now and in the future', paper presented to conference of that titl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pril 1990. Reprinted in L. Grossberg *et al.* (eds)(1992).
- Hall, S., Connell, I., and Curti. L.(1981) 'The unity of current affairs television' in T. Bennett *et al.* (eds) *Popular Television and Film*,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Open University Press.
- Hall, S. and Jefferson, T.(eds)(1978)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London: Hutchinson.
- Hall, S. *et al.* (eds)(1981)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 Hall, T. (1976) *Beyond Culture*, New York: Anchor/Doubleday.
- Halloran, J.(1970a) *The Effects of Television*, London: Panther.
- (1970) *Demonstr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Harmondsworth : Penguin.
- (1975) 'Understanding television' *Screen Education* 14.
- Hammersley, M. and Atkinson, P.(1983) *Ethnograph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London: Tavistock Books.
- Hannerz, U.(1990) 'Cosmopolitasn and locals in world culture', in M.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 Haralovich, M.(1988) 'Suburban family sit-coms and consumer

- product design', in P. Drummond and R. Paterson (eds) *Television and its Audi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Hardy, P., Johnston, C. and Willemen, P.(1976) 'Introduction', *Edinburgh 1976 Television Festival Magazine*.
- Harris, N. (1971) *Beliefs in Socie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Hartley, J.(1987) 'Television audiences, paedocracy and pleasure', *Textual Practice* 1(2).
- Hartmann, P. and Husband, C.(1972) 'The mass media and racial conflict', in D. McQuail, (ed.) *Soci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Hartsock, N.(1987) 'Rethinking modernism', *Cultural Critique* 7.
- Harvey, D.(1985) 'The 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 in D. Gregory and J. Urry(eds)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London: Macmillan.
-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Hassard, J.(1990) *The Sociology of Time*, London: Macmillan.
- Heath, S. and Skirrow, G. (1977) 'Television: a world in action', *Screen* 18(2).
- Hebidge, D.(1979)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n.
- (1988a) *Hiding in the Light*, London: Comedia/Routledge.
- (1988b) 'Towards a cartography of taste', in D. Hebidge, *Hiding in the Light*, London: Comedia/Routledge.
-



- 
- (1990) 'Fax to the future', *Marxism Today*, January 1990.
- Hermes, J.(1991) 'Media, meaning and everyday life', paper presented to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Studies Conferenec, London, July 1991.
- Hill, P.(1979) 'Ideology, economy and the British cinema', in M. Barrett et al. (eds) *Ideolog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London: Croom Helm.
- Hirst, P. (1976) 'Althusser's theory of ideology', *Economy and Society*, November 1976.
- Hobson, D. (1982) '*Crossroads*':*Drama of a Soap Opera*, London: Methuen.
- Hodges, J. and Hussain, A.(1979) 'La police des familles' [review article] ,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6.
- Horton, D. and Wohl, R.(1956)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 *Psychiatry* 19.
- Hoyles, M.(ed.) (1977) *The Politics of Literacy*, London: Writes and Readers Publishing Cooperative.
- Hurtado, A.(1989) 'Relating to privilege: seduction and rejection in the subordination of white women and women of colour',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4(4).
- Hymes, D. (1964) 'Towards ethn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 reprinted in P. Giglioli (ed.) (1972) *Language and Social Context*,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72)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J. Pride and J.
-

- Holmes(eds) *Socio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Innis, H. (1951)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Jameson, F.(1984) 'Postmodernism: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
- Jensen, K.B. (n.d.) *The Politics of Polysemy*, mimeo, 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 (1987) 'Qualitative audience research: toward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recept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4.
- Jensen, K.B. and Rosengren, K.(1990) 'Five traditions in search of an audi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3).
- Johnston, C.(1979) 'The subject of feminist film', in *Edinburgh Television Festival Papers*.
- Jouet, J.(1988) 'The social uses of micro-computers in France', paper presented to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Conference, Barcelona, July 1988.
- Jouet, J. and Toussaint, Y. (1987) 'Telematics and private sphere; the case of the French videotext', paper presented to Data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May 1987.
- Kantor, D. and Lehr, W.(1975) *Inside the Family*, New York : Harper & Row.
- Katz, E.(1959)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and popular cul-
-

- 
- ture', *Studies in Public Communication* 2.
- Katz, E. and Lazarsfeld, P.(1955) *Personal Influence*, New York: Free Press.
- Keddie, N. (ed.) (1973) *Tinker, Tailor: The Myth of Cultural Depriva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King, A.(1980a) *Buildings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1980b) 'A time for space and a space for time ',in A. King(ed.) *Buildings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irby, A.(1989) 'A sense of plac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6(3).
- Klapper, J.(1960) *The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Glencoe, Ill.: Free Press.
- Knorr-Cetina, K.(1989) 'The micro-social order', in N. Fielding(ed.) *Actions and Structures*, London: Sage.
- Kramarae, C. (ed.) (1988) *Technology and Women's Voices*, London: Rutledge.
- Kubey, T.(1986) Television use in everyday lif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ummer 1986.
- Kumar, K. J.(1988) 'Indian families watching television', paper presented to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Studies Conference, London, July 1988.
- Labov, W.(1970) 'The Logic of Non-Standard English' in N. Keddie(ed.) *Tinker, Tailor: The Myth of Cultural Deprivations* , Harmondsworth: Penguin.
-

Laclau, E.(1977) *Politics and Ideology*, London: New Left Books.

Lazarsfeld, P. et al.(1944)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eal, O.F.(1990) 'Popular taste and erudite repertoire: the place and space of TV in Brazil', *Cultural Studies* 4(1).

Lemish, D.(1982) 'The rules of viewing television in public plac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26(4).

Lewis, J.(1983) 'The encoding/decoding model: criticisms and redevelopment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5.

——(1992) *The Ideological Octopus*, London: Routledge.

Lewis, J.et al.(1986) *The Audience for Community Arts*, London: Comedia.

Liebes, T. and Katz, E.(1991) *The Export of Mean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ndlof, T. (ed.) (1987) *Natural Audiences*, Norwood, NJ: Ablex.

Lindlof, T.and Meyer, T.(1987) 'Mediated communication: the foundation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 Lindlof(ed.) *Natural Audiences*, Norwood, NJ: Ablex.

Lindlof, T. and Traudt, P.(1983) '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families', in M. Mander(ed.) *Communication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Praeger.

Lodziak, C.(1987) *The Power of Television*, London: Frances Pinter.

Lull, J.(1980) 'The social uses of television', *Human Communica-*

---

- 
- tions Research* 6(3).
- (1982) 'How families select television programmes: a mass observ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26.
- (1987) 'Audience, texts and context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4.
- (1991) *Inside Family Viewing*, London: Routledge.
- (ed.) (1988) *World Families Watch Television*, Newbury Park and London: Sage.
- McArthur, C.(1981) 'Historical drama', in T. Bennett et al. (eds) *Popular Television and Film*,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Open University Press.
- McCabe, C.(1981) 'Days of hope', in T. Bennett, et al.(eds) *Popular Television and Film*,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Open University Press.
- MacIntyre, A.(1963) 'A mistake about causalit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P. Laslett and W.G. Runciman(eds)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II*, Oxford: Blackwell.
- McLuhan, M.(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McLuhan, M.and Fiore, Q.(1967) *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 New York: Bantam Books.
- McRobbie, A.(1982) 'The politics of feminist research', *Feminist Review* 12.
- McRobbie, A.and Garber J.(1976) 'Girls and subcultures', in J.
-

- Clarke *et al.*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London: Hutchinson.
- Maddox, B.(1977) 'Women and the switchboard', in Sola de Pool(ed.)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Telephon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Mann, M.(1970) 'The social cohesion of liberal democra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June 1970.
- (1973) *Consciousness and Action among the Western Working Class*, London: Macmillan.
- Marcus, G. and Fischer, M.(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rtin, G.(1973) 'The press', in D. Thompson, (ed.) *Discrimination and Popular Cultu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artin-Barbero, J.(1988) 'Communication from cultur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0.
- Marx, K.(1973) *Grundrisse*, trans. Martin Nicolau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ascia-Lees, F. E. *et al.* (1989) 'The postmodernist turn in anthropology: caution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Signs* 15(1).
- Massey, D.(1991a) 'The political place of locality studi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3(2).
- (1991b) 'Flexible sex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D): Society and Space* 9(1).
-



- 
- Mattelart, A. and Dortmann, A. (1979) *How to Read Donald Duck*,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 Mattelart, A. et al.(1987) *International Image Markets*, London: Comedia.
- Mayer, M.(1977) 'The telephone and the uses of time ',in Sola de Pool (ed.)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Telephon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Medrich, E.(1979) 'Constant television: a background to everyday lif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6(3).
- Mercer, K.(1990) 'Black art and 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Third Text* 10.
- Merton, R.(1946) *Mass Persuas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Merton, R. and Kendall, P.(1955) 'The focussed interview', in P. Lazarsfeld and M. Rosenberg (eds), *The Language of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 Merton, R. and Lazarsfeld, P. (1948) 'Communication, taste and social action', in L. Byron (ed.),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New York: Cooper Square.
- Meyerowitz, J.(1985) *No Sense of Pl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9) 'The generalised elsewher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6(3).
- Miller, D.(1987) *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 Miller, D.(1992) 'The young and the restless in Trinidad', in R. Silverstone and E. Hirsch(eds), *Consuming Technologies*, London: Routledge.
- Mills, A. and Rice, P.(1982) 'Quizzing the popular', *Screen Education* 41.
- Mills, C. W.(1939) 'Language, logic and culture', in C.W. Mills,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dleski, T.(1984) *Loving with a Vengeance*, London: Methuen.
- (ed.) (1986) *Studies in Entertainme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90) *Feminism without Women*, London: Routledge.
- Moore, S.(1988) 'The box on the dresser: memories of early radio',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0(1).
- Moorhouse, H. and Chamberlain, C.(1974) 'Lower class attitudes to the British political system', *Sociological Review* 22 (4).
- Morley, D.(1974) 'Reconceptualising the media audience', stencilled paper,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1976) 'Industrial conflict and the mass media', *Sociological Review*, 24(2).
- (1980)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1981a)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a critical postscript',

*Screen Education* 39.

- (1981b) 'Texts, readers and subjects', in S. Hall *et al.*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 (1986) *Family Television*, London: Comedia/Routledge.
- (1989) 'Changing paradigms in audience studies', in E. Seiter *et al.* (eds), *Remote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 (1990a) 'Behind the ratings', in J. Willis and T. Wollen (eds), *Neglected Audiences*,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1990b) 'The construction of everyday life', in D. Swanson and D. Nimmo(eds) *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Newbury Park and London: Sage.
- (1991a) 'Where the global meets the local', *Screen* 32(1).
- (1991b) 'The consumption of medi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1(2).
- Morley, D. and Robins, K.(1989) 'Spaces of identity', *Screen* 20(4).
- Morley, D. and Robins, K. (1990) 'No place like Heimat', *New Formations* 12.
- (1992) 'Techno-orientalism', *New Formations* 16.
- Morley, D. and Silverstone, R. (1990)'Domestic communication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2(1).
- (1991) 'Communication and context', in N. Jankowski and K. B. Jensen(eds)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 Morris, M.(1988) 'Banality in cultural studies', *Block* 14; reprint-

- ed in P. Mellencamp (ed.) *Logics of Televis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Murdock, G. (1973) 'Mass medi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in N. Armistead (ed.) *Reconstructing Social Psycholog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89a) 'Cultural studies: missing link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s* 6(4).
- (1989b) 'Critical Inquiry and audience activity', in B. Dervin *et al.* (eds)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Vol. 2, Newbury Park and London: Sage.
- (1990) 'Television and citizenship', in A. Tomlinson (ed.) *Consumption, Identity and Style*, London: Comedia.
- Murdock, G. *et al.* (1989) 'Home computer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 complex commodi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forthcoming).
- Naumann, M.(1973) *Gesellschaft-Literatur-Lesen*, Berlin : Aufbau-Verlag.
- Nava, M.(1987) 'Consumerism and its contradictions', *Cultural Studies* 1(2).
- Neale, S.(1977) 'Propaganda', *Screen* 18(3).
- Newcomb, H. and Hirsch, P.(1984) 'Television as a cultural forum', in W. Rowland and B. Watkins (eds) *Interpreting Television*, Newbury Park: Sage.
- Nice, R.(1978) 'Pierre Bourdieu: a "vulgar materialist" in the

- sociology of culture', *Screen Education* 28.
- Nicholls, T. and Armstrong, P.(1976) *Workers Divided*, London: Fontana.
- Nightingale, V. (1986) 'What's happening to audience research?', *Media Information Australia* 39.
- Nordenstreng, K. (1972) 'Policy for news transmission', in D. McQuail (ed.) *Soci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 Harmondsworth: Penhuin.
- Norris, C. (1991)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rev. edn., London: Routledge.
- Nowell-Smith, G.(1977) 'Editorial', *Screen* 18(3).
- O'Connor, A.(1989) 'The problem of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6(4).
- Ohmae, K.(1989) 'Managing in a borderless worl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7(3).
- Open University (1981) *Course U203 Popular Cultur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Parkin, F.(1971)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London: Paladin.
- (ed.) (1974) *The Social Analysis of Class Struggle*, London: Tavistock Books.
- (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London: Tavistock Books.
- Pateman, T.(1974) *Television and the February 1974 General*

- Election*,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Paterson, R.(1987) 'Family perspectives on broadcasting policy', paper presented to British Film Institute Summer School.
- Pêcheux, M.(1982) *Language, Semantics and Ideology*, London: Macmillan.
- Peters, M.(1987) [Review of *Family Television*], *Initiatives* (SEFT), April 1987.
- Piepe, A. *et al.* (1975) *Television and the Working Class*, London: Saxon House.
- Pollock, F.(1955) 'Empirical research into public opinion', reprinted in P. Connerton(ed.) *Critical Sociolog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 Poulantzas, N.(1971)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 Press, A. (1991) *Women Watching Televis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Pride, J. and Holmes, J.(1972) *Socio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Rabinow, P.(1977)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adway, J.(1984a) 'Interpretative communities and variable literacies', *Daedalus*, Summer 1984.
- (1984b) *Reading the Romanc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British edition, London: Verso
-



Books, 1987.

——(1988) 'Reception study', *Cultural Studies* 2(3).

Rakow, L.(1988a) 'Gendered technology, gendered practic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5.

——(1989b) 'Women and the telephone, the gendering of a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n C. Kramarae (ed.) *Technology and Women's Voices*, London: Routledge.

Rath, C.D.(1985) 'The invisible network: television as an institution in everyday life', in P. Drummond and R. Paterson (eds) *Television in Transition*,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88) 'Live/life: television as a generator of events in everyday life', in P. Drummond and R. Paterson(eds) *Television and its Audi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Rawlence, C.(ed.) (1985) *About Time*, London: Jonathan Cape.

Richards, I.(1960) 'Variant readings and misreading', in T. Sebeok (ed.) *Styl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Riley, D.(1988) *Am I That Name? Feminism and the Category of 'Women' in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Riley, J. and Riley, M.(1959)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social system', in R. Merton (ed.) *Sociology Today*, New York: Free Press.

Robins, K.(1989) 'Reimagined communities', *Cultural Studies* 3(2).

- (1991) 'Tradition and translation', in J. Corner and S. Harvey (eds) *Enterprise and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 Robins, K. and Webster, F.(1986) 'Broadcasting politics', in *Screen* 27(3-4).
- Rogge, J. U. and Jensen, K.(1988) 'Everyday life and television in West Germany', in J. Lull (ed.) *World Families Watch Television*, London: Sage.
- Rorty, R.(1978) 'Philosophy as a kind of writing', *New Literary History*, X.
- Rosen, H.(1972) *Language and Class*, Bristol: Falling Wall Press.
- Rosengren, K.(1985) 'Growth of a research tradition', in K. Rosengren *et al.* (eds) *Media Gratifications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Ross, A.(1988) 'All in the family', *Camera Obscura* 16.
- Rothschild, J.(ed.) (1983) *Machina ex Dea*,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 Runciman, W.(1983) *A Treatise on Social Theory*,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utherford, J.(ed.) (1990)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Ryle, G.(1949) *The Concept of Mind*, New York: Barnes & Noble.
- Said, E.(1978) *Oriental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 Sangren, S.(1988) 'Rhetoric and the authority of ethnography',
-

*Current Anthropology*, 29.

Saussure, F. de(1974)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ondon: Fontana.

Scannell, P.(1988) 'Radio times: the temporal arrangements of broadcasting in the modern world', in P. Drummond and R. Paterson (eds) *Television and its Audi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89)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and modern public lif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1.

Schiller, H.(1981) *Who Knows? 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 Norwood, NJ: Ablex.

——(1988) 'The erosion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by the world business system', in M. Taber (ed.) *The Myth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London: Sage.

Schlesinger, P.(1987) 'On national identity',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26(2).

Schroder, K.(1987) 'Convergence of antagonistic traditions ?',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2.

Schudson, M.(1987) 'The new validation of popular culture: sense and sentimentality in Academi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4(1).

Schutz, A.(1963) *Collected Papers*, I, Den Hague: Martins Nijhoff.

Seaman, W.R.(1992) 'Active audience theory: pointless populism',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4.

Seiter, E.(1990) Making distinctions in television audience research', *Cultural Studies* 4(1).

Seiter, E. et al. (1989a) 'Introduction', in E. Seiter et al. (eds) *Remote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Seiter, E. et al.(1989b) 'Towards an ethnography of soap opera viewers', in E. Seiter et al. (eds) *Remote Control* , London: Routledge.

Silverstone, R.(1981) *The Message of television*, London: Heinemann.

——(1988) 'Television. myth and culture', in J. Carey (ed.) *Media, Myths and Narratives*, London: Sage.

——(1989) 'Television: text or discourse?' *Science as Culture* 6.

——(1990a)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the television audience', in M. Ferguson (ed.) *Public Communication The New Imperatives*, London: Sage.

——(1990b) 'Communication is a carp', working paper, Centre for Research in Innovation, Culture and Technology, Brunel University.

Silverstone, R., Hirsch. E. and Morley, D.(1990)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household', discussion paper for Centre for Research in Innovation, Culture and Technology, Brunel University. Reprinted in R. Silverstone and E. Hirsch (eds) (1992) *Consuming Technologies*, London: Routledge.

---

- 
- (1991) 'Listening to a long conversation: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to ICT in the home', *Cultural Studies*, 5(2).
- Silverstone, R., Morley, D. et al. (1989) 'Families, technologies and consumption', working paper, Centre for Research in Innovation, Culture and Technology, Burnel University.
- Siskind, J.(1992) 'The invention of Thanksgiving: a ritual of American nationality',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12(2).
- Skirrow, G.(1986) 'Hellivision: an analysis of video games', in C. McCabe(ed.) *High Theory/Low Cultur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Slack, J. D. (1989) 'Contextualising technology', in B. Dervin et al. (eds),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Vol. 2, London: Sage.
- Soja, E.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 London: Verso.
- Spigel, L.(1986) 'Ambiguity and hesitation: discourses on television and the housewife in women's magazines', paper to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Studies Conference, London, July 1966.
- (1992) *Make Room for TV: Television and the Family Ideal in Post-war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pivak, G.(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 Nelson and L. Grossberg(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tam, R.(1983) 'Television news and its spectator', in E. Kaplan(ed.) *Regarding Television*, Vol. 2, New York: Amer-
-

ican Film Institute.

Thompson, E. P.(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Past and Present* 38.

Tomlinson, A.(1989) 'Home fixtures: doing it yourself in a privatised world', in A. Tomlinson(ed.) *Consumption, Identity and Style*, London: Comedia/Routledge.

Towler, R.(1985) 'Beyond head counting', paper to the Royal Television Society Convention, Cambridge.

Turkle, S.(1988) 'Computational reticence: why women fear the intimate machine', in C. Kramarae (ed.) *Technology and Women's Voice*, London: Routledge.

Turner, G.(1990a)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Unwin Hyman.

——(1990b) 'It works for me: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 Australian film', paper presented to 'Cultural studies: now and in the future'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pril, 1990. Reprinted in L. Grossberg et al. (eds) (1992).

Voloshinov, V.(1973)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Walkerdine, V.(1987) 'Video replay: families, films and fantasy', in J. Donald and C. Kaplan (eds) *Formations of Fantasy*, London: Methuen.

——(1988) *The Mastery of Reason: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 the Production of Rationality*, London: Routledge.
- Wallman, S.(1984) *Eight London Households*, London: Tavistock Books.
- Webster, D.(1989) 'Cocacolonisation and national cultures', *Overhere* 9(2).
- Webster, F. and Robins, K.(1979)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R. Miliband and J. Saville (eds)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 Wellman, B.(1979) 'The community ques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
- Willemen, P.(1978) 'Notes on subjectivity', *Screen* 19 (1).
- (1990) [Review of J. Hill *Sex, Class and Realism: British Cinema 1963-1965*] , in M. Alvarado and J. O. Thompson (eds) *The Media Reader*,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Williams, R. (1970) 'The local press', *The Listener*, 15 October 1970.
- (1976) *Keywords*, London: Fontana.
- Williamson, J.(1986) 'The problems of being popular', *New Socialist*, September 1986.
- Willis, P.(1978) *Learning to Labour*, London: Saxon House.
- (1981) 'Notes on method', in S. Hall et al.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 Wober, M.(1981) 'Psychology in the future of broadcasting research',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34.

- Wolf, M. et al.(1982) 'A rules-based study of television's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26(4).
- Woods, R.(1977) 'Discourse analysis: the work of Michel Pêcheux',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2.
- Woolfson, C.(1976) 'The semiotics of workers 'speech'',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9.
- Worpole, K.(1983) *Dockers and Detectives*, London: Verso.
- Wright, P. (1975) *On Living in an old Country*, London: Verso.
- (1985) *On Living in an Old Country*, London: Verso.
- Wright, R.(1960) 'Functional analysis and mass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4.
- Zaretsky, E.(1976) *Capitalism, the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London: Pluto Press.
- Zimmermann, J.(1983) *The Technological Woman*, New York: Praeger.
-

□	□
□	□
□	□
□	□
□	□